民國叢書

第三編

·65·

歷史·地理類

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　　陳端志著

「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　　「五四」卅周年紀念專輯編委會編

上海罷市實錄　　海上閑人編

上海書店

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

陳端志著

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

全一冊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版

定價壹元貳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作者 陳端志
發行人 顧湘姚
總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分售處
上海 大公報 開明書店 新生命書局 北新書局
各埠 各大書店

獻辭

一我今天看見歷史上誕生了一個新紀元！一

這是正當一七八九年法蘭西民族在萬難的環境中掙扎着，終於在滑爾梅之戰（Battle of Valmy）擊破了自由平等的敵人，德國少年詩人哥德（Goethe）親自跑到前敵所說的話。

的確，法蘭西大革命委實是人類在平靜生活的過程中一次巨大的波瀾，這波瀾便劃分了歷史的時代，不過歷史彷彿是一部車輪，繼續不斷的向着時代前進，我們雖然不敢斷定這部車輪前進經過的程途，但是可以探索過去的輪跡。我們知道法蘭西大革命的爆發，乃是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所放的許多花朵中的一顆果實：什麼宗教革命產業革命，民主革命，非美亞澳四大洲的侵略，地球上有色人種的征服，以及近世西洋文化的種種怪劇，都是從這文藝復興中

以奔放式而演出來的。所以文藝復興纔是人類歷史上誕生新紀元的原動力，劃時代轉變的鈕帶。

我愛西方的文藝復興，牠崇古而不忘新生命的探討！

我愛西方的文藝復興，牠在人道主義運動之下，解放了個人自由；他在混亂殘殺的世變中，建設了獨立的人格！

我愛西方的文藝復興，牠有熱情反抗如米開蘭基羅，(Michelangelo) 牠有智慧卓絕如達芬奇；(Da Vinci) 前者詛咒此世界，還指示光明的出路；後者帶着諷刺的微笑，但未失去人間的同情。

要之，文藝復興是人類精神之春雷，一震之下，萬卉齊開，五采繽紛，無美不備。牠雖策源於意大利，却能因地因時而撒下許多不同的種子，各地種子舒芽放苞之後，又產生着許多特殊的花果，牠終於高飛遠及，散偏於全世界的通都大邑，散偏於全世界的窮鄉僻壤。

但是牠還遺忘了世界之一角，牠還沒有移植於東方古國之域中。雖在最近一世紀中，被那狂風驟雨吹了過來，而這失去了時序和不自然的播種，免不了「橘逾淮為枳」的古話，佳穀生

矣，黃禍亦隨之以出。故從鴉片戰爭撞開了東方古國之門後，其間也曾好幾次把數千年鬱蘊債蓄的氣運，迸裂發作起來，例如太平天國，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等等，可是中華民族經過長時期的苦悶犧牲，依然如在黑暗恐怖之中世紀中。尤其是五四運動，牠已把閉智塞聰禁慾殺精的宗法封建社會，掀起了絕大的波瀾，牠很像上承西方文藝復興的餘緒，下開東方古國「一再生」的[illegible]而，而爲近代中國推動劃時代轉變的大炸彈，不料這東方的文藝復興之五四運動，風停雨止而後，早被這封建殘餘緊緊地圈收錮蔽，一時再也不會迸裂發作了。

赫格爾說：「歷史時常重複的。」那麼緊緊地圈收錮蔽的五四運動的種子，總有一天折窗毀壁，發生波瀾。可是被人稱爲自古反動的和保守的中華民族，已不允其再走錯路了；我們希望是繼續着當年五四運動的精神，我們望希是開始走上東方文藝復興的道路，我們希望用歷史的方法從人類過去的痕跡，推測將來民族出路的途徑，我們並不作任何的暗示，我們祇就歷史的事實，作一種客觀的分析。

「我人惟進德修業二事最靠得住，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則我之尺也，得寸則我之寸也。」

這是今後我們對己的態度。

「我之欲興，天莫之阻；我之欲亡，天莫之助。」

這是今後我們對社會國家的精神。最後我把哥德讚美滑爾梅的勝利的一句話，改成爲：

「我們今天推動歷史上誕生了一個新紀元！」

一九三五、五、四、即五四運動的第十六週年端志誌於上海。

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目次

是幻想　中國往那兒去　開始壯烈的革命鬥爭　人類社會的歷史前程　思想運動　澈底破壞與澈底創造　不堪回首的往事當作成功之路的明燈

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

第一編　導言——從西方文藝復興說到東方文藝復興

中世紀末以前東方總是侵略者　文藝復興改變了歐洲人的形相與結構　文藝復興的意義　文藝復興的場所與主角　中世紀游牧民族的逞威　西亞地位的重要　戰爭通商傳教爲媾通文化的媒介　羅馬教皇意外的收穫　蒙古西侵撒下文藝復興的種子　東方的黑暗時代　東方讓給了領導的地位　儒學的大反動　東方失却復興機會　理學的反動　近代西方文化初期輸入的失敗　清初西方文化輸入的中止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洋務政策　今文學家的維新運動　甲午後的直接閱讀西方書報　經生文人爲政治重心　維新革命二派介紹西方政治思想　狹義的民族運動　五四運動何以稱爲東方的文藝復興　國內國外二種刺激暴發着空前的轉變　找出問題的背景　中國必將跳舞起來

在人類歷史上東方總是勝於西方，西方到中世紀末造和近代的開端，東方仍是侵略者：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俄羅斯的蒙古人，匈牙利的土耳其人，都是勝利的亞洲人的前哨。正如上古時東方

的宗教觀念，學術文藝和手工藝，爲希臘人所獵取同化和取而代之。中古時代初期，正當羅馬帝國瓦解時候，來自西亞的文化，把牠換了一副面目，成爲中古時代後期的阿拉伯哲學和科學，而爲改造近代歐洲最重要的動力。

但是東方的力量，似已盡於此了，不獨在回教國內，即在印度，即在世界上開化最早之中國，偉大的文明創造時代，似乎久已告終了。牠們的文化生活在停滯中，且在將來似無發展之望。三四百年來西方的歐洲，已煥然一新；在同一時期內，東方却像是沈入於永久的靜止狀態中，不論政治的變遷和朝代的隆替，從沒有把牠的社會秩序，政治形式和經濟制度革新了分毫。

西方在中古時代，我們所見到的歐洲人，是愚蠢的，呆滯的，毫無生氣的，他們除了宗教生活之外，沒有別種生活，除了伺候王公貴族以外，沒有別的人生的目的，他們的心靈是遲緩，他們的行動是笨拙，他們和同時代的全世界各民族比較起來，他們遠不如東方的中國人，也不如創造回教的阿拉伯人，並且也不如單以武力見長的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在那時誰也不會信過了幾世紀後，在西方跳出這麼一個又生動又雄偉又燦爛的近代歐洲人和歐洲文化來。在這兩個不同時代的中間，有顯然過渡之跡象，這跡象的最重要之一幕便是所謂文藝復興(reneissance)

時代歐洲人和歐洲文化受了文藝復興的洗禮以後，不但改變了形相，並且改變了結構，從此他們不再給東方所侵略而反來侵略東方了。所以文藝復興是使十七世紀歐洲蛻變爲十九世紀歐洲的關鍵，也是東方和西方變換侵略地位的鴻溝。

當一四五三年黃色的新興民族奧脫曼土耳其(Otman Turks)的回教帝國，攻陷東羅馬都城君士坦丁堡以後，僅存一線的希臘文化，摧殘殆盡，老師宿儒，多逃往意大利的都市，苟延殘喘，這些學者們將他們的希臘智識，帶給了熱情興奮的意大利人，就開了風飈雲湧的文藝復興之花。那來自北方森林中的日耳曼民族，一副精強的體魄，新鮮的血輪，出得山來，就遇着閉智塞聰的宗教，緊緊地圈收錮蔽，一直鬱蘊積蓄到一千年之久，已經不能再忍受那種枯寂黑暗的無聊生活，漸漸有要求心靈解放的需要了。在這種心靈解放的高潮中，便把文藝復興的種子，舒芽放芭，芬芳滿野，爲歐洲開闢一個新天地；什麼宗教革命、產業革命、民主革命等等的西方人所認爲人類文化空前的偉大奇蹟，都是從這文藝復興一幕中搬演出來，所以近代的西方人和西方文明，最多也不過四五百年的歷史，前乎文藝復興時代，西方人和西方文明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重要的紀載，文藝復興是近代西方人活動的第一頁，也是近代西方文明奔放的第一頁。

原來文藝復興的原義，是再生（Rebirth）復活（Revival）的意思，指着所有的一切，由中古過渡到近代的社會，政治，經濟，科學，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的種種變遷，（註二）並不像一般史家所說的是指中古末期在意大利躍起的一些對於古典文學學問以及藝術的新興奮，更不是如衞道者所歌功頌德的一種近古時代的復古運動。牠並不是真的囘轉到古代，不過以研究古學開端，是指希臘與羅馬的古學之復活，而所走的完全是新的途徑，所以隨着古學復活的，還有許多其他的新事物應運而生，我們要抓住這個運動的靈魂——人文主義，便可知道牠不僅使學問與藝術復興，而且使人類的理性，從神的威權之下，得到一個解放，因而奠定了現代人類社會的基礎。這個運動，好比一顆石子，投在水中，所起的漣漪，由一點而推到很遠，有古學的復興因而形成了人文主義，從而在一方面做方言文學的動力，一方面做理性解放的鑰匙，更間接而發生了宗教革命。再往前看，則因方言文學而牽涉到國家的發現，因理性解放而牽涉到世界的發現——以至於由政治哲學發達而牽涉到法國大革命，由科學應用而牽涉到產業革命，詳細推跡起來，當時所起的漣漪，到現在全人類的生活中，還受到牠的波浪的推動，所以文藝復興不僅是西方歐洲光榮史的一頁，也是全部人類歷史中最重要之一幕。

文藝復興的策源地，是在近代歐洲諸國之大師兄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主角，無疑的是意大利人和北歐新興的諸民族。無論從廣義的說，或是從狹義的說，牠總究是西歐的文藝復興。可是推動新機運，趕上新途徑，使閉塞了七八百年的歐洲人，重復躍起而爲造成新世紀的準備的，却是東方的許多民族：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對於西歐文化的復興，均有極大的助力。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不過是一件顯著的導火線；其原因還在東方蒙古人的西征，與西亞阿拉伯的創造囘教。

爲了蒙古人的數度西征，東西交通因之開展；爲了阿拉伯人的創造囘教，東西文化因之傳遞。因爲在中古以前，人類交通的開展與文化的傳遞，除了靠着商人的力量外，戰爭也是一種重要的因素。在中世紀時，東西世界完全屈服於游牧民族：東方的中國，自唐室衰微以後，經過了五代紛亂時期，至宋代始行統一，遼金相繼南侵，宋僅保有長江流域，互訌不息，卒爲蒙古人覆亡，明朝繼起，自始就不是一個武功鼎盛的朝代，北方游牧民族的活躍，更甚於前；這是在東方的中國方面在看西方的羅馬帝國，自北歐日耳曼人南侵以後，社會日趨於崩毀，政治日見其紊亂，到了四七六年有個日耳曼軍人叫做郭多瓦(Odoacer)的，把最後的羅馬皇帝綸繆範斯(Romu

之趕走，西羅馬便給蠻族傾覆；都於君士坦丁堡的東羅馬帝國，以其所處地位之優越，曾有一個短時期之隆盛，然自大食帝國興起以後，也便日趨於衰落。當時在歷史舞台上主要的角色，爲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和日耳曼人，除日耳曼人他的活動地點僅從北歐到南歐外，其他三種民族，足跡所至，幾徧歐亞兩洲，而其活動之重要場所，又都集中在西亞一帶，故當時亞洲西部情形最爲複雜，地位最爲衝要，史家稱上古文化由東而西，中古文化由西而東，所謂由西而東者，即由地中海移到印度洋，西亞既爲中西各種遊牧民族逐鹿之場，又爲中古東西民族混戰之地，以戰爭而東西交通愈頻，又以戰爭而文化傳遞愈速，於是本爲上古人類文明之老家，至此而成爲東西文明溝通之媒介。所以如果認爲意大利是文藝復興之母，那麼西亞可稱爲文藝復興之外婆；如果認爲意大利人與日耳曼人是文藝復興之主角，那麼阿拉伯人蒙古人與土耳其人可稱爲文藝復興之鼓手。

除了戰爭與隨戰爭而來的商人，負着中古時代傳遞文化之使命外，還有更有力的分子，就是教徒，西亞本爲各派宗教之發祥地，他們在中古時代，借着政治的力量，整個的歐洲，都給牠支配去了；就是對於東方，在唐朝時候，已有不少的宗教徒到中國來，在第七世紀至第十世紀年代，

中國的長安竟有世界人種博物院與宗教陳列所的名稱，所以中國與西亞的交通，在唐朝以後，已經很是密切，到了元朝東西交通之盛，尤甚於前，羅馬教皇既在歐洲做了皇者之皇，又想用宗教力量來感化這獷悍無比的蒙古人，以求得意外的收穫，便派柏朗嘉賓（Jhon of Pianode Carpini）（註二）到和林說教，事雖失敗，然因此引起歐洲人到東方的熱情，與蒙古人引用色目人之動機，而有威尼斯商人尼哥羅孛羅（Nicolo Polo）弟兄隨旭烈兀的使者，同至中國謁見忽必烈大汗的故事，又以大汗的寵悅，而有其子馬哥孛羅（Marco polo）供職元朝，官至樞密副使的佳話。（註三）當時西方人到中國的很多，他之所以特別重要，就在乎他把居留中國十七年中所見所聞的寫成馬哥孛羅遊記（The Travelsof Marcop lo）一書，在這書裏，他盛稱中國的社會，農業，建築，以及綢緞之美麗，城市之繁盛等等，都是西方人聞所未聞的奇蹟，這部書風行了全歐洲，和聖經一樣地家喻戶曉，歐洲人讀了這書，他們才知天地間還有許多事物是聖經中所沒有提及的，他們才知天地間除了他們所住的歐洲外，必有出乎意外的錦銹河山，於是他們相信聖經以外，還有可讀的書，歐洲以外，還有可住的世界。

這是羅馬教皇派遣柏朗嘉賓所意想不到的收穫，獷悍的蒙古人，沒有給基督教義所感化，

反而因爲一個商人兒子在東方回來，寫成的一篇遊記，却把基督教在西方的基礎動搖了。歐洲人讀了遊記以後，一方面對於「神」的懷疑，覺得這個世界並不這樣狹小，還有許多在聖經中未曾提及的祕密，使朝着人的發現路上走；他方面見到書中所記的東方是富有吸引力的，富有神祕性的，耳聞不如目見，於是爲了一種好奇心的驅馳，便成了後來世界發現的遠因之一。

與這種教會統治的解體，情形正相反對的，便是新都市和新國家之興起，牠的背景爲中古封建社會之崩潰，與商人階級的興起，又以十字軍與土耳其的混戰，以及蒙古人西侵的結果，給西歐人帶來了許多創造新時代很好的工具，如火藥，羅盤針，印刷術和造紙法等等。火藥幫助新興君主摧毀貴族們的堡壘，羅盤針幫助航海者作更遠的探險，印刷和造紙却與新興講學中心的大學，同爲幫助思想學問解放的三傑。十三世紀以後歐洲，不但在神學，哲學，文學，藝術各方面都起了重大變化，科學的曙光，亦如點點星火，隱傳於西歐各地沈默黑暗的中世紀中，因此潛伏在土中的新世紀種子，也在那裏萌生蘖長，經過了若干時代霹靂一聲，萬卉競放，久被窒息的歐洲人，穿了文藝復興的新裝，重復活躍起來，準備着担任近世人類歷史的嚮導。

文藝復興以後東方與西方領導的地位倒置了，在過去，東方總是侵略者；此後，西方反爲侵

略者了。

物極必反，西方在中世紀經過了長時期的黑暗時代，文藝復興的反動運動是必然的產物。但是中世紀造成黑暗時代主要的遊牧民族，他們混戰的範圍幾徧歐亞各地，在東方從三世紀到四世紀末，即三國和東西晉時代，中國歷史上和西歐同樣的來了一個可怕的黑暗時代。其在黑暗時代中，也和西歐一樣地爲了民族大轉移而發生異民族的大調和；又在黑暗時代中，也曾爲了外來文化的輸入，而形成別開生面之新文化。中國自北方五胡民族侵入以後，不但思想與信仰受了影響，即藝術上也生極大變化。秦漢以前，中國的藝術觀念本很薄弱，五胡亂華以後，東西交通重行恢復，幾乎全部被外來的藝術所征服，文學，戲劇，繪畫，音樂，乃至建築，雕刻，無不如此。自東晉直到北宋，這幾百年中間，爲中國文化思想界發生空前之轉變，那時中國第一流思想家如智顗玄奘玄密窺基等，都用全副精力，研究印度哲學，翻譯佛學經典，從此中國人對於佛教才有正確的觀念。又以梁武帝陳武帝等都曾幾度舍身於佛寺，上行下效，佛教遂正式成爲民間的信仰，社會各方面，如風俗習慣等，也都滲有印度文明的成分。中國文明印度化的結果，中國人的向後思想，和出世觀念，日益增長，對於控制自然的努力，遠遜於前，而其創造之思想，也遂趕不上

先秦時代：中國經過長時期黑暗時代以後，不能繼之以類似西方的文藝復興時代，因之中世紀後，東方漸退於被侵略的地位，把人類文明的領導權交給西方，從此西方的文明，扶搖直上，而東方自甘退處於靜穆之鄉。

宋朝是印度文化傳入中國後最為成熟的時期，也是中國民族趨於墮落的一個起點，而在儒學方面，卻起了一個極大反動。中國學術思想界到了漢代，只知墨守成法，不事創造，及於後漢，訓詁學異常發達，就鬧到「碎義逃難，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義，白首而不能通的地步」。（註四）降及魏晉，老莊之說大行，於是授老莊以入儒，就為當時的風尚，嗣以佛教盛行，學者遂授釋以入老莊，進而更授釋以入儒，這種風尚，都是漢季專重訓詁的反動：到了末流，便率性談佛，政治上的混亂黑暗，思想上的煩悶凌雜，極個人主義和縱慾生活的發展，使儒學陷於不可挽救的悲境。至宋儒便力崇實踐，專事修養，恢復孔子之學，以救佛學末流之弊，要把生機剝盡，死氣沉沉的學術思想界，由復古而解放，是即宋儒之理學。理學之興，確是中國思想界起了一大革命，不過印度文明輸入中國以後，交盪互激，無跡可尋，理學家雖不承認和佛家禪宗有何關係，其實理學家之精闢獨到之見，總免不了給印度文明滲透化合。（註五）當時西方的文

化，已突飛猛進，中國宋朝的哲學，也突起新局，可惜中國人終於給印度文明所束縛，而不能改變其向後思想，結果，除了把儒學哲學化外，未曾救得佛學之弊，更未曾走上復興之途，這是中世紀後，東方失去了復興機會，趕不上西方的所在。

歷宋，元，明三代，儒家成爲一尊，理學便爲學術之中心，甚至把朱子看作卽是眞理，這種學說的末流，過於篤信謹守，他的弊病，便是拘迂，所以統治階級便利用牠來束縛人心。姚江王守仁倡知行合一之說，謂知只是行的主意，行只爲知的功夫，其討論直捷簡易，一反朱學支離拘迂之病，一時思想界所受朱學的束縛，頓爲解放，明代理學的趨勢，便劃成一新時期。惟學者承其風氣，都注重侈談心理，輕視誦讀功夫，其末流不惟束書不觀，就是思想也只能掇拾性理爛語，陳陳相因，甚至蔑棄社會上一切信仰，而有猖狂自恣的行爲；理學走到這樣百病交作的地步，自然要引起人們的反感。明末一般學者，鑒於流寇和外患交作，士大夫高談正心誠意之辨，無救於國亡種淪之慘，對於王學末流空疏放縱的弊病，紛紛起來提出合理的修改，或深刻的抨擊，顧炎武竟謂明代之亡，實由於此（註六）於是學術思想又生反動，六百年一脈相傳的理學，遂在知恥博文，（註七）經世致用（註八）的標榜之下，又爲之一變。

西方的文化，自蒙古帝國瓦解後，東西交通，一時斷絕，歐洲亦因宗教改革等問題，無暇東顧，東西文化，僅在元代一度接觸，並無若何進展。到明朝中葉，世界已換了一個新局，印度新航路與環遊世界一週，又在發現新大陸後，俱告成功，（註九）西方的學術思想，隨着歐洲人傳教與通商而開始輸入，外來文化，自唐代佛典翻譯之風衰，至是始有翻譯西洋科學的盛舉。惟所譯之書，偏重物質科學，而忽于社會科學，明末以後，學者激於亡國之痛，正致力於政治運動，以謀恢復明室，與初期輸入之西學，初無若何影響，故理學轉變後，雖大師輩出，仍不能與西歐新興文化，融會貫通，追蹤繼武於現代文明之後，千載之機，交臂以失，這是中國近代文明，不能與西方分庭對抗的第一次失敗。又以清朝屢興文字之獄，研究經世致用之學者，有觸忌諱，構奇禍的恐怖，於是學者羣趨於與世無關的考證學，以為隱身遠禍之計，朝廷也願意這樣，以收束人心，減少反抗思想，於是有清三百年來正統的學問，遂告成熟。因為他們排斥宋明儒者的空談，而尊重漢學以為近古，故即稱之為漢學，牠們以研究經典為中心，旁及於列史，諸子，羣書，曆算，音律，與地各方面，以考證方法，求了解或發現古學的眞相，就是向來認為儒家對敵的諸子，也連類考究；加以輯佚的風氣盛行，稍復遺書的眞面目，（註十）為了校勘的方法精密，古書都有很好的刊本，這時期那些，

漢學家對於考據校勘訓詁的效力和成績，實爲秦漢以後空前之盛舉，這和西洋推翻中古經院哲學，(Scho las ti eism)昌明古希臘的文學哲學有些相像。

可惜古學正在昌明之時，西學輸入又以驅逐教徒事件，突告停頓。(註十一)因當時西學輸入，和舊教傳教事業有密切關係，自從清聖祖下令驅逐教徒出境後，經世宗高宗仁宗(一七二三年至一八二〇年)三朝，前後一百年間，西學輸入，又告中絕，當時智識階級爲傳統思想所籠罩，一般有科學式頭腦的人，祇能埋頭在故紙堆中探討，不屑爲自然科學的研究，明季清初輸入的西學除曆算以關係經史，尚有人考究外，其餘則聲響寂然，即浙東派史學家認眞搜集近代史料的工作，也爲了文網嚴密，無人繼起，社會科學方面，遂無絲毫成就。當時漢學家僅做了復古工作，而沒有和西來文化匯合產生一種中國的新文化，這是中國近代文明，不能與西方分庭對抗的第二次失敗；也是中國在十七世紀終於不能追隨西方，踏進十八世紀的一個大關鍵。

清初第一期西學輸入以教徒犯規的爭執而中斷者達一世紀。至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各挾雄厚資本紛紛東侵，農村經濟，突告動搖，農民騷動，日以嚴重，終於爆發太平軍的革命運動，(一八五〇至一八六四年)在內憂外患，交相煎迫的情勢之下，東方古

國的門已關不住了。於是思想進步的智識份子，便感到固有學術之不足，漸有傾向西學的趨勢；即在政治上有威權的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因爲在軍事上外交上，和西人接觸的機會較多，並目擊西人華爾(ward)戈登（Gordon）戡平太平軍的力量，更感到西洋學術的可怕，所以在太平軍平定後，他們便努力於「洋務」：這是清代第二次西學輸入之期。當時他們都認爲西洋所長的，是物質科學，是船堅砲利，(註十二)所以翻譯之書，亦多偏重於這一方面，對於社會科學，仍如第一期西學輸入的一樣忽略，(註十三)遂形成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傳統觀念。他們並沒有效法列強改良政治制度的企圖，故講求洋務三十年，竟爲後起的小國日本所挫敗，這是中國近代文明不能與西方分庭對抗的第三次失敗，也是中國辦理洋務，趕不上日本明治維新的所在。

提倡西學，辦理洋務，既告失敗後，一般覺悟份子，知道非進一步師法列強，改良政治制度，終不足以挽弱圖強。尤其是那留心經世之學的漢學家，都轉變其進路的方向，再也不願疲精敝力於屑瑣的考證音釋，徒然和現實生活隔絕。他們的影響，在學術方面，打破歷史上尊經信古的觀念，使學術思想得一解放，開近來學者重新估定古史與古書的動向；在政治方面，力謀學以致用

的精神，與西學結合而形成後來由今文學家主動的維新運動。（註十四）惟其如此，中國在中日一役後，今文學家能在學術思想界上掀起一個有力的波濤——戊戌維新運動，這波濤又直接影響到政治，充分表現出時代的色彩，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掀起的一個大波濤，從這大波濤中，又激起空前的轉變，和種下光明的根苗。

維新運動所以不免陷於失敗的悲運，拉德克（K, Radek）曾有如下的一段批評：

「維新派是隔離了羣衆，也不能鼓起羣衆官僚階級自身是不能進行改革的，因爲改革與他們自身利益相衝突。這次改革的進行，爲時非常短促，牠只能表現出這種改革是爲當時所需要的罷了；至於能夠去推行這種改革的社會基礎的力量還沒有。」（註十五）

拉氏對於維新運動所以失敗的原因，說得甚爲透澈，因爲當時中國社會的風氣與時代相違背，到處表現出極大的矛盾，少數思想前進的智識份子，雖已懂得改革的需要，可是官僚以與自身利益衝突而反對，人民以無政治觀念而漠視，上有敵對的死黨，下無羣衆的力量，即有少數從官僚階級和智識階級中出來同情他們的主張，而官僚階級是不能自己改革的，智識階級也僅憑着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書作爲改革的理論基礎，於是所謂維新變法，乃雜湊而成爲維持

封建統治殘餘的一種忠誠的獻謀，（註十六）幸而正趨沒落的代表封建統治的清朝政府，牠的命運已到了無可挽回的程度，所以康梁領導的維新運動，終於失敗了。維新運動的失敗，直接加強統治階級的自信心而益見其反動，繼着便有庚子拳亂和八國聯軍等事件的發生；間接從這反動中，乃是袁世凱絕大幸運的照臨，（註十七）也就是北洋軍閥基礎的確定。這對於封建統治的清朝政府，都是加速其沒落的命運，所以在維新運動的本身上，和王安石的變法沒有什麽兩樣，只爲了牠壽命的短促，和慘敗得可憐，反而激起空前的轉變，種下光明的根苗。

在過去，西學輸入，第一期偏重在歷算方面，第二期偏重在軍用科學方面，又以絕鮮精通雙方文字的人才，翻譯之書，每多膚淺，甲午以後，學者多學日語以譯日本所譯著之書，其淺劣更甚於以前官局與教會之譯稿。維新運動失敗後，更足表現中國學術之貧乏與學者向外追求之熱情，留學歐美者日以衆，至是國人始知西方哲學，名學，羣學，法學之精邃，非徒製造技術之軼於我土了。歐美留學生學成囘國後，中國才不由日本重譯，而直接與西洋思想發生關係，這是維新運動失敗後所以激起空前轉變和種下光明根苗的又一原因。

鴉片戰爭以後，國人受了幾次外力的刺激，漸漸覺悟干涉國事的需要。最初祇有對外，如各

地的教案便是此種性質的運動後來屢經失敗的結果，知道單純對外，也不足以收效，因此對內改革的思想，就漸漸活躍。不過當時的政治思想，是從經典裏面去找維新的途徑，所以科第中新貴的康有爲在京師公車上書（公元一八九五年）就有一千二三百人的簽名，在野行醫的孫中山，到檀香山發起興中會（公元一八九三年）信仰他的同志僅十餘人。因爲當時中國政治界的潛勢力，以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爲中心，受外力刺激而發生一點反省的人，也祇有這一階級，康有爲之所以握到維新領導權者以此。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爲的思想，始終不變。梁啓超則伏處日本，力學不倦，思想言論，漸漸地脫離康的羈絆，丟了公羊孟子不講，而講盧梭孟德斯鳩了，他所辦的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以其文章帶有情感，最易激動讀者心弦，故其介紹西方政治思想，影響頗大。當時與康梁領導的立憲派處於對敵地位的同盟會，也由章炳麟胡漢民汪兆銘諸人刊印民報，鼓吹革命思想。爲了立憲革命兩派宣傳鼓吹的結果，遂使留學國外的青年，亦多薰受世界潮流與革命思想的洗禮，而國內的智識份子，其於西洋系統的政治思想上，也可窺見大概。這是維新運動失敗後所以激起空前轉變和種下光明根苗的又一原因。

清朝因種族關係，久已受漢人的懷恨，太平軍失敗後，此種思想潛伏於下層社會，始終未滅。

維新運動雖主和平變法，然其健將譚嗣同著仁學一書，已鼓吹排滿，梁啓超早年也很贊成這種主張；只有康有爲感恩知已，始終圖爲清室效力。維新運動既告失敗，除康有爲徧遊各國，宣傳其一貫主張之尊孔保皇外，梁啓超已視排滿革命破壞暗殺爲救時的良藥。其黨人唐才常更聯絡兩湖會黨，起事於漢口，因此革命思想深入兩湖青年，黃興組織之興華會，就是以兩湖會黨爲基礎。此外江浙文人蔡元培吳敬恆等，因受明末遺老思想的感化，和西洋民主學說的興奮，也組織光復會，鼓吹革命思想；鄒容的革命軍，影響尤大。革命運動得了這種思想上的生力軍，就轟轟烈烈澎漲起來。梁氏亡命日本時的努力目的，原爲君主立憲，而其議論，却超過了君主立憲範圍，反爲危害清室的主犯。(註十八)因爲拳亂以後，昏暗糊塗的清朝，益令國人失望，有志的智識份子，都蘊釀着打倒現狀的潛意識在心裏，有觸卽發，遇到這種聲情激越的文字，沒有不投袂而起的。同時孫中山亦聯合各個革命集團，組織革命同盟會，提出「排滿革命」的口號，激發國民固有的民族思想，闡發外來的政治學說，而謀民主政體的建立。這是維新運動失敗後所以激起空前轉變和種下光明根苗的又一原因。

清季感受西力侵入後，國人便有三種不同的態度：從興辦洋務到維新運動，再由維新運動

而入於革命運動的三階段。其最後一階段的革命運動，是國人對清朝外交失敗的憤激和種族觀念所造成，故最初革命宣傳的口號，和民衆對革命的認識，祇重在排滿，而社會上仍爲舊日的封建思想和崇拜英雄的觀念所支配。所以滿清的君主專制，在維新運動失敗後第十五年卽告推翻，而在維新運動失敗時，初植基礎的北洋軍閥，反得盤根錯綜，一到民國成立，以袁世凱的獨裁，演成軍閥割據的局面，雖其兇橫獰猙，十倍於滿清政府，國人反沒有反抗的表示；革命分子，亦以慴伏在專制淫威之下，毫無生氣，這是近百年來一個最甚的黑暗時代。然而光明的種子，已在此時深深種下，因爲歷史的事變如流水，因果輪迴之間，實有無從切斷之處，後時代的變化，都是前時代已經成了問題，後時代的人物事蹟，都是前時代的產兒；例如五四運動雖爆發於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其激起運動之對象實開始於民元袁世凱獨裁政治的成立；而造成袁世凱獨裁政治基礎的北洋軍閥，又遠在小站練兵的時候（公元一八九六年）所以維新運動的本身，雖無甚價值，其在歷史上的意義，確有不可磨滅之處。

由洋務，維新，革命的幾度轉變，光明的水苗，在空前的轉變中舒放出來，終於在民國八年激起了東方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當初不過是一種文學革命運動，爲何推崇牠爲東方

的文藝復興運動呢？

因爲自辛亥革命後，以袁界凱的獨裁和北洋軍閥的割據而入於黑暗時代，當時中國的思想界，既已受過維新和革命的洗禮，對於西洋文化，已有相當認識，雖爲黑暗政治所籠罩，其待機而發的精神、未嘗稍稍消失。到帝制運動終了，護法運動（註十九）開始時，從國內國外兩方面得到兩個大刺激：國內方面的大刺激，爲民國六七年間新青年派的文學革命；國外的大刺激，爲俄國的社會革命。因文學革命進而成爲文體解放，由文體解放進展到思想解放，於是所謂文學革命，擴大到新文化運動，什麼討論問題，研究主義，言論思想界五花八門，表現一種活潑可愛的現象，這種現象，在五四以前從來沒有的。正在這轉變的動盪中，俄國社會革命又是同時掀起，以俄皇和他的貴族地位，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專制政府，竟被布爾雪維克黨把牠根本推翻；接着德國的威廉第二，也被社會黨趕跑了。這種革命的大風潮，把全世界都震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殭凍狀態，也自然不能不爲之衝破，何況國內已經起了一種新的運動呢？國民思想受這種種鉅大刺激，遂由睡眠狀態一變而爲高視闊步行動，這種現象也是五四以前所從來沒有的。還有一件意外之收穫，就是這兩種刺激促起全國國民對於日漸冷待的國民黨得進一步的認識，而信仰

其主義的可以實行，(註二十)以爲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統一全國樹一有力的因素。這是五四運動所以比過去幾次轉變的偉大，和可以當得起東方的文藝復興的所在。

東方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到現在，已有十六年的歷史了，當日的朝氣，已成過去的光榮，到現在社會又是極度的混亂，經濟又是極度的貧乏，就是文化和政治罷，還是在蝸牛殼裏兜圈子，越兜越狹窄，一切的一切，都有今不如昔的感想，但是爲什麼到這樣的一種情境呢？牠的前途又將如何？用什麼方法，纔能解決這種社會的混亂和貧乏？這些問題，都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對於這些問題給一個正確的答復，那就第一步必須找出這些問題的背景——這便是說必須從歷史的研究着手。因爲只有用歷史方法，可以從過去的跡象，推測將來的途徑。不過一切歷史的變革，都是以經濟組織的變革爲其基礎，所以對於歷史的研究，必須首先着眼於爲社會組織之基礎的經濟結構的變遷；如果忽視了這一點，那種歷史的事實，僅可窺見其一面，歷史的價值，僅可計算其一端。五四運動有了文藝復興的條件，沒有文藝復興的收穫，這便是當日錯認了五四運動是單純的新文學運動，不知其爲中華民族總體變革的運動。

在距今八十二年前，正是太平軍攻破南京的時候，這消息從一個德國的傳教師傳到歐洲，

馬克思便說：「中國必將跳舞起來。」也許是中華民族的不幸，太平軍並未如馬氏的預言而成功。在太平軍失敗以後，這八十餘年的長時期中，中華民族也曾活躍過多少次，尤其是五四運動時代的聲勢，幾乎像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一樣的浩浩蕩蕩，結果還是和太平軍同陷於失敗的悲運，中華民族還是不能跳舞起來。

東方的力量，豈眞盡於此了嗎？中華民族偉大的文明創造時代，豈眞不可再得嗎？

不，西亞的土耳其和東亞的日本，他們都是我們東方最好的榜樣。看罷！過去，我們是走錯了路了！這裏，歷史指示我們的事實，便是再度發生波瀾時的途徑！

參考

(註一)韋白斯脫(Webster)世界史第一編第七章第二四〇頁

(註二)當拔都建國東歐時，歐洲各國均爲惶恐，遂於一二四五年由教皇意諾增爵第四(InnocentIV)召集歐洲奉基督教國家會於里昂，決定派教官東去與蒙古修好，既可藉宗教之力以感化蒙古大汗，使之信教，弭禍於無形；又可使在和林之基督教徒，有所聯絡。第一次被派的爲柏朗嘉賓，歐洲人到中國而有文獻可稽的，柏氏爲第一人。

（註一）尼哥羅孛羅與其弟馬飛孛羅（Mafeo Polo）經商於君士坦丁堡，其後至布哈拉，適值旭烈兀遣使至中國謁忽必烈大汗，使者邀尼哥羅兄弟同行至北京，久之漸通蒙古語，世祖召見，爲之述西洋事物，遂留居左右。其後西歸，世祖命其致書教皇，請派道行高深博通學問之士百人東來，尼哥羅回至意太利，而教皇新逝，新教皇僅簡二人偕尼哥羅東去報命，道二人又中途託故不前，尼哥羅乃以與大汗有約，故攜其子馬哥於元世祖十二年至中國。世祖喜馬哥的聰明，備顧問者共十七年。（一二七五——一二九二年）嗣以他們想念故鄉，乃從泉州放洋，護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伊耳汗國，尼哥羅等三人於一二九五年重返威尼斯故鄉。

（註四）見漢書藝文志

（註五）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古代哲學史第七頁及鍾泰中國哲學史。

（註六）顧炎武日知錄有云：「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政論學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爲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尙浮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愧乎其言。」觀此顧氏竟謂明代之亡，王學實尸其咎。

（註七）見亭林文集與友人論學書。

（註八）黃宗羲是王學的修正派，主張多讀書，以窮理之變化，謂學問須能經世致用，故尤致力於史學，爲浙東學派開山祖。

（註九）科侖布於一四九二年發見了新大陸，葡人華斯哥加馬（Vasco Da Gama）於一四九七年發見印度新航路。西班牙麥哲侖（Magellon）於一五二〇年環遊地球一週自後葡西二國人士，相繼向東力進取。

（註十）清代輯佚之風極盛，如孫星衍，孫馮翼，茆泮林，嚴可均，章宗源，湯球所輯均多此外如已刊之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和黃奭的黃氏逸書考，卷帙最多。

（註十一）舊教徒如利瑪竇等在明代中國布教很能參酌中國風俗，容認中國教徒一面奉教，一面可拜孔子，拜天拜祖先，後爲羅馬教皇得悉認爲破壞教規，遂於一七〇四年派鐸羅（Tournon）東來令不守教規的教徒一律退出中國清聖祖因此大怒，下令逮捕鐸羅，送至澳門並令不遵守利瑪竇遺法的教徒，亦一律出境。世宗即位，更令凡不在欽天監供職的教徒，不得居留內地並改教堂爲公所禁止人民奉教，這種禁令經高宗仁宗兩朝，均未解禁直到鴉片戰爭以後爲和約所限，布教事業，又復活躍，可參考楊東蓴本國文化史大綱第九章。

（註十二）梁啓超批評李鴻章的所謂洋務說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爲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槍耳，砲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這幾句話正道破李鴻章一般人所謂洋務的失策。

（註十三）關於第一第二兩期西學輸入的概況，可看鄭鶴聲鄭鶴春中國文獻學概要第五章。

（註十四）原來經學有今文古文之分，自東漢鄭玄以古文大家徧注羣經以後，古文盛而今文衰。清代樸學獨占時代，學者說經一尊東漢家法他們抱着爲學問而治學問的態度，注重名物訓詁的研究，其所用方法固合於科學，但研究對象過於支離破碎，所以在思想上沒有大的貢獻。今文學家治經方法，重在微言大義的發現，不爲訓詁名物所

拘束，這派開創於莊存與，繼起的爲龔自珍魏源諸人，他們研究的結果，古文諸經傳皆發生眞假問題，且又留心經史之務，更多經濟之談，其思想的解放，影響於中國甚大。至康有爲一派，更假託經學作改革運動，一面攻擊古文學之非儒家正傳，認爲出於劉歆王莽的託古改制，一面又取春秋三世，禮運大同諸說，與社會進化論相牽合，撰作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書以爲改革的理論基礎，而歸結於由今文學家主持的維新運動。

（註十五）拉德克爲歐洲現代的政論家，這段話從他的中國革命運動史一書抄過來，此書現在辛墾書店有譯本，改稱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

（註十六）關於戊戌維新事件的批判，另詳拙著中國維新史。

（註十七）袁世凱因吳長慶的提拔，得在朝鮮幹幾件冒險的事，而爲李鴻章賞識，漸有知兵之譽。甲午慘敗，乃由軍機大臣李鴻藻和榮祿的保薦，在新農鎮督練新建陸軍，是卽小站練兵的開始，亦爲北洋軍閥的基礎。戊戌政變時，康梁要他「保護聖主、復，權、清君側、肅宮廷。」不料袁氏陽唯陰違，不惜犧牲維新份子，結歡西太后。庚子二月，實授山東巡撫，以鎭壓拳亂，聲名雀起。嗣後北京以拳亂引起八國聯軍之進攻，聶士成和他所帶武毅軍同歸於盡，久駐小站之新建陸軍，以袁氏於春間升擢山東巡撫，都帶到山東去，得免於難，否則亦將如聶士成和他所帶武毅軍同一末路，而北洋軍閥也沒由成立的可能了。

（註十八）梁氏亡命日本，力主打破現狀的策略，對於當時思想界，關係頗大，嚴復與熊純如（見學衡雜誌）書有：「於道徒見一偏，而出言甚易。」又說：「主暗殺，主破壞，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主暗殺則人因之而僩然暗殺，主破壞則人又羣相爭爲破壞，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而不知其種禍無窮。」嚴復更罵康梁爲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

之人。梁氏言論的力量，於此可見。

（註十九）民國六年段祺瑞平滅復辟黨後，非但不尊重民元的臨時約法，恢復國會，反而另組織新國會，西南各省乃聯合反對，稱為護法之役，為南北分立的第一聲，至十六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始復統一。

（註二十）民元革命成功，而革命政策無從實現，革命主義遂為民眾所忽視，且有指孫文民生主義為沒有實現可能的空想，後來沙皇和威廉第二兩位寃皇竟然被和民生主義相像的社會主義趕跑了，於是淡落已久的三民主義，漸為民眾所注意。又以文體解放，給予國民黨一種改良的宣傳工具，像辛亥以前革命機關報的民報上章太炎等文章，連高等學堂學生都看不懂，現在祇要受過幾年教育，便可閱讀三民主義一類的書本。

第二編　東方文化停滯之史的動力

第一章　東方與西方的阻塞

關於民族盛衰的三因素　早已醜化了的東方文化　二千年來停滯不進的三事象　亞力山大與成吉思汗　安息阻止着東西交通　從文化上孤立而形成出世觀念　從異族侵入而轉變爲佛國　從戎政策的禍根　畢竟不是佛教的對手　中國史的三個大節目　上帝之鞭　突厥人封鎖東西通路　鄭和不及西洋人　東西文化火炬的消長

一個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或是衰敗和滅亡，誰都離不開三個因素：生物的遺傳，地理的環境，歷史的文化。（註一）人文生物學者把這三個因素連結起來，叫做生命的三角。三者間之動的關係，交光互影，各有聯鎖，甲因素的變遷，推本尋源起來，有幾分可以歸到乙，又有幾分可以歸到丙，變遷的結果，對於乙丙又發生了些甚麼新的影響，精究乙丙二因素變遷的因果時，也有同樣

的聯鎖。譬如地理的環境發生變化，勢必以經濟的條件而影響文化，因選擇的關係而影響遺傳；文化與遺傳要是發生變化的話，亦然。三個因素的關係既如是其密切，所以研究任何一種民族，各方面都得加以充分的檢討。現在中華民族對於這三個因素的健全，已成了疑問，尤其是近年來「復興民族」的論調開始後，此種疑問已帶了嚴重性，而實際上關於民族復興的種種議論，都偏在文化因素一方面，大家以為民族目前的問題是一個文化失調的問題，其實一個有過幾千年歷史的民族，不發生健康程度或生存能力的問題則已，否則此種問題決不會限於一二因素的，因此要推求民族不振的原因，和尋覓復興的途徑，先要在史的歷程中；根據着上述三種因素，做一番清算工作。不過，要是把這三種分別敘述，更闡明其互為聯鎖，互為因果的所在，非本書的篇幅所可許。現在專就中國民族所以衰落的幾個史的動力，檢查出來，讀者能夠把這檢查出來的史蹟，常常用上述三種因素的眼光去看，那也可以得到近似的結論了。

現在中國民族已到衰敗的境地，那是鐵案如山，毋庸諱飾。民族衰敗的由來，遠從兩千年，近從八百年，遞演至今，外面已殭化成硬殼，內容腐敗，酵發臭味，這並不是西方物質文明來醜化了的結果，即使倒退一百年，西方物質文明未入中國之時，固已陵夷至最後一步，不成樣子。中國文

化這樣多的年代停滯着，即無外力壓迫，也要走上衰敗以至於滅亡的途中。衰敗是果，停滯是因，我們如果找尋民族衰敗的動力，應當先去檢討文化停滯的根源，我們原有的文化，也許是很有創造力量的，也許是很能隨機應變的；但在史期以內，積極的創造，是不是已經變為消極的守成，甚至連守成都還有危險，原則上雖還主張通權達變，但事實上是不是已經變為一成不變？因文化而關係到遺傳，我們的遺傳，在史期以內，有過甚麼變遷？受過甚麼淘汰與選擇的影響？這種影響究屬是好的多，還是壞的多？又因文化而關係到環境，在環境方面假定本來也是很好的，我們也要看發生過甚麼變化，這種變化是進步的，還是退步的？從這種種尋象中間，便可診斷出中國民族衰敗的根源。

中國民族的所以衰敗，既然為了文化的停滯，遂使二千年來社會組織與經濟結構，始終沒有走到另一個階段上去；社會制度與經濟條件，既然跳不出二千年前的局面，文化和其他的一切，也就停滯下來，引不起絲毫變革。這裏我們應當要問中國文化為甚麼在二千年前突然停滯呢？又為甚麼停滯了後，經過二千年的悠久時期，始終沒有復興的機運呢？並且文化停滯了後，在地理的環境上，也要發生變化，為甚麼不以經濟的條件而影響到文化呢？又這人種的遺傳上，也

必發生變化，為甚麼不以選擇的影響？而再生文化呢？對於這些問題，如果沒有正確的認識，便不能去瞭解中國的民族問題，更不能去批判中國民族的復興問題。因此本書的開始，在敘述東方所以不能像西方一樣在產生文藝復興以後，再述中國為了下述的三種事象，把燦爛無雙的東方文化，中途停滯不前的情形。這三種事象，不但可以解釋中國二千年來停滯不進的理由，就是對於現代中國的各種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種事象為何？一為東方與西方的阻塞，二為孝的宗教的發展，三為述而不作的一貫精神：

現在先說第一種事象

一說到第一種事象，便要牽涉到中國民族和文化的起源問題。關於這種學問的探討，中國尚在萌芽，所得的材料，還不能用來下最後的結論；雖然西人討論這個問題，已有近似的決定，（註二）總以地下材料的尚未充分，說到遼古，我們不能不取懷疑態度。本章所指的東方和西方，其在時代上乃是從中國民族卜居黃河流域，文化也已孕育發長，略告完成，且有文獻可以稽考之先秦時代起。先秦以前，雖有幾種古籍記載和西域諸國發生過關係，可是中國古籍給後人偽造的很多，所以古代文獻上的證據，如沒有地下材料為之輔佐，也不敢信牠是可靠的。

中國自先秦兩漢的時候，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已有許多痕跡可尋，且外來文化，自先秦兩漢以後，也已萌生櫱長，植根東土。何以稱牠爲東方與西方的阻塞呢？因爲在先秦兩漢年代，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均在若明若昧之中，在公元前第四世紀，西方的希臘正是亞歷山大大王在位時候，大王雄材大略，抱着席捲六合的雄心，征服波斯以後，便提軍東邁，進討印度，還想直撲中國；後來因爲大王國內起了變動，以致征服東方的理想，不能實現。東西兩雄既未火拼，遂使遠處東方的古代中國，不能與古希臘文明有所接觸。史家謂亞歷山大大王之東征，與後來成吉思汗的西征：正是後先輝映，實爲東方與西方的兩大偉人。然在文化上，以成吉思汗征西，而喚醒了西方的迷夢，於是有人的發見與世界的發見之動機；以亞歷山大大王征東，而於印度的西北以至波斯一帶，立了不少希臘小國，爲後來印度文明由西域傳入中國的開路。也是使後來中國陶醉於印度文明，成爲孤獨的東方古國的根源。他們倆雖然都有轉移兩大洲的時運，可是成吉思汗是把歐洲人趕上前去，而亞歷山大卻把中國人倒拖回來。

亞歷山大大王東征失敗，既種下中國不能接觸古希臘文明而陷於孤獨的東方古國的境地。到了後漢，中國同西亞波斯一帶交通甚盛，班超平定西域，便想與張騫所想望的大秦國通使，

遂在永元九年，（公元後九七年）命部將甘英至安息，條支，欲從條支渡海到大秦；當時中國與西方通商絲綢一項，銷路最大，安息在西亞一帶，國勢最強，便壟斷了這項貿易。安息既然獨佔了中國的絲綢貿易，於是凡有西方國家要同中國通商，他便橫亘中途，遮斷雙方的交通。所以甘英到條支渡海時，安息西界的船子對他說：「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聽到這樣危險，便不敢渡海。在大秦方面也常想到中國來，安息始終是阻止着；當時東西兩大古國，遙遙相聞，竟不能直接交通，不過靠著安息商人，交換了雙方的土產，終於使中國不與西方羅馬文明接觸，這是後來中亞一帶，爲印度文明所獨佔，東方與西方橫了一重障礙，使中國陷於孤獨的東方古國的又一根源。

原來中國文明，好像一所平靜的大湖，最初從西部高源順流而下，便停滯在風平浪靜的大湖中，當古代西方文明沒落，臨到中世的黑暗時代，歷史的本流處於乾涸狀態的期間，那時中國文明的大湖，反現出了最汪洋的全盛時代；雖然在西方和北方不斷地有異族侵入，可是侵入的民族，都是未開化的，未開化的外來民族，那裏敵得過典章文物之邦？所以在中古以前之中國，任

何異族來侵略，一經接觸，便被這神祕的湖水所吞沒而同化了。

在春秋戰國年代，中國文明已是燦爛絢華，達於極度，而四周異族，尙未脫離游牧生涯，每經一度異族的入寇，除了中國民族在血流上逐漸混合外，沒有發生新的文明的可能，於是僻處東方的古國，便像孤雲野鶴，與世絕緣。民族與個人同，假使一個人單靠自己奮發不去攻錯他山卽有成就，也難持久，一旦本身有了病態，便會停滯不進，倘再受外邪的侵襲，更將由停滯而漸入於乾涸。中國文明到了秦漢年代，本身病態日漸顯著，不但在政治上日益崩潰，卽儒家文學，亦已不能維持。曹操當國，羅致人才的令文中，竟有「負汚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之術者」的話頭，更公然抉破儒家思想的藩籬。加以魏晉以後，篡奪不已，有野心的奸雄，都假借儒家所倡導的美名，以掩護其攘奪欺詐的舉動，更爲有識者所痛心，都想從這長時期間的儒教拘執之下，解放出來，而趨向於超脫的活躍的境界。老莊純任自然的思想，正好是救濟這種煩惱的清涼散，因而發生清談和玄學：這種運動，對於儒教的僵化，雖有解放的功績，然其流弊所至，以超世消極而成後來陶醉於出世思想的印度文明，與近代入世思想的西方文明，遂無接受容納的機會。

這種超世消極的風氣，終於鬧成北方五胡游牧民族相繼亂華的恐怖事件，卽歷史上有名

的東方黑暗時期，中國經過這一打擊，便把東方文明源泉的大湖，由停滯而日趨於乾涸；活的源泉，變成死的源泉，活的湖水，也變成死的湖水了。然而這還是表面的，暫時的，尚有因五胡亂華而引起一絕大事件，這一事件爲了五胡亂華，把中國民族思想，轉了一個方向，即爲中國古代思想與西方古代和近代思想相背而行，爲從來史家所忽視的一件事，便是印度文明——佛教——的流行中國。

中國在古代爲了亞歷山大大王東征失敗，及安息國人覇持中亞，阻止中國與羅馬交通這兩件事情，是使中國孤立東方，不能與世界另一文化接觸，既如上文所述。第三件便是五胡亂華，傳入印度文明。印度文明與五胡亂華有什麼關係呢？因爲在西漢末年，匈奴一部落，由黃河套撤至中亞，即在前希臘民族所建大夏帝國故地，建立一個大月氏帝國，當時中亞一帶，本爲東（中國）西（希臘羅馬）南（印度）三大文化勢力和政治勢力的接觸地，大月氏帝國的興都庫什山南部，係北印度地方，於是印度文化便藉帝國的力量，灌輸到中亞諸國，大月氏成了北方佛教的中心；五胡在未入中國以前，本已受過佛教的感化，既入中國以後，因爲他們的首領，大半信仰佛教的，如同後趙主石勒，前秦主符堅，後秦主姚興，都非常信仰佛教，北魏諸帝，除太武帝外，也

都信佛，末年的武太后，尤崇佛法；當時南方君主，雖保漢族，但受了異民族的影響，也非常崇信佛法，就中如東晉孝武帝宋文帝梁武帝陳武帝等，尤爲著名。佛教得到政治上的保護與傳播，不到幾時，便已風靡全國。以中國民族的天才，接收了這一份豐富的禮物，自然會另外創出一種新的融化物了。從南北朝到唐朝（公元五世紀到七世紀）初年，爲中國新佛教建設時代，也是中印兩枝文化結合後成熟時代。從此中國人的向後思想，日益增長，對於控制自然的能力，漸次消失：這種現象的養成，印度文明的傳入，當然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所以五胡亂華的可怕，不在造成政治上的黑暗時代，而在五胡首領用政治的力量來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西方經過了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到文藝復興運動興起，便可重見光明；中國經過一次黑暗時代，因爲在思想風俗習慣，信仰，都滲透了印度文明的成分，便長夜漫漫，在歷史上發生了一重牢不可破的障礙。

古代中國對於外來民族向來是華化的，爲何五胡亂華時代，竟被印度文明化合滲透呢？這一點就得注意當時的中國人種了。中國在兩漢時代，實行遷戎內地政策，將征服外族，往往將降衆徙居內地，最顯著的如漢宣帝的徙匈奴呼韓邪於光祿塞，光武徙南匈奴於西河美稷趙充國，馬援徙降羌等等，於是中國內地，便有許多外族，蕃衍孳生，而人種上起了一大變化。所以後來印

度文明的輸入，一經提倡，便風靡全國。並且佛教輸入中國的最初二三百年，不過是宗教的信仰，與學術思想無甚關係；照常理講，崇信佛法的，開化較遲的南方，多於開化較早的北方；而實際上適得其反，於此可以證明印度文明大規模輸入的成功，爲的是北方民族人種上已發生變化，這便是因人種的遺傳而影響到文化的一個鉅大的關鍵；也是使中國到秦漢以後成爲孤獨的東方古國的一大關鍵。

佛教到了唐朝，已是登峯造極，唐太宗爲人，不僅經營八表，並且能兼容並蓄，對於各種宗教，俱能容納，無所歧視，當日長安成了世界上各種宗教的陳列所，便是這個緣故。各種宗教中，有基督教的一派叫做景教的，按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註三）當時朝野知名之士，頗多信仰，不過佛教的勢力太大了，景教徒中既沒有精通漢文的人，所譯經典以及術語，大都模倣佛經；加以政治上的壓迫，和佛教出世思想的束縛，所以不能和佛教一樣地風行。西來的宗教既然不爲中國人所注意，西方的文明也便無緣向東方輸出，而中國的出世思想，遂以沒有和第二種外來文明接觸，陷於不能自拔的境地。

自此以後，一部中國史，便是幾個周而復始，更迭遞轉的大節目，刻板的排演下去。這大節目

的順序，是外族的侵陵，人口的移徙，政治的混亂；並且外族的侵陵時期，也就是內部的混亂時期，而內部的混亂時期，又必是外族的侵陵時期；而這三個節目的排演，和環境變換，人種選擇兩種現象，亦息息相關，互爲因果。同時還有一種在東方歷史上特多的旱災和水災（註四）首尾銜接，此起彼落的活躍於三個階段中間。這樣的天災人禍，裏應外合，便陷開化最早的東方古國，永久地循環於一治一亂的狀況之下。

東方古國，在那時既有這樣不幸的遭際，東方文明泉源的大湖，滿裝着死水，因此在唐朝年代，雖有阿拉伯的海上貿易者通商，和基督教的輸入等歷史事件，爲了中國人對於海的觀念的幼稚，（註五）和基督教遭際的不幸，也不能成爲什麼動因和反響，連以前北方蠻族侵入在這人類大湖裏所掀起的那樣表面的波紋也沒有。直到蒙古族建設了連結歐亞兩洲的一大蒙古帝國的元朝年代，纔把東方古國大湖裏激起了排天的濁浪。然而這個濁浪，也僅僅浮動於這悠久的大湖的水面上，並沒有像西方日耳曼人侵入羅馬那樣掀起了根本傾覆湖床的怒濤。百年中武功彪炳的「上帝之鞭」（註六）在歐洲竟然受這西征的震撼，而使黑暗時代漸有撥雲霧而見靑天的動向；在中國除了侵略者的馬蹄越過大江，踏徧全國，把中國南方人種混合了一

些從沙漠裏帶來的蠻人血液外，只有把這大湖中的死水，進一步的腐化。本來衰老的民族，混合此蠻族的血，總會新民族與新文化產生，而中國偏偏在宋朝時候，只關着「儒表佛裏」與「儒表道裏」的理學，（註七）在儒家成爲一尊的維護之下，把印度文明咀嚼消化，遂使中國民族愈益頹廢。所以在五胡亂華以後，由於蠻族同化與混合的結果，還得唐朝比較光明的一個時期；南宋到元朝，蠻族同化與混合的範圍幾及全國，却引不起絲毫的反響。馬哥孛羅居留中國十餘年，從中國回到歐洲，可使歐洲人對於東方有深刻的熱情；比馬哥早一千四百餘年前，漢張騫居留西域也有十餘年，從西域回到中國，相隔二百餘年，才有班超仰慕這極西大秦的富庶，要與之通使。到了元朝，歐洲各國到中國做官的，經商的，傳教的，不知道已有多少人，同時蒙古軍隊已深入歐洲的腹地，引起了歐洲人口的大徙移，而中國人還是好整以暇，空談心性，一般人的目光，不但想不到西方的歐洲，就是漢唐以來累世經營的西域地方，因非禮義之邦，也不欲有所注意。所以元朝覆亡以後，東方與西方給西亞從中橫隔；海洋方面又爲突厥人封鎖，和漢朝時候安息人橫阻中國和大秦的情形一樣，東西交通因此阻隔，東西文化，更無接觸機會。時代愈近，東方與西方隔離愈遠，漢唐兩代，把西域開闢，幾乎與歐洲連貫起來，至此反斷絕往來，如隔鴻溝。自此以後，

在那外族侵陵，人口移徙，政治混亂的三個歷史輪迴中，儘管忙着一治一亂的扮演，終於僅是朝代的更替，沒有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革新，倘使十九世紀西洋資本主義的哨兵，不來擣破這閉關自守之古國的門，就是再過幾百年，這靜穆的大湖，亦斷沒有新的變化。

但是中國民族，究竟是務實的民族，只要有人提倡與鼓勵，便可做出驚人的事業。明朝初年，中國海軍縱橫於南洋一帶，帆影所揚，遠達非洲東岸，這便是永樂宣德兩朝（公元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二年）三保太監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故事。假使鄭和眞正抱着經營南洋和航行西洋的志願，說不定好望角的發見，不必等到五十五年之後；（註八）而科侖布之發見美洲，與麥哲倫的週航世界，即由鄭和諸人開其端，亦未可知。惜乎七下西洋，乃爲私而不爲公，所以鄭和以後，不惟繼起無人，即中國在南洋已有的勢力，也逐漸衰微，仍給後來的西洋人佔領，中西兩方在這十五世紀的時候，一先一後，一東一西的在那裏努力開發海運，終於西勝於東，後勝於先，和在中亞陸地上的史蹟，如出一轍，這不能算是偶然的罷。

至此東方古國文明的力量，似盡於此了，偉大的文明創造的時代，早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蹟，這重要的因素，爲了印度文明的輸入，這純粹出世思想的熱帶民族哲學，即永久被人征服的印

度宗教，確是麻醉中國的唯一毒劑。直到現在，社會的基礎，已被西洋物質文明震撼得一刻不能安寧，然而還有浮在社會上層的人們，要從東方的印度哲學中間，掏出精神救國的法寶，以爲只要耐心地株守在東方文明源泉的死湖中，總有否極泰來，回復到二千年前萬邦來朝的周天子時代。

但是這樣大的罪名，不可全部加於印度文明身上，我們且把世界史檢查一下，古代的東方和西方，各有兩支文明的火炬：在東方是中國和印度的兩支火炬；在西方是希臘和猶太。這四支火炬，最初循環各自的歷史而燃燒着，到了中古的漢朝以後，西方猶太的一支和希臘混合起來後，由羅馬的承繼，再經過歐洲中古時代，而終於脫胎換骨，成爲光焰萬丈，照耀全世界的大火炬。回頭再看東方的兩支，同樣地亦以交通的發達，在相差不多的時期，印度的一支也和中國混合起來，成爲富於東方色彩的暗淡的燭光。在古代猶太和印度同樣的是世界大宗教老家之一，其傳敎的憑藉是政治力量，以成爲一時期的文化中心，亦有類似之處。基督教因爲逢着日耳曼蠻子，使歐洲成爲基督教世界，亦如佛教爲着胡族的西侵與南下，使中國成爲佛教世界。不過，歐洲經過了一度的黑暗時期，轉變其出世思想而重反於希臘時代的入世思想；東方的中國，竟以佛

教的輸入，而停止其社會的史的發展，其中必另有重大原因，便是以下二章所述的二事象所造成的。

參考

(註一) 華年第一卷第三十一期潘光旦「不着實地的民族議論」及第三卷第三十八期「民族復興的一個先決問題」兩文，均以遺傳、環境、文化爲復興民族三要素。

(註二) 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二號何炳松「中華民族起源之新神話」摘譯法國 (Henri Cordier 的 Histoire de chine) 書對於西人討論中國民族和文化起源諸說列舉尚稱詳盡。

(註三) 此碑爲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大秦寺僧景淨所立，明末在陝西出土。

(註四) 亨丁頓(Ellsworth Huntington)在「種族的品性」(The Character of Races)中有：「中國所受荒年的苦，比世界任何國家要深刻。」又云「在全部中國史裏，似乎沒有一個時期，有過連上幾十年的風調雨順物阜年豐，除非是歷史初期之黃金時代中。」關於中國荒災之詳細記載，可參閱三種文獻通考國用考下之賑恤一門。

(註五) 中國民族自西亞大陸向東發展，與西洋藉地中海發展者不同，自古對於海洋觀念即很薄弱，元朝以後，對於海運以遭逢數次挫折，更視爲畏途，當時只留意於海的防禦，不注意於海上的發展。明朝雖有三保太監下西洋的奇蹟，後以倭寇猖獗，海禁加嚴，養成國人對於海的隔膜，此後昧外與輕外的觀念，也由此蛻變而成。

（註六）成吉思汗滅貨勒自彌，對貨勒自彌人說道「上帝生我如執鞭之牧人，用以籌撻羣類」故歐洲人卽以上帝之鞭稱成吉思汗，至今成爲歐土的流行語。

（註七）宋儒在表面上，闢佛闢老，而實際上與佛老思想，實無二至，參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導言，鍾泰中國哲學史卷下第三編，及楊東蓴中國學術史講話第八講。

（註八）明成祖既做了皇帝，還怕惠帝逃在海外，要去搜尋他的下落，遂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他最遠到非洲的木骨都束等地（卽今意屬索馬利蘭一帶）倘再往南一些，便可發見好望角，而其所經各地，亦卽後來葡人華士葛達伽馬發見的印度航路。

第二章　孝的宗教之發展

東方文明本身的缺陷　中國二千餘年思想的中心　親親是宗法社會的極致　孝是家族成員行動的規範　孝的宗教化　祭禮的力量　造教的苦心　無形宗教的慘酷　商業資本的不能抬頭　重農輕商政策　遺產分配的奇特　跳出孝的宗教的倫理圈

東方與西方的阻隔，西方的歐洲仍循其社會的史的發展；東方在二千年來，便陷於停滯的狀況；是則東方中國的文明，必有其本身的缺陷。其缺陷爲何？便是支配中國人心的倫理：近人對於舊制度有所謂「吃人禮教」和「封建遺毒」的詛咒，亦唯此倫理之賜。

中國古代社會上支配人心的，爲思想學問及禮俗制度兩大部，思想學問僅爲少數人所得享受，禮俗制度可普及於全部社會，孔子有其任何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對於人羣所不能有之偉大而長久的勢力，便是這構成數千年禮俗制度之中心骨幹的倫理；從倫理思想而演成宗法社會，又從宗法社會而演成家族制度：這種以家族爲基礎的倫理思想，自春秋以後，經儒家的發

揚傳布，遂成爲中國二千餘年思想的中心。古代羅馬也曾努力於保持家族制度，幾使羅馬社會瀕於破產，幸而基督教侵入歐洲，把這民族發展唯一的障礙衝破了，使歐洲人在中古時代思想上少一重枷鎖。但在中國從來不受基督教徒宣傳的影響，反使基督教徒有家族化的傾向；就是普渡衆生看破色相的佛家，一到中國，也不免降在家族制度的脚下：這固然是中國和歐美社會中間橫着的一大溝渠，（註一）也是東方停滯下來趕不上西方的最大原因。

宗法社會的組織和思想，是古代從神權時代轉變到人權時代的產物，家族制度便是人權政治的中心。中國在周朝以前，尚在神權時代，到周朝纔漸入於人權時代，故宗法觀念具體的表現，是開始於周朝。後來儒家用託古改制手段，以周公旦的制禮作樂，開創一代的規模當作嘉話。我們現在固然知道儒家許多禮意禮文，不一定就是周朝的定制，而周朝必自有其禮制，因爲在宗法社會產生的封建制度國家，一切社會組織與政治組織，都以禮之一字貫串之。（註二）在宗法社會中，政治與社會是沒有分別，社會與家族也沒有什麼分別；往往政治的首領，便是家族的首領，其中維繫的根本精神，全在「親親」（註三）的意義上，故宗法社會中「親親」的觀念，便是宗法社會思想之極致。

宗法的家族制，與中國的農村經濟有關，惟其有農業經濟之長期的穩定與存續，宗法的家族制才能夠穩定，才能夠存續下去。因為中國歷來的經濟組織，不曾脫離農村自然經濟的階段，而農業的生產，又以安土重遷與家族成員的勞作為前提，則家族之重要，便遠在個人之上，而國家之構成元素，亦以家族為本位，不以個人為本位，國家不過是家族之擴大體，或是家屬之集合體。同時宗法的家族制，是以家長為一族的首領，而家長之所以能夠維繫其權力，就全恃有「孝」來做家族成員的行動之規範。國家既是以家族為其組成的單位，則一國的元首，自然就是諸家長之上的一個最大家長，因此元首所藉以維繫其權力的東西，便是從「孝」字推演出來的「忠」字（註四）做教條：由此可知從血統關係組織之宗法社會的國家，「孝」不但是家族道德的首要，也是一切道德的根據。曾子對於「孝」字說得最透澈，他說：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於是「孝為百行先」的教條，就成為中國人一舉一動的規範之規範。更以歷代帝王的提

倡，諸儒的渲染，這禮教藩籬，也就隨着封建統治存續至二千餘年之久而莫敢突破的了。

但是，要人人盡孝道，要人人做一個「兒子，」要使做兒子的帖帖服服埋沒在家庭倫理裏面，不得不把孝來宗教化，孝而入於宗教化，則家長可借宗教的力量來裁制子孫。不過宗教是迷信的玩意兒，中國古代所以沒有有力的宗教產生，因為中國古代哲人，大都不信鬼神的緣故，（墨子也說儒家不信鬼神）何以反把倫常中心的孝，採用宗教的手段呢？這或者古代哲人認為在農村自然經濟社會中的人羣，只有鬼神可以用來做人生道德的裁制力，孔門雖不信鬼神，但也無從否認這種力量的偉大。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也有如下的一種見解：

「宗教家要人行善，又怕人不肯行善，故造出一種人生行為的監督，或是上帝，或是鬼神，多可用來做人生道德的裁制力。孔子是不很信鬼神的，他們的弟子，也多不深信鬼神，所以孔門不用鬼神來做人生的裁制力。但是這種道德的監督，似乎總不可少，於是想到父子天性上去；他們以為五倫之中，父子的親誼最厚，人人若能時時刻刻想着父母，時時刻刻惟恐對不住父母，便決不致做出玷辱父母的行為了；所以儒家的父母，便和別種宗教的上帝鬼神一般，也有裁制鼓勵人生行為的效能。」

孝既然宗教化了，於是不得不定出些儀節來，不但可使做兒子的有所遵循，就是在觀瞻上也可從莊嚴中越益顯著其威武；又要使做兒子的可以法則起見，自身不得不向已死的祖宗設法紀念，如此，不但可以以身作則，即使死了以後，做兒子的亦時時刻刻「必有聞乎其容聲，」而不致忘却了，於是便有喪葬，祭祀的禮。禮雖有五種——吉，凶，軍，賓，嘉——但祭禮却是一切禮的核心，禮記祭統篇上說：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歟，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宗法社會的倫理觀念，盡於以上的「十倫，」而十倫却全包括於祭義之內，可見祭在古代之重要了。再看下面抄的祭義篇中的一段文字，便可證明孝的宗教的成熟了。

「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意志，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謂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

其嘆息之聲。」

儒家雖不深信鬼神，却又自己造出鬼神來崇拜，例如孔子明說：「未知生，焉知死；」他却又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一個「如」字，已把祭祀的心理形容盡致，他們要維繫宗法社會，使人人各守其分，力行弗替，所以不惜自己造出鬼神來崇拜。這裏，他們當然也有一番苦心，曾子說：「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孔子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一劬喪葬祭祀的禮節，想用「愼終追遠」的手段，以達「民德歸厚，」「民興於仁，」其用意所在，與其他宗敎並無二致。

在宗法社會組織之下，孝的宗敎便從倫理觀念之中建立起來，各人去崇拜各自的祖先，猶之各人去信仰各自的上帝，遂使中國人一個個在孝的宗敎信條之下，終身埋沒在家庭倫理裏面，人人自認並不是「我，」而是我的父母之「我；」家族觀念旣牢不可破，國家觀念遂漸次消滅，就是出來替國家效忠，其目的還是在「顯親揚名」和「增光門楣，」所以父母便是嚴君，正家可以定天下，在這種倫理觀念之下，不承認個人在社會上自有其獨立的人格，並不承認個人爲組成社會之一員，戕賊個性，窒滅人性，使人消磨勇往冒險的胆氣，養成妥協麻痺的行爲，其爲害之烈，有不堪言喩者。一般人以爲中國沒有宗敎，故在思想與行爲上不若西方拘束之甚，不知

中國實際上也有宗教，此無形宗教拘束人生之慘酷，十百倍於其他宗教，日本福澤諭吉對於中國禮教曾有如下的批評：

「支那舊教，莫重於禮樂；禮者，使人柔順屈從者也；樂者，所以調和民間鬱勃不平之氣，使之參順於民賊之下也。」

人人既不認得個人存在的價值，則個人不過是家屬的附屬品，不過是帝王的奴才，一齊屈伏於禮教網羅的重圍之下，只知順受，只知屈從，福澤氏實以一語而道破禮教之罪惡。

為了歷代孝的宗教的演進，宗法的家族制度益以穩固。同時，我們知道宗法的家族制度，又與中國的農村自然經濟有關，惟其有農村自然經濟之長期的穩定與存續，宗法的家族制度亦得歷長時期而不至於崩潰。家族制度既然適宜於農村自然經濟，所以家族集團的國家元首，勢必用政治的力量，來穩定農村自然經濟；生存在家族制度之下的士大夫階級，亦以安定自足自給的農村社會，為他們最大的任務。因此，中國在春秋戰國時候，雖然手工業已日漸發達，商業資本亦隨商人的抬頭而日見重要，如猗頓以販鹽起家，郭縱以冶鐵為業，其財富與王侯相埒，至於魏國的白圭，却更以商人而兼政治家，史記一書中對於商人的記載很多，例如：

「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以爲務。」——蘇秦傳

「周人以商賈爲資。」——遊俠傳

「魯俗好儒，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貨殖傳

由這幾段話看來，足見當時經商的風氣，已是很厲害。但是一般人對於商業既這樣的熱狂，商業資本亦既生出這樣重大的效力，却爲甚麽不能代替土地資本而走入另一個階段呢——即中國的產業革命——這完全是受着孝的宗教的影響。因爲在宗法社會政治之下，是不許商人階級抬頭的，倘使商人階級一抬頭，商業資本便可代替土地資本而興起，寄託在農村自然經濟之下的宗法社會的組織，也必失所依據而崩潰，所以重農抑商的政策便應運而生。中國在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文化與經濟條件，均有轉變的樣子，中間突然停滯的原因，就是代表土地資本的統治階級，把重農抑商政策用以維持宗法社會的封建國家，自從秦國的商鞅變法起，與宗法社會互相表裏的重農輕商的一貫政策，從來沒有變更過，例如：漢高祖既得天下，就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又重租稅以困辱之；」晉代政府「欲使力農，故重征商稅；」隋高祖禁工商不得仕進；唐高祖定工商什類，不與於仕伍；明代更頒布賤商之令；（註五）清代則以重稅

病商：凡此都是一脈相傳的重農輕商的政策。

這種重農輕商政策，不過是代表土地資本的統治階級，用以維持封建勢力的有效方法；也是宗法社會國家，用以維持倫理觀念的有效政策；換句話說，就是利用孝的宗教而產生的大地主富人，勾結王候官僚來剝削農民的傳統勾當。所以二千年來，在以農立國的口號之下，任何朝代，總是農人未得實惠，商人已無立錐之地，到處是無田可耕無業可執的失業羣，到了無可維持的地步，狡黠之徒、便趁着統治階級綱紀解紐的時候，利用農民騷動，以攫取統治者的地位，因此朝代儘管變換，而封建制度的經濟組織與政治組織，却依然如故；即使有一時代商業資本較為雄厚，然其力量也僅足以搖動封建社會的秩序，不能代替土地資本而獨樹旗幟。

重農輕商的結果，同時還影響到交通。本來古代文明的傳布全賴交通，交通的發展，靠着戰爭與商業；中國累世採用重農輕商政策，對於發展交通上，便缺少一種因素，不但在國內文明的傳布很是遲緩，就在國外無論是陸路或水路，數千年來，幾乎完全在閉關自守的狀態中，雖漢唐以後，東方與西方已經開始來往，國內且有好幾處城市，已成為中外互市的場所，（註六）終以中國壓迫商人政策的嚴厲，遂使互市成為朝貢的餘事，（註七）失去國際貿易的意義，重農輕

商政策，不但維繫封建勢力，使中國社會停滯在土地資本的一階段中，郎在傳布文明的交通方面，也以缺乏了商人的一因素，而使東方與西方的阻隔又延長了千餘年。

復次，在宗法社會的家族制度之下，對於遺產的分配，中國又有奇特的習慣。就是對於承繼遺產與債務，長子與其他嫡出諸子，是平均分配的，這顯然與宗法的家族制度違背，因為孝的宗教的成立，既着眼於男統，故儒家言孝，特重男統，倫常名分，便是尊重男統的教條，遺產的承繼，當然限於長子一人，這在歐西與日本封建時代，遺產亦僅限長子一人承繼，何以中國有此奇特的習慣呢？這非本章的篇幅所可詳盡，概括言之：即以中國自民族制度衰頹後，對於土地的分配，往往取井田制度的遺意，以求土地之均衆庶，抑併兼，而近於均產的政策，例如王莽的王田晉朝的占田制度，後魏的均田制度，唐代的班田制度，雖富豪兼併，史不絕書，然而經過這二千餘年的封建社會，國民的資力，比較還不算懸殊，直接的原因，乃是諸子平均承繼遺產的家族制度。宗法的家族制度之下，所以有此不合於宗法的習慣，和土地均產制度，實有絕大的關係。中國宗法的家族制度，既適應於中國農村自然經濟，遂以農村自然經濟之長期的穩定與存續，宗法的家族制度，亦因之而能穩定與存續；同時以孝的宗教為中心的倫理，亦天經地義，成為萬世不滅的定律。

由孝的宗教而可束縛個人的思想與行爲，由孝的宗教而可限制社會的變革與進化，由孝的宗教而阻遏文化的發揚，由孝的宗教而喪失民族的進取，於是民族因此而衰老，文化因此而停滯，舉凡今日中國社會上成爲問題的，類多與牠有關。近代西方的勝利，固應歸功於文藝復興，然無宗教改革，則文藝復興無從完成，產業革命更無從爆發。中國孝的宗教的惡毒，尤甚於歐洲中古時代的基督教，所以復興民族當從孝的宗教的革命着手。這是打破傳統觀念的起點，剷除封建思想的根源；這亦是改造家庭的要素，建設社會的基礎：要把停滯在古代東方民族階段中的中國孝子，趕上二十世紀現階段中做一個社會的成員，那就不要再上宋儒的當，跳出孝的宗教的倫理圈纔是！

參考

(註一)日本稻葉君山中國社會文化之特質一文中，謂家族制度爲民族唯一的障壁。

(註二)孟德斯鳩法意中亦有謂：「……是故支那孝之爲義，不自事親而止也。蓋資於事親而百行作始，惟彼孝敬其所生，而一切有於所生表其年德者，皆將爲孝敬之所存則長年也主人也官長也君上也，且從此而有報施之義焉。以其子之孝也，故其親不可以不慈；而長年之於幼稚，主人之於奴婢，君上之於臣民，皆對待而起義。凡此謂之倫理，凡此

謂之禮經倫理禮經，而支那所以立國者胥在此。」見嚴復原譯本十九卷十九章。中國倫理力量之偉大，西歐哲人亦早見及，無怪嚴氏按語中有「不覺低首下心服其偉識」的了。該書在全卷十六十七兩章一再言及倫理，可以參考。

（註三）「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見禮記大傳篇。

（註四）古代闡發孝字最多的，首推曾子，他說「事君不忠，非孝也」；「孝子善事其君」等語。

（註五）農政全書上說「太祖加意重本折末，令農民之家許穿綢紗絹布，商賈之家只許穿布，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綢紗。」

（註六）漢代和西方交通的，陸道要算敦煌，水道當推徐聞合浦。（即今廣東海康合浦二縣）

（註七）向達中西交通史第九章有「……番船入港，有舶脚進奉收市等名目，舶脚相當於今日進口稅；進奉則是專指進貢的貨物而言，收市則是宮廷收買所需各國貨的名稱，收市的價格大概比普通要高兩倍，宮廷收買過以後才准一般人民自由買賣。」這樣看來人民的買賣，不過是宮廷挑選下來的殘餘。

第三章　述而不作的一貫精神

拋開自家向外求逐　中國比不過日本　每次轉變的是始盛繼衰終窮　今日所食之果已往自已所釀之錯　述而不作的儒家開山祖　中國倫理思想　忠恕與中庸　儒門中不出人才　創造我的前途

中國在近百年間，談洋務，辦新政，以致於革命共和，都是拋開自家根本精神，向外以求逐自家前途，一切落於被動而失其自覺與自主。及至方法已窮，焦悶不知所出，遂不惜昨日之所是，今日之所非，依違無常，取捨不定。卽此百年中間，前後不知換了多少方式，費了多少氣力，犧牲多少生命財產，終於屢試無效，愈演愈糟。

或者以爲中國自鴉片戰後，感受外來新穎劇烈的刺激，亟亟於摹取追蹤，大都是覺悟的智識分子，尤其是甲午以後，凡民族自救的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而興起之新興勢力，其領袖人物，類皆沐受西洋教育，或得西洋風氣之先，初非傳統勢力老舊人物所可比，何爲而顚倒迷擾，每況

愈下呢?

這也是中國的一種傳統觀念所形成，因爲一民族生命之所寄，寄於其固有環境與固有文化，拋開了自家固有的環境與文化，便斷送了自家前途。自家前途和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其固有環境與文化而求進，而向上。在西洋，無論是一種制度或是一種方法，牠的政治背景，牠的經濟條件，往往數百年間，一氣呵成，與我國數千年賡續活命之根本，固大異其趣。倘一切不顧，惟亟亟於摹取追蹤，於是乍見其強在力，則摹取之，乍見其強在學校，則摹取之；乍見其強在政治制度，則摹取之；舉凡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致富強的方案，無不摹取之追蹤之，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物，悉以置辦於此農村自然經濟社會，而欲成爲東方資本主義國家，以達富國強兵的企圖。(註一)結果是邯鄲學步，並失故步，西洋的法術未曾懂得透澈，自家的寶貝早已毀壞無遺，當時中國以東方大國的身分，在國際上還有相當地位，然而德國的畢斯麥早就看出中國不會有富強的一天；並且又從留學歐洲的中國學生志趣上，也早就看出中國比不過日本。(註二)因爲中國所謂辦洋務，講富強，目的不過是整軍裕財，方法不過是摹取追蹤，只會抄襲別人有效的藥方，不去檢查自家所患的病症，迨所求既不得達，正在窮思極異，而西洋風氣又變，於是向所摹取追蹤的，掉

頭一變，又另有所摹取追蹤。將這數千年長久不變的龐大而靜穆的東方社會，從此捲入渦漩，發生大轉大變。

歷來所摹取所追蹤的，都是拋開自家根本，故所發生的大轉大變，常見其始盛，繼衰，終窮，由極有力的高潮，退落歸於無有。自其加於社會的結果言之，每一轉變，始而氣象一新，繼而利害參半，終則百弊叢生。此種勞民傷財有害而無利之舉動，亦非無人看到其錯誤失敗，例如清代同為談洋務的郭嵩燾，因為他久居歐洲，其經歷自必勝於國內之覺悟分子，而亦不能改變李鴻章的留學政策。（註三）蓋當一世之人心思耳目有所蔽時，要轉移這社會傾向，却非容易事情；近百年來，每當民族命運危殆之際，我民族志士仁人，先知先覺，未嘗不急起圖存：甲午以前，其所震驚艷羨於西洋者，為船堅炮利，故其所學在於「物」；甲午以後，纔知僅去摹取西洋物質文明，不足以圖富強，不得不更進一步，要求師法列強，改革政治制度，故其所學在於「法」。「法」同是法也，又以西洋思潮的轉變，其所以為我刺激者不同，而其所學於「法」者亦前後分殊。歐戰以前所取法的，為東鄰的日本，即如講富強，辦新政，以至於革命共和，雖其間再轉再變，不可同語，而其歆羨資本主義的目標，則固有一貫之的。歐戰以後所取法的，為西鄰之蘇聯，即如談思想主義，採取直接

行動，（五四以後各種運動）以至於國民黨改組容共，十五年北伐，（註四）縱其間或左或右，不盡一致，而其趨向反資本主義的目標，則亦有一貫之的。其所學於物者，民族工業迄未樹立，而軍閥互鬨之局，竟於船堅炮利的企圖之中演繹而成焉。其所學於法者，以言政治，封建思想的根性未除，社會主義的溫夢已作；以言經濟，豔稱商戰之言猶在耳，咒罵經濟侵略，又細若不及。模仿日本之後，菲薄日本；迷信蘇聯之後，怨詆蘇聯：結果還是屢試無效，愈做愈糟，吾人今日所食之果，何莫非已往自己所鑄之錯。

從談洋務辦新政以致於革命共和，其間顛倒迷擾以自貽戚者，乃眞不可勝計，種此因者，必有其果，有此果者，亦必有其因，因果循環，百歷不爽。拋開自家根本一味摹取追蹤，固爲近百年間鑄成大錯的唯一原因。但是我們再進一步問，爲何中國人喜歡拋開自家根本，一味摹取追蹤？這是歷史上的傳統觀念所致。歷史上傳統觀念很多，何者爲其首要呢？便是儒家的述而不作的一貫精神。二千年來文化停滯不進，民族日就衰老，至今社會上種種現象皆成問題，與夫孝的宗教並行不勃的，便是述而不作的一貫精神所致。

何以二千年前儒家的一句話，影響到二千年後的今日呢？並且這不過是孔子的一句話語，

他的弟子，以及二千年來一脈相傳的儒教中人，從沒有把這句話語，做了些補充的工夫，更無論其發揮光大，何以有這樣偉大而悠久的力量呢?

原來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蠭起，百家爭鳴，但其勢力最大而影響於當時最鉅的，雖只有道，儒，墨三家。漢代以後，直到今日二千餘年來，只有儒教獨盛；中國成了「二千餘年來無是非，皆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的中國。道家思想雖一度流行於魏晉之世，然不久即已歸於無聲無息。墨家學說，司馬遷做史記時，即已消滅；所以「中國之歷史，即孔子一人之歷史。」（註五）孔子對於傳統的學術與信仰，是極端尊重的，中國古代的文獻，至周公始集大成，（註六）故孔子力崇周代的文獻；又極崇拜周公，他在論語上也說：「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後世便稱他爲承繼上古文明的大聖人，（註七）也是儒家開山的大祖師。

孔子既崇周公，而周公之學，在於六藝，所以孔子亦以六藝教人。六藝雖不一定是周公所作，（註七）孔子下過整理工夫是可相信的，（註八）他不但刪詩，書，定禮，樂，還根據原有的周易作一部易經，根據魯國的史記，作一部春秋，這都不是孔子的創作。此外還有許多書，名爲是孔子所作，其實都是後人依託的，例如一部孝經，稱孔子爲仲尼，稱曾參爲曾子，這裏便可證明不是孔

子手筆。論語一書，雖極可靠極有用，更不是孔子所做。他只有整理周代文獻，把牠發揚光大罷了。

孔子對於傳統的學術，既如此尊重，從而對於傳統的信仰，也就保持守舊的態度。因爲當時是「邪說橫行，處士橫議」的時代，非得借重富於神話意味的先哲言行，也不容易壓倒羣倫；並且從這「天下無道」的時代，社會上產生二種反動——極端的破壞派與極端的壓世派，在這「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的環境中，要是不從古代文獻中找些四平八穩的溫和藥方，也不會引人入勝，於是他便把相傳堯舜的「中」的倫理思想，以爲祖述堯舜的根據，並示人以述而不作的態度。堯舜的「中」的倫理思想，可從下面的一節文字中表現出來：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永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孔子既祖述堯舜的「中」的倫理，不得不把中庸之道，力爲闡發，爲儒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改良主義立下基礎，而爲修己治人的出發點。他對於中庸的重視，從下列所舉各節中可見一斑：

「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論語，子路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及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引孔子語

可知孔子的一貫之道，乃是中庸之道，後人誤解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兩句，便說孔子以忠恕爲一貫之道，這是誤「目的」爲「方法」了。因爲忠恕乃是做到一貫之道的法方，而中庸實爲一貫之道的目的。（註九）所以孔子對於「中庸」二字，不知道提到好幾囘，例如：「囘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君子依乎中庸」，「中立而不倚」，「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等等。他既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傳統學術與傳統信仰，在「中」的倫理思想之下，用述而不作的態度，把當時異端邪說一齊鎮壓下去；更用同樣的方法，使天下後世，皆能循規蹈矩，埋沒了自我的個性，拋開了自家的立場，（註十）在傳統的學術與信仰中死兜圈子，雖至焦頭爛額而不自稍悔，其入人之深與誤人之烈，可與孝的宗教的倫理觀念，無獨有偶。

孔子的述而不作主義，最適宜於宗法社會的封建制度之下，牠在經濟基礎上，亦有存在的根據，儒家由此而成爲專制一尊，學術却至此而中途停滯。孔子究竟是氣魄偉大的人，所以雖然說是述而不作，還有偉大的成功。可是常人就不興了，即在他的及門弟子，那麼多的人裏，找不到

一位非常的人，就是孔子死後到現在已有二千餘年儒門中人也不曾出幾個出類拔萃的人物。因爲埋沒自我個性，足以毀滅創制的天才；拋開自家立場無從培養論理的識見：中國在西洋文化未輸入前，所以停滯不進，日漸衰老的，與西洋文化既輸入後，所以摹取追蹤，愈演愈糟的，都是給這種歷史的傳統思想所束縛的關係。二千年來儒家雖然拋開自家前途，還是在一脈相傳的故紙堆中討生活，尚且我不出什麼東西，幹不出什麼成績；現在把自家固有環境與固有文化都拋開了，斷送了，去拿人家數百年間一氣呵成另有其政治背景與經濟條件的制度與方法，也用述而不作的老方法去追踵摹取，顛倒迷擾，自在意中。在過去的儒家，雖然陷於傳統觀念中，不過多兜些圈子；現在因爲追取摹踵的，往往與我國數千年賡續活命的根本大異其趣，故即欲兜圈子而不可得。

這裏，我並不是希望中國倒退過來，去兜那永遠鑽不出頭的圈子，更不是希望中國不去追踵摹取近代西洋文明：我所希望的是本着自家前途和自家新生命，循其固有環境與固有文化，再去追蹤摹取西洋近代文明的精華，而求進，而向上。我有我的前途，我便應創造我的前途，述而不作是維持封建制度的精神，不是創造自我前途的方法。

參考

(註一)參考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

(註二)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緒言中引用德國畢斯麥批評中國和日本的留學生云：「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因爲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求政制原理謀歸國爲根本的改造中國人到歐洲來的祇問某廠的船礮造得如何，價值的貴賤如何，買了回去，使用就完事。」

(註三)郭嵩燾爲清季熱心洋務的重要人物，以其喜談洋務，故於出使英國回來的時候，朝野一致反對，竟致不敢進京。他在英國時，對於派遣留學生政策，反對甚力其所見與畢斯麥同光緒三年，郭氏從倫敦致李鴻章信中，詳言日本留學政策之可畏，中國僅學兵法買兵器之非，是李氏的答信有「兵乃立國之要端，欲舍此別圖其大者遠者，亦斷不得一行其志，祇有盡其力所能爲而已」等語。李氏的短見，影響中國前途甚大，講富强，辦洋務的失敗，這也是重要原因。

(註四)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中對於四十年來民族自救運動，分爲二期，前者爲感受着歐洲近世潮流後者爲感受歐洲近代潮流。

(註五)參考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篇第二章第三節。

(註六)章學誠文史通義中有云「自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門窮變通久之理，亦大備，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留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則亦時會使然，非周公之聖制能使之然也。」

（註七）六藝照經古文家說是周公所作，而今文家則謂孔子作春秋，自比文王；其實春秋確經孔子手定，六藝未必爲周公所作。

（註八）淮南子要略謂：「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司馬遷史記自序中謂：「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古書上說孔子承繼周代文獻者甚多。

（註九）章太炎章氏叢書檢論訂孔論忠恕爲孔子的根本方法，他說「心能推度曰恕，周以察物曰忠。故夫聞一以知十，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恕之事也……周以察物，舉其徵符，而辨其骨理者忠之事也……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以忠恕作爲孔子的根本方法的章氏爲第一人。又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也說：「孔子說的一以貫之和曾子說的忠恕，只是要尋出事物的條理統系，用來推論，要使聞一知十，舉一反三。這是孔門的方法論，不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學。」胡氏以「一以貫之」與「忠恕」合爲一談，則誤目的爲方法。

（註十）西歐文藝復興的酵母，其實祇是個性的復活，即是史家所謂「人的發現。」個性復活後，就覺得處處有一個我在，宗教方面如果沒有我，那就須得改革，智識方面如果沒有我，那就找求眞理，其他如政治經濟方面，亦以解除個人的束縛，以求平等自由。故中國之所以停滯與西洋之所以突進，便在這個性的能否復活上分別。

第三編　西力東漸與東方的沉淪

第四章　鴉片戰爭前的中國社會經濟

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關鍵　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　歷代重農的一貫政策　社會生活形成相反的極端　民反爲農民生活上的掙扎　西歐的產業革命　中國沒有產業革命的條件　五種理由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關鍵．因爲在鴉片戰爭以前，從政治上說是一個獨立國家；從經濟上說是自然經濟佔優勢的封建社會。雖然鴉片戰爭以前，西方資本勢力已開始侵入，可是中國社會生活還能保持一種自足自給的狀態。鴉片戰爭以後西方資本主義開始其露骨的侵略，使中國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發生了鉅大的變動：在政治上，中國由「上國天邦」的獨立國地位，降低到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戰敗國地位；在經濟上，封建的農村經濟開始動搖，造成了使

中國陷於半殖民地的狀態。鴉片戰爭對於中國既有這樣大的關係，所以要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轉變，先要對於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狀況，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在鴉片戰爭發生的時候，西歐資本主義已有長足的發展，但是中國的經濟狀況，還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經濟沒有多大差異，產業革命在中國固然連影子也沒有，就是一般的商業，也還很落後。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和西歐的先進資本主義比較起來，當然有天壤之別，所以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二千年前的秦漢之世，沒有多少質量上的差別。

中國歷代統治階級的經濟基礎，是建築在農村中的封建剝削，在古代如此，在鴉片戰爭以前，亦復如此，工商業的發展，可以破壞農村中封建剝削關係，所以歷代統治階級就要以全力制止工商業的發展，自春秋戰國以至於鴉片戰爭，從沒有例外的變更：這便是第二章中提及的中國歷代的重農主義政策，重農主義政策是創始於周朝末年，商鞅變法，樹立了重農主義的基礎，(註一)至漢代而農政成為立國大本(註二)晉朝繼承漢代的統治，在經濟政策上，依然扶植農村中的剝削關係，(註三)歷經唐，宋，元，明，每代的統治階級，無不以保障農村中的封建剝削及打擊工商業發展為已任，到清代一仍其舊。統治階級為要維持其對農民的剝削，以重農的美名，鼓

勵農民增加生產，這正和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鼓勵工人努力生產，以遂其多量的掠奪，是同樣的意義，

歷代統治階級既然把重農輕商爲一貫的政策，工商業就很難發展，所以直至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還完全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中國人口的大部份，也都集中在農村生產，在鴉片戰爭前，全國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從事於農業勞動，他們在統治階級的「勤勞儉樸」的鼓勵之下，終年辛勤於極度的勞動，過著最艱苦的生活，任憑著統治階級的搾取；重重的壓迫，重重的搾取，就在這樣剝削關係之下，一年年維持下去。

這樣重視與獎勵的重農主義政策，維持了對於二千餘年農業生產，絲毫沒有改進。在十九世紀初期，西歐從北方森林裏趕出來的蠻子，已經過了產業革命的階段，開始其農村中大規模的機械生產；但在開化最早的中國農村中，不但沒有夢見機械的影子，還在憧憬着井田制度的復活。

在鴉片戰爭前，機械生產的新式工業，固然沒有，就是手工業也限於範圍極小的家庭之內。手工業既不發達，農產品又沒有多少地域上的差異——甲省的產物，往往乙丙丁均有——而

且人民的消費，大部分是由於自己生產，所以市場的交換關係，不能擴大，商業更不易發展；因而社會經濟也就保持着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的特色。在這自足自給的農村經濟中，物價的低廉，較之現在，相去有數十倍，(註四)生活程度之低，可以想見。

在這自足自給的農村經濟中，人民的生活，本來可以相當的安定，但是統治階級殘酷的剝削，使社會生活形成相反的極端：一方面是統治階級由剝削得來的窮極奢侈的享受，另一方面是農民生活的極度艱苦。這兩種相反的社會生活，雖沒有像資本主義制度下有產者與無產者之趨於激烈的鬥爭，但以統治階級之殘酷無厭的榨取，終於引起了不安定的騷動。鴉片戰爭以前，這種騷動，早經在南北各省普偏的發展，「民反」兩字，已成農民生活上掙扎的名稱，而非作奸犯科的可比：至此，中國社會基礎，已有了裂痕，不安的騷動，也將愈演而愈烈了。

這裏，我們很懷疑西歐在十八世紀中葉，就開始其產業革命，何以中國到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經濟還如此落後，這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最重要的一點。我們如果要明白中國爲什麼相隔了一世紀，產業革命還沒發生，那就先要明白西歐的產業革命是怎樣發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一段詳細的解說：

「……新大陸的發現，好望角的週航，就供給有產階級一塊新的發展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地，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機關和商品的增多，都使當時的商業航海業和製造工業，受一種空前的刺激，因此使那革命要素，便在頹廢的封建社會中急激的發展起來。」——（一八四八年宣言第一章）

接着又說明這種革命的情形！

「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底下，工業生產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可是到了現在，這種工業組織已不復能應付新市場上日益增加的需要了；於是工場手工業便起來代替了他的地位。各業行東被工場製造家這種中等階級擠倒了；聯合的各行組合間的分工，也被各個工場的分工代替了。

接着，市場一天比一天擴大，需要也一天比一天增加；這時候，就連工場等工業組織，也不復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氣及大機器出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得了工場手工業的地位；豪富的實業家，產業軍的總領袖，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把產業界中的中產階級降服了。」

「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市場，其引線全在美洲的發現。有了這種市場，商業，航業，和陸路交通，便會絕大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了產業發展。產業，商業，航業，鐵路，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起來，資本愈加增多，且將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的階級都盡情推倒了。」—(同上)

由此可知新市場的發現，是引誘近代產業革命的第一個條件；由於發現了這些新市場，所以商品銷路愈加推廣，而增加生產也就成了必要了。這種必要又必然地引起了生產力的改進；生產力的改進，使生產方法進展到一個較高的階段，於是急激地由手工而進於機械，完成其產業革命。我們可以從西歐先期發明機械的，不是科學大家而是工人，便可知那種發明，全由於新市場增加把引起增加生產的事實所「逼」出來的。(註五)當時如果沒有新市場的發現，那就沒有增加生產的必要，因而這些新式機械也不會發明，產業革命也不會成立了。

新市場的發現，不但使商品銷路增加，而且是增加原始蓄積的最有力的方法。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基礎，是建築在對於工錢勞動者的剝削；因此，資本主義制度的構成和發展，其第一個條件，就是需要能夠自由出賣勞動力，而且非出賣勞動力不能生存的勞動者的存在。資本主義

經濟組織是一種大規模的生產組織。生產機關的設備，工錢勞動者的僱用，就需要大量的資本。集中的大量資本的存在，是資本主義制度構成和發展的第二個條件。創造這些條件的過程，就是原始的蓄積。這原始的積蓄，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關於這種例子，馬克思在資本論一書舉出很多。形容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新發現的殖民地的貿易，常取露骨的掠奪的方式，衛特曼在他的論著中曾有這樣的一段：

「所謂基督的種族，對於他們所能征服的世界上每處地方和每種人民所施的殘暴及兇悍行為，在世界歷史上無論那一個時代，無論那一個種族——不論這種族如何獰猙，如何野蠻，如何無情，如何無恥——是沒有能和他們比擬的。」

由此，可見產業革命完全是導源於新市場的發現。他們為手工業的進步，交換範圍的擴大，商業資本的發展，國內市場的不能容納，於是不得不向國外尋覓。哥崙布就是適應這種需要去完成他發現新大陸的偉業；這完全和英國許多工人發明機械一樣地適應客觀的需要。

這種需要在中國是不存在的：第一因為中國的封建制度的剝削，甚於西歐，妨礙了商業資本及手工業的發展；第二因為中國物產豐富，各地均可維持一種自足自給的狀態，這種半自然

經濟的自足自給的狀態，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第三因爲中國很早就有廣大的市場，更使其沒有向外發展的必要。所以當西歐各國對於美洲非洲和亞洲的新市場侵略時候，中國還是維持其二千年來閉關自守的狀態，中國既沒有尋覓新市場的需要，自然也沒有改進生產力以增加生產的需要；客觀上既沒有這種需要，自然不會憑空發生產業革命。

在另一方面，中國之社會的經濟基礎，是一種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要集中大量資本是辦不到的。而中國的農民，因爲土地肥沃，即使榨取得厲害，也沒有被迫離開土地，成爲一身以外別無長物，不能不賣勞動力而成爲勞動者的地步。這樣；中國便無發生產業革命的條件，無怪其在鴉片戰爭以前，還停滯在和二千年前一樣的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狀態之中。

但是有人也許記到中國歷史上也有向外發展的事件。雖然說中國在鴉片戰爭前是閉關自守的，可是在歷史上在漢朝以前，已有中外通商的記載。在漢朝曾與西域諸國通商，漢武帝時中國與西域各國通商的範圍更大，地中海，裏海的沿岸，亦有中國人的足跡；南方與印度，安南，也在這時開始通商了。後來與阿拉伯通商而到紅海西岸，波斯灣東岸，及非洲的北部。隋唐以後，陸路水路，均有中外商人的來往。中國既在很久以前，即與這些國外市場貿易，爲什麽不能作爲中

國產業革命暴發的引線呢？又爲什麼二千年前已與外人往來，到了鴉片戰爭前還稱之爲閉關自守的呢？這便是在春秋戰國時候，不能從土地資本進而爲商業資本，這是二千年來不能發生產業革命的一大原因；也是西歐產業革命成功了一世紀後，還不能引起中國生產力和生產方法改進的重大原因。中國沒有爆發產業革命的所在，可以分成五項來說明。

第一，中國雖然很早便和國外發生貿易，但這種貿易，並不是由於手工業的發展，和商業交換範圍擴大的結果，而是由於國家邦交關係的發生。因爲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一向以天朝上國自居，視海外各國都是蠻子，（註六）外人非朝貢不許其入境；另一方面欲誇示中國物產豐富，故國人外出也帶些絲帛之屬，間或允許外人朝貢以後，將其殘餘，與民互市，也視爲「夷人慕義而來」（註七）從不加以注意。因此，此種貿易決不能有多量的發展，更不能引起生產方法改良的要求。

第二，中國在閉關時代輸出的絲，獨佔世界市場已有千餘年。西歐產業革命，不過開始於紡織工業的一部門，由紡織業發展的需要，引起了煤和鐵的生產方法的改革。然則何以中國不能從絲的發展進而發生其產業革命呢？這因爲絲的生產區域大而國外需要，又不若棉織物的普

遍，國外既無大量的輸出，便不能引起國內市場缺乏的恐慌，並不能引起生產方法的改進，這是中國絲的產生不能像英國紡織工業的足以激成產業革命的理由。

第三，中國自漢，唐以來，對外貿易，大都是物物交換形式，不能換得大量的金錢；又以上國自居，反而常把金銀財物賚賜外邦，對於資本之原始的積蓄，沒有絲毫顧到，故歷代通商雖盛，終無引起產業革命的可能。

第四，世人共認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其引線全在美洲的發現。但是中國歷史上對外貿易的國家，都沒有像美洲那樣豐富的金銀礦可供掠奪；而且中國商人在西域諸國貿易，也不像歐洲諸國遠征隊在美洲那樣的窮兇極惡。南洋羣島雖較西域諸國為富，但中國往南洋的，也沒有像歐洲人有政府做後盾，施行整個計劃，所以通商以來，沒有掠得大量金錢，足使影響到資本之原始的蓄積。

第五，西歐產業革命前期，先經過了十六世紀向落後國家侵略熱狂的時期，當時中國正陷於極度的混亂狀態。所以不但不能趁個熱鬧，連三保太監七次下西洋所開拓的都不保。在這緊要關頭，不去參加商戰的陣營，老自閉關自守，靜穆的農村社會中，便引不起生產方法的革命了。

至此，中國在鴉片戰爭以前，是怎樣一種狀況，也可以明白牠的大概了。在鴉片戰爭以前，是這樣一種社會經濟狀況，到鴉片戰爭後，西歐資本主義的種種侵略，那是必然的現象；侵略一經開始，中國的農村經濟即陷於總崩潰的悲運中，也是必然的結果。

參考

（註一）商鞅墾令篇中「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以商之口數，使商合之，斯輿者不常名，則農逸而商勞；農逸則田不荒，商勞則去商：．．則草必墾矣……。」

（註二）鼂錯論貴粟疏有：「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又陳燦中國商業史「我國古代學者之理想，政府之設施，莫不重農輕商，至漢益甚，名之爲逐末，斥之爲兼併，立國未久，即頒賤商之令。」

（註三）陳燦中國商業史「晉人趨重商業，政府欲使力農，故重徵商稅，……南朝即屬行商稅，北朝亦踵而行之。北齊，北周，篡奪相繼，乘亂取國，商業雖極凋零，而軍事所需，仍仰給於商稅。」

（註四）龔煒巢林筆譚中有「清河太原聯姻，兩家皆貴而贍，其記順治三年（即公元一六四五年）婚費，曾親嵩席十六色，付庖銀五錢七分。蓋其時兌錢一千，只須四錢一分耳。而豬羊雞鴨賤甚，準以今之價錢斤不過一二分有奇，他物稱是，席之所以易辦也。」

（註五）例如一七六四年英國發明吉尼紡織機的哈格里夫（John Hargreaves），一七七一年發明水力機的阿

克萊（Richard Arkwright）一七七九年發明騾機的克朗登（Samup Crompton），一七七四年發明紡織機的加特來特（Edward Cartwright）等都是工人出身而非科學專家。

（註六）在清朝嘉慶十年及二十一年（公元一八〇九年及一八一六年）英使兩次來華，要求通商，清政府仍當做朝貢，英使以英爲獨立國家，要求互相答贈，竟爲清政府逐回。在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九二年）英使馬戛爾尼（Earl of Masartney）還强迫其行三跪九叩首禮，幾經周折，始許其行謁見本國國王之禮，其對外自大如此。

（註七）明朝永樂年間，西洋剌尼等國來朝，附帶胡椒等物，與民互市，有司奏請征税，帝不許，曰「夷人慕義遠來征税則虧辱大體。」

第五章　資本主義侵略的序幕

中國遲至十九世紀始行屈服的原因　英人侵華的先聲　初期偷進鴉片的數量　鴉片貿易為一切支付的手段　鴉片戰爭的必然發生與必然失敗　一八四二年的歷史紀念戰後引起的六種影響　近代中國史的展開　中日戰後的急轉直下　五十年中的宰割門戶開放後的新局面　免却瓜分陷入次殖民地　國際投資的開始　賠欵生息的創舉兩次戰爭完成次殖民地的條件

鴉片戰爭，並不是單純的鴉片問題，也不是單純的戰爭問題，乃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掠奪落後國家的侵略戰爭，鴉片問題不過是一個導火線而已；即使沒有鴉片戰爭，英國侵略中國的暴行，也難免要發生的，不過時間上的遲早罷了。

西歐資本主義侵略中國，雖把鴉片戰爭作為劃時期的界限，可是西歐商業資本發達的國家，在明朝（約當十六世紀）就開始到中國來。當時中國為何不跟着美洲和非洲那些野蠻民族，給資本先進國家所屈伏呢？因為中國有悠久的文明歷史，有繁庶的人口，有廣大的疆土，當然不

會像美洲，非洲那些落後民族那樣容易屈服。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無論牠的內政如何腐敗，究竟不是資本先進國家所能隨便吞下去的；所以在十六世紀就有西洋人到中國來，直到十九世紀初期，這龐大國家的人羣，還沒有給西洋人屈服。到後來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的發展，已非僅僅是商業資本所可比，牠可使國家武裝的勢力隨着強盛起來，不但可以掠奪落後的民族，而且可以壓倒其他商業先進國家。這是中國自十六世紀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那些商業先進國家，不能完全侵略中國的志願，仍須等到十九世紀西歐資本主義最先進國家的英吉利來完成的原因。

英國在十八世紀的後半期，已積極向東方侵略，到十九世紀初期，由征服印度全部而進佔中國保護的緬甸及南洋羣島。至此，英人在亞洲的力量乃益強大，當時西歐那些商業先進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荷蘭諸國，早已被英國的威力所屈服。可與英國對抗的法國，自從滑鐵盧戰敗，拿坡侖被俘之後，也不能與英國爭勝，在當時世界上只有北方的俄國，還可與英國爭一日之長；然在水路上，西方勢力的東侵便爲英國獨佔去了。

英國既併吞印度及南洋羣島，便集中視力於中國。中國以有傳統的閉關自守政策，故對於

歐洲通商限制極嚴，英國受種種侮辱苛待，已忍無可忍加之中國以與俄國發生邦交較早，（註一）情感較厚，英人尤爲憤慨，遂於清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藉口鴉片問題，用武力侵犯廣東；激成東方人類歷史上最大汚點的一次掠奪的戰爭。

鴉片戰爭雖然不是單純的鴉片問題，不過鴉片問題，也自有其嚴重性，沙發諾夫在中國社會發展史中對於英人把鴉片當做商品的輸入中國，曾這樣地說着：

「在資產階級歷史家的描寫中，很有詩意地把資本主義毒害中國和束縛中國的東西，祝爲外國貿易。事實上鴉片輸入中國，根本改變了國際貿易的意義，從此，中國便處於無法淸償的債務者的地位，他們已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他們和外界的貿易，變爲特殊的征納賦稅：鴉片代替了銀子，毒品代替了價額，中國人成了自己的毒害者的債務者。」

鴉片的輸入，遠在唐宋之際，惟在昔數量不多，流毒不大，當十七世紀時，始由英人及荷蘭人從印度地方大宗輸入，爲害漸烈，到淸乾隆年間，始知鴉片之害，乃下令禁止，並以所存的一千箱燒去，從此以後，禁令時嚴時弛，而鴉片輸入，仍年有增加。在道光十八年（公元一八三八年）時，已有二八三〇七箱之多，各處輸運進口，當不止此數。（註二）又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

四二年）時，據另一統計，（註三）當時合法的入口貨物，如棉紗，棉織品，絲綫，毛織品，五金等物合計起來有一一・二〇〇・〇〇〇金元，而當時偷進的鴉片價值，却有一三・八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出口貨的價值僅當於非法的鴉片的價值。這樣，在數字的表面上是出超之年，爲了鴉片的輸入，中國每年已在暗中用銀幣來抵補一千一百萬金元以上的重債。

英國正因爲中國人吸食鴉片的增加，就利用東印度公司的特殊地位，把印度大量生產的鴉片輸入中國，除獲得他們所需要的中國商品外，還可攫得鉅額的現金，而鴉片便成爲第一種實行於中國的「西方的」貨幣本位，難怪印度總督哀略特將軍在一八四〇年時，直接報告他的政府中說廢止鴉片貿易，足使英國人在中國市場上失去了一切「支付的手段」這種口氣，當然足使資本主義正在膨脹的英帝國格外注意中國；後來義律領事奏請派兵援助，英議會遂在三天激烈的論辯中間，竟以九票的多數，決議援助在華「不義」的商人而輕啓戰端。（註四）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鴉片戰爭發生的原因，並不是誰是誰非的法律問題，而是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對於落後國家侵略的一幕不或可免的悲劇。至於中國戰敗的原因，一方面當然是爲了清朝政府的庸弱無能，但是根本的問題，在乎一個是先進國家，一個是落後國家。在資本主義先

進國家的暴力壓迫之下，無論怎樣國家有如何偉大的天才英傑也是不能挽回這種失敗的悲運。所以鴉片戰爭在十九世紀中期是必然發生的一種侵略戰爭的結果，中國失敗也是理所必然而勢所必至的。

因鴉片戰爭失敗而訂的南京條約，除了賠償二千一百萬元的鉅款外，還開闢商埠，割讓香港，並且損失了海關自主權，爲近百年來資本主義侵略的開場戲。其影響的重要，甚於歷史上一切的變動。從此，英國生產的商品和鴉片一齊闖入中國，美國，俄國，法國，德國及其他原始蓄積的資本主義代表的商人們，也隨着英國接踵而至。二千餘年閉關自守的東方古國，遂於道光二十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在停泊在南京城外的英艦上，更換了一副場面，轉變了一個時代。

從鴉片戰爭失敗而訂立的南京條約以後，便有如下的六種影響：

第一，不平等條約的繼續訂立。在以前中國與外國所訂的條約中，雖不免也有不平等的，可是中國總在有利的地位。從南京條約以後，各國即繼英國之後，向中國要求締結最惠國條約，如道光二十四年（公元一八四四年）美國訂立望厦友好通商條約；同年，法國亦援例訂立中法

黃浦條約。越三年，又與瑞典，挪威締約。明年，又訂立中英天津條約。這些條約中，處處顯示着中國站在最不利的地位，都是南京條約開其端。

第二，帝國主義武力侵略的發展。在以前中國雖已懦弱，因有東方古國的虛名所以西歐先進國家還不敢作露骨的侵略。經過鴉片戰爭，中國的懦弱無用，已爲外人窺破，於是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大胆嘗試，一無顧忌。主要的有咸豐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的中日之役，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八九五年）的八國聯軍之役等。此外，如緬甸戰爭，安南戰爭，琉球戰爭，台灣戰爭，朝鮮戰爭等，每戰必敗，每敗必失地。

第三，疆土的損失。在南京條約中雖只割讓香港一處，然而此風一開，帝國主義相繼威脅求，如英割九龍，緬甸，俄割黑龍江北岸及烏蘇里地方，法割安南，日割台灣，朝鮮及澎湖列島，葡割澳門，又有實際等於割地的租借地與專管租界，滿布於國內重要都市。

第四，商埠開放與商品侵略的急進。在以前中外雖有貿易，但除俄國外，均未正式締約通商，外商在中國所受阻礙甚多。鴉片戰爭後，條約中即有開廣州等五處爲通商口岸，其後又續開商埠多至一百餘處，而資本主義商品侵略，因此偏於全國。

第五，關稅主權的喪失。本來海關稅則的高低，完全由自己國家訂定，可以限止外貨而提倡國產。在南京條約中雖沒有明白規定關稅的高低，但在翌年所訂的通商條約上，即有值百抽五的限止，從此中國自己已無權增加稅額，保護關稅的作用亦完全喪失，外貨就如水之下流，無法遏止，二千年自足的小農經濟，也逐見崩潰，一瀉千里。

第六，鉅額賠款的流出。中國在清朝中葉，因爲連年內亂，國家財政，本已窮困；自鴉片戰爭後，除每年鉅額的入超，歷次軍事的消耗外，更有鉅額的賠款，（註五）於是更促進農村崩潰的速度。

以上所舉的六點，表現着資本主義開始侵略後長驅直入的結果；一方面使中國原來的自足自給的農村經濟開始崩潰；另一方面由於這樣經濟基礎的變動，使牠的上層建築，也開始動搖，於是展開了一部近代的中國史。

中國的近代史是開始於資本主義露骨侵略的鴉片之役，所以中國的近代史，乃是一部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史。在這九十餘年侵略的過程中，開急轉直下之端的，實爲中日之役：因爲在中日之役以前，中國尚爲世界龐然一大帝國，各國縱有野心亦相制而不敢發，每次侵略的動機，

都還帶有嘗試性質。不意甲午一役，中國在大敗於白種以外，又大敗於黃種的日本，從此積弱之勢，曝露天下，國際地位，亦一落千丈，列強各羣起角逐，幾陷中國於瓜分運命，在中國近代史上又開闢了新境地。

這樣看來，中日戰爭之於中國，關係極爲重大，從此資本帝國主義乃公開逐鹿，中國想用「以夷制夷」的方法，去尅服日本。乃於中日和議的明年，李鴻章借俄皇加冕的機會，親自出使，訂立了攻守同盟的加西尼密約，（註六）不料進狼拒虎，日本沒有尅服，俄國的勢力反深入東三省。俄既得志於我國，德國首先藉口於教士之被殺，遂以海軍進佔膠州灣，並要求山東膠濟鐵路的建築經營權，同時俄國更進而從我租得旅順大連，以爲極東軍事之根據地，可使西比利亞鐵路，經中東鐵路直達南滿，以逞其南下侵略的雄圖。法國爲便於向我之雲南廣西發展起見，遂有廣州灣租借條約的締結，並進而獲得滇越鐵路的建設權。英國爲抵抗俄國的南下政策，遂有威海衞的租借，京奉鐵路建築權的獲得，長江流域不割讓條約的締結等。日本在福建亦有同樣之要求。這一種瓜分的局面，多起於中日戰爭後三四年中。我們試看當時資本帝國主義在我國發展的大勢。俄國已併有西比利亞全土，以席捲之勢而南下；德國則以山東爲根據，而漸擴張其勢

力於中原；法國則以安南廣州作爲根據，而伸張其勢力於兩廣雲南；至於英國則不但有壟斷揚子江流域一帶的形勢，並且在南方以九龍灣香港爲中心，而進窺兩廣，又於西南以緬甸爲根據，進窺雲南。因爲在雲南廣西，英法之形勢，日相衝突，而有英法協約。在京奉以英俄之勢力日相錯綜，而有英俄協約。二千餘年閉關自守的東方大國，給資本帝國主義者侵略，前後不過五十餘年，（公元一八四二年至一八九九年）國土和主權，喪失過半，所以中日戰爭在中國近代史上，亦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當時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之情勢，儼如十九世紀初對待阿非利加的樣子；或直接迫中國政府認可，或間接列強協商，中國全局，已十分危險，而在列強間利益衝突，亦已到了一觸即發之勢，美國遂以第三者的超然地位，謀世界公共的和平，在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向英德俄法日意六國，宣言開放中國門戶。自是中國的形勢一變，各國以相互的利益，爲相互的約束，從前各對中國單獨競取的利己主義，一變而爲列強統一合議的緩和行動；中國的領土保全與商工業利益均霑的新局面，遂爲列國所公認。前者在華各國狼吞虎嚥之下，所謂利益範圍與勢力範圍的意義，便是壟斷範圍內的一切權利利益，不准他國政治權的侵入，更進一步，即

可促成中國的瓜分，所以開放門戶的宣言，實在是起死回生的續命湯。

美國的宣言固出於公平正義，以謀世界的和平，然亦迫於本國的利益。因為在十九世紀末，美國產業發展甚速，海外新市場已到處開殖，對於有四萬萬人口落後國家的中國，當然不能忘情；倘列強各據要港，占中國貿易的特權，則美國將無發展之路，遂不得不放棄門羅主義而轉入帝國主義的趨向，名為保全中國領土，調和列強衝突，實則擴張本國經濟勢力於中國。故門戶開放的宣言，雖救出中國於瓜分場中，重復陷入中國於次殖民地，這是中日戰爭後的一大轉變。

中日之役除了直接進行瓜分中國領土外，尚有重大意義表現在別的方面，便是國際投資的開始。國際投資是國際資本的移動，在近代資本主義史的發展上，實有重大關係。原來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兩個條件，就是市場擴張與投資獲得二種：前者是一貨物的移動，要靠市場來吸收消費者，在第四章中所說資本主義國家競爭新市場的意義，就在於此；後者是一資本的移動，要靠這投資地來銷納為資本主義國家用來吸人經濟滅人國家的最終目的的市場擴張，發生於鴉片戰爭以後；投資獲得，開始於中日一役。（註七）

國際投資，分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二種。一國家的資本家，將自己所有資本，不經被投國人

的手，直接投於其國內所發生的營業關係。換言之卽一切事業的經營管理，和由經營所得的結果，皆歸彼投資人的獨占，叫做直接投資。直接投資的目的物，如鐵路，鑛山，製造工場，航業，銀行及其他一切的經濟利權。至於間接投資，卽一國的資本家，將自己所有資本，購入他國國債或地方公債，和貸與他國的私人或私團體的借款。直接投資有百弊而無一利；間接投資其在沒有償還能力的國家害處與直接投資等；最近國聯對華技術合作，便是最好的例子。（註八）

中日戰爭所訂的馬關條約，既開國際投資的例，又開賠款加息的舉。從來關於戰爭的結果，割地輸錢，本屬常事，輸錢加以利息，則從中日戰爭的賠款始。（註九）賠款一經生息，亦已變爲資本，於是實際支付的數目，竟有多於賠款總額的，庚子賠款，卽其一例。（註十）賠款如此，借款亦如此，當時在大炮威脅之下，所締結的對外借款，代替了鴉片，成爲調節中國對外貿易的一個主要的手段，藉以保護對外貿易方面不絕的負的比差。

國際投資的開始，其直接投資因爲馬關條約始作之俑；而間接投資，我國人亦有若干自動的要求。因爲當時歷次對外的軍費與鉅額的賠款，財政上已受創不少，（註十一）又以國內起伏不斷的內亂，更使國庫一貧如洗，已有不得不以借債爲生活之勢。而收回路權鑛權，亦須以重價

賠償各國，才可自修自開，帑藏既經告罄，遂亦不得已而利用外資。列強對於市場擴張的一步本已成功，遂亦利用機會，競起而從事於投資的獲得，衆矢一的不數年而經濟侵略的基礎，又告完成：所以鴉片戰爭，是列強武力侵略的開始；中日戰爭爲列強經濟侵略的序幕。

因鴉片一役而繼續與英國所訂通商章程與天津條約，把國定稅率變成協定稅率，遂使數十年太阿倒持，主客易位，外貨橫行，國產慘敗。因中日一役而訂的馬關條約中，把工業投資權輕輕送掉，關稅權既限制於先，工業專有權又喪失於後，凡可以促進我國工商業發達的條件手段，無一不受外人束縛，中國陷於次殖民地的境地，已在此時備具其條件。

參考

(註一)近代我國對外交涉最早，爲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實開我國對外交涉之始。二十二年訂通商條約，俄國獲此通商特權，爲英國等所妒羨，俄又巧博清政府之歡，並離間其他各國，以獲壟斷之利益，尤爲英人懷恨，英人來華雖遠在明代，然係商人的自由貿易性質，而非正式邦交的形式。

(註二)清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請嚴塞漏巵以培國本疏中有「…外洋來烟漸多，另有躉船載烟，不進虎門海口，停泊洋中之老萬山，大嶼山等處，粵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龍快蟹等船，運銀出洋，運煙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

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兩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一千餘萬兩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餘萬兩之多，此外如福建，浙江，山東，天津等海口合之亦數千萬兩。……」

（註三）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by Chong Su See. 1919 New-York. P. 279

（註四）詳見劉彥中國近時外交史上冊第十六頁。

（註五）鴉片戰爭之賠款爲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英法聯軍，中俄伊犂之役，中日台灣之役，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之役，還幾次共計賠款七〇五·〇五〇，〇〇〇兩

（註六）加西尼密約不見於中文所記，或係李鴻章擬日本爲假想敵，聯俄以拒之。但因此却招到俄人勢力的深入，見陳登原中俄關係述略頁六〇及中國近時外交史頁二四七——二五〇。

（註七）借款雖開始於同治四年，在中日之役前已有四千萬兩外債的往來，惟當時我國財政收入有餘，國際投資的機運亦未至。

（註八）此次國聯與中國的技術合作，一方面促進中國國內軍事性的建設，加强中國作爲軍事根據地的作用；另一方面則能加强國防間，特別是日本和歐美列强間的衝突，即成爲促進第二次大戰的主要契機，亦即對華促進共管或瓜分的主要動因。可參考中國經濟情報社中國經濟論文集總論第二篇。

（註九）賠款加息，中國向無此例，外國在普法戰爭媾和時，其賠款金額爲五十億佛郎，除於一八七一年支付其一部份外，其他加以五分年利於三年內償還，爲世界史上賠款加息之始，此亦爲近代國家商人化的特徵也。

（註十）庚子賠款爲四億五千萬兩，年息四厘，至三十九年償清，共須支付利息五億三千二百三十餘萬兩，較賠款總額，尚

多八千餘萬兩。

（註十一）光緒二十年到二十四年，以軍事賠款兩項，所負外債，達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五千鎊，當時每年償還外債之本利，合計須支付二千五百餘萬兩，而全國關鹽收入不過二千二百萬兩，悉數償還，尙有不足，我國財政入不敷出的原因，已種於此時。

第六章　國民經濟不振的原因

初期產業的步驟倒置　興辦洋務的目的　軍用工業到官辦工業　銷售廢料的大主顧　農村停滯於原始狀態　侵略中國的三害　工業專有權的喪失　中國產業不發達的七條件　樹立了新的歷史力量

中日戰爭以後，資本主義便開始其露骨的侵略，凡可以促進我國工商業發達的條件手段，無一不受外人束縛，既如上章所述。不過在中日戰爭以前，雖已受到不平等條約的限制，總究還有奮發的餘地。並且在中日戰爭前三十餘年間，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李鴻章諸人，採用西法，興辦實業，在當時也曾轟轟烈烈，建立了不少新事業，何以輸入機器三十餘年，僅僅完成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建設，引不起中國的產業革命？又何以中日戰爭後，中國資本主義的初步建設，也便一蹶不振，而使國民經濟日即於窮困的境地呢？

當時主辦新政的曾，左，張，李諸人的見解錯誤，所以開始便把發達產業的步驟倒置了。在歐西工業生產方法的革命程序，是輕工業先於重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的生產擴大的需要。英國

的紡織工業，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已經完成生產方法的改良，但是那時煤鐵的生產還很落後。到紡織工業方面機器的發明，使煤和鐵的需要急激地增加起來；遂促使煤鐵鑛業開始了生產方法的革命。（註一）但是中國完全相反。中國煤鐵的開採，固然是運用西歐已經發明的方法，而開發的動機，是爲着軍用工業的需要，不是應輕工業的需要；換言之：西歐煤鐵工業的開發；是適應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中國煤鐵工業的開發，是適應封建統治階級保護牠的殘餘統治的需要。

在本書前幾章中，已歷述中國爲了種種條件阻礙之下，內部不能發生產業革命的原因。自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兩次慘敗後，曾國藩等遂於剿平太平天國及捻民運動的時候，纔注意到洋務；然而曾氏總究是一個純粹代表守舊的封建勢力的人物，因之他所想學西方的，不是西方的文物制度，而是他們的長鎗大炮。所以當時所謂洋務，不過是限於船炮建設，因而中國初期工業的生產方法革命，是限於重工業而且是重工業中的軍用工業。因爲當時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地位，已萬分危險，不得不捨去向來鄙視外人的成見，以爲保護殘餘統治最需要的船砲。在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以後，滿清政府興辦了許多軍用工業與對於軍用工業有關係的新

政，便是這樣用意。李鴻章與張之洞因爲比曾國藩遲三四十年逝世（註二）在這三四十年中，所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壓迫深入了一步，落後的封建農村經濟的崩潰也更顯著，所以在李張時代，他們不僅知道西洋鎗炮武器遠勝中國，就是其他實業，以及文物制度，亦已承認有優於中國的，他們除了造洋炮，買洋鎗外，還要開工廠，辦鐵路，並且喊出「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主張。因此，曾國藩到李鴻章張之洞的過程中，從國內的經濟意義上說，已由軍用工業發展到官辦工業的階段。

然而嚴格說來，李張二人的事業，因爲時代的演進，雖比曾國藩較爲進步；但是他們仍和曾氏一樣的立場。他們既然看到西洋的富強，並不單是堅甲利兵的政策，而他們所辦事業，主要的着眼，還是在於軍事方面，有許多因爲軍用工業的發展，必然的引起其他重工業部分，如煤鐵工業的產生，和交通機關的革命。

在中國統治階級一方面，爲與辦軍用工業而開發煤鐵，爲運輸煤鐵而開發交通；資本主義一方面，爲要在中國發展商品推銷；所以要開發中國交通；爲開發交通，因而需要煤與鐵，所以要開發中國的煤鐵鑛業。資本主義與中國封建統治，在不同的出發點之下，開始了中國初步資本

主義的初步建設，李鴻章與張之洞就是完成這個初步建設的代表人物。這初步建設到甲午年中日一役幾乎全部擊毀，而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因此而更得擴大發展。

資本主義破壞中國的小農經濟，第一步就是破壞中國農村和都市藉以生存的源泉的家庭工業與小手工業。在中國因爲封建統治者對於初步建設時的觀點不同，產業發達的步驟，與西歐相反，所以從軍用工業轉入官辦工業後，已經引起輕工業部門的萌芽；同時，列強商品的侵略，亦以交通機關的開發，而有加速的發展。然而在中日戰爭前數十年間，并沒有達到以資本主義的工業來替代已經日漸破產的家庭工業及小手工業的地步。這是爲了中國在產業革命開始時，還是銷售先進國家工業之全部廢料的大主顧，同時又是供給他們原料的根據地。落後國家當做先進國家原料的根據地，還是資本主義侵略的鐵則之一；銷售廢料并且以廢料爲主要商品，那是中國特有的奇跡。在同治十年至光緒十年間（公元一八七一年——八四年）五金的入口從二百萬增至五百萬海關兩，佔入口總額百分之六十，直到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入口的五金中，還是舊鐵與錫佔重要位置，當時上海某一位海關監督指出這種貿易的原由：「工廠造船廠以及鍊鋼廠的一切竹頭木屑，格蘭斯齊，利物浦及倫敦等地的荷馬車的馬

和運貨馬的一切用過的馬蹄鐵，一切舊的鐵軌，都能在中國找到銷路。」（註三）

鐵與錫的大量輸入，本可很快使中國工業化。可是當時鐵是用來一部份製造農具外，很多做民間的武器—刺刀，長鎗，鐵棍等；錫是用來一部份製造家用及寺院器皿外，大多數蓋僞造的紙錢、錫箔。這兩種重要的入口貨，前者是助長農民原始暴動的氣勢，後者是增加關於迷信的鉅額消費；不但引不起中國工業化，反而使中國農村停滯於原始狀態。

西方資本主義最初侵入中國的鴉片，和五金的廢物，鴉片盛而中國農田的產量減，廢物多而中國農村的崩潰速。所以鴉片，鐵和錫三種的輸入，是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三害。中國從軍用工業轉入官辦工業，不能走上產業革命的路者以此，列強資本主義破壞了中國家庭工業與手工業後，不能立時把中國工業化者，亦以此。

不過在官辦工業的一階段中，因爲政治上的援助，在輕工業部門方面，也有不少的建設：如左宗棠辦織呢廠，張之洞辦繅絲廠，李鴻章張謇辦紗廠織布廠等，由官辦而進於官商合辦，或官督商辦，雖以帶有腐敗的官僚氣味的工廠，不能和先進資本主義工業競爭；也得立下基礎，待機而動。何以甲午以後，這嫩弱的輕工業部門的萌芽，未曾發育滋長，即摧殘殆盡？這當然還有更重

要的原因。

這重要的原因有二，就是上一章提及的關稅國定權與工業專有權之喪失。對於關稅國定權喪失的害處，國人已經相當的明白，而於工業專有權喪失的利害關係，至今仍鮮注意及此，殊不知二者對於我國工商業有同樣的重要。本書爲節省篇幅計，關於關稅國定權的喪失，略而不談，單以工業專有權喪失的原因與影響，詳爲闡發，用以說明中國在同治光緒（十九世紀後半期）年間，外鑠的工業革命終於不能[illegible]於工業化而立時引起中國產業革命的癥結。

先說我國工業專有權喪失的原因。一國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保持其略相一致，全靠市場調節，所以中國工業專有權的喪失，爲了市場獨占權的喪失，自五口通商後，因爲中國統治階級的昏庸，國民對於經濟常識的缺乏，外人在商埠開設工廠，視爲無足輕重，當時雖無明文規定，歷久已成爲習慣。至中日戰後所訂馬關條約中，在第六款第四項中有如下的規定：

「凡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業製造。……」

這種條文，在昏庸的中國統治階級看來，原爲不足介意的文句；可是日本人已躊躇滿志，從此傾銷於中國的商品，即可搬運當地原料，榨取當地勞工，即於當地製造而銷售於當地，惡例既

開，凡與我有單方最惠條約之國家，皆可援利益均霑的成例，獲得貨物製造權。中國的工業專有權遂向國際開放，而列強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步驟，至此已獲得最後的勝利。

在經濟上可以致富的要素，爲勞力，原料與資本三種。中國有四萬萬人口，有豐富的原料，可以致富的三要素中已得其二，所以不能與人競勝者，自殺的關稅政策外，即爲工業專有權的喪失。工業專有權喪失後，從生產上必需的條件觀察，即可知其關係的重大。所謂生產上必需的條件，有工場的位置、資本、技術、經營能力、勞動力、原料與市場等七種。(註四)

工場位置何以關係重要？因爲工場第一要求的，須位於交通方便之地。原來交通機關的設備，實爲使生產事業發達的一重要手段。試從生產事業而論，所需的是貨物之賣出與原料之買進。然生產貨物，數量必大，如有剩餘，不能不靠交通機關爲之分散於各處；又如缺乏原料品時，亦不能不靠交通機關爲之從各處集中。所以交通機關的發達與否，實爲生產事業生死所關，這是工場位置須設置於交通方便地方，不說自明。而號稱交通方便的地方，具體言之，不外航業，鐵路經由之地。如從我國而論，合此條件的，當首推通商口岸。綜合我國全部的通商口岸觀察，非火車之所經，即爲輪船必由之路。所以我國工業的發達，第一當以通商口岸爲首。孰意我國對日本有

馬關條約第六款第四項的締結；外人在通商口岸，都有工業製造權，而工場位置之一重要條件，已爲外人均分去了。這是中國產業不易發達的原因之一。

如欲產業易於發達，當然要原料豐富。中國地大物博，宜乎對於這個條件，占有特別的優勝，產業亦可受重大的利益。其實不然，因爲產業上所需的原料，大概不外二種：即特殊原料與一般原料，前者最顯著的即是煤鐵。無論何項產業，都應該需要的。而中國關於此兩種原料的出產，大概非在崇山峻嶺，交通不便之處；便在帝國主義勢力支配之下。估中國煤產量首位的東四省的煤業，早非已有，即河北河南山東各重要煤礦，已鮮純粹華資之公司。鐵礦亦與煤礦相等，絕無希望。（註五）至於一般原料雖比較收集容易，然在我們自已收集，除少數享有減稅特典的機械式工業外，其他一切的工業材料，其所經過沿途關卡，須要納出種種捐稅的。在外國人則僅上一回子口稅，即可任運各處加工製造。質言之，外國人在中國採取材料，反較中國自己更爲容易。是原料之條件，已不是中國能享其利益，這是中國產業不能發達的原因之二。

復次，如欲產業的發達，要大市場的存在，這個條件好像對于中國的產業有最大的利益。因爲產業上所必需的，就是要自己貨物能源源暢銷，要得自己貨物源源暢銷，就是要大市場的存

如在中國面積之大，人口之多，自然是個大的銷貨市場無疑，對於貨物的暢銷，確是一個理想地。從這點而論，中國工業，確有發達的可能。但是自關稅自主權喪失後，海關的門戶洞開，外貨便如潮湧至。自馬關條約第六條第四項規定後，工業專有權喪失，外國商品在中國遂得大批製出，而中國之銷費市場，遂與各國人共有，而演成供過於求之現象，貨價當然跌落，輕工業才經萌芽的中國產業，如何能經此種壓迫呢！這是中國產業不能發達的第三原因。

又次，資本亦是產業發達必要條件之一，這爲資本主義之國家最所擅長，而爲非資本主義國家之所短。因爲現代工業，實以大規模的製造爲其特質，顧此種大規模製造，非有鉅額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不能與人競爭。其在資本未曾集中的國家，如欲經營此種事業，實爲困難；然在已得集中的資本主義國家，其資本皆用工業式商業式借貸式的循環方法而得無限的膨脹，以之投資於製造事業，正是他們發揮本能的地方。在大魚吃小魚的鐵則之下，演出大資本併合小資本，先進國壓倒後進國的事情，當然就出現，這是經濟上一般的原則。但在中國的情形又是如何？不消說正是資本缺乏的國家，如中國允許外人直接投資，他們大資本的公司，當然在中國高視闊步，壟斷一切，中國小資本如何能抵抗，豈有不受壓迫之理？這是中國產業不能發達的第四

原因。

其次，勞動力爲生產事業的一種要素，已成爲一般通論。中國對於勞動力的供給，確是無限，中國的生產事業，應當立於最有利之地位。但是由馬關條約外國人可以自由在中國僱用當地勞動者，使之從事製造事業，於是中國在生產上最有利的條件，亦被外人共通享有他們資本旣富，根基又固，中國產業家反立於受壓迫地位。所以從勞動的條件而論，亦以工業專有權的喪失，從有利之地位，降於不利之地位。這是中國產業不發達的第五原因。

最後，爲生產事業所必需的，尙有企業能力和技術人才兩個條件，中國都立於不利地位。我們試分析來說，企業能力是經營事業的經驗，與公司的內部組織，前者在後進國的人民，固甚缺乏，而在中國更形不足。至後者的要點，則在一國法律的監督保護問題，在資本主義國家，皆可以監督保護公司與股東的權利，而在中國，則各種公司皆爲大力者所操縱，又加以連年政局紛亂，軍閥專橫，法律威嚴，墮地以盡，保護監督實不可期，無論公司有如何不端的情事發生，亦都置之不問，此卽中國公司內部組織易生不良的原因。至技術人才，與一國科學發達的程度爲正比例，中國科學旣未形發達，則舉凡專門的智識，熟練的手腕，當然不及各先進國的優良，此從企業能

力和技術人才的條件上觀察，中國產業不易發達之最後二原因。

據上述七種條件看來，我們可以得到結論，即勞動力原料品，工場位置，市場四種，是為我之所長，外人之所短的；至資本企業能力技術人才，則為我之所短，外人之所長的，但至馬關條約一締結後，為我們之所長的，外人已得而與我共有，為我們所短的，外人愈得發揮，在我仍是缺乏，遂使中國在初期的資本主義建設，不能使嫩弱的輕工業的萌芽，發榮滋長；同時亦是使資本主義破壞了中國的家庭工業與手工業後，沒有達到以資本主義的工業來替代牠們的地步。中日之役後的中國產業一蹶不振，與歐戰後的民族工業一敗塗地，都是必然的結果。

列強資本主義用鎗和炮開闢了自己的道路；用鴉片和廢物麻醉和毒害了中國的人民；用關稅和價額的投機事業束縛和絞死了中國產業；把中國在半世紀內變成了實際的殖民地。他們在中國內部樹立了新的歷史力量，在這種力量的影響之下，新的和舊的，前進的運動和停滯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着反抗的鬥爭。

參考

（註一）煤和鐵，在公元一七九〇年以前，還為人所鄙視。到一七五〇年後，煤才開始被採用為燃料，製鐵業也漸次旺盛起

來不過那時還沒有新式的熔礦爐，而是設置大風箱，以水力馬力去運動而送風，這是一種很笨拙的方法。到了一七六〇年，斯米頓（Smeaton）發明了衝風爐（Blasthurnace），在這衝風爐中設置了送風筒，比較以前的風箱是方便得多了，不過動力還是不能不利用水力。一七六九年，牛康門（Newcommen）的機關裏，利用了瓦特（James Watt）蒸汽機的初步改良，使熔礦爐增加了許多方便。到一七九〇年，瓦特蒸汽機關才被採用於製鐵工業，從此製鐵工業的發展，乃有一日千里之勢。在一七九〇年以後，關於精煉礦鐵及其他方面還有許多新的發明。一八二八年納爾遜發明熱風法（Hot Blast）以代冷風法（Cold Blast）；這個發明可以節省煤的消耗。一八五五年柏塞麥（Bessemer）更有新的發明，能夠把溶解了的鐵，直接從礦爐裏變成鋼鐵。一八六四年西門司和馬丁（Pemeus and Martin）發明了開爐法，一八七五年托馬斯和季爾克立斯（Thomas and gilchrist）發明了基性法（Basic Process）。由以上這些發明，使近世的煤和鋼鐵的生產，才有了可驚的增加，而這些關於開發煤鉄工業上的發明，都是輕工業發達所引起的需要。

（註二）曾國藩於同治十一年（公元一八七二年）逝世，李鴻章於光緒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逝世，張之洞於宣統元年（公元一九〇九年）逝世。

（註三）關於中國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專銷列强的廢物，歷來沒有人注意到；在雷麥（C. F. Remer）的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第三十五和五十五頁中曾有此種記載。

（註四）漆樹芬經濟侵略下之中國第三編關於國際投資的利害與工業專有權喪失的關係，分析詳盡，可以參看。

（註五）參考中國經濟情報社中國經濟論文集工業門帝國主義控制下的中國煤礦業一文。

第七章　裏應外合的日禍

資本主義侵略的三時代　日本獲得東亞宗主國身份　日本初期侵略的外交路線　民國成立時的屈服　改變了侵略政策　二千五百萬金磅的賣國大借款　攻取青島的變橫　破壞國防慣例的二十一條要求　威嚇利誘的交涉　袁氏稱帝與日本的播弄　天地變色的日俄協約　苟延了若干年的國脈　八面下網的侵略手段　欣然同意的賣國照會　二年投資幾達五萬萬元　圜辛受騙　和會中的失敗　外交方式的轉變

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從鴉片戰爭至中日戰爭爲第一期，英帝國爲侵略的先鋒，西歐五強步其後塵，各亟亟於勢力範圍與利益範圍的拓殖，以侵略非洲者侵略遠東，不到半世紀，停滯在農村經濟的東方古國，已成爲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市場。因爲資本主義相互間的利害衝突，到了十九世紀末葉，遠東的中國問題也和近東的土耳其問題同樣地陷於嚴重狀態。

中日一役，向稱爲東方大國的中國竟爲後起的日本島國所慘敗，從此，中國的庸弱無能，大暴於天下，而列強侵略的形勢，亦急轉直下。西歐六強各於已得之利益，鞏固其勢力範圍與利益

範圍的基礎，日本亦以戰勝國的地位，並藉其近水樓臺的優勢，作露骨的侵略。所謂勢力範圍與利益範圍，實即壟斷範圍內的一切權利利益，不許他國政治權的侵入，更進一步即爲造成中國瓜分之局。美國門戶開放的宣言發出後，列強即以相互之利益，爲相互之約束，從前對中國單獨競取的利已主義，一變而爲列強統一合議的緩和行動：這是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二期。

日俄一役後波子瑪斯和約中，日本雖未獲得一元的賠款（註一）而極東島國已一躍爲世界一等國的班次。日本既爲世界列強之一，則其在東亞的地位，好像歐洲六強之於歐洲，與美國之在美洲，取得領袖國的身份，以後任何國家有事於東亞，非經日本認可，不能進行。至此，日本遂利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在東亞統一合議的緩和行動之下，括列強的軌道於一致，而自居於中國的宗主國之地位，開始雄霸東亞，獨占中國的政策。列強雖在利益均霑的成約之下，仍得加緊侵略中國，然中國問題的處分，其原動力已由西歐六強轉移於日本一國，這是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三期，這一期的侵略，肇始於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的日英新同盟條約，（註二）成熟於袁世凱的稱帝，活躍於段祺瑞的主政：三十年來一脈相傳，至今猶在急進的過程中，中國政治上經濟上的任何問題，均與日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有關：倘謂近百年來的中國

史，爲資本主義的侵略史，則近三十年來的中國史，可稱爲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史。

日帝國開始侵略中國，雖遠在中日戰爭以前，然其雄霸東亞，獨占中國的野心，則開始於戰敗俄國之後。日本因在外交上獲得英帝國的同情，遂引起法俄美諸國的不安，而有日法，日俄，日美的締約，造成東亞外交上重要地位，昇入世界列強的伴侶。自此以後，列強有事於東亞，必先商承於日本，而日本有事於中國，則又單獨進行，力避各國的牽制；清末的大借款事件，日本不參加四國借款，另成鐵道公債借款一千萬元，卽其明證。惟當時日本經過兩次戰事，元氣亦損傷不少，雖以戰勝而躋於一等強國，究其實力尚遠遜於英法諸國。且俄雖戰敗，仍爲日本大陸上的勁敵；美縱唱門羅主義，而太平洋上海軍的實力，日本不能望其項背；其他西歐列強在東亞的勢力範圍亦已根深蒂固，遠非後起的日本所可輕侮。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日本，僅在外交上活躍，而其最大目的在併吞韓國，對於中國的侵略，僅在外交上利用利益均霑的局面，獲得若干利益而已。

日本在外交上既獲勝利，併吞韓國，當然沒有問題，遂作進一步的侵略，而有日俄第二次密約的締結。日俄第二次密約成而長春以南內蒙古的一部份歸於日本，長春以北及其餘的蒙古地域，歸於俄國，約以互相援助，不相牽制，更許西藏的權利與英國，於是保全中國領土的約束，已

由日本開始侵略大陸政策而潛爲變化。（註三）此種密約的進行，正値民國成立的第一年，北京政府幾經交涉，蒙藏獨立名義，始得取消；然於承認民國政府的時候，英俄二國以中國承認藏蒙自治爲附帶條件，日本以滿蒙五鐵道的建築權爲附帶條件，故在中華民國成立時已將滿，蒙，藏三大區域，在恢復前清外交狀態時，已拱手讓人。民國第一次外交，卽這樣屈服，過去痛罵清朝政府的覺悟份子，不知作何感想？

日本侵略中國，到民國成立已經成熟。過去以國力未充，尙用外交手婉，使遠東維持均勢的局面，而自處於領袖國的地位；至此，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已在歐洲大陸利害衝突，日趨於尖銳化，他們對於遠東，僅能維持其旣獲的利益，無暇再事拓殖。中國雖經革命成功而革命政府已爲北洋軍閥與親日政客所盤據，於是日本對於中國的侵略，放棄其過去運用外交手婉的間接侵略，採取其直接的武力壓迫。並利用政客，勾結漢奸，以造成內應外合的侵略局面。

民國成立初最關重要的事件，卽爲民國二年五國銀行團的二千五百萬金鎊大借款。這次借款的條件中，竟有聘用外人稽核鹽務及審計用途的訂定，實爲前淸歷次借款所未有，而開外人干預財政的開端；豈但干預財政而已，國民黨的被壓迫，二次革命的失敗，以及袁世凱的專橫，

都是這次大借款的力量。當這借款成立時，五國銀行團各仰本國外務部的意志，故有許多苛酷條件。及至契約訂成而歐洲戰機日迫，日本獲此千載難逢之機會，遂大事活動，想把併吞韓國的故技，再以施之中國，以完成其大亞細亞政策。

大借款成立的次年，（民國三年）世界大戰爆發，中國昧於世界情勢，宣言中立。日本對德宣戰，臨時由駐京日公使通知中國外交部，袁氏接此通知，也要求與日本共同出兵攻青島；終為日政府所拒絕。日本雖云用兵青島，其實志在山東全省，以為臣屬中國的入手。故其出發海陸軍二萬餘人，不逕攻青島，偏由龍口上岸，橫穿半島以達膠州；所過城鎮與郵電機關，盡行佔管，征發物品，役使人民，視同敵國。袁氏無可如何，乃宣告中外，畫萊州龍口及接近膠州灣為交戰地，此外各處，仍嚴守中立。而日兵步步進逼，驅逐中國軍隊，直趨濟南，並佔領膠濟鐵路全線及附近礦產，並以佔領的機關悉用日本人。青島降服後，袁氏以戰事已結束，要求青島以外山東內地的日軍，撤回青島，並宣告取消中立。日公使答復謂奉本國政府訓令，此項取消之舉，實屬獨斷，沒却國際情誼，帝國政府不勝驚愕，並不勝憤懣，決不令山東的帝國軍隊，受此取消之拘束云云。同時日本報紙及倫敦太晤報的日本通訊，皆誣中國欲與德國同盟，將效土耳其助德國與協約國宣戰，以

淆惑英德各國的視聽，以爲征服中國的張本。當初對德最後通牒中，明言膠州灣歸還中國的宣言，至此亦已狡賴。因爲那時日本政府已決定向中國積極處分，故四年一月九日日公使拒絕撤兵，而同月十八日大隈內閣乘袁氏要求撤兵的機會，命駐華公使日置益破國際慣例，逕向中國元首袁世凱提出五號二十一條的要求。

二十一條提出時，正當歐戰方酣，列強無暇干涉遠東；加之協約國以日本助戰之故，不願以中國問題與之爲難。中國方面，袁氏方潛圖帝業，民黨方潛圖反抗，左推右挽，悉在日本操縱之中。而北京部員早經日本養成爲韓國一進會李容九第二者，爭先賣國，力事內應，所以即使沒有山東事件，斯時亦有二十一條的提出。因爲日本侵略中國，至此已是「祇達目的，不擇手段」（註四）的時期，故日置益提出條件後，即誘惑袁世凱，（註五）運動外交官，（註六）指定中國所派之人員，（註七）不准會議時設正式紀錄，不准中國另提對案，故意更改中國總代表的言論，反誣中國擅自塗改，故意墜馬延會，辱中國全權，就床前會議；（註八）又於談判緊急之時，日派海陸軍並進，且正式提出最後通牒，侮辱之甚，已達極點。此種要求，純是帝國主義滅人國家之條件或戰勝國壓迫戰敗國的條件，今無端向中立國爲此要挾，實歷史上國際間的創舉。計自中日

戰爭以來，不過二十年光景，日本已雄霸東亞，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爲之側目；中國的積弱無能，已在土耳其，波斯，暹羅之下；一強一弱，猶如雲泥，蓋有中國之自侮而始有日帝國之侮中國也。

袁世凱稱帝之志，始於民國二年解散國會，驅逐民黨於海外的時候。最初欲德國的承認，密與德國公使及青島總督有所接洽。民國三年，德將與俄，法宣戰，爲維持中德和平關係，青島總督有秘密承認袁氏稱帝的文件。此等文件，於青島降服後落於日本人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稱帝的決心，視爲奇貨可居。日政府即密電袁氏稱帝，至再至三，袁氏亦知日人將以此爲條件而有所求，故佯爲拒絕。（註九）日本深知袁氏稱帝之慾甚高，故在民四借山東撤兵問題，不惜破壞國際慣例，直接向袁氏提出二十一條，乘機引誘袁氏的帝慾。日本引誘袁氏稱帝，其意乃作藉此以啓中國內亂，並非變共和爲君憲，對於日本國體有益而出此；故當帝制初步進行，彼邦有力人物及報界論載，多表贊成，及至各省代表組織的國民代表大會實行投票，帝制行見成功的時候，日公使小幡酉吉忽約同英俄兩國公使，提出警告，繼又一再單獨質問，終於聯合五國公使明顯地作干涉帝制的警告。袁氏至此，萬分狼狽，擬犧牲某項權利，爲日本承認帝制的交換條件，遂借祝賀日皇即位大典的名義，派周自齊爲特使，日政府竟以俄國大使將至東京，不便迎接中國特使，以

避南國的議會爲辭，拒絕周氏赴日。同時派多數軍人策士，參加中國之抗袁運動，一面於滿洲召集清室的宗社黨，組織討袁軍，亦名勤王軍，（註十）更招蒙匪南犯，以壯勤王軍的聲勢，而圖擾亂中國全局以攫取無上權利，其侵略的野心，蓋已昭然若揭。

日本乘歐戰初起，假英日同盟的名義，驅逐德國勢力於山東而代領之；又假袁氏稱帝而威迫簽訂二十一條，事實上完全破壞中國獨立與各國均勢之局。不過獨佔中國的優越地位，列國終有所不願。美國已於日本對中國提出最後通牒時，發表不承認侵害美國與中國條約上的權利，或侵害中國的獨立及領土，與列強工商業均等主義云云。日本恐歐戰結束時，外交上陷於孤立無援，故於二十一條的簽定後，急欲乘大戰未了之先，使英，俄，法，美承認日本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如得此種保障，則以後對於中國何等自由行動，皆可從心所欲。然此種政策，英，美，法三國不易贊同，惟俄國所處地位，與日相若，且自對德宣戰後，日本曾竭全力以接濟俄之軍火，並示十分好感，俄政府亦以大敵當前，東方得此有力之助手，遂樂於同盟。袁氏爲稱帝事件擬派周自齊東渡疏通，而爲日政府擋駕的原因，即爲俄國派遣大使赴日訂盟之事，此即民國五年七月日俄政府發表的新協約，此約成而中國的天地變色。因爲民四二十一條的中日約協，雖已破壞中國之獨

立與領土保全，又破壞列強均勢之局；然不過爲日本一國單獨行動，其他有關係列強，尙未一致承認。現在歐亞兩大陸軍國結爲一體，明白宣布中國的權利利益，爲日，俄，兩國所壟斷。在條約中兩國之互相承認既無範圍，又有協商對付彼侵迫的手段，則勢之所及，中國甯有完膚；故曰此約成而中國的天地變色。

日本協約外，另有密約，這是民國六年十二月俄國革命後勞農政府反對專制侵略政策，宣布廢棄，而後才知道。密約的主要部分爲防禦同盟，假使列強中對日本有實際干涉時，日本勢必要求俄國執行密約的義務，而以中國爲第二次大戰的戰場；假使竟無第三國出而干涉，則中國惟有爲日俄兩國壟斷吞噬而已。所以這次密約，實已制中國的死命；亦即資本帝國主義對付中國的最後一張契約。幸而簽約的次年，俄國忽起掀天動地的大革命，李甯舉所有沙皇時代的侵略性條約，一律廢棄。日本獲得意外的打擊，而中國亦於夢寐間苟延了若干年的國脈。

歐戰勃發後，中國人多數主張中立。日本攻取青島，袁氏即擬共同出兵，爲日本所拒，對德宣戰，又爲日本所不許。及至二十一條簽訂後，英國亦悟中國不加入協約國之不利，且以中國中立之故，對於德國的庚子賠款，照常給付，德人即以此爲妨害協約國的活動，尤爲英，法，俄三國所不

快；三國公使乃誘袁氏加入戰爭，袁氏答以中國前此自請加入，旣被拒絕，現在亦有所未便。三公使一再邀請中國加入，並擬邀請日本共同與中國交涉，仍爲日本所拒絕，且有「如中國加入戰爭，四百兆人民，一旦發揚對外精神，於日本大不利」等的措詞；更聲明以後與中國交涉，必先通知日本、英政府對此不敢有異議，法俄亦不敢再請中國加入作戰。嗣以德國宣佈無限制使用潛航艇，美國首先對德絕交，並請世界各中立國一同對德絕交，中國乃亦對德提出抗議；日本知大勢所趨，無可強制，惟一面仍要表示干涉中國外交，故於對德抗議提出後，日公使至外交部有一此等大事，中國不告知日本，甚爲遺憾，此後應請中國政府注意」云云。一面竭力與英，俄，法，意四國駐日大使，爲各別的秘密交涉，以爲日本承認中國加入協約國的條件。並要求各國保證日本接收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與已經日本佔領南洋赤道以北諸島嶼，次第得各國承認。此等約束，異常秘密，除當事國的政府外，無有知之者。及俄國革命後，始爲勞農政府所發表。(註十一)此種險辣外交方略，固爲當時我國政府與國民所夢想不到。惟俄國勞農政府在民國六年十二月中發表此種密約時，我國駐俄使館中人，對此生死關頭的重要文件發表，竟亦未曾注意，並無隻字報告本國政府，以致我國全國人民和當時的南北政府，直至民八歐戰終止之後，還興高彩烈，

希望議和大使在和會中間，收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條的中日協約，一場春夢，到了開議山東問題時，纔知列強均爲密約所拘束，愛莫能助，我國人纔知兩年以前，已被日本制其死命。日本對於中國竟用八面下網之計，而中國政府與官吏的昏庸，與滿清時代如同一轍。

日本既以攻取青島而佔領山東，將膠濟鐵路全線及附近各礦業的中國人員，悉數驅逐，改用日人，更於民六在青島設行政總署，在坊子，張店，李村，濰縣，濟南各處設分署，受理山東人民一切民刑訴訟，抽收捐稅，視同本國領土，雖中國政府先後抗議，皆不理會。及中國對德宣戰，亦爲協約國的一員，日本對於山東，不便永久視同征服地，又逆知中國將來在世界和會中必訴日本的侵害，雖英，法，俄，意已有密約，然尚有美國出而作梗，故欲使在和會中遏止中國的控訴與抵制美國的援助，必須爲萬重之保障。於是民七駐日公使章宗祥與日本興業銀行副總裁小野英二郎締結濟順高徐二鐵路預備借款契約的勾當，突然成立。當時中國內戰方殷，飲鴆止渴，亦所不惜，章氏在答復日本外務大臣的照會中竟有「欣然同意」的話頭，此四字實巴黎和會山東問題失敗之毒根，亦即中國政府斷送山東的契約。

蓋自日本佔領山東後，先以民四二十一條迫中國承認山東權利歸日本爲第一重保障；民

六日允中國參戰爲條件，迫英，法，俄，意承認山東權利移歸日本爲第二重保障；章氏更以「欣然同意」四字的照會送去，不啻爲日本洗刷二十一條件的中日條約，並非出於日本的威迫，以塞將來反抗的口實，此爲第三重保障。章氏「欣然同意」的復文，原爲日本所擬的稿，中國政府以依此可以解決山東問題，又能得二千萬元十足墊款，故不顧一切而照書之，不但異日巴黎和會山東問題根本失敗，且又斷送了超過二十一條以外的許多權利。(註十二)日本寺尾內閣下野後，也自詡侵略中國的功績，謂大隈內閣向中國要求二十一條，惹得中國全國的怨恨，而日本並無實在利益；本人在任期內，借與中國的借款，三倍於從前之數，實際日本對於中國所得的權利，何止什倍於二十一條云云。查中國自前清至民國六年八月以前，其所借日本之款，共爲一億二千萬元，而寺尾於二年之內，竟達五萬萬元之多，且其所借大半爲對西南軍費之用，南北戰爭的慘酷，與戰爭期間的延長，實原於此！故中國國內慘酷的戰爭，日本造成之，戰爭的延長，亦日本造成之。換言之，北方主戰派不啻奉日本之命，攻伐西南，而西南亦間接與日本宣戰。

日本所以延長中國內亂，有三大原因：一使中國在歐戰期內以內戰而不能盡參戰之職任，以免增高國際上的資格；二則使中國以內戰而不得不仰求於日本的借款，以掠奪中國種種權

利；三則可以消磨中國國家元氣，阻害其發展圖強的希望以此三種原因便利用歐戰機會以資助北洋軍閥為唯一之手段，遂在民六民七兩年內，除軍事協定為日軍閥利用參戰名義，實行侵略中國外，其他各項借款契約，都是寺內內閣以促進兩國財政金融互相提攜的名詞，實行其助長中國內亂掠奪中國種種權利的陰謀。

日政府對於中國既獲全部勝利後，惟美國尚未入彀，急思用他種方式，使美國入其網羅，適值美國禁止金鐵出口，影響於日本不利，日即借此遣派石井菊次郎為全權特使，赴美協議。美初以為石井之來，亦如英法等國的特使專為致謝美國參戰而來，不疑其於東亞外交上有特殊的使命而石井亦再三表示與對華毫無侵害的用意。嗣與美國務卿蘭辛會見，在普通酬酢中，輕輕騙上蘭辛簽訂協定；此民六十一月二日事也。日本既訂日美協定，即曲解條文，對于中國自認有特殊地位。至此，日本對於異日和會席上，巳可高枕無憂，侵略中國的策略，亦大告完成。

歐洲大戰至民國七年十月初旬，協約國完全勝利，德奧自請休戰，事實上戰事將告結束，而召開和會之期不遠，日即以中國參戰不力，中傷中國於和會之資格，繼又竊偷陸全權文書，以妨礙中國代表的活動（註十三）加之巴黎和會僅有外交公開為標幟，實際仍是閉門獨斷的機關。

和會實權，既爲五強壟斷，威爾遜亦已孤掌難鳴，一切重要事件，不過四頭三頭在私邸私自取議。我國代表提出的希望條件，概爲和會拒絕，要求青島直接交還，亦遭失敗；又以和會代表均非親日派，日本因有制止中國代表發言的要求。美以中國代表數次請求援助，乃有以青島交五強處置爲調處，仍不成立。是時和會中意以阜姆問題退出，英，法均爲密約束縛而無置喙餘地，能爲中國出力者僅一美國；然以中國另有一「欣然同意」的束縛，遂使美國亦感困難。中國代表以步步退讓，終不得和會接受，故拒絕和約簽字；數年來全國上下一線希望，至此盡成泡影。北京政府始終主張簽字的，接到陸全權等的報告，驚愕失措，以爲不然，惟亦無法挽回，深悔代表人選之不當，蓋出席和會之代表，沒有一人是親日的。

先是，在四月二十二日威爾遜於最高會議向我國代表聲明美國不能貫徹主張後，陸全權等向北京政府電告情形，謂此項和會失敗的原因，一由於民六二三月間，日本與英，德諸國有青島讓歸日本的密約；二由於民七九月我國當局與日政府有「欣然同意」的山東換文，遂使美國無從爲力云云。此電一到，羣情憤怒，便激成全國學生空前的愛國運動。

巴黎和會的壓迫中國，固爲中國千古痛史的一頁，然從此中國已由舊式外交一變爲新式

外交，蓋我國九十年來的外交事件，專由政府少數人祕密包辦，帝國主義利用此弱點，挾持少數人以掠奪我國的權利，我國軍閥官僚亦利用此弱點，以實行其賣國利已的企圖。至此，乃一變而爲公開的國民外交之趨勢，因爲此項不簽約的原因，出於留歐學生團和華僑竭力反對，且圍陸徵祥住宅以示威。及至電告本國，又有空前的愛國運動，到了直接交涉問題發生，而全國更有一致罷課的表示，使中國對外精神發揮於世界，卒使直接交涉的政府，不得不從國民的主張，這是以前所未有的現象。故山東問題的失敗，是我國一部外交失敗史，是一部國權喪失史，同時也是一部日帝國主義侵略成功史。中國眞能從此轉灣迴頭以求一線生機乎？！曰否否九一八之後，又有一二八，繼一二八之後的，祇見其急進，未見其中止：（註十四）然則外交上何以一度轉灣迴頭，東方的古國還是沉淪下去呢？這是後話，且看下文。

參考

（註一）波子碼斯和約談判時，日本向俄國要求報償十二億元歸還樺太島北部之地，俄國以此役日軍未進俄國領土一步，僅失所獲中國的利益，不以戰敗自居，賠款分文不肯承認，故談判幾經波折，結果俄國僅割樺太島南半部與日本，日本爲戰爭而消費的十五億八百四十七萬元的軍費，在此和約中未得一元的償金。

(註二)日英同盟第一次爲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 第二次爲光緒三十一年。第二次同盟條約中，與舊約不同的，爲舊約不過防守同盟，新約則爲攻守同盟；舊約日本對於韓國有特殊利益而止，新約則有指導監督之必要處分權。故第二次日英同盟，爲列强承認日本併吞韓國的先聲，而種日本單獨侵略中國的根源。

(註三)日俄第一次密約訂於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第二次密約訂於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英國對付西藏的政策，以俄國對外蒙的辦法爲標準，遂於民國元年助西藏獨立。

(註四)當二十一條未提出時，加藤高明祕密訓令日使有「宜用種種方法，以求達到此目的」等語

(註五)日置益對袁氏謂日本臣民，大半以爲貴總統反對日本，若不開誠交涉，是反對日本之證；若開誠交涉，則日本希望貴總統高昇一步。袁氏心懷疑惑，卒墮計中，雖經十九省將軍及全國各界苦請宣布，卒以「外交祕密」四字搪塞國人，而委託於日置益指定之陸徵祥曹汝霖二人，遂鑄成大錯。

(註六)當時外交總長陸徵祥主將條件宣布，次長曹汝霖爲日人運動，終於以民氣囂張，一經宣布，輿論沸騰，措施益難而爲之阻止。

(註七 當日談判代表陸曹二氏，係日置益指定。

(註八 議至第二號第二第三兩項時，幾度讓步，已無轉旋之餘地，日本忽海陸軍並進，以示威脅，中國政府表面雖示鎮靜，而極欲會議進行。日使忽稱墮馬受傷，不能出席，陸曹二全權乃親赴使館，又以不能下床，終致到私室床前會議，開外交界未有之創聞。

註九)廿三年十月十八日時報蕭松通信稿，題爲烈士暮年，中有「揭穿秘戲」一節，說及張伯烈在民八廣州非常國會議

員任內，曾作一篇政潮秘史，對於山東問題，歸咎於研究系的湯梁，新舊交通系的曹陸梁等，其事雖未必盡確，然足供參考。張謂帝制發動於宋芸子倡君主之時，在二十一條件之先。鄰國頗相壓文帝電袁氏稱帝，袁曰「稱帝須自動」以不就範圍，故激出二十一條件的交涉，帝制遂停頓，直至交涉案了，楊某的籌安會出。

（註十）清朝亡國後，日本雖致清室宗社黨一班首領，住於大連，至袁氏稱帝時，日政府卽擁肅親王糾合宗社黨，謀于滿州舉勤王軍，以討袁氏，其軍費由日本大倉喜八郎出名借貸日金一百萬元，以肅親王的財產作抵，內以三十萬元由肅親王召集宗社黨三千人（馬賊占多數）至大連，由日本軍官編練成軍，餘七十萬元由日本陸軍大佐士井等率領日本後備軍人另組一軍，混入於勤王軍內。猶恐軍力單薄，更招蒙匪南下，供給蒙古巨匪首領名巴布哲布者，以多數武器，嗾使舉兵南犯，以與勤王軍援應。後以袁氏病死，日本不肯卽罷休，仍促蒙匪南犯，遂釀成鄭家屯事件。

（註十一）參看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下卷第二十三章中國對德奧宣戰及南北戰爭之日禍中，有餘使關於山東密約的兩件。

（註十二）參看劉彥帝國主義壓迫中國史下卷第二十三章一三三頁。

（註十三）陸徵祥自本國啓程，政府預備和會應用一切重要文書，由陸氏攜帶，船經日本，被竊丁字文書一箱，蓋日本急欲探悉我國在和會的提案，故出此不擇手段，當時外報亦指此事爲日本不道德的舉動。

（註十四）九一八後雖失了東北四省，而民氣銷沉更甚於前。日本在華霸權的增加，更是一日千里。國人僅知軍事侵略的兇橫，不知經濟侵略已把整個中國殖民地化了。東北原爲出超，九一八後亦已成爲入超。華北方面自從塘沽協定簽定後，黃河以北已如九一八前的東三省，卽以山東一省而論，日人投資於工商兩業的已達九億七千萬元。

其在華南，也有急轉直下之勢，絕對不輸入日貨的廣東，最近也已公開輸入，汕頭方面，尤爲充斥。總之日本於佔有東四省後，卽企圖獨佔整個中國的市場，企圖控制整個中國的經濟，現在已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了。

第四編　趕上歧途的民族運動

第八章　原始暴動的演進

近代民族運動的第一顆種子　從雙重剝削而激成的羣衆革命運動　團結太平天國的中心信仰　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策　爲了資本主義革命條件未成熟而失敗　從原始暴動轉變到近代民族運動　封建統治的妥協外夷以安內　封建統治又復穩定　借用外力外資的開始　初期民族運動的一種過度形態

在鴉片戰爭前，因爲鴉片的輸入，以致社會生活發生變動，已如第四章所述。這種影響最深的是廣東，因爲廣東是最早與外人貿易，也是鴉片輸入最多的地方；所以在鴉片戰爭前，廣東的農村生活已經起了變化：本來是安定的能夠自給的社會，到這時候已漸漸地感覺貧乏與騷亂的現象了。

鴉片戰爭開始後，廣東首當其衝，當鴉片戰爭第一次在廣東議和時，（公元一八四一年）廣東方面出賠款六百萬元與英國，這六百萬元中，除了四百萬元由藩司運司海關三庫發給外，餘二百萬元直接取諸廣東人民，而其三庫所撥的四百萬元，自然也是間接取諸人民。廣東本已感受經濟貧乏的壓迫，加上這筆鉅額的賠款，更引起社會的不安，又加以英軍在各處恣意騷擾，終於大戰之後，又激起農民的原始暴動——平英團運動。農民的原始武裝暴動，在歷史上是一件極常見的事，不過向來原始的農民暴動，是對準着封建統治階級，這囘平英團運動是因爲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所以平英團運動是開始了中國近代的農民暴動，也是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第一顆種子，牠是由鴉片戰爭直接所激起的，所以鴉片戰爭結束以後，平英團運動也就隨着消沉。

這樣，平英團運動在史的意義上是很有價值的，因爲關於牠的紀載很簡單，不足以充分表現當時農民的原始暴動的精神；但在清史中一段簡單的敘述（註一）已可看出當日農民暴動的力量，足使資本主義者畏怯。

如果以平英團運動爲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第一顆種子，那麽太平天國運動便是中國民

族運動的第一支萌芽。因爲太平天國運動是眞正的自發的羣衆運動，牠是推進中國民族運動最有力量的一次農民原始暴動。

經過了鴉片一役，遂使滿清統治階級對於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投降，於是中國應付的賠款，由六百萬元增加到二千一百萬元。而且鴉片戰爭後：一方面資本主義侵略的長驅直入，很快地引起了農村經濟的破產——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戰勝了自足自給的小農經濟，遂使資本主義商品侵略的發展，與農業經濟的破產，在同樣的比例發展起來。在另一方面，中國戰敗的結果，不僅在國際上揭破了、「上國天邦」的紙老虎的弱點，而且國內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無能，農村經濟的破產，使統治階級在稅收上不能不受影響。而戰後的賠款與種種善後佈置，在在需費，稅收既因農村經濟的衰落而減少，支出反因戰敗的結果而膨脹，戰前的收支已不能相符，戰後、又來了這樣相反的現象，財政困難，臨到山窮水盡的境地。要維持這殘餘的統治，祇有加重於民衆的剝削，於是農村經濟更快的崩潰，生活在落後的封建社會的農民，在資本主義與本國統治階級兩重剝削之下，爲饑寒壓迫所驅使，必然地使那局部的零星的暴動，成爲偉大的羣衆革命運動了。

一個羣衆的原始暴動，在短時間內發動幾千萬的人民，佔據十幾省的區域，支持至十餘年之久，這種偉大的羣衆革命運動，並不是一種簡單的爭天下奪江山的把戲，而帶有濃厚的民族感情的運動。牠在客觀上是接受了資本主義影響的反封建剝削的革命運動，在這種原始暴動中，當然不會有很正確的意識與路線，然在他們的奉天討胡檄文中，（註二）充分地表現出他們運動的意義：一是反對滿清，一是反抗帝國主義；所以太平天國是繼續平英團運動的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展開。雖然在太平天國運動中並沒有鮮明的反帝國的旗幟，但這一點並沒有減少其反帝國主義的意義；因爲沒有鮮明的旗幟，是一切原始的羣衆運動的普遍現象。

太平天國的領袖，大都是天主教信徒，而天主教就成爲團結太平天國羣衆的中心思想。本來西歐資本主義侵入中國後，傳教已成了這些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侵略中國的一種手段，這種文化的侵略，可以麻醉中國人民的民族精神，可以緩和排外的心理。但是太平天國的天主教宣傳，事實上並不是替侵略國家盡了文化侵略的作用，而是用以團結羣衆作爲羣衆共同的理想追求的目標。因爲在一個原始的農民暴動中，事實既不能有正確的理論指導，而又不能不有一個共同信仰的中心信仰，所以原始暴動不能不染有迷信神怪的色彩，因爲如果沒有這種迷信

沒有這種神怪，就沒有一種理想的力來團結羣衆，也就不能發動一種廣大的羣衆運動；太平天國運動在鴉片戰爭以後，即在西歐資本侵略以後，牠的本身是資本主義侵略下的一種反動；然而多少已受了資本主義的影響，所以已經相當程度的掙脫封建宗法社會的迷信，而以帶有濃厚的資本主義色彩的天主教來用作團結羣衆的理想中心。不過我們深信是太平天國雖然利用宗教，並沒有帝國主義之工具的作用，如果有了爲帝國主義的工具的作用，那麼帝國主義的洋鎗隊，再也不會幫助滿淸政府去打牠們了，關於這一點可以從原道醒世訓上面（註三）得到有力的證據。

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有十餘年的歷史，但牠無時無日不在與統治階級激戰中，事實逼迫牠必須傾全力來與統治階級周旋，因而顧不到內部政治經濟的建設。但在太平天國佔領的區域內，社會經濟已起了極大的變化，牠不但是一種反封建的運動，而且澈底地推翻了建築在封建剝削關係上的舊社會經濟制度。在太平天國統治的地方，舊有統治階級被推翻，土地沒收爲公有，再由公家分給農民，這種含有積極的建設資本主義意義的土地革命的制度，其詳細辦法，規定在天朝田畝制度中，這是太平天國的最重要的文獻，（註四）研究太平天國運動的唯一資

料。在這天朝田畝制度中，最可注意的如：「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凡天下田，天下同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這種近乎原始共產主義的辦法，是寄託於農村土地關係的封建剝削所引起的反響，也是含有積極建設資本主義制度的意義。太平天國運動之所以能夠很快的發展，在乎牠能夠得到廣大的羣衆的擁護，其所以能夠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就在乎牠的急進的資本主義的土地政綱，因為人民在殘酷的封建剝削之下，已不能維持其自足自給的安定生活，而封建的剝削，是寄託在封建的土地關係之上，所以太平天國以解決土地問題相號召，很快就得到羣衆的擁護。

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原因，有的說是內部不能團結，有的說沒有紀律，有的說單純的軍事上的錯誤，有的說沒有與國際上取聯絡，也有說牠行為太激烈之故，其實這些都是次要的原因。太平天國之所以失敗，其唯一的主要原因，就在資本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長成，代表封建勢力的統治階級，雖然因為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而開始動搖，然而整個的社會經濟，還是封建的小農經濟，庸弱無能的統治階級，還是唯一有力量的統治者，羣衆方面因為缺乏獨立的經

濟基礎即使爲了國際形勢的逼迫而能一轟而起，終於不能堅持過久。並且農民本來是可左可右的二重性的分子，又是非常散漫與沒有獨立的階級基礎，如果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則農民運動便不容易脫離原始無政府的狀態；太平天國犯了這種弊病，不是偶然的錯誤，也不是任何領袖領導不當的過失，而是必然的現象。統治階級即使臨了極度的動搖，極度的無能，他們終究還有獨立的階級基礎，他們有數千年來遺留下來的精神工具——綱常名教，一切舊的封建道德的意識與習慣。一個沒有階級基礎沒有核心領導的原始的羣衆運動，要獲到最後勝利，那是不可能的事。

太平天國運動偉大的歷史的意義，因爲牠與過去一切農民原始暴動澈底得多，牠已經跳出了封建宗法社會的圈套，開始接受先進資本主義的影響，牠很勇敢地起來與封建宗法社會的一切禮教文化決鬥，所以太平天國運動，已把中國數千年來禮義人倫詩書典則掃蕩淨盡。在過去任何一種暴動，總是敬畏神祇的，而太平天國對於先聖大賢忠臣義士以及一切廟宇道院一掃而光，難怪尊王衞道的曾國藩看來，大聲疾呼牠是「豈獨我大淸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鉅變」了。（註五）太平天國在一般人當牠比過去的流寇還兇惡，就是爲此；而太平天國運動

從原始的農民暴動，轉變到近代的民族運動，也是爲此。

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已經傾向近代民族運動，牠還是不能與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統治階級妥協，這是因爲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統治階級，對於落後國家的資本主義的革命，必然取壓迫的態度。他們不希望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纔可永久地失去了抵抗侵略的能力，纔可以容許他們誅求無厭的侵略，如果落後國家也去依樣胡蘆，創造一個健全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那就先進國家失去了侵略的對像，資本主義先進國家既不願落後國家的進步，必然地要壓迫落後國家進步的革命運動，亦必然地要與落後國家的反動的統治階級聯繫起來。封建的統治階級，雖然一方面也感覺到先進國家侵略的痛苦，然而當國內發生革命運動的時候，他們便會立刻對外來的侵略者妥協，甚至不惜對外來的敵人，作最卑鄙屈辱的投降，而以全力來鎮壓革命。鴉片戰爭以後，代表封建統治的滿清政府，何嘗不深恨這些「外夷」的跋扈，然而臨了太平天國運動起來的時候，覺得比「外夷」更可怕，有根本消滅自己的危險，他們便會把「攘外」暫時不提，而先與侵略國家妥協，甚至投降，做那「安內」的工作。這是太平天國運動受着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與中國統治階級夾攻而更快的促其失敗的地方。

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生，起源於南方的兩廣，普遍到全國各處。兩廣之所以成了太平天國運動的發祥地，因爲西歐資本主義的侵略中國，以兩廣爲最早，其露骨的侵略，亦以兩廣爲最甚；鴉片戰爭後廣東人民犧牲最大，負担特重，所以廣東的農村經濟，比其他各省更爲悲觀，而羣衆的原始暴動也就繼着平英團運動的往事，在兩廣重行開始爆發。

代表統治階級的滿清政府，雖然戰勝了太平天國運動，然而他們不能解決農村經濟的危機，所以羣衆暴動暫時可以鎮壓下去，而回復安定無波的社會生活，已是不可能了。於是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以後，不久北方又發生了被稱爲「捻匪」的農民羣衆大暴動。在十餘年慘酷的屠殺與長期的鎮壓期間，南方及中部各省，大都在太平天國手裏；所以滿清政府的籌餉籌款，只能限於北方，北方數省的民衆，乃不堪其剝削；及至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下去的時候，北方的「捻」民運動，就繼之而起。捻民運動完全是統治階級的殘酷的剝削，致民不聊生，而所激起的反響。滿清政府既能夠把太平天國運動鎮壓下去，自然對於捻民運動的鎮壓，也可以得到勝利了。（註六）

一切的羣衆的革命運動至此已到頂點，終於統治階級在投降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條件

之下，一齊鎮壓下去，封建的統治階級暫時又復穩定起來。

這裏，有兩件事情應當加以注意，而爲人所忽視的，就是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淮軍以外，還借重於洋槍隊；鎮壓囘民運動，左宗棠的成功，在於借到一千數百萬元的外債；前者是統治階級利用外力殘殺國人之始，後者是統治階級借用外資，挽救殘局之始。從此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可得多方面的侵略，而代表封建統治階級的滿清政府，以及承繼滿清的統治者，亦得多方面的援助。中國統治階級發現了這兩條新的路線去勾結帝國主義，於是中國的民族運動，便成了他們的共同敵人，不但難以達到成功之路，並且也不容易抬頭，這些毒辣而卑鄙的手段，已可決定以後民族運動失敗的命運。

太平天國運動開始於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〇年）到了同治七年（公元一八六八年）的平定，已有十八年，至囘疆的平定，則已快到三十年了。在這三十年連綿不斷的內亂期間，還有俄人的侵占東北和西北，與英法聯軍的入犯，民生憔悴，已達極點；（註七）不過在這三十年運動之過程中，仍不失其歷史上的偉大意義，因爲太平天國運動是近代中國民族運動的萌芽，雖然是失敗了，但對於啓發國人的民族思想，給予很大的影響。所以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

以後，民族運動的種子，並沒有消滅，一經相當的時節，便會茁芽向榮。國內的統治階級，與外來的資本主義，確然可使民族運動不易抬頭，同時也是促成民族運動的主力；所以在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二十餘年，初期民族運動的興中會，終於接受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而由新的形式發展成功興中會的成立，（公元一八九二年）自然是當時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牠雖然是同盟會的前身，也可說是太平天國運動的蛻化，牠是從原始農民暴動由新的形式發展而成為初期民族運動的一種過渡形態。因為物質生產方法，是決定人類之意識形態的基本條件，一切社會之意識形態的表現，乃是社會的物質的生產方法的反映。中國產業自鴉片戰爭到興中會成立的半世紀中，雖然已有若干部門的機器工業輸入，牠的發展，為了統治階級的自私自利，顛倒其緩急重輕；又遇到資本主義的壓迫，與封建殘餘的束縛，不能完成產業革命的任務，因之不能形成一種新的獨立的階級意識。新的獨立的階級意識既不能形成，以樹立着鮮明的旗幟，即使已有客觀的條件，也祇可以促成初期的民族運動，只要把興中會成立的目標，一經分析，便可明白。（詳下章）至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就是太平天國還是一種農民的原始暴動，而興中會則已經是比較進一步的有組織的民族運動的開始了。

興中會之所以比較太平天國有進一步的發展，其原因是隨着資本主義而來的一切西方的進步思想也漸漸在中國發生起來，所以太平天國的指導機關（天王政府）實際上並不能眞正作領導民衆革命的核心。而興中會已經具備了革命的政黨的雛形，牠有宣言，有綱領，有各種運動的步驟，都比太平天國有組織，雖然在現在看來是非常幼稚，但和太平天國運動時比較起來，不能不說是比較地進步了：這是比較太平天國的原始暴動進一步形式的興中會，也就在這比較進一步的情形下產生的緣故。

參考

（註一）平英團運動據清史所載，有如下的一段話：「……於是粵民種種不平之感，一旦迸發。初十日英兵千餘，方自四方炮台同泥城三元里居民，忽大樹平英團之旗幟，於是一時鳴金揭竿而起者，聯絡一百有三鄉，頃刻間，男婦數千人各處莊丁雲集四面埋伏，誓與決一死戰。義律（Cantain Elliott）聞變馳救，陷重圍不得出。鄉民愈聚愈衆，頃至數萬，英人突圍不出，死者二百餘人。義律移書告急於知府余保純，保純以英山命往解，竟日，始挾義律出圍。翌日，償金授受已畢，英軍遂於十二日撤去廣州，其大船有擱滯淺沙者，各鄉民復思截而火之，事同償款之緞。義律懼復移文總督，祈頒出示曉諭，衆始解散。而佛山義勇從陸路攻英人於龜崗炮台，先從上風縱毒烟以瞇敵目，殲敵數十，又擊破應援之船。當時先後奏聞，詔責諸將調集各省官兵，何不如區區鄉勇？……是時南海番禺

兩縣團集義勇，晝夜演練義律偵知內河有備，竟不敢報復，翻然更計，遂復有「廈門長江之師」又當時平英團有討英檄一篇茲錄一段如下：「……爾自謂船炮無敵，何不於林制府任內攻犯廣東？爾前日被圍，何不力戰自拔，而求救於首府，此actual奸相受爾籠絡，主款撤防，故爾得乘虛深入，倘再入內河，我百姓若不雲集十萬衆各出草筏沈沙石整槍炮，截爾首尾，火爾艘艦，殲爾醜類者，我等卽大淸國之子民！……」

（註二）太平天國的奉天討胡檄較之曾國藩的討粵匪檄來得重要，以其不易見到，現在錄其原文如下：「眞天命太平天國本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右弼又正軍師西王蕭，爲奉天討胡，檄布四方：

「若曰：嗟爾有衆，明聽予言：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於五湖，而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爲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眞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爲妖人者何，蚊魙（閻羅妖）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今當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魙。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孼。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中國之人爲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今滿洲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中國之人倫，乃僞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盡爲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洲妖魙，悉收中國之美姬，爲奴爲妾，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

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痛心，談之汚舌，是盡中國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洲造爲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之男子而脅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語，今滿洲造爲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汚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女士皆哭泣道路，是使中國人之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鈔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仰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洲之所以愚弄中國，欺謀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汚矣哉！昔佛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不攻中國。今滿洲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占中國，惡極窮凶。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狐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中夏。冠座之設，野狐升據，蛇窩之內，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犂其窟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嚇詐，甚至庸惡陋劣，貪圖蠅頭，拜跪於狐羣狗黨之中。今有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赫然怒。今胡虜羣犬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恥。昔文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予總科滿洲之衆，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衆，不下五千萬。以五千萬之衆，受制於十萬，亦可云醜矣。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而九五之眞人已出。胡罪盈貫，皇天震怒，命我天皇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中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爲官，或爲民，當急揚徽之志。甲胄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招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於蔡州，擒妥懽於應昌。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

或能斬其首級來降者，或有能擒斬一切滿洲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皇上帝當初之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螢孤以先登，戒防風之後至，在世英雄無匹，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真，生為胡人，死為胡鬼。順逆有大體，夏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洲之禍久矣，至今而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於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為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逆天有顯戮。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註三）太平天國的理想上的原則，可以把原道醒世訓一文為標準。

（註四）天朝田畝制度為太平天國的最重要的文獻，茲抄錄原文如下：「凡一軍，典分田二，典刑法二，典刑報二，典入二，典出二，俱一正一副。即以師帥旅帥兼攝，當其任者掌其事，不當其事者亦贊其事。又一軍一切生死黜涉等事，軍帥詳監軍，監軍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次詳軍將，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軍師遵行，勳等臣，世食天祿。其後來歸從者，每年每家設一人為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督農，耕田奉尚。

「凡田分九等，其田一畝，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為尚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為尚中田，可出一千斤者為尚下田，可出九百斤者的為中尚田，可出八百斤者為中中田，可出七百斤者為中下田，可出六百斤者為下尚田，可出五百斤者為下中田，可出四百斤者為下下田。尚尚田一畝，當尚中田一畝一分，當尚下田一畝二分，當中尚田一畝三分五厘，當中中田一畝五分，當中下田一畝七分五厘，當下尚田二畝四分，當下下田三畝。凡分

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三人醜田，好醜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煖也。凡男婦每人自十六歲以尚；受田多逾十五歲以下一半，如十六歲以尚，分尚尚田一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尚尚田五分。又如十六歲以上，分下下田三畝，則十五歲以下減其半，分下下田一畝五分。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畝彘，無失其時。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穀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眞主救世旨意也。但兩司馬存其錢穀數於簿，上其數於典錢穀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兩司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如一家有婚娶彌月事，給錢一千，穀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直等匠，俱用五長及五卒爲之，農隙治事。凡兩司馬辦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總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舊時歪例盡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禮拜堂，兩司馬教讀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及眞命詔旨書焉。凡禮拜日，五長各率男婦至禮拜堂，分別男行女行，講聽道理，頌讚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凡二十五家中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或各家有爭訟，兩造赴兩司馬，兩司馬聽其曲直。不息，則兩司馬挈兩造赴卒長，卒長聽其曲直；不息，則卒長尚其事於旅帥，師帥，典執法及軍帥，軍帥會同典執法判斷之。既成獄辭，軍帥又必

倘其事於監軍，監軍次詳總制，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奏天王，天王降旨，命軍師丞相檢點，及典執法等直啓天王主斷；天王乃降旨主斷，或生或死，或予或奪，軍師遵旨處決。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為忠；由卑陞至高，世其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為奸，由高貶至卑，黜為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為賢為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為惡為頑，或誅或罰。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例其行蹟，註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其人並舉姓名於旅帥；旅帥細核其人於本五百家中，果實，則倘其人並保舉姓名於師帥；師帥總核其人於本二千五百家中，果實，則倘其人，並保舉姓名於軍帥，軍帥總核其人於本軍中，果實，則倘其人，並保舉姓名於監軍；監軍詳總制，總制次詳將軍，侍衛，指揮，檢點，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啓天王，天王降旨調選天下各軍所舉為某旗，或師帥，或旅帥，或卒長，兩司馬。伍長，凡濫保舉人者，黜為農。凡天下諸官，三歲一陞貶，以示天朝之公。凡濫保舉人及濫奏貶人者，黜為農。當陞貶年各省首領各保陞奏貶其統屬，卒長細核其所統兩司馬及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至若其人無可保陞，並無可奏貶者，則姑置其人，不保不奏也。旅帥細核其所統屬卒長及各兩司馬伍長，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師帥。師帥細核其所統屬旅帥以下官，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於軍帥。軍帥將師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姓名，並自己所保陞奏貶某官姓名，詳於監軍。監軍並細核所統軍帥，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

詳欽命總制。欽命總制並細核具所統監軍，某人果有賢蹟，則列其賢蹟，某人果有惡蹟，則列其惡蹟，註其人，並自己保陞奏貶姓名，一同舉於將軍侍衛指揮檢點，及丞相。丞相稟軍師，軍師將各欽命總制及各監軍及各軍帥以下官所保陞奏貶各姓名直啓天王主斷；天王乃降旨主斷，超陞各欽命總制所保陞各監軍，其或陞爲欽命總制；或陞爲侍衛；謫各欽命總制所奏貶各監軍，或貶爲軍帥，或貶爲師帥，或貶爲旅帥，卒長；超陞各軍帥所保陞各官，或陞尙一等，或陞尙二等，或陞軍帥，謫各軍帥所奏貶各官，或貶爲下一等，或下二等，或貶爲農。天王降旨軍師，宣丞相，丞相宣檢點，指揮，將軍，侍衛，總制，次宣監軍，監軍宣各官，一體遵行。監軍以下官，俱是在尙保陞奏貶在下。惟欽命總制一官，天下准其所統各監軍保陞奏貶。欽命總制，天朝內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諸官，天王亦准其尙下互相保陞奏貶，以剔尙下相蒙之弊。至內外諸官，若有大功大勳，及大奸不法等事，天王准其尙下不時保陞奏貶，不必拘陞貶之年。但凡在尙保陞奏貶在下，誣則黜爲農。至凡在下保陞奏貶在尙，誣則加罪。凡保陞奏貶所列惡蹟，總要有憑據，方爲實也。凡設軍每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設一軍帥，次設軍帥所統五師帥，次設師帥所統五旅帥，共二十五旅帥；次設二十五旅帥各所統五卒長，共一百二十五卒長；次設一百二十五卒長各所統兩司馬，共五百兩司馬；次設五百兩司馬所統五百伍長，共二千五百伍長，次設二千五百伍長各所統四伍卒，共一萬伍卒。通一軍人數共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凡設軍以後，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另設一伍長，添多二十六家另設一兩司馬，添多一百另五家另設一卒長，添多五百二十六家，另設一旅帥，添多二千六百三十一家，另設一師帥，共添多一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另設一軍帥。未設軍帥前，其師帥以下官，仍歸舊軍帥統屬。既設軍帥，則割歸本軍帥統屬。凡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經，虔誠祭奠禮拜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禮拜

日師帥旅帥卒長更番至其所統屬兩司馬禮拜堂講聖書、教化民、察其遵條命與違條命及勤惰。第一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師帥至兩司馬禮拜堂，第二七七四十九禮拜日帥長又別至某兩司馬禮拜堂，以次第輪迴而復始，旅帥卒長亦然。凡天下每一夫有妻女子三四口或五六七八九口則出一人爲兵，其餘鰥寡孤獨廢疾免役，皆須國庫以養。凡天下諸人，每禮拜日，依職分虔誠設牲饌奠祭禮拜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講聖書，有敢怠慢者，黜爲農。欽此，」

（註五）見曾國藩討粵匪檄。

（註六）當太平天國運動興起於南方後，北方便有捻民與回民的運動，反抗滿清。「捻」的意義，相傳謂當日在江蘇安徽山東湖南湖北五省交界游民相聚刼掠，一聚爲一捻。又說捻是河南安徽鄉民迎神賽會，燃油紙捻爲龍戲的名目。當太平天國攻陷南京時，乘勢興起與之結合，聲勢亦大，洪秀全命陳得才聯合捻民攻入陝西時，渭南一帶的回族也起來反清，後來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左宗棠鎮壓捻民與回民的運動，清朝因此又穩定起來。

（註七）太平天國運動後，農村經濟破產的危機，極爲顯露，就是曾國藩也有「……自五季以來生靈塗炭，無論於今日」的話。見曾文正公書扎卷一三復馮晉川信。

第九章　民族運動之曲線的發展

初期民族運動的開始　不能形成獨立的階級意識　南洋羣島和美洲的華僑　不能完成中國經濟革命的四原因　引起他們革命的要求　誘發中國初期民族的主因　廣東成了革命策源地　政治上的要求　初期民族運動的特點　中產階級的幻想　民族運動第一個轉變　對於政治輭弱的原因　軍事暴動與單純的政治活動　異軍突起的鄒容革命軍　反資本主義的羣衆運動　一服烈性的興奮劑　同盟會隨義和團失敗而成立　民族運動跨進了新階段　民族革命運動進程上的一大缺憾　中國近代思想的集大成　民族革命運動又變了一種恣態　一種意識形態　辛亥革命失敗的必然性

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在北方興起的捻民回民運動，雖然前後綿延三十年的奮鬥，終於被封建統治階級勾結資本主義，共同鎮壓之下失敗了。但是對於啓發國人的民族思想，給了一個很大的影響；所以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民族運動的種子，潛伏若干年後，仍由新的形式發展起來，光緒十八年（公元一八九二年）興中會的成立，（註一）就是這種發展形式的表現。興中會的成立，不僅是接受了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而且還有當時的社會經濟情形，造成了這種初期

民族運動的開始。

太平天國運動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既如第八章中所說。與中會成立的時代，中國資本主義革命的條件是否已經備具？同時牠的階級基礎是什麼？牠的核心領導又是什麼？關於這些先要了解「物質的生產方法，決定人類的意識形態」的前題之下，纔可以了解中國民族運動進展的情況。

鴉片戰爭後因爲先進國家商品的侵入，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有長期的歷史的發展。但是商業資本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牠只是永久地在流通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牠不能改變原來的生產方法，只可在舊的生產方法的範疇中活動，因而與當時的封建剝削，發生利害的關聯，使商業資本與土地資本混合生長起來：所以中國經過幾乎半個世紀的時期，還不能形成一種新的獨立的階級意識。

但是在南洋羣島和美洲的華僑，與中國內地的資本家，顯然有本質上的不同。他們不但做簡單的庸俗的商品交換媒介的任務，他們本身就是新式機械工業的主人——樹膠工場或製糖工場的主人，在東印度羣島還有一小部是錫礦工人的主人，他們向落後民族的土人，掠奪着

其他資本主義僑民掠奪剩餘下來的財富，所以他們的資本積累，遠非國內商業資本家所能及，但是這種僑居國外的中國資本家，仍不足以完成中國經濟革命的任務，因為：

第一：他們的基礎，不在國內而在國外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上，他們本身的基礎，異常薄弱，而其生產事業，與國內市場毫無關係，不能促成國內舊生產方法的解體。

第二，他們積累的資本，雖然遠過國家的商業資本，而還遠不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他們為了本身事業備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已無餘力發展本國國內市場。

第三，當他們有相當發展的時候，帝國主義已經侵入了中國，他們的力量，決不能和已經侵入國內市場的帝國主義相競爭。

第四，國內殘酷的封建剝削，使他們沒有到國內發展其產業的決心。

他們雖然不能回到祖國完成產業革命的任務，但是他們在國外既有相當發展，必然引起他們注意國內的政治。換句話說，必然引起他們的革命的要求，因為：

第一，他們遠在國外，眼見他國僑民都有他們祖國的保護，只有中國的僑民，不但得不到祖國的保護，反而遭到種種的壓迫。

第二，他們常在居留地給殖民地政府虐待，祖國沒有力量來援助。

第三，他們因爲帝國主義先進工業的壓迫，有回到祖國發展的意向；但是祖國政府不僅不加援助，且反重捐苛稅剝削他們。

這些原因，引起了他們的革命的要求，成了誘發中國初期民族運動的主要動力；同時在國內也有若干力量，因爲；

第一，先進資本主義的侵略，引起了中國農業經濟的崩潰。自鴉片戰爭後，中國所受經濟上的損失，主要的有：

甲，賠款的損失：在與中會成立以前，鉅額的有中英鴉片之役二千一百萬元，英法聯軍之役一千六百萬元，中俄伊犂之役九百萬元，中日台灣之役五十萬元。在鴉片戰爭前，中國財政已極窮困，經過了幾囘戰爭以後，財政已瀕於破產，連年強度的搾取，增加了農村破產的速度。

乙，對外貿易的損失：資本主義以商品輸入中國，掠奪中國的財富，這是促進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最大原因；在與中會成立前，商品輸入的入超數目，已年有增加，洋貨支配了中國市場，使農業手工業經濟開始破產，成千成萬的農民手工業者，失去了土地和失去謀生技能，成爲無家

無業的遊民，因而引起社會的不安和騷動。

第二，這時代新式工業已開始出現：雖然這些工業，都是官辦的，或官督商辦的，但是這種新式工業的出現，總究使舊生產方法的崩潰。

第三，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太平天國運動和連帶而起的捻民回民運動，前後三十年的長時期，直接間接益使農村破產的日益嚴重，統治階級不能解救這些危機，於是不安的騷動，不以太平天國已被鎮壓而稍有顧忌。

至此，初期民族運動的出現，及其開展的主要動力，已經成熟，但是華僑資本階級革命的要求，比之國內所有的條件為重要。因為如果單是國內農業經濟破產，只能引起一種原始暴動，在興中會成立以前，中國沒有民族運動而僅有原始的農民暴動，就是為此。初期民族運動之所以在廣東及海外為中心點，因為廣東與資本主義接觸最早，其受壓迫也最甚，而在海外的言論行動，亦比較的可以自由：所以初期民族運動，往往集中在海外，而民族運動又以廣東人為多數；且廣東又每為民族運動的策源地的原因。

初期民族運動是由上述幾種動力，即：一，華僑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二，國內農業的破產；三，

國內新興企業的出現，在構成這三種動力的份子上加以分析，便可成為當日政治上的要求，其主要的是：

一，富國強兵與列強並駕齊驅。

二，要求政府革新自強，恢復中國五千年來歷史上的光榮。

初期民族運動的有異於過去的原始暴動，便在牠的鮮明的政治要求。這兩個政治要求，在興中會的宣言上，很具體的表現出來，(註二)隨後所附的綱領第二項及第三項，更明白說明他們的宗旨。(註三)

從這興中會的宣言和綱領中，可以知道初期民族運動的幾個特點：

一，當時對於滿清政府，僅在反面表示不滿，並沒有公然表示顛覆政府的主張，這固然是避免專制政府的壓迫，可是在初期民族運動的革命份子，雖有一部份對於滿清政府的政治設施，極不滿意，而大多數人却以滿腔的熱忱，希望滿清政府能圖自強，恢復「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的光榮，而成為「無敵於天下」的強國：前者是受着明末革命思想的暗示；後者是受着歷來傳統觀念所束縛。

二，當時從「忠君愛國」的出發點下手，所以對於民權思想，還沒有充分的發達。（國民黨的民權主義思想，是後來完成的。）

三，當時因爲豔羨列強，希望能夠與各強國「並駕齊驅，」所以對於資本主義，不加反對。

四，當時因爲參加民族運動的份子是資產階級與覺悟的智識份子，所以對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沒有注意到；雖然在綱領第三項中，有擬辦利國益民的話頭，可是「利國益民」四個字，在資產階級中人，不過是一種口頭禪，興中會中人，亦不能例外。（國民黨的民生主義思想，是後來完成的。）

從這四個特點中，可以看出初期民族運動僅僅是一種「力圖自強」，其最終的目的，是和各強國「並駕齊驅」罷了。這當然自有其歷史上的革命意義，他們的宣言中所謂「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所謂「有心人不禁大聲絕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從這裏可知所謂「有心人」不是上，也不是下，而是中間一個階級，這階級當然也由於某種物質條件所決定的某種階級的意義。換句話說，這有心人便是當時有嚴重的歷史的意義之中產階級，也就是初期民族運動中的中堅份子。他們是一些進步的智識份子，和華僑的

資產份子結合而成，他們的出身，是社會的中等階級，一方面他們在國內因爲受着資本主義的侵略，家庭環境隨着農村經濟的崩潰，一天比一天惡劣起來，這種日常生活的壓迫，使他們要求新的政治上的出路。在另一方面，他們在海外或在國內積累了一點資本，給封建貴族的統治，受盡壓迫與剝削，不僅使他們無從發展，而且日益趨向崩潰；同時封建貴族統治的腐敗，引起了他們竊取政權之最初的企圖。但是他們大部分是出身於所謂「冠裳禮義之家，」所以雖環境壓迫，對於目前的政治表示不滿，要求新的出路，而又依然戀戀於舊日的光輝，舍不掉傳統的觀念。例如說科舉害人，而於「登科」「及第」的虛榮，仍不能忘情於懷；說專制不好，而於「花翎」「頂帶」的服飾，猶多依戀於此：在這樣一種矛盾心理之下，自然沒有澈底推翻現制度的決心，而有種種幻想產生。

他們的幻想，是希望滿淸政府能夠自動的維新改良，恢復國家數千年來的歷史光榮，使這班破落戶子弟，也得光復舊的門楣；等到政治上有相當的地位時，再可利用政治力量來發展產業，他們的目的，至此已經達到，而初期民族運動，亦告完成。

關於初期民族運動沒有推翻舊制度的決心，除在興中會的宣言及綱領中可以看出外，在

孫中山上北洋大臣李鴻章書中，更可明白當日民族運動中的全部要求。（註四）這封長信，對於我們研究中國近代史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獻；在這封信中，不僅可以看出這位民族革命領袖初期的政治思想，而且可以由此看出中國初期民族革命運動的根本要求。孫氏在上李鴻章書中，他已能了解「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者富強之大要，治國之大本也。」所以他希望李鴻章輔助滿清政府，力行此四事，便可「修我政治，宏我規模，治我軍實，保我藩邦，歐洲其能匹哉。」但是陳腐的封建貴族在那時無論如何不能容納這改良要求，初期民族運動的中心份子，在和平的要求失敗以後，於是轉而積極的反對滿清政府，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展開了一個新的階段的標誌，也是中國初期民族運動的第一個轉變。

在興中會時代，雖然指出「強隣環立，虎視鷹瞵」的危險；可是對於資本主義沒有反對的表示。他們以爲中國所以受列強的欺侮，是中國自身的不爭氣，祇可恨自己，不可恨外人，外人的文明是可以效法的，如果排斥外人，那就是排斥文明。當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運動失敗後，興中會分子給香港總督請求援助的信，把這種矛盾心理，充分的表現出來。在初期民族運動中，對外

政策之所以如此輭弱，決不是由「中產階級」的天然的妥協性，而是由於當時實際條件所決定。因為當時中國產業剛才開始萌芽，不但沒有發展到與列強資本主義的工業衝突，而且中國產業還在列強資本主義的協助之下，開始發展；因此初期民族運動的中堅份子，只看到滿清政府的壓迫，還見不到列強是自己致命的敵人，這是當時對外政策輭弱而不反對資本主義之又一原因。

又在給香港總督的信中，附有平治章程六則（註五）沒有一字提到改善民衆的生活；同樣，在興中會的實際行動中，也沒有下層羣衆，這果然是他們沒有看到羣衆的力量，同時也是因為他們本身的基礎過於薄弱，還不能組織羣衆。所以當時所謂革命的動作，不過從事於軍事暴動與單純的政治活動而已。

興中會到了鄒容的革命軍發表後，已發展到較高的階段，他的主張比興中會的宣言與綱領為具體，為明確，狹義的民族感情，顯然已表示其有覺醒的意識，所以已由反對滿清統治而進於誅殺滿洲人了。至革命軍出而中國民族運動，將由興中會而轉入同盟會時代了。

在興中會成立後的第八年，（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一九〇〇年）北方發生了反資本主

義的原始暴動——義和團運動計自鴉片戰爭後至義和團運動暴發時，列強資本主義侵略中國，已有六十年在這六十年間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最初輸出商品，繼之以輸出資本，他們不但在中國進行商品侵略，而且進一步的在中國境內經營鉄道輪船礦山工廠銀行等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經濟掠奪已經樹立了很強固的基礎；陪着而來不可避免的現象，就是農村經濟的崩潰，也就更嚴重的表現出來。加之中日戰爭時，北方飽受蹂躪，由生活的壓迫而起的動亂，已無可避免。再加以教士的横行，政府的媚外，以及官吏豪紳的魚肉鄉民，使一般人憤無可洩，於是殺洋人，燒教堂的原始排外暴動，由是而起。

義和團與興中會的不同，在於義和團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及一切勞苦的羣衆，他們沒有受過資本主義的洗禮；另一方面他們對於中國數千年來的聖賢名教所給的毒，也並不甚深，所以他們很簡單的一個求生存的概念，他們受了不能生存的威脅，終於燃燒了他們反抗的火焰。義和團之所以成為「野蠻」的「拳匪」，就是為此，但也正是這種地方，他才是眞正偉大的反資本主義的羣衆運動。

有人以為義和團既是下層平民的「反帝運動，」為什麼又勾結了滿清政府而揭起一扶

清滅洋」的旗幟呢？其實義和團並不和滿清政府聯繫起來；當時滿清的重臣，如李鴻章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等，都是反對的；不過爲了西太后一人要想借此報仇，與以援助，在義和團方面，並不是爲了「扶清」而「滅洋」，乃是要「滅洋」而「扶清」。因爲如此，所以義和團不但殺洋人，燒教堂，就是平日借教堂勢力欺凌鄉民的地主豪紳，也因爲二毛子而殺之不赦，在有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看來，這當然是更野蠻的舉動，而義和團的偉大的革命意義，也就在這些地方。所以義和團運動失敗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展開了一個新的局勢。興中會發展到同盟會，反對滿清的民族運動，蓬蓬勃勃的發展，以及辛亥革命的出現，固然還有旁的原因促成，可是「野蠻」的「拳匪」的義和團運動，總不失爲中國初期民族運動中的一服烈性的興奮劑。

義和團運動雖爲客觀的條件，決定了牠的失敗的命運；然而每一偉大的革命運動失敗以後，必然地有第二個運動隨之而來，所以義和團運動失敗以後，同盟會運動即繼之而起。

由於義和團運動所引起的庚子八國聯軍之役的結果，締結了辛丑和約。中國的國際地位，自從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之役以後已開始江河日下；及至中日戰爭失敗，更下降至最低下弱小之國；及至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以後，則中國事實上已完全失去了獨立國家的資格，而成爲列

強共管之殖民地。在經濟方面，這四萬五千萬兩的鉅額賠款的支出，都是從各省所加的苛捐雜稅而來，中國農村經濟已經崩潰，再經此重大剝削，乃益加速破產。因這政治經濟兩方面的影響，便成爲誘發革命最有力的條件，也是產生革命最有力的信號，因爲這樣，同盟會遂在社會經濟極度的貧乏，與社會秩序極度的混亂的光緒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宣告成立。

同盟會的成立，對於中國革命有極重要的歷史意義，牠的產生，與義和團的失敗，當然有不可分離的關聯，看了孫中山紀述義和團運動後革命之新形勢的展開，（註六）便知同盟會是緊接着義和團運動而產生的。

同盟會的政治主張，比興中會更進步得多，只要看同盟會成立後，以軍政府名義所發表的宣言，就可知道。興中會僅僅希望「富國強兵」的自強運動，而同盟會已公然說出「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他們國民革命運動，有下列兩個特點：

一，同盟會注重民權思想，民主革命精神表現得非常清楚。

二，同盟會注重平民生活，民生主義到這時已佔了重要的政治思想的一部份，他們的急進的土地政策——平均地權，就是以民生主義的理論爲其基礎。

這兩點不見於興中會而見於同盟會的宣言，就是表現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跟其階級勢力的發展，已經進展到新的階段。這並不是天然的或是領袖個人智識的進步，而是進步的物質條件所決定的；因爲在同盟會時代，中國新興的產業，總不若興中會時代而有多少進步，這種新興產業的進展，便引起階級意識跟着發展。

但這裏所謂發展，當然也很有限制的，牠還沒有到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所以還沒有受到資本主義雄厚資本的工業組織的致命傷，於是同盟會的對外政策，仍如興中會一樣的沒有反資本主義的表示，甚致處處表示對列強資本主義妥協。他們在「維持世界和平」的標題之下，發表了與虎謀皮的議論，這是表現着中國中產階級的不合理的空想，和智識分子的世界眼光的幼稚，看到軍政府發表對外宣言的一再申述革命軍保護帝國主義在華既得權利的誠意，幾乎對於這些掠奪與不平等條約都極力承認，加以保護；這雖然還有因爲初期革命運動往往在國外活動而且有時還得到各國的援助關係，以致對外政策，這樣的輭弱，總究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進程上，成了一種最大的缺憾。

從同盟會成立後，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跟着中國資本主義之曲線發展，形成了意識形態

各種不同的臉譜。當同盟會與立憲派對立筆戰的時候，各有完整的思想體系；可是過了一個短促的時期，複雜的中國經濟狀況，終於彙合而成爲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因爲三民主義的曲線的階級背景，就是決定牠的理論體系之最實際的條件。有人以爲三民主義太複雜，太廣泛，從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起，到盧騷亞里斯多得亞丹斯密斯一直到馬克思李嘉圖蒲魯東克魯泡特金止，無所不有，無所不包，其實這完全是中國工業資本曲側多變的反映，所以孫中山不但是中國民族革命的領袖，也是中國近代思想的集大成。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雖然這樣複雜，這樣廣泛，可是他總究是中國社會經濟的反映，所以無論他怎樣說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以及大同主義這些名詞，（註七）他 過借此說明民生主義的終極目的，並不是眞的走上馬克思的路線，否則他何必把唯物史觀攻擊得體無完膚，而偏要創立民生史觀的學說呢？

孫中山不但有異於中國一般的智識份子，並且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思想家，也有不同之處。因爲他能看到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不是一種恆久性質制度，私有財產制度，決非歷千萬年而不變的東西，世界終於免不了走上共產主義與大同主義的一日；他雖然反對馬克思的唯

物史觀與階級鬥爭，而他的民生主義的理論的體系中，帶着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所以三民主義思想成熟以後，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又變換了一種新的姿態。但在普通的智識分子，他們往往一方面追慕着行將崩潰而自己沒有嘗到的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又感覺到共產主義大同主義之必不可倖免的悲劇的到來。這種矛盾的境遇，造成了矛盾的意識形態，遂使日後同盟會份子同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政治主張，這是中國工業資本曲側多變的發展的反映，也是落後國家中產階級矛盾張皇的寫眞。

中國民衆運動革命家的思想如此奇特而多角，是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所決定的，現在再總括地一說，因爲是：

一，中國產業不能充分發達，封建勢力依然是經濟結構中的主要成分，所以智識分子的思想，還不能完全從封建意識中解放出來，這是三民主義所以有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德的成分。

二，中國果然是產業落後的國家，但現在的整個時代，已經是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所以智識分子的急進思想家，不能不感受社會主義的影響；尤其是中國的智識分子，他們知道不去做

發廣大的羣衆，就不能肅清封建殘餘，產業也不能充分發展；所以國民革命必須採納近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綱，這是三民主義所以包含社會主義思想的原因。

三、中國智識分子一方面是處於資本主義沒落時代，一方面又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受革命勢力的威脅，在這樣三面夾攻形勢之下，必然地會傾向到獨裁的法西斯蒂的一途。

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到同盟會時代，三民主義思想成熟後，便由一種新的姿態而演成上述的三種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到辛亥革命後，益見顯著。

辛亥革命不是突然發生的，自鴉片戰爭以後，農村的暴動，很普遍地發展起來。這種農村暴動之普遍發展，無疑的是有革命意義，並且必然地要成功一個總的政治暴動；辛亥革命就是這些暴動的總匯。我們不必計算太平天國義和團等偉大的農民暴動，單就一九零一年到一九一一年這十年間，大大小小的農民暴動，無慮數百起，這數百起的農民暴動，終於產生這一九一一年的大革命。不過這一次的革命，仍不能完成牠的歷史任務；因爲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運動集中其目標於代表封建貴族的滿清政府，但是滿清政府不過是代表封建勢力的一個上層建築，如果要壞了這個上層建築而沒有澈底破壞牠的眞實基礎，則牠還可以用別一個形態表現出

來。所謂眞實基礎，便是落後的農村中的封建剝削關係，要破壞這種封建的剝削關係，必須誘發廣大的農民羣衆，來參加革命，根本推翻封建的下層基礎。辛亥革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們只集中於單純的政治活動與軍事暴動，所以大革命後，只推倒了封建貴族的滿清政府，沒有動搖牠的下層基礎，在滿清政府倒台以後，封建政治的上層建築，由一種別的形態代之而起，這不能說袁世凱之破壞民主政治，實在是革命運動祇完成了一半的原因。

在辛亥革命以前，代表封建貴族的滿清政府，祇有屈服於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亦祇有來壓迫滿清政府。到辛亥革命以後，代表封建貴族的北京政府，勾結帝國主義來壓迫民族革命；帝國主義亦利用北京政府，來把持中國政權：所以辛亥革命成功，反使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內的封建剝削聯繫起來，而益陷中國民族命革運動於絕境。

參考

（註一）興中會成立的時期至今傳說不一，玆姑根據鄒魯所編的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篇第一章所紀：「紀元前二十年（壬辰）總理創立興中會於澳門」而來的。

（註二）興中會宣言的原文如下「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堂堂華國不

齒於列强；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憤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破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然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矣！方今强鄰環立，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蠶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絕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於他族。用特集志士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仰諸同志，盍自勉旃。」

（註三）宣言後所附的綱領第二項「……本會之設，專爲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諸學，以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中國今日政治日非，綱維日壞，强隣輕侮百姓，其原因皆由衆心不一，只圖目前之私，不顧久長大局；不思中國一旦分裂，則子子孫孫世爲奴隸，身家性命且不保。急莫急於此，私莫私於此，而舉國憒憒，無人悟之，無人挽之，此禍豈能倖免？倘不及早維持，乘時奮發，則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從此淪亡，由茲泯滅，是誰之告？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絡四方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强兵之學，化民成俗之經，力爲推廣，曉諭愚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無難挽救，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甯也。」

又綱領第三項「……本會擬辦之事，各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才，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皆惟力是視，逐擧漸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共殘。必使我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倘有藉端舞弊，結黨行私，或界限互分，彼此歧視，皆非本會志向，宜痛絕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註四）孫中山上李鴻章書，在光緒二十年，卽公元一八九四年，洋洋數千言，讀之可以知道這位民族革命領袖初期的政治思想，對於中國革命史方面實爲一重要的文獻。

（註五）興中會致香港總督信中的平治章程六則是（一）遷都於適中之地；（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三）公權利於天下。（四）增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

（註六）參考建國方略中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

（註七）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有「故民生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卽是大同主義。」

第十章　民族運動之曲線的發展（續前）

初期民族運動的兩柱石　兩位領導人物最初的差別　初期運動領導權的落到康氏身上　中國思想界的第一顆炸彈　東西烏託邦的比較　民族運動領導權由康氏轉移到孫氏　還有不可忽視的兩個人物　晚清思想的彗星　民族運動含有社會主義幻想的由來　一時代言論界驕子的梁啓超　新民說與三民主義　爲革命利器的權利與自由　打破現狀的影響　譚梁思想的權威　立憲革命的貌離神合　扭入狹義的民族革命運動　沒有中心信仰與中心力量　從複雜的理論中決定了不同的臉譜

初期民族運動，在政治上及思想上發生重大影響的，除了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及同盟會運動外，尚有康有爲一派的維新運動。他們倆是十九世紀末葉中國新政治運動的兩個柱石：孫中山在光緒十一年（公元一八八五年）已決志傾覆滿清，（註一）康有爲在光緒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九年）也就以諸生伏闕上書請變法；孫中山於光緒十八年創立興中會，康有爲於光緒二十四年領導戊戌政變。他們倆的思想，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也有許多同的地方：康有爲的年齡比孫中山大十一歲，（註二）在政治上開始活動的雖然孫氏比康氏較早，而於初期民

族運動的環境，適宜於康氏而不宜於孫氏。故在初期政治上及思想上，康氏比孫氏爲有力量。

康有爲與孫中山思想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這是由於他們不同的物質環境所決定的。他們倆雖然都是出身於西方文化接觸最早，受到外來侵略最甚的廣東海濱；（註三）但是他們所處的家庭環境幼年時所受的教育薰陶，却大有差別。（註四）康氏出於「世以理學傳家」一的家庭，祖父做過教官，從祖官至巡撫，讀書作官的家庭，縱然「以理學傳家」，那種理學本身的內面，就不免含着多少不健全的因素，不流於虛僞，便拘於網羅。孫氏出於先世業農的家庭，過着農村生活的家庭，在生活上是須奮鬥的，在思想上是單純素淨的，雖也脫不了幾千年傳統的習俗與觀念，但是所受名教思想的束縛，比較薄弱，所以孫中山在十二三歲時，便表現着一種自然活潑的思想，以不作洪秀全第二爲遺憾。康有爲在成童時，便套入理學的圈子裏，去憧憬聖人的風味。孫氏幼年，即受西方新式教育，以科學爲基礎，對於西方文化的觀感，是直接的，所以他發出來的思想，不涉於玄想：康氏所受的教育，是東方的舊式教育，以玄學爲基礎，對於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間接的，所以他發出來的思想，總免不了玄杳空洞：這是兩位維新領導人物最初的差別。

他們倆也有相同的地方；孫山中接受了全部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以外，對於中國固有的倫

理道德，並不澈底反對，而且有許多地方，是非常留戀的，他對於「數千年聲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禮義之族」的光榮，始終沒有忘情的，這是與康有為的思想，是沒有根本的衝突；在康有為雖然出身於這樣一個陳腐的家庭，死抱着聖人的牌位，但他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文化，也有部分的接受下來，這是與孫中山的思想，也沒有根本的衝突。

何以初期民族運動的環境，適宜於康氏，而不適宜於孫氏呢？

在第九章中已經說過，中國初期民族運動的中堅份子是智識份子，則抓住智識份子，纔可以獲得運動的領導權，並且當時中國政治界的潛勢力，以經生文人的士大夫階級為中心，因甲午中日一役而有一點覺悟的人，也祇有這一階級，康有為由新進舉人得中進士，既為科第中的新貴，又是經生文人，公車上書時，慷慨激昂，洋洋灑灑，上皇帝的萬言書，已得到這個階級人士的賞識，雖然他的活動，也是歸於失敗，但是在國內造出的風潮就大了，上自在位的皇帝及內外大僚，下至在野的知識份子，都被他掀動了。孫中山是出身農家的一位醫生，在封建社會裏，當然沒有他的地位，所以他創立興中會，比康氏公車上書早，可是贊同他的主張的，僅僅十餘人。其後奔走檀香山美洲及英國各埠去宣傳，而歡迎革命主義的，每埠不過數人或十餘人，在與西人接觸

的國外尙且如此，國內更不言可喻。康有爲公車上書以後，幾乎全國聞名；孫中山直到第一次革命在廣州失敗後，纔在新聞紙上發現孫「汶」的名字，（註五）在這樣環境之下，中國初期民族運動的領導權，自然要落到康氏的掌握裏去了。

康有爲的政治思想，是由六經裏面紬繹出來的，他所以能做維新運動的領導，造成一時的大風潮，也是因爲他對於六經，先做了一番維新革命的工作。他在早年有兩部值得意注的著作，一部是新學僞經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他的主張是否正確，是另一問題，而在當時，確發生了很大的影響。據梁啓超所說：第一、淸學正統派的立脚點，根本動搖；第二、一切古書，皆須從新檢查估價；所以康氏對於中國近代的思想界，確有使之轉變的力量。不過康氏雖然大膽言前人之所不敢言，而他自己的思想，並沒有擺脫舊制度的桎梏，而形成一個新的體系，他在一方面極端的標新立異，而另一方面又不能自成一體系。所以他把中國的思想界投下一顆炸彈，本人還始終擺在封建意識中，不能有新的創作。他以理想的社會制度，作一部大同書，（註六）這完全是一種在現在經濟條件下，決不能實現的烏托邦，這種烏托邦的原理，和十九世紀初期西歐空想的社會主義相似，尤其與法國的傅立葉（Eourier 1772—1837）的理想有的相同。不過同是烏托

邦的思想，東方與西方各有其出發點。在西方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帶來的貧富懸殊的現象，固為人人所不滿，而大規模機械的生產，仍為人人所艷羨；所以在英法兩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中，總是以機械生產為根本企圖，以機械去代替一切討厭的不愉快的工作，企圖以機械去增加生產，減少人工；這是西歐空想社會主義者必須機械生產為出發點的原因。康氏生長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既不了解機械生產的偉大意義，因而他的理想社會中，沒有機械；但沒有機械，生產就不能增加，人工時間就不能減少，則理想的樂園，如何得夠實現呢？於是康氏就不能不把廢除家庭關係，以為減少各人的負担，增加各人的生產，這是和西方不同的地方，也是比傅立葉聖西門與文等的理想，更為玄妙的地方。

康氏雖因民生疾苦的影響，產生他的大同社會的理想，但他並沒有勇氣，把他的理想公開出來，更不如傅立葉聖西門與文等之力求其理想之實現了。據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所說：「有為雖著此書，然祕不示人，亦從不以此義教學者；謂方今為據亂之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讀了這段批判，一面暴露着康氏矛盾畏縮的態度，一面正是反映了日趨沒落的封建社會，沒有實現這種理想的可能。

康氏一方面對於現狀表示不滿，而另一方面又沒有革命的勇氣。他的經濟背景，限定他的意識，祇能在極低限度的改良主義範圍內有所發展；所謂小康，便是改良主義，也是維新變法的政策。維新變法原是維持封建統治殘餘的一種忠誠的獻謀，然而止趨沒落的代表封建地主的專制政府，牠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命運，康有爲的小康主義，終於隨維新變法的失敗而消滅；民族運動的領導權，亦因之而轉移到孫中山身上。

這裏還有不可忽視的人物，他們雖然也是康氏小康主義的維新變法運動中的人物，可是他們各有獨立的思想，在維新變法運動失敗以後，不但是中國民族運動的推進者，而且是二十世紀中國思想界的權威，如果把維新變法運動這件事撇開，他們的地位都在康有爲之上。從思想上說，他們是十九世紀的中國進化到二十世紀的中國之橋梁；從民族運動上說，他們是辛亥革命的哨兵，是五四運動的先鋒。他們是誰？一位是犧牲於戊戌政變中的譚嗣同。一位是戊戌政變以後成爲中國言論界驕子的梁啓超。固然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潮流中，自從康有爲矛盾畏縮而歇了下來以後，孫中山始終是中流砥柱，不過孫中山的偉大，在於苦幹的行爲，這種苦幹的行爲，所以能夠由數人十餘人的信仰推而及於百千萬人者，譚梁兩人推動之功績，不可沒也。倘

以整個的中國民族運動來講，譚梁兩人，與其說是康有爲的信徒，不如說是孫中山的開路，現在把他們倆的思想，概括地分述如次。

先說譚嗣同，嗣同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人，幼時好駢體文，結交梁啓超後，其學一變，自從金陵居士楊文會後，其學又一變。他的思想的勇敢、精銳、徹底，在十九世紀中國要稱第一人，（註七）不幸他只有三十三歲，便爲戊戌政變而犧牲了；倘使天假以年，則在中國文化思想上的貢獻，必有更偉大的成就。他著作雖多，可是較有系統的祇有仁學一書，所以要領略他的學術宗旨，也只有此書。然即在此書中，已可窺見譚氏透利銳澈的思想，而不能不引起人之深切的欽佩了。譚氏在仁學自敘中說：

「吾將哀號流涕，強聒不舍，以速其衝決網羅，衝決利祿之網羅，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衝決全球羣學羣教之網羅，衝決君主之網羅，衝決倫常之網羅，衝決天之網羅，……然既可衝決，自無網羅，眞無網羅，乃可言衝決。……」

讀這一段敍文，則知譚氏的大無畏精神，實爲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巨擘，他不僅要衝決利祿的網羅，衝決俗學羣學羣教的網羅，而且要衝決君主的網羅，要衝決倫常的網羅，衝決天之網羅，

在十九世紀末葉之中國，而有此種勇敢邁進的思想，實不能不令人驚異。且譚氏所要衝決的，都是康有爲認爲天經地義，謹守奉行的事物，譚氏雖爲康有爲之黨人，而其思想則較康氏爲進步，所以譚氏雖是維新變法的角色，實在乃是一個近代中國最急進的革命家。他在仁學中說：

「古而可好，則何必爲今之人哉。」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他對於過去的一切，都主排斥，而於倫常名教，以及統治階級御用的精神工具，說來半文不值，這種勇敢邁進的態度，蓋無一人可及者。他對於封建統治者在精神上奴隸羣衆的工具的名教，又有如下一段話：

「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爲教，則其教已爲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三綱五常之慘禍酷毒由此矣！……如曰仁，則其名也；君父以責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於箝制之術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一切分別等衰之名。……忠孝既爲臣子之專名，則終不能以此反之，雖或他有所據，意欲詰訴而終

不敢忠孝之名為名教之所尚。……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

這種議論，在衞道之徒的意識中，眞是極人倫名教之奇變；然而在二十年後新青年一派的急進思想，掀起了軒然大波，把全國年青的男男女女，從名教的枷鎖中解放出來，重新去估量人生的意義，飲水思源，不得不歸功於譚氏。

譚氏的政治思想，是一種澈底的民治主義，其於攻擊滿清政府之處，幾如太平天國的奉天討胡檄相同，充分表現着狹義的民族的情感，而其思想之結晶，則為世界大同的幻想，這是中國民族運動思想的特色，不僅譚嗣同如此，民族運動諸領袖，都有極模糊的廣義社會主義的幻想：康有為如此，孫中山亦如此，從興中會後民族運動的集團，他們的終極目的，往往含有社會主義的意味，這是落後的中國經濟關係所決定。因為這種模糊的社會主義的眞實意義，就是積極的建設資本主義；可是不先去誘發廣大的羣衆，起來推翻封建統治，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初期民族運動的革命領袖的思想，與革命集團的經濟政綱，往往含有社會主義的意味。在另一方面，他們旣豔羨資本主義生產的繁榮，而又不希望階級鬥爭的出現於中國，於

是模糊的廣義社會主義的幻想，便成了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普遍的傾向。

其次，與譚嗣同同工異曲，殊途同歸的，便是一時代言論界驕子的梁啓超了。啓超又名卓如，別號飮冰室主，廣東新會人，爲康有爲之弟子，其講學最契之友爲夏曾佑，譚嗣同，故其思想受夏譚影響亦最鉅。譚氏因爲早死的原因，所以一般人還不十分重視，致於梁啓超，他在思想上事業上，均有極大之貢獻。他在戊戌以前時務報時代，便已出了名，所以人都以康梁並稱。其實在戊戌以前，他不過是康有爲的代言人，和徐勤汪彭年龍同在康有爲的圈子裏過活，還沒有與康氏並稱的價值；到戊戌以後，亡命日本，學習外國語，研究新學說；思想言論，便脫離康氏的羈絆而異軍突起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直至戊戌政變，這五十餘年間，思想界甚爲混亂，沒有一人可以稱爲思想界的權威；但從戊戌政變以後，直至五四運動，這二十年間，梁氏始終站在中國思想界最高地位。他的事業當然遠不及孫中山之偉大，其在思想上之成就，無有一人可以比擬者；尤以光緒二十六年辦新民叢報起，至辛亥革命的十年間，（公元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一年）是梁啓超的黃金時代。當時適當科舉程式改變，（註八）一班應考的秀才童生，驟然失了向來的揣摩工具，新民叢報就變了他們的「小題文府」「三山合稿，」政府儘管禁止，國內却是暢銷無滯，

梁氏遂成了全國青年及智識份子崇拜的偶像。他的主要著作新民說，成了新時代的聖經，他的中國魂，成了每個智識份子與青年必讀之經典，梁氏在中國思想界的權威，直至五四運動時，纔由陳仲甫起而接替。因爲他的思想稱霸的時間較長，所以傳播的影像亦較大，梁氏眞可稱爲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天之驕子」了。

梁氏的思想，雖屢經蛻化，然始終未曾離開中產階級的立場。可以包括他的全部思想的，當然是他最主要的作品新民說了；所以新民說便是中產階級思想在中國最成熟的最具體的表現。當時民族運動兩柱石之康孫二氏，均還沒有具體思想著作發表，（康氏大同書發表於辛亥革命後不忍雜誌，孫氏三民主義講稿也是五四以後才發表）譚氏的仁學，其見解雖有遠在梁氏之上，而其全體結構，又失之過雜，所以新民說委實是近代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潮流中最成熟最具體的一種作品了。

因此，新民說與三民主義，同爲近代中國思想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在過去對於梁啓超往往聯想到康有爲，尤其是在辛亥以前的梁氏，因爲立憲派與國民黨對立的印像，總不以革命者目之，他的著作，也當做不革命的作品。可是實際上這篇文字，不但有嚴密的組織，有一貫的理

論的體系，而且包含着豐富的民族革命的具體思想。新民之說，是要求國之「安富尊榮，」這出發點和興中會的富國強兵，如同一轍；梁氏認爲要實現新民之說，就應仿效已經達到安富尊榮的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的一切文明制度，這種制度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民治精神。（註九）而其立論之根本有二，一爲內治，一爲外交，關於內治的根本見解，就是鼓吹民治精神，而此所謂民治精神，正是資本主義政治的特徵。關於外交的根本見解，「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此處之所謂民族主義，實際也是資本主義，所謂民族帝國主義實際上也就是資本帝國主義，他說的「人以民族主義侵我，我以民族主義抗之，」亦即爲人以資本主義侵我，而我即以資本主義抗之的意義。

在這樣一種出發點之下，他對於資本主義之新道德觀念，闡發甚多，而於封建的舊道德觀念，則力加搾擊。他在新民說第九節中，對於公德，推崇備至，然而公德乃是資本主義道德之最高的標準，統治階級就在公德的美名之下，去掠奪被統治階級和欺騙被統治階級，替他們服役，梁氏既要破壞封建的舊道德觀念，不得不對於新的資本主義道德，目之爲最根本的道德，反覆申說，以達其道德革命的目的。更進而闡發權利與自由的思想，這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最需要的口

號，蓋非如此，不足以激發羣衆去推翻封建統治。雖然他所說的權利與自由都是對於資產階級偏面的利益，可是在史的歷程上，這是資產階級大革命的利器，也是封建統治崩潰的致命傷。在十九世紀以前，世界上一次次地革命與流血，都是爲了這些；所以在經濟落後的中國，梁氏能夠說出這種論調，在當時無疑的是代表進步思想而且有革命意義的見解。

梁氏更認定必須有破壞，纔有進步。他歷舉英法德美日諸國，皆以破壞而有進步，中國非經破壞，不足以求進步之理。他對於舊統治階級的不滿與攻擊，表現出一種蓬蓬勃勃的朝氣，這種打破現狀的風氣，在戊戌政變以後，確實喚起了不少的青年。所以在戊戌政變以後，梁氏的言論，已超過了君主立憲的範圍，而梁氏的思想，也以閱讀歐美新學說而走上民族革命的路線。他在要求進步而不得不主破壞，要求破壞而不得不先打破現狀的觀念之下，故其發爲議論，往往出之極端，雖稍偏稍激，亦所不惜，一以駭世驚俗爲主，（註十）於是進步的智識份子，都蘊釀着打破現狀的潛意識在心裏，辛亥革命以前，同盟會的實際工作，所以在短時期間，到得大多數人的信仰與贊助，梁氏新民說的思想，以及他聲情激越的文字，亦有很大的功績。

譚梁二人的思想言論，其影響於民族革命，既如上述。二人中以譚氏早死，且少著作，其直接

影響於辛亥革命者少，而間接影響於五四運動者多；梁氏自戊戌政變以後，卽取得康有爲之地位，握中國思想言論界的牛耳，故其影響於辛亥革命者甚大。至五四運動時代，譚氏的思想，得陳仲甫之發揮光大，風氣爲之一變：向日一般智識青年，以梁啓超爲崇拜的偶像者，至此，陳仲甫便代替了梁氏的思想權威的地位，而爲一般智識青年崇拜的偶像了。

何以說是梁啓超的思想，對於辛亥革命很有影響呢？原來中日戰爭，雖把中國弱點，完全暴露，西方資本主義者的侵略野心，也無限制的猖獗起來，但是大多數人祇感覺到外國人的可惡可恨，對於滿清政府還不敢藐視。自經拳禍的大亂後，資本主義者對於中國國民，頗起了一點的戒心，侵略的方法，乃稍稍變更。他們對於滿清政府一面壓迫，一面却又保持扶植，於是中國的大多數人，却把恨惡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滿清朝廷身上去了：越覺得外人的可恨，就越覺得滿清的無能，甚至立憲派中除了康有爲以及少數深中封建遺毒的分子外，他們對於滿清，也都沒有什麼顧惜，並且有點厭惡了。就是梁啓超，他到了日本，讀到許多西洋新學說後，早已不如康有爲之矜持，不過厭惡滿清的程度，有深淺之分，梁氏總究與康有爲還有師生關係，又受了光緒帝的知遇，不得不站在立憲的旗幟下面。可是他的思想，已日漸和興中會接近起來，倘使沒有康有爲

的申斥，與徐勤的暗中作梗，說不定兩黨合併工作，可以實現於同盟會成立以前，新民叢報和民報的對抗文章也不致於產生了。

梁氏對於兩黨合併運動失敗後，他和孫中山陳少白的來往仍密，雙方仍多聯絡協助的事情。巳亥冬天，（公元一八八九年）立憲派健將唐才常林圭二人，也是孫中山最賞識的朋友，帶領留學生二十餘人回國，往長江一帶謀以武力保皇的時候，梁氏在東京的紅葉館設宴送別，孫中山陳少白亦均作陪，孫氏並爲唐林作書介紹於漢口某俄國商行買辦興中會會員容星橋，足見當日立憲革命兩黨中人，並不如後來雙方機關報上之對立，更沒有如現在一般歷史書中所記載。唐林二人回到國內，便往長江一帶聯絡會黨，準備舉事，並函約孫中山和興中會同志也預備在廣東方面起事。明年北方的義和團事件暴發，而廣東之惠州之役，與長江一帶的漢口和大通之役也相繼爆發；這便是立憲革命兩黨，分途並進，殊途同歸的一點事實。

立憲派因爲唐林失敗，便專在文字上宣傳，國內智識分子對於康梁本極信仰，尤其對於梁氏的言論，全國智識分子的意識，常隨着梁氏的筆尖而轉移，從「君臣之義如何能廢」的一種觀念，轉變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一種觀念，把全國智識分子一齊推入狹義的民族革命運

動的途上。梁氏對於滿清政府，常常發出極痛心的話，雖其立場，猶爲立憲，而於革命方面，反發生一種反宣傳的效力。如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中有：

「如是之政府，非底於亡國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而希冀萬一於不亡。」

似此沉痛文章，不勝歷舉，所以梁氏雖在立憲派的地位以反對革命，而其文章不但替革命黨張目，而且他在不知不覺中，已承認革命乃是出於萬不得已的事，遂使閱讀梁氏文章的智識分子，也抱着「等是亡也，不如冒險革命而希冀萬一於不亡」的意嚮，對於革命黨人，也不如以前的視同洪水猛獸了。孫中山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指乙未）舉國輿論，莫不目予爲亂臣賊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以惡聲相加。」這是實情，因爲滿清的罪惡，已爲多數人所公認，而革命的力量，亦已由梁氏的文章，給予青年智識分子一種很強烈的刺激，同情之心，乃油然而生了。

梁氏在戊戌政變以後，因已取得思想界的權威。自清政府以預備立憲爲標幟，梁氏以及他領導的立憲黨人的活動，更比革命黨要順利，雖在西太后袁世凱張之洞與革命黨人兩面夾攻的情勢中，（註十一）他們的進行，並沒有損失。不久便有華僑聯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實行立

憲的事，又有湖南人熊範輿等聯名向清政府請願要求設立民選議院，李劍農在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說：「國內此處彼處，常有學生開會作政治演說，漸至北京也有開會演說的事了；大概都是由政聞社員的活動而來的。」這樣，更可以證明晚清革命運動的急轉直下，與辛亥革命的一發而不可收拾，梁啓超的言論思想，其功固不可沒。可惜他在辛亥以後，投身政治活動，想藉北洋軍閥的實力，來實現他的立憲政治。但是每次的嘗試，都歸失敗，歐戰以後他從歐洲回來目擊歐洲戰後的荒涼，寫成一部歐遊心影錄，大唱西洋物質文明破產東方精神文明復興之說。此後雖然還做了些整理國故的研究，可是他的思想已跟着時代的後面走，不能再做開路先鋒，成爲清代思想史的結束人物。

我曾說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直至戊戌政變這五十餘年間，思想界甚爲混亂，沒有一人可以稱爲思想的權威，這實在是中國的大不幸。戊戌政變以後，直至五四運動這二十年間，中國民族運動的兩柱石，康有爲就此歇了下來，除了發表一篇烏託邦理想的大同書之一部分外，其他一無建樹，在民族運動史中，已無他的地位；另一柱石孫中山，他開始僅向華僑與海外留學生鼓吹革命，戊戌政變以後，又專在實際行動上奮鬥，其在民族革命史中，雖然留下了許多光榮的史

蹟，可是中心思想未能樹立，中心信仰亦無從產生，因之在同盟會成立時，各方志士加入的僅僅爲狹義的民族主義——排滿主義——而來入會的，對於民權民生兩主義尚多未能確實信仰，這便是滿清皇位所以容易顚覆的原因，也便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不健全的癥結。故在五四以前的二十年間，在革命的行動上，當然都在孫中山指導之下不斷奮鬥，而其思想能影響到革命的，首屈一指的便要輪到梁啓超了。

不過在辛亥以前，梁啓超終究是站在立憲旗幟下面的立憲黨人，終究是醉心立憲而反對革命的人，他的思想言論，雖多爲革命黨張目，爲革命黨反宣傳，而覺醒了經生文人，推動了民族革命：可是他的中心思想，不過欲把現階段的滿清朝廷，達到「安富尊榮」的境地，不過要把瀕於崩潰的封建政府，走上民治的途徑，以完成和西洋同樣的資本主義國家。他把握着中國言論界的權威幾乎有二十年，從十九世紀末葉到二十世紀初期，委實是梁啓超所說的「實中國兩異性相搏相射，短兵緊接，而新陳嬗代之時也」在這樣重要的時期中，思想的權威，握在主張立憲的梁啓超手中，所以從民族革命運動的立場上說在五四運動以前，仍沒有中心思想，因爲沒有中心思想，遂沒有中心信仰，並且沒有中心力量，於是民族革命的發展，乃是相搏相射，曲抑迴

旋中逼迫出來，並沒有一貫的思想和明顯之路綫，因之而領導思想的權威，在五四以前，落在立憲派的梁啓超身上，到五四運動的前後，又被新青年派的陳仲甫取而代之，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終於未曾發出偉大的力量而底於成功的唯一原因。

自從辛亥革命失敗後，孫中山看到黨員精神的渙散和國人意識的頹廢，乃從「先有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的認識中，努力於心理建設的運動，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最合理的轉變。可惜他在這方面努力的時間太短促了，他僅留下了一部沒有講完的三民主義講稿便長逝了。這包含極其複雜的一部三民主義，決定牠的理論體系之最實際的條件，當然是他的曲綫的階級背景；又從牠的包含極其複雜的理論中，決定了後來民族革命者的各個不同的臉譜，人人摭取三民主義的一角，各執革命理論的一端；以三民主義之稱頌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便有私淑康有爲的聖賢主義了；以三民主義之談到李甯，馬克思也，便有侈言社會革命的急進改良主義了。這是四五以後封建殘餘的軍閥政府，所以能夠不即崩潰，也是中國民族運動，始終沒有中心思想中心力量，遂使民族的革命運動，終於循着曲綫的發展：浪費了多少的金錢，冤屈了多少的生命！

參考

(註 一)孫文學說第八章中說:「余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

(註 二)康有爲是咸豐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生的，孫中山是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生的。

(註 三)康有爲廣東南海縣人，孫中山廣東香山縣人。

(註 四)關於康有爲的生平可參看梁啓超所著康有爲傳；關於孫中山的歷略，可參看吳敬恆所撰的中山年系。

(註 五)當初文字邊旁加上三點水作汝字形容他與强盜亂賊一樣，見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一章。

(註 六)大同書在不忍雜誌上發表過一小部份，沒有刊布。

(註 七)梁啓超說他是「晚清思想界的慧星」又批評譚氏仁學一書也說「……其盡脫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註 八)光緒二十五年，辛丑，科擧程式改爲策論，廢棄八股。

(註 九)新民之說，可以達到國之安富尊榮見新民說第一節；說民治及其立論之根本，分內治與外交，均見第二節。

(註 十)壬寅年的新民叢報中有一篇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故某以爲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爲病。」由此可知當日梁氏立論的如何偏激了。

(註十一)革命黨與立憲黨的對立，在戊戌政變後愈演愈烈，不但彼此在言論上攻擊，並且兩黨中人，竟有動武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七月十七日，梁氏和蔣智由等在東京神田錦輝館開政聞社的成立會，即被革

黨搗亂，當時傳爲笑柄，章太炎記述其事如下：「陽歷七月十七日政聞社員大會於錦輝館，謀立憲也。社以蔣智由爲魁，而擁樹梁啓超。啓超往，徒黨幾二百人，其他赴會者亦幾千餘人，又有日本名士犬養毅者，其氣類相投者也。革命黨員張繼陶成章等，亦往視之。梁啓超登，力士與會者以次坐。（按梁氏已知革命黨有不利之行動，故預雇日本力士爲護。）政聞社員在前，革命黨員在政聞社員後，其他留學生在革命黨員後。啓超說國會議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詔，刻期立憲，諸君子宜歡喜踴躍」語未卒，張繼以日本語厲聲叱之曰：「馬鹿馬鹿！」（按即侮辱意）起立，又呼曰「打！」四百餘人奔而前。啓超跳自樓曲，旋轉而墜，或以草履擲之，中頰。張繼以馳詣壇上，政聞社員持椅格之，金剛自後搖其肩，格者僵，繼得上。衆鼓掌歡呼，聲殷天地。政聞社員去赤帶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繼遂言曰，「吾不應參與政聞社員事；然所以不能默者，將有所詰問於犬養毅。毅前在早稻田語支那學生曰，中國當速革命，吾親聞之，今何故附會立憲猥鄙至是！」毅俯首謝，則登壇作酬應語，既卒，徐曰：「支那或革命，或立憲，任人爲之，在速行耳。」當是時，蔣智由先知有變，不至，會亦遂散。繼本欲痛毆立憲，以塞莠言，會事急至用武，亦未竟其說也。」讀此可知革命與立憲之對立，已由學理的辯論，而入於意氣的鬥爭了。至於反對立憲黨的另一勢力西太后袁世凱等，完全爲了「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傳說所致。

第十一章　變例的民族運動中的奇蹟

從遊牧民族侵略轉變到資本主義侵略　三種不同的侵略方式引起三種不同的反響　支持民族運動的農工階級　元清統治的轉變　清朝士大夫階級的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之最初的覺醒　兩種不同方式的民族運動　有羣衆無領導和有領導無羣衆　事實與意識的不相應　意識拗不過事實　變例的民族運動成了變例的民主國家　北洋系的開山祖　一幅軍閥起落圖　辛亥以前革命運動的目標　革命成功卽爲軍隊成功　袁氏絕大幸運的照臨　北洋系排斥士官生的種因　袁世凱幾受極刑　非袁不可的心理　小站長官做了國家元首　爲開明專制而成了專制的帝制　北洋軍閥官僚獨舞台　造成二十年割據局面的大宗師　軍閥的不可絕滅　擒賊先擒王的方式

近代中國民族運動曲線的發展遂使鴉片戰爭到現在將近一世紀的長時間中，不能產生一種徹首徹尾始終一貫的中心思想，既如上述。這裏再把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何以趕上歧途，和趕上歧途後遭逢的奇跡，再爲一說。

中國自海通以後，西歐資本先進國家，相繼而來；所以海禁開通是結束遊牧民族的侵略，而

開始資本主義的侵略。換句話說，中國到了近一世紀，遊牧民族侵略的時期已過資本主義侵略的時期到來。因爲中國自中世紀以來，不但是五胡的亂華，亦不但是蒙古族與女眞族的統治，事實上沒有一個時期不受遊牧民族侵略，不過侵略的程度，有久暫大小而已。到海禁開通，西歐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挾其雄厚的資本，如潮湧至；至此，數世紀來纏擾不休的遊牧民族，遂和中國一樣地退處於被侵略的地位。

資本主義初期的侵略，表現於中國的形式的，共有三種：一是軍火與軍事技術，二是商品與貨幣，三是交通機關與生產機器。在這三種不同的侵略方式中，引起三種不同的反響。統治階級的戰鬥集團最感覺第一形式的威脅；士大夫階級最感覺第三形式的重要；農民工商業者最感覺第二形式的鋒鋩；三者各依其所感覺，以決定對外關係與對內關係。

滿清政府和承繼滿清的軍閥，他們與外國資本階級的關係，正如從前東晉，石晉，南宋，等時代的統治階級與突厥，通古斯，圖伯特各族豪右大人的關係相同，戰爭，和議，屈服，勾結皆決定於對內統治的安危利害。在他們的心目中，對於外國軍火有抗禦或購用的兩途，對商品貨幣有抵制或借助的二法；交通機關可以利用以增加歲收，利用以鎭壓民衆；生產機器可以顚覆封建軍

國，也可以作兵工軍服工廠的設備。總之，外國資本階級之於中國統治階級，可以橫加壓迫，也可以憑藉提攜；所以戰爭，議和，屈服，勾結，也都決定於對內統治的安危利害。

士大夫階級認識新生產技術的必要，同時又感覺新生產技術的危險；他們一方面知「閉門獺祭」的不足：

「曰：然則巖穴之士，豈無能自積學以待驅策者乎？曰：格致，製造，農商兵礦諸學，非若考據詩章帖括之可以閉戶獺祭而得也。」（註一）

他方面，又感覺與新生產技術相伴而來的思潮之可畏：

「然一旦悉取舊制而驟更之，不獨宿學耆儒咸傷廢棄，且率天下而專務於功技巧利之事，勢必盡舉六經四書概置不讀，設有奇材異能，而於大綱大本之地未加講求，逞其智能勇略，設有奸徒，唱爲邪說，鼓惑煽誘於其間，小則啓離經畔道之思，大則爲犯上作亂之漸，其患何堪深道。」（註二）

農工生產民衆則反抗商品侵略，因從反抗滿族統治，而至於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在從前有太平運動，在現代有五卅一類運動。

因此，我們知道中國近數十年中，支持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是農工生產民衆，士大夫軍閥官僚都不適於作爲中國民族運動的主要階級，所以孫中山也曾有如下的一段話：

「乙酉以後，予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惟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淸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爲易入。」

關於農工生產民衆可爲國民革命的中堅，在中國歷史上亦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當然，中國數千年來都停滯在農村經濟社會的一階級，所以農民爲主要階級的民族意識比工人還顯著，他們在歷史上常引起偉大的農民反抗運動，就是辛亥革命的前期，也依農工祕密會黨爲主幹。

但是，近代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士大夫階級雖非成了國民革命的中堅，却仍處於領導的地位，這種變態的因素，當然也有其歷史上的條件：可是最大的根源，乃是元淸兩朝異族對於中國的統治，與隋唐以前異族統治的方法不同。蒙古族的統治所不同於過去者，是抑制中國士大夫階級而不與提攜，並且以軍事駐防壓迫中國民衆。女眞族的統治所不同於過去者，是杜絕滿

漢的融合，而其軍隊駐防制又不同於元。後者仍以貴族分封各地，前者則完全廢止封藩制度。蒙古與女眞統治相同的，他們皆以武功威壓漢族。中國本來是士大夫階級支持的民族，尤其是在五代以後南宋以前，他們靠着門閥的勢力發揮其身分意識的權威。（註三）他們早已把身分意識去代替民族意識，所以異族侵入，就會勾結各族豪右，以保持其統治地位，所謂以夷制夷政策，也不過是勾結一部分的異族豪右去排擠另一部分的異族罷了。（註四）到了突厥族與通古斯族的血液再度滲入漢族的血液後，中國士大夫門第之身分差別，轉化爲官僚階級科第之身分差別；至此士大夫的民族意識更爲官僚階級科第所毀滅。他們既然沒有絲毫民族意識，所以對於異族稱臣稱子，成爲司空見慣。他們看到外交政策，不過是維持私人政權的手段，征異族或和戎狄，皆決定於統治階級對內的安危利害而定。元淸兩朝入關統治，一變過去異族統治政策，不再和士大夫階級提攜了；尤其是淸朝，不但不提攜，還要杜絕滿漢的融合，還要用武力來壓迫。這樣一來，數千年來對於異族卑辭厚禮的中國士大夫階級，便從切身之痛而亦發展其民族衰敗和民族差別的痛苦，民族意識的思想又重行形成了。

因爲這樣，所以在淸初便有不少含有民族革命意識的士大夫階級從事於反淸運動，倘使

清朝在乾嘉以後，不變更其對於漢族的高壓手段，那是辛亥革命還要提早一百年；因爲後來滿清改用籠絡手段，把許多的智識份子，一齊羅致去了，所以在清朝中世武功衰歇以後，還有許多漢族的忠臣義士，忘却祖宗慘殺的仇讎，反爲滿清去打倒太平軍，維持其統治的地位。這原來是士大夫階級無恥的本性，也是滿清統治階級轉變其統治政策的成功。

但是在滿清入關統治的最初一百年中，對於漢族壓迫的慘酷，如揚州十日，嘉定屠城，尤其是無數莫須有的文字獄，當然還在一部分士大夫階級的深刻印象中，所以清朝士大夫階級的民族意識，不以統治階級的籠絡手段而撕滅。尤其在下層社會中他們在淸初同樣地受到慘酷的屠殺，而後來的籠絡政策，與他們無干，所以民族意識在下層社會中，反較士大夫階級爲普遍，他們不斷地宣傳種族革命的排滿運動，哥老會，洪門會，三合會，九龍會，雙龍會，白蓮教的秘密組織，更以此而普遍於民間。這些組織爲吾國民族革命之原始的秘密組織，他們對於後來清室的覆亡，尤有極大的影響；由這些組織所影響而成太平天國的反清運動，與和團的反帝運動。這是吾國民族意識之最初的覺醒，也是士大夫階級的覺悟分子領導民族運動的開始。

至此，可以明白中國士大夫階級雖然不是國民革命的中堅，却仍處於領導地位的歷史的

條件，而中國近代民族運動的分子，便有兩種不同的形式。

一種是不懂世界情勢的內地農工分子所發動者：鴉片戰爭時的平英團運動，同光年間鬧的無數教案，光緒二十六年發生的義和團扶淸滅洋，以及後來北方各省的紅槍會、天門會、四川的神兵等等，皆屬此例。

一種是通習世界情勢的智識分子所發動者：歷來的各種維新運動和革命運動，皆屬此例。

在第一種所舉的爲原始農民暴動，他們沒有階級意識，他們祇有模糊的民族意識。他們的行動，正同於一個病人爲痛痒苦楚所激起的身體動亂。在這種方式的初期民族運動中，偶然的勝利都談不到，更不要希冀牠的成功。其次，第二種所舉的不論立憲的或是革命的，都是領導民族運動的智識分子。本來革命的基礎，應當寄託在大多數的農工無產者被壓迫者身上，這些人雖在政治上經濟上機會最不好的分子，而是社會中解決社會問題之一大力量，亦爲有革命方向的智識分子所必須憑藉的力量。但是在中國就有些例外，牠的原因是：中國的智識分子，雖然爲了元淸兩朝的極端壓迫而有民族意識的覺醒，可是士大夫階級的身分意識，還在智識分子的潛意識中，他們儘管喊着自由平等的口號，而於勞苦羣衆仍有不屑爲伍的觀念。還有因爲中

國民族革命乃由少數覺悟分子由對內的民族意識之覺醒始進而爲對外的反帝運動，不像西方民族運動，必因經濟演進，社會變化，便有大多數爲了感受迫害虐苦的羣衆，亟求解除苦痛而要起來推翻現狀，以求人人達到政治上經濟上的機會平等。因爲如此，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往往有領導而無羣衆，有羣衆便無領導；智識分子和農工羣衆，各爲意識地牽拉各走其革命的路線。

中國民族運動在第一種所擧之例——各種原始農民暴動，其發生以至於消滅，全是社會中受壓迫最甚，智識最低，陶鑄於舊習慣最深的農民，而無智識份子爲之領導；在第二種所擧之例——立憲與革命各運動，其最初發生以至於五四以前，恰與第一種相反，全是智識分子高唱其獨脚戲，而無農工爲之後盾。因之第一種的民族運動，不動則已，動則爲翻轉囘去的動，天下豈有民族運動而走向反面去的事情，初期民族運動的終於不脫原始農民暴動的典型，便是爲此。第二種的民族運動，以其分子都爲士大夫階級的智識分子，他們原是思想游移的流動分子，他們只要本身得到小惠，不但「非革命不可」的形勢不易造成；反以留戀於現狀而落於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隊伍中去，這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起落不已，革命勢力盈虛無常，民族革命運動活

動了將近半個世紀，而封建遺毒還是徧植全國的根源。（註五）

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既爲少數智識分子受外來經濟侵略的刺激，而爲意識地牽拉。以常例言之，凡一社會中，其意識恆爲其現有事實之反映，其事實又恆爲其意識所調整而拓展，二者息息相關，互爲因果。假有社會事實既已遷進，而意識未更，則將發爲革命。革命之發生與成功，莫不有新事實爲根據，亦莫不有新意識爲先導，否認舊意識，要求新意識，新意識此時蓋已伏於新事實之上，絕未有在同一社會中，事實所歸落與意識所趨向，兩不相應，有如中國今日者。是則由社會事實以演自中國數千年特殊歷史爲本，而社會意識以感發於西洋近代潮流者爲強，二者固大不侔，近代中國之民族革命運動，原非發自整個民族社會之內，乃爲少數人從外引發而來，實爲民族革命運動之變例。社會內部自發之革命，大抵因新事實而有新意識，意識事實，一致同趨，革命乃可成功；從外引發之革命，意識與事實不侔，舊事實既不容於新意識，被排而去，（如辛亥革命）而新意識又以缺乏新事實而安立不起來，在此兩夾中間，意識拗不過事實，民族革命運動就歸落到失敗之局。

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既歸落到失敗之局，就是辛亥革命以後，一切重反於辛亥革命以前，在

某種觀察上，革命以後，或者竟有甚於革命以前的情形。因爲當時民族革命運動，集中其目標於代表封建貴族的滿清政府，這種反滿清政府的鬥爭，自然就是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而事實上滿清政府祇是代表封建勢力的一個上層建築，智識分子的革命者，他們厭惡着這上層建築，他們還不知這種封建的上層建築，如果不去誘發廣大的農民羣衆來參加革命，根本毀壞了上層建築的眞實基礎，那就仍舊像中國歷史所特有的張家倒了李家上台的一治一亂之循環圈；或者因爲在「共和」一招牌之下，須得改變花樣，便用另一種形態表現出來：（把大總統執政等等的名稱與形式，去代替了皇帝）於是從變例的民族革命運動，而形成變例的民主國家，更從變例的民主國家中產生着曠古未有的奇蹟——就是北洋系軍人的變爲軍閥。

北洋系軍人的開山老祖，遠在清朝武功衰微太平天國平定以後。從前蒙古的武功衰微，漢族農民蜂起，逐出北方，便是明朝的開始；女眞的武功衰歇，亦遭漢族不斷的反抗，從中橫出幾個保駕滿清江山的漢族忠臣，他們一方面做了滿清中興的功臣，一方面便是後來北洋軍閥的開山祖。

爲何北洋系軍人走上軍閥這條路上去呢？原來軍閥不是一個好的名詞，他們在辛亥革命

以後，社會人人詛咒着他們自己亦應和着；從來不見有這樣反階級理論，人人詛咒，自己亦從而詛咒之，而其潛伏於社會上的勢力，反繼長增高，一發而不可制。在辛亥以前，我人心目中毫不知有軍閥這樣東西，亦且絕未聽說這名詞，故這曠古未有的奇跡，明明是入民國以後的新產物。然而革命者偏偏又以打倒軍閥爲肅清封建勢力的首要，他們莫不一致以軍閥爲革命的對象；既爲革命的對像，又何爲產生於革命的運動中，這已有些奇異了。產生以後，不但爲人類社會所共恨，即他們自己亦彼此互咒，一若軍閥這東西實狗彘之不若；然在實際上打倒軍閥的呼聲，儘管響澈雲霄，而舊軍閥倒，新軍閥出，以暴易暴，無以自解，梁漱溟在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上，有如下的話：

「一撲之下，旋卽不見；轉而出現後，營隱身兩翼，再撲三撲，愈迷愈亂，手傷趾殘，頭暈眼花，欲罷不能，不罷亦不能。」

這聊聊數語，委實是辛亥以後一幅軍閥起落圖，牠的產生已經有些奇異，牠的變化更是有些神妙，稱爲奇蹟，毫不過分。我們現在考查牠產生的由來，再去推測牠今後的去路。

原來辛亥以前民族革命運動的目標，只集中於代表封建貴族的滿清政府，而其方法，只集

中於單純的政治活動和軍事暴動。政治活動既告失敗，於是軍事暴動遂爲革命唯一之出路，戊戌政變以後，聯絡會黨，通款軍隊，爲革命活動的中心工作，然當時立憲革命兩黨，猶各辦機關報，陣容嚴肅，旗鼓相當，在這雙方針鋒相對的辨論之下，覺悟了不少中國的青年，喚醒了不少中國的志士，革命的理論，漸爲一般人所同情，獨執言論界牛耳的梁啓超，已不能克服革命黨的主張，民族革命運動進展之速，以這一時期爲最。可惜在宣統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梁啓超改出國風報時，革命黨早已放棄宣傳工作而入於實行時期：所以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進程中，不但沒有完整的革命理論宣示大衆，即零星論著，亦未繼續不斷的宣傳。革命者既以軍事暴動爲革命唯一之出路，於是軍事暴動便爲革命之重心；革命者既以革命之重心寄託於軍事暴動，那麽革命的成敗，完全繫於軍事，而軍隊遂爲革命的靈魂：革命成功，即爲軍隊成功，彼軍隊領袖，亦可搖身一變而爲革命領袖，於是而軍閥成焉。軍閥之所以不見於前淸而見於辛亥革命以後者以此。軍閥即爲封建時代的軍人，封建餘孽附麗於革命，改變花樣，用另一種形態表現出來：故革命者不得不以昔日排滿主義的力量，起而從事於打倒軍閥了。

不過舊軍閥倒，新軍閥生，打倒一個，產生好幾個，好像稗草蔓生，越割越盛，這是什麽原因呢?

過去民族革命運動，集中目標於排滿主義，不去誘發廣大的農民羣衆，已是失策之至；又復集中工作於軍事暴動，革命工作祗有軍事暴動，離開軍隊，也就不能革命，立憲者的心理如此，革命者的心理亦莫不如此。軍閥的老牌者爲北洋系，而手植北洋系終其身爲北洋系之領袖的爲袁世凱；袁氏固藉北洋軍閥而得以扶搖直上，袁氏發跡之初，雖得吳長慶李鴻章榮祿李鴻藻等四人之知遇，但是戊戌政變和義和團事件，實在是袁氏絕大幸運的照臨，也就是北洋軍閥基礎確定的開始；是則北洋軍閥最初之產生，立憲志士與有力焉。

袁世凱走上幸運之途，即擢升而爲直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陸續奏設軍政司，（後改督練公所）學校司，農務司等種種機關，而軍政司之下，仿效日本參謀本部，訓練總監及陸軍部的組織，區爲參謀，教練，兵備三處，儼然在天津成立一個小政府；當時他雖還沒有據地自雄的陰謀，可是已引起親貴派的忌刻。到癸卯年（公元一九〇三年）冬間，北京設立練兵處以後，排袁運動突然緊張，鬧出一場袁鐵之爭；直至丁未七月，（公元一九〇七年）袁與張之洞同時調入軍機，親貴派的排袁纔獲了最後勝利。不過當時軍隊將領，大都爲袁之部屬，留學日本士官學生，亦已陸續畢業回國，其本自北洋送出的，也得派往各鎮充下級將校，故袁之潛勢力，不以鐵良的挾制

而稍阻其發展。袁鐵衝突時，其間有一個士官生名叫良弼的，是滿清貴族中的佼佼者，他和革命黨員吳祿貞極要好，士官生中的革命黨員，急於取得軍權，作革命基礎，便由吳祿貞聯絡良弼，擁護鐵良以排袁，良弼亦要充實力量，樂得與他們結合，免除排漢的痕跡。所以在當時袁鐵之爭，骨子裏是滿漢之爭，而表面上彷彿是士官生與北洋系的傾軋。以後革命黨的士官生如吳祿貞等能在北方軍隊中播散革命種子，未始不由於此。然而辛亥革命後，北洋系的軍閥排斥他派的士官生，也未嘗不種因於此。

袁世凱被親貴派的排擠，調任外務部兼軍機大臣後，表面上軍權削小不少，可是實際上統率北洋六鎮的還是他的舊人；因為滿清的庸弱無能，雖高唱着排漢政策，而實際上政權已漸漸附屬於軍權，軍隊早為軍事領袖個人所有，北洋系的基礎，至此已很牢固了。到了光緒帝和西太后崩駕以後，袁氏的地位，纔見動搖，他雖極力拉攏載灃，希望他念其擁戴之功，仍和西太后一樣地信任他；不料載灃早和那般少年親貴議有辦法，於宣統嗣位後，不到一個月，就諭「命袁世凱開缺，回籍養痾。」並且當日親貴中很有主張在袁被逐時，索性把他殺掉，（註六）因為穩健派恐怕北洋軍隊造反，從中諫阻而止；倘若當時真的把袁氏殺了，在滿清當然仍免不了亡國，不過

辛亥以後中國二十餘年的政治將另換一個局面了；並且袁氏在那時殺死，北洋系決不會有後來這樣大的聲勢，而軍閥的名稱，也不致如今日這樣嚴重了。

原來袁世凱的幸運，尙未走盡，載灃竟究不是一個有魄力的人，既送他回去，又不敢採用少年親貴的意見殺掉他。等到辛亥武昌起義，在「非袁不能收拾」的呼聲中，（註七）載灃不得不委屈求全，令徐世昌微服出京，親赴彰德勸駕。袁知時機已至，故意推諉，以冀清廷對於他所提的六個條件（註八）全部承認。後來各省響應革命的日有所聞，南征的軍隊，都是袁的舊部，又不肯出力；資政院的立憲派人，提出四條的上奏；駐在灤州的陸軍第二十鎮，又打下一個要求立憲的十二條電奏，同時山西也已響應獨立；載灃和滿清貴族，慌忙萬狀，也覺得大勢已去，非袁不能收拾，於是由起用他作湖廣總督，而欽差大臣，而內閣總理，並全部接受袁氏的六個條件。至此，清廷一切自衛的壁壘，盡行撤毀，祇留下一個孤兒，一個寡婦，被玩弄於袁世凱一人掌股之上，終於將二百餘年的皇祚，拱手讓位於袁氏。袁氏當年小站練兵的長官，一躍而為國家元首，北洋軍人，亦以其領袖的榮顯而偏植全國。

然此尙不足以產生軍閥，因為北洋軍人，終究不過是軍人而已，袁世凱亦不過是共和國的

元首而已。最大的關鍵，是當時全國上下都存「非袁不可」的心理，袁氏窺破國人的弱點，便利用進步黨的政客，去抑制炙手可熱的國民黨。到民二冬間，國民黨被袁氏摧毀後，進步黨也失去政治活動的立足地，於是中國成爲北洋軍閥官僚的獨舞台。當時進步黨人還是將順他，希望他，藉此實行所謂開明專制以救中國；不料袁氏是要由專制而帝制，卻不是爲開明而專制；所以專制成而開明無望。他在民三五月所頒布的新約法，無論在事實上形式上已經成了中國的獨裁元首；有了同年十一月所公布的修正大總統選舉法，至少成了終身的獨裁元首。並且在修正的選舉法上，並沒有說不許推薦現任總統的親屬，則更有袁家世襲獨裁元首的可能；又在新約法中，訂定國務卿的設置和爵位的頒給，這已明明把「卿」字隱射上面的總統同於「帝」，而以「烘雲託月」的法子，從五等封爵中，總統已等於皇帝了。袁氏既做了事實上的皇帝後，更大施其利誘威迫之手段，一面樹植死黨，一面消滅敵人，以貫撤其家天下的策略，梁啓超有一段批評他的話：

「……嗚呼！我四萬萬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凱蹂躪而無復餘。袁氏自身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其爲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及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

以號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來，北京政府爲所謂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縱橫披猖，盤旋熏灼於人人心目中而已。夫無論何國皆中人之資居大多數，中人云者，導之善，則可以向善；導之惡，則可以向惡。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而以白刃脅人於後，務使硬制軟化一國之人以爲之奴隸，自非眞强立之士，其不易自拔也有固然矣。……蓋四年以來，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無庸爲諱者也。而此種罪業誰造之？吾敢斷言之曰，袁氏一人造之。袁氏窺破人類公共之弱點，乃專務發達此弱點，以資其利用，其有能自制其弱點而不甘受其利用者，則必設法屠殺之，驅逐之，窘蹙之，使其不能自存。當前清之末，袁氏執政，已專用此策以專植勢力；我國政界惡濁之空氣，實自茲播種。及其爲總統，乃益煽而揚之，試思此種人爲淘汰之術，挾大力以鼓鑄社會，云何可當。」

以上云云，至爲確當，袁氏之必須扶植北洋軍人者以此，北洋軍人之甘爲袁氏死黨者亦以此：上行下效，狼狽爲奸。袁氏的生命既全在北洋系，而北洋系的生命也全在袁氏。不過生命雖然是互相依託的，心理上却各含有可以分裂的細胞種子，袁氏爲統率北洋文武的總領袖，段祺瑞

濶國璋爲武的兩大柱石，徐世昌爲文的柱石，中國成爲北洋軍閥官僚的獨舞台後，南北各方地盤割據思想的潛滋暗長，培植許多封建勢力。到了帝制失敗，北洋系失去了一個統率的頭腦；當時培植的許多封建勢力，本已伏着分裂的動機，至此便形成許多割據式的小軍閥。這樣，帝制運動不惟是中國的大危機，也就是北洋軍人從滿清遺下舊勢力變成割據式的軍閥的大關鍵。所以辛亥革命之役，造成北洋軍閥官僚獨占中國的機會；而護國軍之役，造成北洋軍閥官僚割據中國的機會：這在民族革命運動史中，値得注意的兩件大事。袁氏不但是軍閥的作俑者，也是民族革命運動史中的一個巨魔。

這裏，對於北洋軍閥的經歷，所以不厭求詳的敍述者，因爲牠不但是一個奇跡，就是在中國民族運動中也佔有極重要的位置；牠不但在辛亥以後和民族運動發生正面衝突，就是在辛亥以前，牠是維持滿淸的實力者，事實上早經和民族運動站在敵對的立場。牠和中國近代民族運動有同樣長的歷史，就是袁世凱的政治生命，和民族運動兩柱石的康孫二人，亦在相差不多時候開始。而且袁氏不僅是北洋系的領首，不僅是辛亥革命的主角，不僅是民主國的皇帝，亦是造成二十年來割據局面的大宗師。所以要認識中國民族革命運動，非先認識軍閥產生的經歷不

可；要認識軍閥產生的經歷，非先認識北洋系的來蹤去跡不可；要認識北洋系的來蹤去跡，那就先該認識袁世凱不可。如果沒有軍閥，或者二十年來沒有什麼民族革命運動；同樣，如果沒有袁世凱，一部中國近代史將要換個格局。牠既然有這樣的重要性，吾們就不能放牠忽略過去。

對於軍閥產生的由來，既如上述，然則這曠古未有的奇蹟去路究竟怎樣呢？

軍閥之於中國，猶疾病之於人身，醫新病易，治宿症難；軍閥既有數十年的歷史，剷除已非易事。因爲牠的唯一武器爲傭兵，爲政客，要剷除軍閥，非先取銷傭兵制度和杜絕政客來源不可。然而中國產業衰落，農村崩潰，無量數的生活無靠的失業羣，祇有當兵爲最後一條生活的途徑，取銷傭兵制度，勢有所不可能。中國的智識份子，對於升官發財，本極熱中，興辦學校而後，教育雖未普及，識字人數已多，產業界以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不能發展，同時國家機能和行政機關，亦隨產業的停滯而不增加，因此，中國智識份子的供過於求，和勞動者一樣陷於失業的恐慌；他們便攀龍附鳳，祇求個人的出路，不問國家的安危。於是軍閥不但傭兵可以源源而來，即策士謀臣，亦可愈集而愈衆。軍閥既得其肆虐的工具，因而生產愈加速的衰落，農村愈加速的崩潰，農工與智識份子的失業羣亦愈多，因而勞動者祇有當兵爲唯一的權利，智識分子祇有謀做官爲唯一的

出路。如是而成爲循環性，軍閥遂無限地愈演愈多：而且愈演愈烈，減少且不可得，安有剷除之望！

復次，中國數十年來的民族運動，前半期的目標是滿清，後半期的目標爲軍閥，滿清和軍閥的背後，都有帝國主義爲之作祟，故此民族運動，又可稱爲對於帝國主義求解放的運動。何以滿清可以推翻，軍閥不能破毀呢？因爲帝國主義之於滿淸祇有愚弄而止，其於軍閥，己進而互相勾結了，所以軍閥不但利用國內的封建殘餘，幷且依靠國外的帝國主義。在國內牠已造成其循環性的現象，故不能再用釜底抽薪的方法；牠既然把帝國主義爲靠山，那就應用擒賊先擒王的方式，和帝國主義相抗爭，孫中山也曾說過：

「我們中國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進行做到澈底的成功：這種反革命的勢力，就是軍閥。爲甚麽軍閥有這個大力量呢？因爲軍閥背後，有帝國主義者援助。」

「不過要以後眞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

如何去打破帝國主義呢？這在孫中山遺囑中肯定地說着：第一是對內「喚起民衆，」第二

是對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可是這種方針，到五四以後，才給與我們，五四以前，中國民族運動從無反帝的表示。從革命目標的錯誤，而致於革命方針的錯誤，更從革命方針的錯誤，遂使民族運動趨上歧途，而成變例的民族運動，而成變例的民主國家，終於產生曠古未有的奇蹟之軍閥世界。

參考

(註一)李泰棻請推廣學校摺。

(註二)王之春覆議新政疏。

(註三)文獻通考選舉考一「今之中正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註四)例如劉淵的兵柄是司馬穎授與以禦東胡等。

(註五)在原始農民暴動中，當然也有智識分子參加，如平英團和義和團中除了少數商人外，還有若干貴族和紳士的參加；不過他們僅僅是識字罷了，並沒有覺悟的智識分子附和着。又在立憲和革命的各種運動中，也曾分赴各地運動會黨，尤其在庚子年的前後，立憲和革命兩黨中人的武力暴動，都有大批會黨中人爲之援助，然而他們祇是聯絡會黨中人，對於革命勢力基礎的農工階級，反而遺忘了，這不過暫時壯些革命的聲勢，仍無補於革命的實力。

（註　六）據傳說袁被逐時，親貴中有主張把他殺了的，因爲有人怕引起北洋軍人的反動，遂先密電徵詢各鎮的意見，第四鎮吳鳳陵第六鎮趙國賢二人，皆答請先免本人職，以免士卒有變，致負天恩，親貴因此有所顧忌，遂不敢發，請他回到彰德老家養壽園去休息休息。

（註　七）辛亥革命軍起，弈劻首先建議起用袁世凱，外國人卽替他鼓吹說：「非袁不能收拾；」到後來不但袁氏的舊部說着「非袁不可收拾，」卽滿清貴族以及一般智識份子，亦以爲「非袁不可收拾，」甚至革命黨人亦作如是觀：此種心理，直至袁氏做皇帝時，始一變而爲「非去袁不可」的心理，當時汪精衛有這樣的一段話：「一年以來，國民有一致普通之口頭禪，曰非袁不可，然同時又有一致普通之心理，曰非去袁不可。何以非袁不可，非袁則蒙藏無有解决乎？曰否。非袁則列國無有承認乎？曰否。非袁則共和建設無由乎？曰否。然則何爲而非袁不可曰以袁擁重兵故。袁之部下，不知有國民，祇知有袁宮保，使袁宮保在，專制可共和亦無不可；使袁宮保去，則亂且接踵而至；津京兵變，已小試其端，奈何其復蹈之，此「非袁不可」之說也。……今日以前，慮其部下之有變，而苟然安之，然則今日以後，亦將慮其部下之有變，而苟然安之乎？慮其部下之有變，奉爲大總統而苟焉安之；然則慮其部下之有變，奉其皇帝而亦苟焉安之乎？此所以非袁不可言者，同時亦必有非去袁不可之意也。」觀此，足見辛亥革命後國人對於袁氏均在「非袁不可」四字所籠罩，遂有洪憲帝制與北洋軍閥的終於實現。

（註　八）清廷再三催促袁氏出山，袁便以徐世昌和弈劻爲介，提出六個條件，非淸廷全部允諾，决不出山。其條件爲：一，明年卽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寬容與於此次事變的人；四，解除黨禁；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的全權；六，須與以十分充足的軍費。這種條件的核心，是「養敵自重」和「大權獨攬」。從前袁氏在天津有

第二政府或小政府的渾號，現在他却有把握正牌政府的野心，不但對於鐵良和載灃的前事可以一吐其氣，就是對於整個的滿清政府，也已目空一切了。

第五編　劃時期轉變的來臨

第十二章　扳轉時代的動力

時代幾乎倒退到中日戰爭以前　國民革命開始　民族熱感反映出愛國的衝動　人類歷史上的兩次波瀾　我國革命和中國民族運動　改變了中國民族運動的性質和前途　第一聲喊出打倒帝國主義　客觀的條件所決定　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　英德兩系爭奪近東市場　和平正義是掩飾全世界壓迫階級的耳目　東亞民族的厄運　列强的垂涎中國　四十三年的流血時期　中國失去經濟生命的神經系　帝主火拚期間中國民族工業的勃起　民族自覺的微光　由反對日本侵略而發爲各種運動　兜底攪亂了殭凍的社會思想

辛亥十月十日武昌發難的革命軍，竟在一百二十六天的短時間內，摧毀了數千年的君主專制政體，建立了東方唯一的民主共和國家，成功的迅速，實堪令人驚奇。可是這速成的革命工

作，終於失敗了，專制的皇帝政府雖然推翻了；可是繼之而起的，無一不是封建專制的政府——表面上儘管掛着民主共和的招牌——專制政治的存在，固然可以束縛思想的自由與妨礙工商的發展，而軍閥政府宰割之下，比滿清的專制時代還要勝過多多，北洋系的軍閥官僚利用這種機會，把中國當做他們的獨舞台，所以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個封建代表的滿清政府，却造成了許多封建集團的軍閥官僚，於是二次革命失敗後，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滿布全國，時代幾乎倒退到中日戰爭以前的模樣，連狹義的民族革命與含混的民權革命都很少有人注意了。

這樣反動的局面，直到帝制運動告終，護法運動開始時，霹靂一聲，劃時期的轉變的五四運動，從國內國外兩重刺激中突然展開，這是中國民族運動史中最有光輝的一頁，其意義實不亞於西歐的文藝復興。五四以前，除了原始暴動和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民族運動外，並沒有發生過羣衆自覺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眞正的國民革命運動，是開始於五四運動以後，所以五四運動的開始，便是中國劃時期轉變的來臨。

這一運動的發動近因是由於二十一條件和軍事協定的壓迫；遠因是由於太平天國的種因，和民國成立以前民族革命思想的昭示。當時世界大戰既起，英法諸國聯軍不但沒有絕對勝

種的把握，而且法國東北十郡被德軍佔據，不易奪回；又以海上交通的不便，各帝國對於海外殖民地的統攝大爲不易。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勃發的前夜，參戰諸國一方忙於應付對德戰爭，同時更忙於調度軍費的收支，感受着莫大的危難，所以在那時候牠不得不想盡方法去安撫牠的殖民地，尤其是英帝國的對於印度。因爲印度受英國的壓迫和蹂躪，在大戰期中已被炮火震醒了，大有步武北美十三州獨立的趨勢。幸而印度當日，還沒有像後來這樣發生盛大的反英運動，英帝國仍得榨取殖民地的作戰經費，不斷地對德交戰；牠還怕殖民地脫離牠的羈絆，對德作戰立即失敗，便承認印度的自治。這種事實的暗示，雖不能給我們中國有多大的幫助，但足以衝動中國人的民族熱感，反映出愛國的衝動，而憎惡列強，特別是日本在東三省，在內蒙，在山東，在福建種種的侵略，都足以引起中國人的反感。

同時在日帝國統治下的朝鮮，感受到民族思想的暗示，也勃發其獨立運動，雖然一次一次的被鎮壓下去，可是他們仍舊不斷的反抗，這種堅苦卓絕的精神，也給中國人不少的刺激；以爲果不幸而中國也像朝鮮那樣，則更難於自拔。所以在這運動的初期，一般青年都有獻身犧牲的精神，他們對於日帝國主義的憎惡，和對於勾結日帝國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憤懣已日趨於緊張，

大有一觸即發的情景。

當時尤其使人興奮，使人注意的是俄國大革命，在地理上中俄兩國，壤地相接，犬牙交錯，從新疆綿亘到吉林，在其他各國，再沒有這種密切關聯的國家。雖然俄國開始革命，從克倫斯基執政到布爾塞維克黨上台，中國人沒有明確的認識；可是對於俄國專制皇帝的倒台，和汚穢政治的掃除，却都抱着無限的同情；同情的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專制政府，竟被布爾塞維克黨把牠根本推翻。接着威鎮四海的德國皇帝威廉第二也被社會黨趕跑了。這種革命的大風浪，把全世界都震動了中國社會思想的僵凍狀態，也自然不能不爲之衝破；何況外受日帝國的侵略，內遭北洋系的壓迫，民族革命思想，重復充滿於年青人的血輪中，燃燒着愛國的熱情，掀起了排天的巨浪，終於使中國成了劃時代的轉變！

人類在平靜生活的過程中，常以事實的變遷，會忽然發生波瀾。這波瀾便劃分了歷史的時代。我們檢閱最近一百五十年來人類的歷史，便可見第一次的波瀾在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法國革命企圖打破政治的承繼權，從此皇帝的兒子不可再做皇帝，貴族的兒子不可再做貴族。這種理論在現在看來太平淡了，可是法國革命爆發於王權神聖的歐洲，使一切享受政治特

權的人們，都發生了恐怖。那時歐洲把天賦人權的學說，視作邪說暴行；把共和政體視同洪水猛獸，而有各國的聯軍劇除法國共和政府的企圖。那知在法國革命後一百二十八年，歷史便發生類似的事實，人類生活的過程中，又在一九一七年發生了第二次的波瀾——俄國大革命，俄國革命是打破經濟的承繼權，財主的兒子不可再做財主，資本家的兒子，不可再做資本家，這當然和十八世紀的情形一樣，一切享受經濟特權的人們，發生了恐怖。社會主義如天賦民權的學說一樣，被人們看作邪說暴行，蘇維埃共和政體一樣被人們視作洪水猛獸；在革命發生以後，也曾有過西伯利亞的聯軍，企圖去撲滅那社會主義的政府。經過時間的訓練，人們已經承認太子不能再做皇帝；但還不能普遍地了解，何以資本家的兒子，不能承繼遺產？

俄國大革命雖然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感，可是對於落後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得到不少的助力。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意志純潔的革命者，經過殺害，驅逐，排擠的結果，早已沒有聲氣了；社會上對於革命運動已不欲同情，對於革命理論也漸生膜視。除了北洋軍閥的明爭暗鬥，北洋官僚的自拉自唱外，社會早入僵凍靜止的狀態。直至世界大戰爆發，纔引起一部份人的自覺，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不但對於俄國這次走向新的途徑，試驗空前的歷史的實驗，抱着

莫大的新希望，就是對於中國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運動，又重行注意而加以同情了。因爲以前國內一般人士覺得孫中山所提倡的民生主義——卽西方的社會主義——祇是一種沒有實現可能的空想，和康有爲的大同社會同樣是一種烏託邦觀念；自從俄國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他們看到西方社會主義竟有這麼大的威力，中國的革命理論民生主義，也許有實現的一天。因此對於國民黨和民族革命領袖孫中山的理論表示同情，不但覺悟的青年和急進的智識份子如此，就是實際帶有保守性的進步黨人，也想借社會主義的幌子，做對抗軍閥的武器：（註一）中國人所受俄國革命的影響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史太林（Stalin）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所寫的那篇十月革命與民族問題有名的論文中，有如下的幾句話：

「實在說來，十月革命在世界是一次空前的大革命，牠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勞動羣衆的迷夢，而引起他們與帝國主義鬬爭，在波斯，中國，印度……」

「如此，十月革命將落後的東方民族，和先進的西方民族，都聯貫起來，總合在共同的營壘中，與帝國主義鬬爭。」

最後史太林作了如下三條結論：

「第一，十月革命擴大了民族革命的範圍，由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而爲各民族殖民地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謀解放的一個整個問題。」

「第二，十月革命開闢了廣大的眞正的解放的道路，足以輔助西方的和東方的被迫民族，謀解放的事業，幷呼引他們到共同的路線上，做戰勝帝國主義的鬪爭。

「第三，十月革命是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壓迫的東方之間橋樑。從西方的無產階級經過俄羅斯革命到東方的被壓迫建築了一條新的戰線，以反對全世界的帝國主義。」

在這裏可以知道俄國的十月革命，不但含有世界意義，並且對於中國革命的重要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還有一件重要的史蹟，也許早已被人遺忘了；也許當時爲了與俄國絕交問題，或者在痛恨中國的共黨觀念之下，爲人所不願提的。就是在俄國大革命後北京天津方面，便有一種工人學生的羣衆組織，他們宣言對蘇聯的革命勝利，表示着無可形容的喜悅，而這種一無目的的羣衆組織，到後來都成了五四運動的中堅分子。當時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莫不驚惶失措，正詛咒着這洪水猛獸的蘇維埃政府早日消滅，祇有中國已有工人學生們，抱着大旱之望雲霓的熱情，

遙祝着蘇聯革命的成功；所以俄國大革命不但擊破了中國社會思想的僵凍狀態，而且對於中國民族革命的性質及前途都有重要的意義。

何以說是對中國民族革命的性質及前途，都有重要的意義呢？因為歷來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祇有集中目標於滿清政府，他們以為民族的不平等，民權的抑止，民生的憔悴，都是滿清政府的罪惡，不知滿清政府的後面，尚有帝國主義在。所以在五四運動以前，民族運動者，從來沒有反對帝國主義的表示。在維新時代的立憲派人固然不用說；就是興中會時代同盟會時代以及辛亥革命時代，也沒有絲毫反對帝國主義的表示；在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宣言中，反而一再申述其對帝國主義表示親善的誠意。（註二）這種與虎謀皮的企圖，當然是失敗的，所以新政府成立後，列強不即予以承認，直至代表封建勢力與革命為敵的袁世凱執政後，帝國主義才「深表同情。」從此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內的封建剝削聯繫起來，這種猙獰的面貌，被國人認出了，終於在五四運動爆發以後，逼着喊出第一聲的「打倒帝國主義」口號：中國民族革命運動，至此始轉換了方向。就從這句口號中，已經知道中國轉形時期之將至，而五四運動也就不能等閒視之了。

五四運動在表面上雖然似乎只是一個新文化運動；但是這個運動，在中國革命史上的意義比辛亥革命更爲偉大。因爲中國歷來的民族革命運動，一直到五四爲止，纔脫離羣衆的原始暴動，和少數領袖分子的專一的軍事冒險與政治陰謀的領域，而開始成爲有意識的羣衆革命運動。這個羣衆的革命運動，一方面以反對舊道德舊禮教以及一切舊的文化制度，給封建勢力一個絕大的打擊；另一方面則以反對列強的侵略，（特別是反對日帝國）開始中國有組織的羣衆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所以五四運動與其說是文化運動，毋甯說是民族解放運動。

爲何在初期民族運動中，在辛亥革命運動中，對於列強帝國主義從不加以反對而表示親善，到了五四運動時却來反對帝國主義呢？這除了大戰期間，日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引起的反感，和俄國大革命的社會主義成功感受的暗示外，尙有其他重要的客觀條件所決定的。

這裏關於五四運動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明白了那客觀的條件，才可對於這次空前轉變的來蹤去跡，認織得清楚。歷來對於五四運動看得太簡單了，錯認了運動的意義，便會有走入歧路的危險。現在要使這客觀的條件格外清楚起見，先把列強帝國主義最近的侵略，火拚，和中國如何倒懸於他們巨壑無底的巨吻中間的情狀作一概括的敍述；再說中國在戰後民族工

業如何勃興和何以受挫的情形分析一下，可使讀者明白客觀條件如何去決定這次大轉變的愛國運動的所在。

原來歐美資本主義的發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亞洲做大市場和大掠奪場。在最近一世紀內，資本主義侵略的積累，造成二十世紀血染遍了的世界資本主義巨大骨幹：那些資本帝國主義者由競爭掠奪而出於戰爭，把他們自己造成的骨幹從根本上加以損毀，損毀之後，又想用原法鞏固而且擴大資本主義的建築物，同時他們新的損毀事業又正在準備進行中——這樣循環式的趨勢，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的必然現象。在現今這般資本主義進程中，全世界有十二萬五千萬的殖民地和被壓迫國的人民（還有資本主義國家裏數萬萬的無產階級）輾轉斃於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等處極少數銀行家工業家和他們政府重壓之下；除非把世界資本主義的組織完全剷除，這種慘酷的現狀是決不會消滅的。這些現象最值得弄個明白，因為個個中國人，不但是勞動階級，都應當知道他自己受痛苦的原因。

世界上的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必須獲得廣大的市場，來銷售他過剩的商品，吸收他需要的原料；而世界上可供掠奪的市場，只有印度、中國、土耳其、摩洛哥、埃及、波斯、高麗、墨西哥、安南、南

洋羣島，南部中部的阿非利加洲等地方，因此奪取那些市場的競爭，是免不掉的。競爭的結果，便須訴諸戰爭；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屠殺，便是發源於英德兩系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爭奪近東市場的衝突。

上次世界大戰的成績，即是屠殺了數千萬的勞動羣衆，瓜分德國的殖民地，毀滅德奧等的經濟基礎，使他們變爲英法的殖民地，並把全世界的經濟秩序，破壞無遺。戰後，那些帝國主義的國家又企圖恢復戰前的經濟原狀，來挽救資本主義根本覆滅的厄運，便想以戰爭的鉅大損失，取償於全世界的勞動羣衆。因此，他們先後在巴黎、華盛頓等處開分贓會議，假借「和平」「正義」等名詞以掩飾全世界被壓迫階級的耳目；但那爭奪宰割世界而引起劇烈衝突的眞相，已暴露無餘，他們那些不可消滅的利益衝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

帝國主義者開多少次數的會議，都不能免去日美日俄在最近將來的戰爭趨勢，和德法非相見於疆場不能解決的衝突；不過他們常常被逼着去救濟資本主義無法挽回而日見擴大的世界經濟恐慌，冀圖避免社會革命的銳利鋒芒，故不得不藉此種會議的分贓妥協行爲，犧牲弱小民族的利益，來掩蓋他們中間的裂縫，以苟延此不可避免的大戰時期。同時並可在此苟延期

間之內，加緊刼奪殖民地和弱小國家的富源和勞力，一方可以勉強按住他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使之不能卽時脫離覊軛，俾得從容補償前次大戰的損失；他方便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經濟的和軍事的準備。

許多年來，東亞各民族被踏在英美法日等國鐵蹄蹂躪之下，上次大戰以後，帝國主義侵略東亞各民族又更加厲害。美國勒住非列賓羣島，一面用假裝慈善的態度，一面繼續他的經濟侵略，不稍放鬆。英國扼着印度的喉頸，剛柔並用的壓倒印度獨立運動，以維持每年一百萬印度勞動羣衆死於英國資本家的長爪之下的現狀。安南農民更是奴伏在法蘭西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牛馬一般的種出米穀來供法商的榨取；安南儘可每年餓死多少萬種米的農民，但缺不了法國米商成千萬石米糧的輸出。日本榨取高麗人民的血汗，更是橫暴無比，日貨盡量的輸入，米糧強迫的輸出，使二千萬高麗農民處在飢餓死亡的境遇。

帝國主義的列強歷來侵略中國的進程，最足表現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本相。中國因爲有廣大的肥美土地，無限量的物產和數萬萬賤價努力的勞動羣衆，使各個資本主義的列強垂涎不置，你爭我奪，都想奪得最優越的權利，因而形成中國目前在國際上的特殊地位。

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開始於一八三九年英國艦隊的攻擊。這次攻擊實是資本主義最著名的卑汚強盜行爲，因爲他的起因是由於英國政府和商人要強迫把鴉片毒害中國民衆。從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攻打大沽，直到一九〇一年義和團反抗「洋人」的暴動，促成八國聯軍佔領北京這四十三年間，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宰割中國的流血時期，也是中國人在歷史上受最大痛苦和侮辱的時期。二十世紀的開始，已是到了列強因掠奪而互相衝突的形勢，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戰爭，爲的是爭奪滿洲；戰爭的損失，又挖取中國人的血肉去塡補。

帝國主義的列強，在這八十年侵略中國時期之內，中國已是事實上變成他們共同的殖民地了，中國人民是倒懸於他們慾壑無底的巨吻中間。帝國主義者掠取了中國遼廣的邊疆領土的島嶼和附屬國，做他們新式的殖民地，還奪去許多重要口岸，做他們的租界；並且把中國畫成幾個各自的勢力範圍圈，實行其專利的掠奪事業。在中國自己領土之內三分之一的鉄路爲外國資本家的所有物，其他的鐵路也是直接間接由外國債權主人管理；外國的商輪是在中國海口內河裏面自由行駛；郵電是受嚴格監督，關稅也早已不能自主，是由國際帝國主義者協訂和管理的；這樣，不但便利於他們的資本輸入和原料的吸收，而且是中國經濟生命的神經系已落

在帝國主義的巨掌之中了。那些外國資本家還在中國佔據了許多礦山，幷在上海天津等商埠開設了許多工廠，鞭策百萬的中國勞工在那些礦山工廠裏，做他們生利的奴隸。同時又加上外國商品如潮的輸入，漫說布疋紙張之類，舊有的針和釘都幾乎絕了種，因此生活程度日漸增高，三萬萬的農民日趨於窮困，數千萬手工業者的生活輕輕被英美的機器製造品奪去，而漸成爲失業的無產階級。中國因爲每次戰爭都要被索去一批現金賠償，加上鴉片和商品的吸收，現金日見減少，又加上二十萬萬外債連本帶利不斷的盤剝，更加上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廣州幾個外國銀行家的操縱，國家和民衆的經濟生活都陷在極恐慌的狀態之中。帝國主義者還賄賂中國的官僚政客，派遣許多的顧問牧師，出版報紙，設立學校——這是企圖更順利的達到他們貪婪掠奪的目的。同時爲防止中國民衆的反抗起見，帝國主義者的列強又掠得實際統治中國人的領事裁判權，幷派遣軍隊警察軍艦駐守於中國領土之內。

在一九一四年各帝國主義列強終於爲不可消滅的利益衝突而開始其空前的大屠殺了。

自從歐洲大戰發生，落後的中國產業，受了大戰的刺激，而南洋的市場又復一時旺盛，盡量的吸收中國貨品（註三）當日與中國處敵對地位，同時又是中國的正面敵人的日本，正在侵略中國

預備獨佔中國市場。中國人尤其是帶有民族意識的中產階級的覺悟分子，在這大戰期間，順時勢的推移，得以擴張其產業，增加其生產能力，使停滯的中國國民經濟，一時頓現活潑的狀態；雖然對外貿易仍處入超地位，可是，在大戰期間，較之戰前戰後，相差甚大。（註四）當時中國產業以紡織業與麵粉業最為發達，更以纖維工業的發達，因而對於其他各部門的產業，也給與刺激的興奮。在民國七年底中國工場，有六百十七架蒸氣機，有二百八十三架電氣發動機，還有七百四十一架其他種類發電機：其發動機的馬力，蒸汽發動馬力有八萬二千七百五十，發電機馬力有二萬一千一百十九，其他動力馬力也有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三馬力。純粹產業工人數也由戰前的二十五萬增加到民國七年已有五十一萬人。由此我們知道中國在世界大戰期中，正在進行着產業革命的演化，因產業的發展而銀行金融事業亦隨着發達，從民四到民八的五年中，新設立之銀行計有十家，而資本在百萬以下和各省省立的猶不在其內：中國國民經濟的底流，因此發生巨大的影響。雖然中國當時並沒有脫離農村經濟的範疇，城市工業的基礎也並不曾十分穩固，仍然是外國資本支配之下，尤其是日本資本支配之下，去圖半殖民地，或亞洲生產形式的發展。

但是，中國產業革命沒有完成，而手工業組織却因此愈見顯露其衰落的徵候，農民離村的現象也愈見其嚴重。所以當時不僅給與有志青年以嚴重的暗示，暗示着中國急待整理和挽救。即在世界大戰期中，霑潤得多少利益的中小產階級，也有了民族自覺的徵兆，也覺中國民族得不到解放，則產業的振興終於無望。

在大戰期中，各帝國主義雖無暇來顧及殖民地與落後國家的侵略，但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反而加緊；不僅在政治上攫得很多的利益，就是在經濟上也有長足的進步。即以紡織業而論，中國在這一時期要算是項工業最爲發達，可是日本在中國的紡織工廠營業的發達，仍遠勝於中國工廠，除了原有的不計外，日本又在這一時期到上海青島兩處新辦十廠，利用着不平等條約，已爲中國的致命傷。更勾結北洋軍閥取得中國政治上的特殊勢力，而工商業又感受日本商品輸入莫大的威脅。這種教訓，不論在抽象的民族觀念，或實際的私人利益，都有使中國各階級團結起來作一次盛大的民族運動之可能。因爲這樣，所以五四運動從愛國一點出發，由反對日本的侵略進而恢復國權，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及賣國賊，反對基督教革新教育，復與中國文化，……從學生的罷課延長到罷市罷工，普徧的震動了全中國領土。

中國國民經濟既向上發展，舊時代——殘餘的封建模型的意識，也範圍不住新時代奔放的情緒，腐敗的政治，更令人不滿，參加歐戰既未真正出兵，徒為日本所利用，而為內戰的工具。現實既未嘗有所變革，將來也不見得有轉好的象徵，所以積憤愈深，反抗的思想也愈見普徧，愈見激昂，遂將殭凍了的社會思想兜底攪亂，成為一發而不可止的民族解放的五四運動。

參考

（註一）進步黨份子最為複雜，除維新時代的立憲派人做基本份子外，國民黨跨黨份子，舊同盟會份子，以及軍閥官僚政客無所不包，其主要政策皆取保守主義，自俄國大革命潮流震動中國後，他們便利用社會主義的名詞，去對付軍閥這在當時進步黨的機關報上就可看出。

（註二）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宣言中有一段對外方針云：「若何革命主義，為吾儕所倡言，萬國所同喻，前次屢起屢蹶，外人無不鑒其用心。八月以來，義旗飆發，諸友邦對之，抱和平之望，持中立之態，而報紙及輿論尤每表其同情，鄰誼之篤，良足深謝。臨時政府成立以後，當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以期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滿清時代的辱國之舉措，及排外之心理，務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義，與我友邦益親睦。……」

（註三）歐戰期間，因各帝國的火併，及海上交通的不便，向為歐洲各國大主顧的南洋一帶，頓感求過於供的現象，華僑便乘機而起，當時在短時間致富的華僑甚多。

（註四）一九一五——一九一九年之入超最高爲八千六百九十八萬零，最低爲一千六百十八萬零，除此五年外，計自一九一一年以來，最低之入超亦在一萬零二百五十七萬零以上。

第十三章　啓蒙工作的回顧

啓蒙工作的火線　兩種爆發物　最先爆發於北方　運動的眞相　欣然承諾的賣國條文與章宗祥歸國　五七示威的宣言　情勢突變後提前遊行　向親密朋友商託後事　二十個風雲叱咤的戰士　被阻於東交民巷　一羣孩子挨罵政府要人　往趙家樓去　五千學生圍困曹汝霖宅　窮搜不得放火洩憤　佯作身死的章宗祥逃往皮蛋店　皮蛋打靶死不開口　大隊軍警捉拿學生　對於罷課的雄辯　學生聯合會的誕生　北大學生的獨當一面　全國學聯會的成立　被捕學生釋放　九日的懲辦命令　傳蔡辭職　開始同盟罷課　各地學生影響　留日學生被捕　六三的醞釀

自從興中會以至辛亥革命，中國民族運動僅是名義上的成功；直至五四運動爆發，纔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開始。五四運動雖然震動了全中國人們，團結了各階級分子，而運動的核心，還是少數中產階級爲了實際的私人利益，和少數智識分子爲了抽象的愛國觀念，所以無論這運動如何擴大，而核心的領導是「名流」，是「暴發的資本家」，核心的勢力，亦就歸之於學生與工人。學生與名流，工人與資本家，論其關係確是非常密切，而其志趣則又適得其反，五四運動

雖然在中國的思想界劃一新時代向前猛進，可是中途就會分裂起來。所以五四運動，在實際上當時只作了啓蒙的工作，還沒有爲中國思想界建築起堅固的基礎。

五四運動在發動的初期，是中國代表在巴黎和會失敗消息的傳布；不過這是一點引起爆發物的火線，假使這火線的盡頭沒有爆發物，即使火線燃燒也不能引起烈性的爆炸。這爆發物分爲兩種：一爲新書報的出版；一爲社會主義團體的成立。

一，新書報的出版　從梁啓超的新民叢報停辦後，民族運動偏重於實際行動，中國言論界便入了沉寂的狀態。到五四運動以前北京方面，才有公開地流行和秘密地流行兩種新出版物：關於前者有新青年一類作代表，（註一）其中以八年一月出版的新潮爲純粹學生主辦的有力刊物。關於後者有自由錄民聲進化雜誌一類作代表。前者重在批評中國舊有的文化，後者却重在剷除一切人類的桎梏。當時在言論界上最有權威的首推陳仲甫，陳氏在新文化運動中最努力的便是反對孔子，因爲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封建地主的思想，所以當時的出版物，對於這封建的堡壘施以有力的攻擊。從這反對封建思想中，喊出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剷除封建殘餘的剝削。有了這些帶着強烈刺激性的出版物作晨鐘暮鼓，一向銷沉的青年，也就不能不從睡夢

中驚醒，思想的解放，自是當然的結果了，

二、社會主義團體的成立　中國在民國元年雖然已有掛名社會黨的政黨，實在沒有多少人理會牠。眞正社會主義的團體是在五四運動前後才發現。並不是說到了此時，中國資本發達，需要社會主義，所以社會主義的團體就應運而生；（註二）實在是到了此時，受到俄國革命的刺激，思想上起了變化，一般人被國內的軍閥和國外的帝國主義者迫得不堪其苦，於是思想急進的分子，想把俄國的共產黨作導師，去哄動大多數尚沒有階級意識的無產者，一齊團結起來，造成一個無產階級，和軍閥決鬥，和帝國主義決鬥。因此便在新書報的宣傳鼓吹之下，不成熟的社會主義思想，如水下流的散布於青年學生與勞苦羣衆。這種趨勢，不但在五四運動中作了核心的領導，又是後來社會主義青年團勞工協會祕書部等等成立的基礎，也是後來蘇俄代表越飛到北京新潮社等十四個團體開會歡迎和國民黨容共聯俄的背景。（註三）

何以這種爆發物，在北方的北京和天津地方，反多於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呢？這有兩種原因；一爲北京是封建集團的根據地，也是軍閥官僚的獨舞台；天津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北部的大本營，也是中國北部產業最發達的場所。在這樣雙重壓迫之下，已有激成強烈反動的條件，又加

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提倡自動教育，使中國教育換了一個新方向；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陳寶泉提倡新文化運動的普徧，使學校教育與社會打成一片。在這思想震盪的時候，再有這樣兩位最高學府權威的領袖起來革新教育，解放思想，登高一呼，萬山應響，而這空前的民族解放運動，遂以北京學生最先炸裂而爆發於全中國。（註四）

我們對於這次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因，既在上一章中述其大概，這裏，又把啓蒙工作初期的導火線和爆發物以及所以最先炸裂於北方，和北京學生衝在最前線的理由都說明了，這次運動經過的大概，也得說明一下。因爲向來一般人對於這次運動，不是認做新文化運動，便當他是山東問題的一種反響；本爲民族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現在許多歷史中幾乎把五四的名稱都遺忘了，當年五四的精神，到現在不過是十六個年頭，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記憶起來。現在把當時運動的眞相，按照時間的次序，把重要的事實，分別敍述，最後再來探討其失敗的原因。（註五）

在前面已經說過辛亥革命，不過把滿清封建政府的政權，轉移到軍閥封建集團的手裏罷了。從袁世凱以下的主政者，專以賣國求榮爲目的，二次革命而後，對內則戰而不宜，對外則宜而不戰，到民國七年比廿一條件更甚的中日軍事協定成立後，北京國立各專門學校學生，知道這

種協定，乃是引狼入室，自惹禍害的媒介；於是全體相約同到新華門內去見馮國璋，請求廢止那個協定。但因爲事前沒有組織，結果，幾個被推去見馮國璋的代表，被他一場圓滑而兼恐嚇的話騙了出來，所有同去的學生，也就不得不各跟着代表囘到學校裏去。有少數不識世故的代表，還以當日見得什麽總統的顏色爲榮，得意洋洋地向同學報告他們和馮國璋談話時候所得與請願的目的全無關係的結果——實在是無結果的，把一般熱烈的同學們氣得要死！

那些熱烈的學生，因此覺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組織堅固的有力量的小團體的必要。各校學生更獨立自由組織和聯合組織各種小團體，相繼成立的至少在二十以上，尤以各校聯合組織的國民雜誌社和北京大學一部分學生組織的新潮社最有力量；其他如工學會同言社和共學會等，也以組織嚴密，均有領導一部分學生的魄力。當時新出版的定期刊物一天多似一天，和各種事實的壓迫一天緊張一天，這些團體的彈性也就跟着一天強固一天。到了民國八年四月，這些團體就不約而同的有一個舉行五七示威運動的大預備，同時並得了全體學生加入的同意。因爲各種團體中北大的新潮社是領袖團體之一，而各團體參加的中堅分子，高師高工的學生比較的佔多數，所以在這示威運動的工作中，北大與高師高工也就處於領導的地位。

當北京各校學生議決五七示威遊行後，京中空氣，已很緊張。五月一日大陸報北京通訊，登出巴黎和會傳到北京的消息，（註六）三日，又由幾家報紙和幾個外國教員傳出一些和會消息，竟說中國的外交已完全失敗，並說失敗原因，即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祕密訂定的高徐濟順兩路借款合同的換文上寫的「欣然承諾」四個字，以致中國代表爲此四個字所箝制，美國亦以此四個字而愛莫能助云云。梁啓超於四月二十四日自歐洲拍回警告政府的電文，又徧載於各報，人心更爲激昂。先是，章宗祥不先不後，適在此緊迫之際，從日本公使館忽忽返國，抵津後，恐遭國人之忌，逗留數日，由陸宗輿赴津與之接洽，並爲其先容於總統，章氏乃於四月三十日進京，次日即由外報發表其不復返任等語，更使人憤慨。京中人士，在三日得悉青島交涉的惡耗，各政團紛開緊急會議，力謀救濟。京中商會通電各省商會，請共爭山東問題；上海商會亦有六日開會，籌議對付方法。國民外交協會推舉代表晉謁徐世昌，請電和會專使，拒絕簽字。政府見情勢突然嚴重，乃加緊防範。各校學生更是氣憤塡胸，箭在弦上，其機固已躍躍欲動矣。

從五月一日到三日雖僅僅三天光景，情勢已經急轉直下。起初祇有各校學生爲主體的許多小團體，至此，已波及一般智識份子，商人，政客，就是平日穩健的人們，也被愛國狂潮所推動而

加速其血輪的運行了。當四月之杪，各校學生議決五七示威運動時，會有如下的一通宣言，發給全國各報館及各團體。

「青島歸還，勢將失敗，五月七日在卽，凡我國民當有覺悟，望於此日一致舉行國恥紀念會，協力對外，以保危局。北京專門以上學校全體學生二萬五千人叩。」

到五月三日京中情勢更爲緊張，政府防範，如臨大敵；豈知羣衆心理，愈壓抑而勢將旁流橫決而不可止。青年學生畢竟是血氣方剛的分子，爲了政府的專事壓抑，而使反抗的精神愈加增高，終於在其他各種團體紛紛開會發電的五月三日，各校代表又開臨時緊急大會，議決提前於四日舉行示威運動。各校的小團體也紛紛各自集議四日游行時的如何表示，其中以工學會的態度最爲急進，也最爲激烈；五月三日那天晚上，工學會開全體會議，由會員提議討論「對於中日問題的示威運動，本會應取何種態度？」一大多數主張採用激烈的手段去對付那幾個仰日本軍閥的鼻息，作國內軍閥的走狗，並且慣以構成南北戰爭以快私意的曹陸章。就決定次日聯絡各學校的激烈分子，伴大隊遊行至曹陸章等的住宅時候，實行大暴動，並一面派會員先將曹陸章等住宅的門牌號數調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動。

五月四日早晨，凡在各校主張激烈的分子，就由這個工學會的代表實地聯絡的結果，暗中已心心相印了。到了四日上午十時，中等以上各校的代表，在法政專門學校議決本日下午一時，各校全體學生同到天安門外取齊。舉行示威運動的消息，傳到了各校各校的激烈分子——二十人上下——都有相當的準備，甚至連身後的事都向親密的朋友商託好了的。這時候便有許多在場的學生們，看見他們幾個同學那樣決意爲反抗強權，反抗人類的蟊賊而犧牲的激昂慷慨的態度，也便不知不覺有同往犧牲的勇氣，絕無絲毫恐懼和苟且偸生的念頭。就是畏縮懦弱的朋友們，見此情狀，心中也覺得公理正義，竟足以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出生死問題以外，而感悟到以勢凌人，以死畏人的軍閥封建勢力終屬有限之至，理想的社會，眞正的自由，實在可以血淚換得來的可能。（註七）

及至此，由工學會領導二十人模樣的戰士，叱咤風雲，把京中數萬學生灌了瘋狂劑似地爲純粹的愛國心衝動，一齊抛下書本，整隊出發。到天安門集合的，共有十三個學校的學生。約有五千餘人。當時各人手中所持的旗幟，都寫上什麽「廢止二十一條，」什麽「誓死爭回青島，」什麽「賣國賊曹某章某，」什麽「反對強權，」什麽「抵制日貨」一類使人不起注意的字樣。

因此當時政府派出在學生隊伍前後巡邏的偵探雖然很多，却也一點摸不到頭腦；不惟他們看不出學生們有痛打曹章等的決心，並且也不相信學生們會有什麽暴動的——事實上，最大多數的學生，確是沒有這種預備的。可是當時大家都以爲須全隊赴東交民巷走過，方纔可以對外人表示中國民衆的一種公意。就決定向東交民巷出發，不料東交民巷外國守衞隊，竟不讓通過，雖由代表再三向英，美，法，意各國公使署交涉，因庚子條約的束縛，終沒有允許通過的可能。於是素不感覺外力欺壓的痛苦的人們，這時也覺得憤激起來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裏去！」的呼聲，眞個響澈雲霄，這時候，無論怎樣怯懦的人，也都變成了一些有勇氣的戰士了！

這五千餘學生被阻在東交民巷，足足站了兩個鐘點，拔後就由大衆決定改道向曹汝霖家裏去。這時負總指揮責任的爲傅斯年，形勢過分緊張了，他誠恐有意外發生，力阻勿去，却在呼聲震天的羣衆暴動之下，那裏阻止得住！

這五千餘學生終於整隊經過東長安街往趙家樓去，沿途高呼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賣國賊陸某徐某段某和其他在政府有權勢的人，都在這一羣孩子口中任意挨罵。這時候羣衆的各個分子都沒有個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樣唱着，同樣走著，不到四點半鐘的光景，就全體

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前面了。當走到曹宅前面的時候，大多數的學生都從牆外把所持的旗幟拋入牆內，正預備着散隊回校時，而那些預備犧牲的幾個熱烈學生，即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時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圍牆的窗洞上，把鐵窗衝毀，滾入曹汝霖的住宅裏去。這時曹汝霖宅內的十幾個全身武裝的衛兵，已被外面的呼聲鼓掌聲的震駭，並且受了跳進去的學生們勇猛的威動，已喪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刺刀，退出裝好的子彈，讓繼續跳進去的五個學生從內面把那緊閉重鎖的後門打開。（註八）後門打開之後，便如鰤如鱗的一擁而入，對着後門豎立的一塊木屏，被一個人猛力地推了下去，發出轟然的一聲，在宅內宅外和立在後面狂呼的學生聽着，以爲裏面放槍了，就相驚倒退了數十步，直至裏面出來的學生說夠明白，才又湧上前去。

那一天，在事前已探聽到曹章陸三位正在曹宅開會，因爲窮搜不得，遂被那圍住的學生放起火來，以洩一時的忿怒。可是當曹宅西院火光初現的時候，在曹汝霖的小老婆和他的父親被大家交給在內的警察帶出的時候，忽然在東院房間的木桶裏走出一個身穿西裝面像日人模樣的，被一個學生趕上前去，用一根棋桿劈頭一擊，那人就倒身在地，佯作身死，於是動手打他

的人就往後走出，而一時「曹汝霖已經被大家打死了」的喊聲就傳遍了內外，因有許多胆怯的學生就乘機回校避禍去了。但是一些熱烈的學生們，却爭先恐後的去看那被打死的人，以證實當時的傳言是假是眞；哪裏知道那佯作身死的人，已乘機逃到外面一家皮蛋店裏去躲藏好了。後來却被另一批搜尋曹章的人，在皮蛋店裏面一間光線黑暗的屋子裏的床上，又把曾經被打裝死的人搜尋出來，大家就拉住他兩隻脚，從那間黑暗的房間裏倒拖到皮蛋店的門口，同聲問他是什麼人？他總是絕對地不作聲，大家耐不過，就各拿手中所持長不滿尺的小旗桿，向着他的面孔上亂打，而那些手中沒有武器的學生，就只好權借皮蛋作武器，把那個死不開口的悶葫蘆當做靶子去亂丟，幾十百個皮蛋丟了過去，葫蘆還是悶葫蘆，一聲不兌，不過已是滿頭鮮血淋漓，還雜着黃藍色的皮蛋汁，幾乎把七巧都封鎖滿了。

正在危急時，有一位貨眞價實的日本人冒萬死而替這不開口的人來保護着。當時在場觀戰的有不少西洋人和日本人，因此，大衆就懷疑起來，這不開口的或許是日本人，就有許多細心朋友暗暗地打招呼，停止了皮蛋進攻；躺在皮蛋汁中的不開口人，因而不死。那裏知道他便是向日本政府親遞那封「欣然承諾」四字的換文的駐日公使新回中國運動承認直接交涉的章

宗祥啊！停止了皮蛋打靶後，已經是五點三刻了，尙在看熱鬧的學生，實際只有幾十百個人，而那些攻打曹宅用力過多的人，這時多半也已經精疲力竭地跑回學校休息去了。正當大隊學生繼續散去的時候，趙家樓一帶已開到了好幾排軍隊；於是那些起初對學生很客氣的警察也胆大起來，並且也都扳起面孔，吹起警笛，開始協同軍隊捕人了！

當學生前往曹宅時，曹章確在會商要事於曹宅，曹倉皇乘汽車奔避於使館界的六國飯店，章以不熟路徑，爲學生毆傷，曹宅亦付之一炬，不到六點鐘模樣，僅有少數學生未散，而已有大隊的軍警趕至，被捕三十二人，（註九）到晚上七時才把這個消息傳到各校全體知道，且有政府必將被捕之學生以軍法從事的消息。於是各校學生都立刻召集全體大會，討論對付辦法，一時空氣極度緊張，北大校長蔡元培竭力與警廳交涉，京中十四校長會議結果，並謂此舉爲團體公共運動，不能使少數人負責，並議決無論如何，非將被捕學生全部保出後，再行聯名辭職。

翌日，各校代表齊集於北京大學開緊急會議，大多數主張卽日一致罷課，以要求政府釋放被捕同學。（實際上已有多數學校無形罷課）當時主張罷課以壯聲勢的以北大代表最力；獨高師代表表示異議，所持的理由是：（一）大家應該尊重被捕同學的犧牲精神，繼續奮鬪，不應該

專從營救同學著想而放棄了原來所抱的目的；就是說：大家應該跟著被捕的同學一同去犧牲，不應該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學早點出獄，來跟著我們快活；(二)就事實方面說起來，罷課以後，大家不容易集會，團結精神更加無法保持。可是大家都只憑感情說話，沒有什麼眞理可言，高師代表這樣的主張，自然不能得到多數的同意，所以大家就把全體一致罷課營救同學的議案通過了。這個議案通過以後，又繼續討論到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結果指定北大和高師代表起草組織大綱，爲營救被捕學生和積極進行愛國運動的表示起見，遂有北京學生聯合會的誕生。學生界之有聯合會此爲創始，當時政黨的力量已經幾乎沒有，就是革命歷史最悠久的國民黨，牠的組織和黨員間的聯絡指揮，遠不及這新成立的學生聯合會。(註十)這是全國學生聯合會的雛形，也是全國學生會的開端。所以對於北京學生聯合會的成立，不但是五四運動中的重大事件，就是對於五四以後的民族革命運動也是很有關係的。

聯合會組織大綱自六日上午由起草代表草定以後，即日就交到各校代表會議通過。於是所謂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便宣告成立了。至於這個大綱，却有兩點須連帶說及的；一是該會分爲評議幹事兩部，評議部只負議決一切進行事件之責，幹事部只負辦理評議部所議

決的一切議案之責；二為評議部的評議員的產生，只以學校為標準，就是說，不論學校人數的多少，每校只許出評議員二人；而幹事部則專行委託北京大學學生幹事會代理。這樣一來，人數最多的北京大學，不患無事可作，而少數學校獨斷的主張也便不能通過。還有一點，就是為了幹事部完全交代北京大學代辦，所以後來在外種種接洽，都是北京大學學生，益像這次運動是北京大學包辦的：其實北大在表面上負全部執行的責任，實際上還是各校所共同的。

全國學生聯合會雖成立於六月十六日，以敘述便利計，先在此處提及。北京天津南京三處學生會代表以情勢惡劣，於五月底先後到滬，會商聯絡事宜。三十日下午在西門體育場舉行追悼郭欽光烈士大會，是為南北學生代表第一次集會。六月一日由上海學生聯合會邀請北京天津南京及留日學生代表，討論組織全國永久聯合會事宜，同認為組織學生聯合會為時勢所必要。即討論具體辦法，並定名為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借寰球學生會為籌備會事務所，通電全國各地學生聯合會，於二星期內，各派代表來滬，舉行成立大會；歐美方面遠道不易即歸，亦通函請其表示意見，暫託上海學生聯合會辦理籌備事項，關於對內對外的問題，先提如下的三條件：

一，請政府明白宣布青島由日本處置一條，決不簽字；

二，請取消二十一條約及軍事協定；

三，請懲辦國賊以謝天下。

至十六日假大東旅社開成立大會，將各地代表三十餘人（註十一）中外男女來賓黃炎培李登輝蔣夢麟周錫三舒蕙貞等二百餘人。三時開會，由北京代表段錫朋報告開會宗旨後，各地代表及來賓先後演說，並有建議建設中華民國學生總會會所等事；領導五四運動總樞紐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於是成立。

自全體學生罷課以後，直接感受苦痛的就是各校的校長，因為一方面要受什麼政府的申斥，一方面又要受學生的責備。所以他們連日大忙特忙，開會啊，寫信啊，打電話啊，向教育總長說話啊，向國務院警察廳檢察廳疏通啊，向學生演說啊，弄到一個個精疲力盡，終於由十四校長議決先向警廳保釋，再行全體辭職，並電各省教育會一致對待。後由汪大燮王寵惠林長民等保釋出來，受傷者由家屬自行醫治。惟其時政府有嚴懲學生，解散大學的風說，教育部長傅增湘深自引咎，約各校長同行辭職，其辭呈凡三上，於是政府始稍稍覺悟，未曾實行其斷然手段；然在五月九日大總統的命令中，仍有將滋事學生，送交法庭依法辦理等語，以致重復引起各界的反感。

被捕學生保出後，全體學生依舊上課，惟各校長在奔走營救的時候，其中受氣受辱受驚的地方自然不免，被捕學生才釋出，即有校長辭職的消息。自總統命令發表後，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便於次日清晨出走天津，臨行，留有一啓事云：「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願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吾者諒之。」蔡氏此行，甚爲密秘，大學同事多不知者。自經發覺，全校震驚，玩其啓事語氣，似另有暗潮逼迫而去，以蔡氏爲提倡新文化最力之人，向爲舊派所不滿，此次學潮爆發，政府當局多歸咎於蔡氏一人；及至九日懲辦學生之命令發表後，遂知事不可爲，乃悄然而去。蔡氏出走後，各校議決一律停課以待，教育部亦擬三種挽留辦法，然蔡氏此去，意頗堅決，已具一去不復返的決心，京中情勢，因之復趨於緊張。

政府既明令懲辦學生，於是總檢察廳令行京地方檢察廳及警廳責成保人將學生交出，歸案訊辦。各校學生，乃假北大召開緊急會議，其結果：如法庭必欲少數人負責，甯全體赴廳自首。後來中學校亦加入團體，風潮愈形擴大。中學以上教職員會議結果，亦一致辭職，於是京中教育界頓陷於混亂的狀態中。

當時各大學學生雖極憤激，惟態度仍極鎮靜。中等以上各校學生聯合會議決各校組織演講團，以期喚醒人民對外的覺悟，且有出京分往湘鄂各省演講的。學校當局方面則有各專門學校校長亦取一致行動，並推代表九人謁見總統總理請宣布三事：一，對教育界切實態度；二，善後辦法；三，留蔡誠意。政府雖有留蔡指令，仍無誠意，因有馬其昶繼任北大校長之風說，於是教育總長傅增湘亦於十三日赴西山決意引退。傳蔡同去，北京學界更皇皇無所主，政府不但不肯採納學生界的要求，且有對於教育有根本解決的主張，而田應璜為教育總長和馬其昶為北大校長亦已現諸事實。於是京中各校羣起反對，並於十八日召開緊急會議，由專門以上十八校決議，自十九日起一致罷課，積極進行，務求貫澈初衷而後已。因當蔡氏出走之初，各校學生雖有議決罷課之舉，事實上除北京大學以陷於無政府狀態確已停課外，其他各校的穩健派以為政府苟意存漠視，吾輩即使盡棄其學而回去，彼輩亦不感何種刺激而有所覺悟，反於救國運動，以不便團結而妨害其進行，故大部分仍主上課。至十八日而學校當局亦以罷課為最後手段，於是京中各校，一致罷學，轟動全國的罷課運動，遂以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的總罷課而開其序幕。

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以營救五四被捕學生，早經成立；再自津滬而及全國，各地均有

學生聯合會的組織。當北京學界宣告自十九日起一致罷課後，上海學生聯合會亦於十九日在寰球中國學生會召開緊急會議，定於五月二十二日起，凡入會各校，一致罷課，並遣派代表分赴各省聯絡公私校，一致進行，故各省各校自五月二十日以後，相繼罷課以為援助。留學外國學生除發宣言表示援助外，尙有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留日學生在五四以前，多已返國，其他留日的一部分因於國恥日為青島問題，整隊赴英，美，俄，法，各使館陳述意見書，傳聞亦被日警四百餘人拘入麴町區警署，任意侮辱，並將七人下獄，且有當我留學生前，撕毀國旗的侮辱，被拘的數百人雖於次日釋放，而下獄的七八，且判一年至三個月的徒刑，後雖宣告緩刑，然其有辱國體，已為國際間所鮮有的了。

此次運動中心的北京學生自十九日總罷課後，政府對於學生的種種活動，無不加以干涉，各校附近無不密布軍警，所有露天演講發散傳單和發行刊物——如五七，救國之類，等等運動，自然都被嚴厲地取締和禁止。就是學生聯合會雖然每日改換會議地點，亦屢次為政府所探知而施行強迫的解散。什麼請願書雖然再三地向政府裏送去，哪裏能夠值得他們一顧呢！到了五月三十日，向政府自告奮勇的代理教育總長袁希濤竟下了一道限學生於三日以內一律上課

的訓令；到了次日，徐世昌的禁止集會演講和宣布戒嚴的命令，更堂哉皇哉貼到各校的門口：這更可見當時政府相信他們的權威有效的一斑了。然而政府的壓力愈大，學生潛存的彈力也愈大，在五月三十一日又經從前在五四那一天運動最激烈的那些熱烈分子，到各校活動的結果，六月一日學生聯合會就有從二日起再行分隊出外，舉行露天講演的決議，並且決定，如果二日出外演講的完全被捕，次日就加倍再去，三日又完全被捕，四日就全體出去；所謂六三運動的醞釀期間，就在此時成熟了。

參考

（註一）新青年雜誌在民國四年出版，為辛亥革命以後國內唯一的新文化運動雜誌，牠所崇奉的兩位導師，一位是德先生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ey），另一位是賽先生的賽因士（Sience）。德先生代表民主政體平等自由的精神；賽先生代表破除迷信尋求真理的科學精神。這兩位導師是中國近代文明的淵源，見王哲甫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註二）見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十一章。

（註三）同註二

（註四）世人往往誤認五四爲新文化運動，更有誤認爲北京大學學生運動。其實這一次運動是全國各界爲打倒帝主剷除軍閥的民族解放運動，北京學生不過是爆發物中的一分子，因爲爆發的可能性較他處爲充實，所以在火線着火以後，他們便首先爆發了。

（註五）關於五四眞相的記述，除當年各種日報所載外，竟無一部詳盡的專書，現在根據匡互生五四運動紀實的小册子，和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三册學潮中的五四運動始末以及關於各種紀述五四的書報中作成系統的紀事，以爲研究五四運動的史料之一。

（註六）巴黎和會中國代表電告和會失敗的消息。

（註七）現任暨南大學數學系主任的陳藎民先生，人人當他是一位穩健的學者，當日也是其中準備着犧牲的一個，著者曾數次與他談到示威運動的故事，並且把當日主要分子，一個個和現在對照起來，眞是使人有不勝今昔之慨，因爲在五四時摩拳擦掌義憤冲天的愛國靑年，已有不少追踪於曹章陸之後，努力於殊途同歸的　零賣工作。余何言哉，余何言哉，

（註八）這五個跳進曹家牆頭的五位戰士，說的各人不同；不過從前在上海辦立達學校的匡互生先生確是其中之一。

（註九）被捕的學生中，爲北大十九人，高師八人，工專匯文留法預備等校共五人。

（註十）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十一章中有云：「我敢大膽的說一句，此時候已經有了長久歷史的國民黨的組織，和黨員間的聯絡指揮，恐怕還不如這個新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組織的完密，運用的活潑靈敏。後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軍閥勢力壓迫下面的各省，大概是靠着學生聯合會作宣傳主義吸收靑年黨員的大本營

可知道所謂「五四運動」的關係了。」

（註十一）全國學生聯合會成立會的各地代表為：北京代表段錫朋，唐炳源，陸梅僧，許德珩，楊健、陸宗錫，黃炳蔚、羅國烱、張伯謙，羅發組、黃日葵，南京代表曹公瑋，郎巨，吳邦傑、天津代表張陽先、杭州代表連瑞琦、黃維時，上海代表陳綸曾，何葆仁、留日代表凌炳、王之楨，劉振華，南通代表潘濶夫，羅元愷，武漢代表蔣元龍，潘澄卿，山東代表崔書馨，卓景泰，吉林代表吳仁華、安徽代表湯志先、常禹元、嘉興代表葛敬庚、吳乃燮、寧波代表張其昀、丁福成、崇明代表施英王歐，松江代表陳愨，王同福，保定代表吳震寰，蘇州代表鄭承樹，尤敦信，九江代表鄧毅生，揚州代表孔慶洙，南河代表李仁榮，李九期，浙江代表魏篪等三十餘人，尚有各地代表、已經出發而不及趕到的，亦有數十人。

第十四章 啓蒙工作的回顧(續前)

政府 付政策 日兵挑撥 遊行演講與販賣國貨 條條胡同有演講 校舍改爲監獄 鬼哭神號的北京城 美國教員揮着同情之淚 各地罷市的醞釀 京中學生的破釜沉舟 女子解放第一聲 拒絕要人津貼 商人發動轉變了政府的態度 上海罷市罷工後的影響 各地軍警蹂躪學生 罷免國賊的命令 新華聚泣哭聲震天 留歐學生和華僑圍住專使住宅 電告拒絕簽字 對於五四五種結論 五四是反帝國反封建的啓蒙運動

自政府通令停課各校，限於三日上課，否則決以軍警壓迫的消息傳出後，各校學生憤憤不平，教職員亦不以爲然，提出理由書抗議於府，院，教部，以全體辭職爲最後對待之方法。政府見事態擴大，乃將軍警干涉上課的計劃打消，惟責令教職員勸導學生上課。三日期滿，部令上課期限既屬無效，該部又派出部員十餘人，分赴各校巡視，以覘學生有無轉圜的希望；袁次長欲提前一月放暑假，以爲敷衍緩和之計，如此，學生可以不居罷課之名，教部亦得自全其面子。安徽省長呂調元且有請開文官考試，其意以學生苟趨於利祿之途，則將爲我所用。政府因其請，頗爲所動；於

是決下文官考試令，以冀其平息風潮：凡此種種都是政府悉力籌付對待學生的利誘政策。

當北京學生團總罷課時，曾提出六條向政府要求（註一）其中反對教育總長田應璜一條，雖允撤回，亦遲遲未行；懲辦國賊一事，讓步到免職，尚難辦到；故學生罷課的主張益復堅決。並要喚醒民衆起見，組織演講團，每日至少派出八隊至十隊遊行演講，人數至少有二三千人。最初警察多所干涉，其後以學生秩序甚佳，故亦任彼往來講演。嗣以日兵有汽車遊行的示威舉動，車上插立「青島勝利」等字樣的旗幟，氣勢洶洶，頗有欲與演講學生挑撥的樣子。政府聞悉，大爲恐慌，遂下令嚴禁學生講演。然此熱度達於頂點的數千學生那裏干休，演講被禁而改爲販賣國貨，調查介紹，組織頗爲嚴密，較之遊行演講，又進一步。其工作範圍，從工廠商店以至用戶，從通都大邑以至鄉村，以販賣國貨爲名，幹抵制劣貨其實，此種工作，其爲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所反對，自在意中。

政府自敷衍利誘政策失敗後，乃一變而爲武力政策。當六月二日上午九時，除販賣國貨照例進行外，仍有演講之事，各校合計有二千餘人的演講員，因當時政府已有禁止演講的命令，故學生各把一面小旗藏在袖口裏，一個個地偸出校門，（註二）走到熱鬧之處，就揚出袖中所藏

的旗幟號召聽衆，隨地演講。這種辦法已出軍警預想以外，並且人數很多當地警察，雖然照例上前干涉，終無都大效力。政府以學生仍不遵守命令，且多越軌行爲，乃於是日連下兩道命令；一道是痛斥學生，一道是偏袒曹章。是日下午三點鐘時候，無聊的步軍統領衙門和警察廳只得下令捕人，同時被捕的有四十七八之多，北京大學法科就變成臨時的監獄。不過這次被捕，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當然沒有特別驚惶的地方。雖然當夜謠傳被捕去的學生均遭餓斃，而三日上午加倍出發的講演員却依舊鼓起精神，分途出發。一時北京市上差不多沒有一條胡同沒有立地演講的學生，同時却也沒有一條胡同沒有干涉演講和逮捕演講學生的警察。被捕的學生初由各地警察押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學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對着看守的警察演講起來，演講的學生大都「垂淚而道」，而聽講的人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有深表同情於學生而大罵那些賣國政府賣國官僚的。

但是青年的熱血和民衆的同情，在政府看來是最不值錢的，學生儘管是「垂淚而道」，聽衆儘管是「掩面而泣」，只要封建統治者哼了一聲，那批走狗般的軍警們就會喪心病狂似的幹那違心事的。後來數千百的學生正在大聲疾呼的時候，步軍統領衙門即分派大批馬隊步隊

協同警察再由各分局分所把所有的學生一網打盡而捕去了。因爲這樣大的監獄，畢竟是趕造不及，遂把被捕的學生，一律解送臨時牢獄的北大法科和理科管押起來。在被送的時候，學生依舊沿途大呼抵制日貨，懲辦國賊，甚至有大呼大衆起來革命的。還有在校出來打聽消息的學生，路上彼此相見，即大呼什麼「中華民國萬歲，」什麼「前進，」什麼「死呀！」「死呀！」「你們先去呀！」「我們就來呀！」一片激昂慷慨，淋漓悲壯的呼聲，眞個把北京城圈裏鬧成了一個鬼哭神號的世界！

這時特別對於被捕學生表同情示敬禮的，就是那些特別出來參觀的美國教員，因爲他們一遇着被押解的學生，即立在道旁，舉手示敬，而這些狂呼大喊的被押解的學生，在脫帽還禮的時候，益覺勇氣百倍；因此引出了美國教員不少的熱淚；同時道旁的行人却也有不少相見流淚的。等到被解送的學生繼續進了法科或理科以後，大家雖然餓了十個鐘頭，但因爲在裏面看守的軍隊爲大家的沉痛演說所感動，對於被看守者在法科理科範圍以內的行動完全不加干涉，各人不惟不覺到有什麼恐懼與苦痛，而且立刻又在裏面組織一個被捕學生聯合會。這個組織差不多和原有的學生聯合會的組織一樣，不過評議部和幹事部的職員都由各學校學生按照

每校幾人的規定自行推出。所以到了三日的晚上，在法科被看守的八百多人就把所謂評議部和所謂幹事部所有的交際股，庶務股，會計股，糾察股、衛生股等，都已組織完全，一切事情，概已有人負責，不惟秩序井然，而且食的問題也能設法解决了。

這時大衆所不能放心的，就是明日各校學生全體出發的事情是否能夠實現？大家所最希望的，是北京商家亦能夠起來援助而一致罷市，京外各地各界同樣地一齊起來表示大家一點聲援。

當二日第一批學生被捕後，卽由北京學生聯合會通電各省，請求營救。三日第二次大捕學生事件發生後，該會及天津學生聯合會均有急電報告二次被捕情形，四日各地 上都以大字披露是項消息。各地除學生界外，其他各界亦都不滿意於政府的措置，已從少數知識份子的同情漸及於各界一致的公憤。各地罷市的醞釀，至此已有躍躍欲試的景象，尤以上海商界的空氣最爲緊張，這是很顯然的因爲上海商界受到日帝國的壓迫亦最厲害。

自三日學生重行出發演講，被軍警拘捕多人後，形勢更見嚴重。在校學生見出外演講同學全數被捕，固然明 知軍警監視學校愈加嚴密，不容易全體走出校外；但爲免除良心上的苦痛起

見，只得各人攜帶乾糧被褥，（註三）死力衝出。果然全體攜帶行李衝出以後，軍警即蜂也似的上前阻止了。但是全體學生既挾「破釜沉舟」之勢向前猛進，並且用着慷慨激昂，懇切沉痛的態度向着軍警們演說，軍警的良心已經發生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和慚愧，安得再有力量來阻止學生們不去呢？不過四日軍警方面所持的態度，實在也和三日兩樣，因爲他們三日見着演講的學生即盡數捕去，四日却只極力苦勸——甚至於有跪地哀求的——學生們不要再出外演講，絕對地不再捕人了，所以四日出發的學生，反能夠自由地在一切熱鬧場所，向聽衆把平日所不能說不敢說的話，此刻都可任意說得出來。但是他們一面演講一面却都向着北大法科理科走，因爲一則可以就近探聽昨日被捕同學的消息，一則可以從聲勢上表示一點勝利，以安慰安慰被捕同學的沉悶。後來却都能達到目的，下午五時以後，那天出發演講的全體學生，眞是出乎意外的都得安然回校。

這一天還有一件可記的事，就是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及附屬中學的學生，也打破後門出外加入演講，且有集款接濟被捕學生的舉動。這是北京女校學生參加五四運動的破題兒第一朝．因爲在過去幾次召集，各女校也很活動，每次都給學校當局阻止着；當二三兩日被捕大批學生

的新聞在報上發表後，該校女生就商量援助的方法。不料事爲該校校長所採知，就一面囑咐工人把校門緊閉，一面召集學生訓話，加以嚴厲的斥責。這樣的辦法，似乎使得該校女生再也沒有活動的餘地了；但是他們的憤氣却因此更盛，就將後門打開，一齊向外出發，沿路講演。下午也一同到了北大法科的門前，同時她們的代表及女中的代表六七人，各用手巾提了幾千枚銅元，送到法科被捕學生團，接濟被捕的男同學，並聲明送來的銅元都是臨時捐集的，所以來不及換成銀元。這種熱情俠舉，不僅增加了男同學不少的勇氣，而且可以說，這就是中國女子自己解放，自已取得平權的第一聲。女子師範領導女界首先發難後，繼着就有京中十五女校聯合呈請政府釋放被捕學生，而各地學生會中亦多有女校的學生代表參加。

四日軍警對付學生的態度忽然改變，當然是政府看見情勢嚴重，把武力政策稍稍轉變，所以四日出發的學生，仍得背着被辱安然回校。至於三日被捕的學生，雖然失去了自由，可是却因此引起大多數人的同情，私人親友及各團體代表前去慰勞的一天不知有幾十百起，送點心和火食費的也是接二連三地來個不已。不過，被捕學生對於送來的火食費並不是輕意肯接受的，凡是各校教職員及學生還有被捕學生的親友家屬送去的一概接受外，其他無關係的尤其是

軍政界中有地位的人。卽使誠心捐贈，往往婉言絕拒，（註四）這種精神，格外使人欽佩。五四運動之所以值得後人景仰的，一大半就在運動的中堅分子，除了「自我犧牲」的勇氣外，絲毫沒有其他企圖。

五日早晨，看守的軍隊忽然無條件地自已撤去了，大家很覺奇異，還有人猜疑政府別有用意。後來纔知道政府因爲上海爲援助北京學生，已實行罷市；天津漢口也有罷市的趨勢，北京商界有將和天津漢口商界取一致態度的傳說。並且在外面活動的學生聯合會提出了嚴厲的抗議，大有無可收拾之勢，所以只好無條件地把看守的軍隊撤去。不過政府雖然無條件地撤去了軍警，被捕的學生，却不能不向他們嚴重地質問任意蹂躪人權的理由。所以在五日下午教育部派來四個代表前往慰問，並勸學生回校，大家因爲他們對於學生所提出的質問沒有滿意答復，反把那個代表教訓一番；並且說政府如再沒有悔禍的表示，大家仍採激烈的手段去對付他們。六日起學生的演講團及販賣國貨者隨地皆有軍警均不干涉。後來政府重派代表自認誤捕學生之罪，而在外的學生聯合會又有進一步辦法的提議，全部被捕學生，乃於七日在萬人歡呼聲中，各自回校，被拘於警察廳的一部份學生，亦經某科長的再三道歉，雇車送回。

此次政府態度所以突然緩和的原因，北京學生再接再厲的精神，和各地學校同聲相應的表示，固爲促成政府覺悟的所在；然其重心，却在商界和工人起而援助，行將演成全國總罷市總罷工的趨勢，遂使冥頑不靈的北洋軍閥，亦有衆怒難犯，稍稍悔過的覺心。因自六三大捕學生的警電傳出後，羣情憤慨，達於極點，尤以上海罷課學生的四出呼號，涕泣陳辭，遂使商界與學界聯合一致。四日京中已盛傳上海全市商店將於次日一律罷市的謠傳，其他各大城市如天津武漢南京杭州濟南等處，亦有步武上海後塵作同樣表示的消息。以此緣由，政府乃於五日突然自動撤去看守軍警的舉動。至五日而上海南北市及英法租界商民激於學生的義憤，自動罷市。（註五）上海罷市既成事實，內地各處，相繼追蹤，二三日內，各地幾已全部罷市，更由商界而波及於工界。蓋自全國罷學罷市以後，政府僅僅撤退看守被捕學生的軍警，及向被捕學生的慰問與道歉，其於賣國賊之懲辦，仍無決心表示，遂以學生的加緊宣傳，和商界的擴大運動，上海銅錫業機器工所首先發難，印刷紡織各廠隨之罷工，其他如火車電車工人，亦一律罷工，風潮鼓盪，幾成全國一致，氣象慘淡，至斯而極，誠空前未有之事變也！

學商工既聯爲一氣，對內對外都發宣言，以表白所以罷學罷市罷工的苦心；而各地學生每

以演講爲喚醒民衆首要之務，故遭當局之忌，亦以學生爲最甚。北京方面連日大搜捕後，雖於五日政府即自動釋放，而各地軍警，仍多蹂躪學生，尤以南京武漢及福州數處爲最甚。南京罷市後，學生出而維持秩序，分隊立街，下關方面的警察，以槍刺刺傷暨南農業兩校學生二十八人，又大行宮的警察痛毆金陵及基督益智兩小學生。武漢學生以出外演講，被警察毆傷拘捕者幾於各校皆有，高師學生陳開泰因傷重身死，文華中華各校學生均有受重傷者。福建處在積威之下雖屢次希圖發動，均爲當局破壞，故學潮發動最遲，然其受禍亦最烈。當時福建督軍李厚基逮捕學生，笞責鐐銬，慘無人道，餓者傷者，殺死者，不知其數。（註六）此外各省，如魯，如晉，如陝，如浙，如贛，如兩廣，以及東三省、等，有能學而未罷市者，有先罷學而後罷市者，有罷學罷市並舉者；重要商埠，更以學商工的聯爲一氣，故並有罷工者。其中罷市的力量以上海爲最大，罷工的影響，除各大同業外，則以滬甯鐵路停駛的應響爲最大；其出發點雖各有不同，而其要求拒絕和約簽字，懲辦國賊，取消苛約，抵制日貨等條件，則皆同聲一致。政府始則以學生爲罪言，繼則以曹章陸爲公忠，意存袒護，曹章陸猶戀棧依然，雖經一度辭職，不過嘗試政府的意旨罷了。洎乎全國騷然，衆怒沸騰，政府鑒於各方面的情勢不可挽回，乃於六月九日始下准予曹章陸辭職的命令。

當七日北京被捕學生囘校後，曾於次日晚上召開學生聯合會，決議於九日上午十時全體學生赴總統府直接談判，要求罷免曹章陸等的議決案用電話通知教育部，要他們通知徐世昌屆時在府守候。政府從教育部得到這個消息，並且因爲南苑某軍隊也有預備同時武裝進城一律加入請願的謠言，和津京商界將有激成罷市的傾向，卽晚十一點鐘就召集國務會議，一致通過容納民意，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議決以後，就立刻由教育部用電話通知學生聯合會，並力勸學生聯合會轉告同學，明日不要到總統府請願，以免釀成其他不測的禍變。聯合會當卽要求須有罷免曹章等的實證，纔有商量的餘地，他們就答應以明日上午九時以前送到各校罷免令的政府公報爲證，學生聯合會，就答應明天再看。果然九日上午八時政府公報已送到各校，曹章陸的免職令眞個成了事實。一月餘全國各界，奔走呼號，要求懲辦國賊的一條件，至是才得解決：可是在封建勢力之下，這樣結果也可說是求之不得的勝利了。

然此打倒國賊一問題，乃由和會中山東問題的失敗所致，曹章陸的罷免，尙非此次運動的主要目的，在「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公共目標的五四運動，必不以曹章陸罷免爲已足，蓋國賊雖然受了一點薄懲，而危險萬狀的外交依然沒有多大挽囘的希望。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傳聞

中國專使將於日內簽字於損害國權的凡爾賽和約，於是全國震驚，奔走相告，若大難之將臨。雖學商工界抗電力爭，尚恐無效，於是北京學生聯合會又於二十七日向總統府強迫徐世昌電令專使拒絕簽字；山東代表七團體，亦有叩閽呼籲之舉。從二十七日起，各界數百代表，新華聚泣，哭聲震天，經過兩日乾晒，一夜露宿的最後奮鬥，各省學界及在京商工兩界亦繼起參加請願，上海國民大會及山東協會電請政府拒絕簽字，限四十八小時答覆，否則國民與中央脫離關係云云。結果徐世昌就當面答應專使如未簽字，即電令拒絕簽字，如已簽字，則將來和約交到中國時，定予以批駁。學生代表雖明知徐氏圓滑，但無法暫時證明他說話的虛偽，也只好各回原校，另圖補救了。不過徐世昌的圓滑雖然弄到大家無法進行，而近在巴黎的留法學生和華僑却因爲國內民氣激昂，激動了處置軟弱無能的中國專使的決心，就於和約簽字的那一天，全體赴中國專使所住的地方，阻止他們赴會簽字，並聲言專使如要去簽字，大家就以國內學生對付曹汝霖的辦法對待他們。於是中國幾個可憐的專使因爲恐怕簽字以後，自身難免有性命之憂，也只好容納學生華僑們的要求，保全自身的安全，便着心腸各不赴會。至此，拒絕簽字的目的已達，而五四運動中主要目標的「外爭國權」一項，竟在威嚇利誘的環境中保持着一線生機，於是一月餘

掀起的愛國高潮，遂在六月二十八日陸專使拍回拒絕簽字的電訊以後，各在悲壯嚴肅的情境之下平靜下去，轟動世界的五四運動，也就告一小小段落。

五四運動的起因和經過大略說完了，我們可以得到下面幾種結論：

一，五四運動不是偶然的，爲了經濟上的變動，政治的腐敗，軍閥的橫行，以及思想上的轉變，而有醞釀很久的歷史的力量。

二，五四運動雖沒有許多生命上的犧牲，但在最初北京學生發難的時候，他們預備犧牲的也大有人在。因爲預備犧牲者努力的結果，便引起其他多數的預備犧牲者，所以運動的力量也因此增大。

三，五四運動所以能持久，就爲了平時有團體的訓練，臨時有相當的組織。

四，五四運動所以不爲軍人政客的詐術所破壞，所污辱，所利用的，就在大家所抱的目的，是非常地正大光明，不但有威武不屈的態度，且有富貴不淫的精神。

五，五四運動在這「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共同目標之下，使直接感受威脅的新興民族工業代表人，和乘着歐戰期間隨民族工業發達而漸見抬頭的勞動者，激起空前的反日運動，因

爲學商工三界的聯合能使奸滑狡猾的北洋軍閥窮於應付而終於屈服。

這樣看來，五四運動是一個反帝國主義的含有民族主義的運動；惟其如此，所以這次運動的餘波才會影響到以後的五卅運動上面去。並且五四運動也是一個反封建勢力的含有民主主義的解放運動！惟其如此，所以這次運動的餘波，才會影響到以後的一切解放運動上面去。但是，這個運動只可說是一個啓蒙運動，因爲牠的力量偏於破壞現狀，少有建設工作；惟其如此，所以五四運動以後的各種新主義新思想同時並起，而新文化運動也就這樣地向前奔放起來了。

參考

（註一）北京學界議决總罷課時，在上政府當局的呈文中有六不解的理由大致不外質問政府不簽字之决心；請懲辦國賊，請挽留傅蔡，打消田長教育；撤廢警備學生會；向日政府抗議釋放被拘之學生；恢復南北和局等語。且聲明係暫行停課，其措詞及舉動，皆望政府予以了解也。

（註二）因當時各校校門，均有軍警看守，不許學生結隊出入。

（註三）三日學生被捕，還有設替被捕的同學去送被窩和點心，四日全體出發，如果依舊全體捕去，那就再無送被窩點心的人了，所以各人只得預先帶走，這也是破釜沉舟的一種表示。

（註四）三日被捕學生各界投贈火食費者甚多，大都爲學生拒絕，如梁啓超之弟啓勳贈送大洋一千元，據說是代廣東

何某捐贈被捕學生，他親自送到北大法科，由被捕學生交際股收受後經評議部提議認為不應收受，便行退還，並登報聲明。又吳光新托人轉告願津貼學生聯合會，並說段祺瑞徐樹錚對於學生甚表同情，亦被學生拒絕。

（註五）上海罷市甚為奇特，是日上午七時，城內先行罷市，他處商店照常營業，及八時許，中法交界之民國路商店相繼閉門，越一小時而法界亦無開門者，十時許五馬路商家繼起上牌門，至十一時許南京路商店隨着關門，不到正午全市竟無開門者。罷市後商家皆於門上貼着標語，如「坐以待斃，與汝偕亡」「還我自治還我學生」「驅逐賣國政府」等等字樣。故此次罷布，並無預先協商，實以人民積憤已甚，心理相同，自然之趨勢也。

（註六）八年六月十七日上海各報所載福州電報謂學生六千餘人被李督及日兵捕去，慘無人道，乞援於全國學生聯合會，嗣經政府去電釋放，風潮始平。

第十五章　革命主力的轉移

愛國運動緩和後政治的惡劣　革命高潮的由來　發難地點的轉移　陳仲甫承繼譚梁餘緒　新靑年派戰士攻擊的目標　思想界的分化　民主主義中的婚姻問題　革命主力由北京到上海　革命主力落到上海的第一個條件　革命主力落到上海的第二個條件　孫中山努力於主義的建設與宣傳　革命主力落到上海的第三個條件　國民黨改組的三個階段　新生命的胚胎　一黨專政的信念　民族主義的演進　民族革命的歷史截成兩段　改組後的主要工作　中國革命思想的權威　革命運動歸落到南部的原因　運動發生的兩個時期　五四運動的牽線者　革命領導權的歸落到工人階級　中國革命進了新的階段　工運重蹈歷史上農民的覆轍

當和會專使拒絕簽字的電訊披露於國內新聞紙後，轟動全國的愛國運動，便在凄涼慘淡憤慨激昂的雰圍中緩和下來。當時日帝國方面恫嚇利誘，或將出於補簽的風聞，然大家以爲曹，章，陸既倒，親日派的段祺瑞內閣亦已下台，從此國事當有轉機。殊不知封建的殘渣，已再不能領導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政治組織；同時產業的發展，又比大戰期中遲緩下來。於是政治上的衰

現逐愈見其惡劣，曹錕的總統竟至以賄選得來；即當時所稱謂什麽模範省，什麽模範軍人等等，都不過利用當地人民傳統的弱點，求得短時期的苟安；其他所謂模範村模範縣等等運動，就是假借資本主義的表皮建設，而實行其土豪劣紳的地方統治，一切似是而非的政治表現，豈但不能滿足五四運動時代的希求，反而越見醜態百出，越是令人憤慨。民國十三年十月驅曹事變之後，北洋軍閥的系統逐陷於總崩潰的悲運，十餘年來給北洋軍閥官僚霸持的獨舞台，到了那時已經號令不出國門一步。曹因吳逃之後，雖然還演成雜燴式的段祺瑞的臨時執政，可是這種龐雜的軍事混合的封建組織，那裏担當得起改造中國的任務！

五四運動之後，雖不曾解除封建時代所殘留下來的桎梏，却已受了嚴重的民族解放思想的感應。那時候正當世界大戰初告結束，資本主義不但在海外市場勃興，即國內消費力也相對的增大，中國處這樣環境之下，產業繼續向上發展，特別是纖維工業的發展，於是人民的生活水準，固未必增高了許多，而已有轉旋的餘地，所以思想的發達，也跟着物質的進展而生長出來。在民十以後的思想界雖沒有很顯着的劃分，却有了相當的認識，不是五四運動初期那樣只是要革新而沒有標的的可比，這是民十四前後革命高潮之所以由來，國民革命北伐之所以勝利。

從轉形期的五四而五卅以至於民十五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最初爆發於封建集團根據地的北京，其次爆發於帝國主義經濟勢力中心點的上海；最後仍歸宿於革命運動發祥地的廣東；在這短促的七年中間，雖然每一次高潮的來臨，必彌漫於全國各地，而發難的地點却分配於中國北部，中部和南部，這是因爲推動革命主力的轉變，所以革命的中心勢力和爆發地點便每次不同。

五四運動的所以爆發於北京，和發難的主角所以落到北京的學生界，這在第十三章中已經分析。現在要分析何以繼五四而起的五卅運動，從北部中國移到中部中國？而隨五卅之後的革命運動，又何以歸宿到南部中國？其次五四運動的主角，我們已經知道是由少數知識分子的覺悟，推動青年學生做先鋒隊；但是在五卅運動中何以學生退處於配角地位，那運動的主力轉移到工人身上去呢？又何以上海和其他各地以五卅而爆發的工人運動沉寂以後，而南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還有粵港罷工事件作最後的中流砥柱呢？這其間都有歷史的意義，假使忽略了其中轉變的根源，那就無從認識這一次中國轉形期的意義。

在第十章中關於譚嗣同梁啓超的思想言論，曾有如下的一段話：「梁氏自戊戌政變以後，

即取得康有爲之地位，握中國思想言論界的牛耳，故其影響於辛亥革命者甚大；至五四運動時代譚氏的思想得陳仲甫之發揮光大，風氣爲之一變，向日一般知識青年以梁啓超爲崇拜的偶像者，至此，陳仲甫便代替了梁氏的思想權威的地位，而爲一般知識青年崇拜的偶像了。」原來在最近一世紀的中國思想界最有權威的是譚梁二人，譚氏因爲早死，且其著作又少，故在當時沒有若何大的影響，直到五四運動前後，中國的思想界早已入於殭凍狀態，便由新青派起來標榜新文學新思想以從事於反對因襲的文學和因襲的思想，這完全是承繼着譚嗣同的大無畏精神，去衝決一切天經地義的網羅的工作。譚氏對於過去的一切都主排斥，而於倫常名教以及統治階級御用的精神工具，說來半文不值，新青年派完全把譚氏的思想接受過來，異軍突起於中國的思想界中。主辦新青年而爲該派領袖的便是陳仲甫，當時覺悟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之視新青年，一如戊戌政變以後之視新民叢報，其信仰陳仲甫亦如當日之信仰梁啓超，無怪北京大學校長蔡培元因爲欲整頓北大，就去禮聘這「可爲青年指導」向來「有不忘的印象」之陳仲甫來担任文科學長了。（註一）

新青年派的戰士們，其攻擊的目的便是孔子和禮教，自從陳仲甫做了北大文科學長以後，

不久便有北大學生發行的新潮雜誌響應新青年的運動，由是新舊思想的衝突普遍於全國。幾千年來支配人心的孔子和支配行爲的禮教，那時竟被攻擊得體無完膚，於是青年界的懷疑精神，就隨而擴大起來，差不多對於社會的一切現狀，都感覺着成爲問題，而新文化運動也便向前奔放起來。這固然是中國的經濟組織起了變動，才會使社會上一切現狀成爲問題；不過新文化運動的主力是在北京的知識分子和北京的青年界，他們眼見着北洋軍閥官僚的獨舞台上演着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活劇，早已到了有觸卽發的條件，遂在巴黎和會失敗的消息傳來後，掀起了空前未有的學生示威，所謂五四運動也就爆發了。

五四以後，從排孔與反禮教而影響到家庭問題，婚姻問題，貞操問題，和孝的問題等等上面去，使人對於那從來視爲天經地義神聖不可侵犯的禮教重新估價，而禮教的束縛便從此失却牠的力量。不到幾時，這推動新文化的主力軍新青年受了蘇俄革命的影響，在這新文化運動的陣線中思想分化，一派專講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由陳仲甫李大釗領導而另辦嚮導週報，成爲鼓吹共產主義的機關報；一派信仰杜威的實用主義，由胡適領導刊行努力週報，成爲鼓吹好人政府的言論機關。五四運動本身雖然還很貧乏，也沒有堅定的基礎；不過對於將來的期望，已劃出

了理想的輪廓，假使領導者保持着初期運動的目標，則此偉大的歷史使命，不致過了六年方有五卅的革命高潮，也不致將革命主力轉移到上海去了。

但是，到了五四運動之後，因爲民主思想的展開，民主運動隨着抬頭；在聽天由命慣了的中國人，看到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反乎常，最爲一般人注意而且爲青年界特別是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年，在這打破禮教的狂潮中，很多費了最大的勞力去奮爭婚姻自由。中國的禮教大防在中產階級以上的所謂「書香」人家格外謹嚴，自由思想必然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組織發達而勃興，生產形態既已變動，則思想也要隨之而起變動。對於久受拘束的婚姻制度，恰是較有思想的青年男女所最難忍受，所極欲推翻而希求根本改革的；所以五四以後大多數的青年男女，往往出全力來爭求婚姻自由的實現，在民主運動的自由主義中，婚姻自由却占了最大的成分，這固然是落後的中國所應有的畸形現像，也是初從封建時代蛻化出來所不可避免的階段。不過把大部分甚至全部分的精神都消耗在爲戀愛而抗爭，而犧牲，勢必對於其他的政治鬥爭漠然不顧，這是五四運動時代的民主鬥爭，僅展開了思想的序幕，沒有堅定基礎的主要原因。其後政治的壓力漸次明顯，經濟的束縛益難解除，柔和美妙的愛神不能生存於新舊合鑄起來的醜惡社

會，而一齊窒死於財魔之下，遂使熱烈，活潑，進取的青年，成爲消沉，頹唐，失望的人們。尙有一部分具有向上意識的急進分子，對現狀不僅是不滿，而且打算從根本改造，他們想把俄國的共產黨作導師，哄動大多數還沒階級意識的無產者，結合起來造成一個無產階級，和軍閥決鬥，和帝國主義決鬥。可是他們忽略了過去歷史的演化，和現實社會的結構，他們拋開現實，一味奮往邁進，苦鬥的結果，不但中國的新建設沒有多大希望，明天就是光明的假想也成幻想，連民族解放的實質也難於登天，於是而迷惘，而煩悶，而彷徨，他們終於和爲婚姻自由而爭求的戰士們，同樣地成爲消沉，頹唐，失望的苦境。這樣，在五四以後受過五四洗禮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大多數已是失去了鬥爭的勇氣，失去了戰士的身分：這不管他們是否歷史運行的早熟，或另有其他客觀條件爲之決定，總之他們已不是領導革命的主力軍了。

北京在五四以後既沒有領導革命的主力軍，當然沒有革命運動的繼起；但是新文化運動的種子已落在上海而欣欣向榮了。在那裏已繼着五四的精神，創造一個新的局面，成功一個新的力量，他們經過了幾年艱難困頓刻苦磨鍊功夫，已具備領導革命運動的條件，現在要問就是何以這革命的主力移轉到上海？

上海本來是國際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中心，也是歐戰期間中國新興的民族產業的中心，在戰後第一時期，（註二）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遇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高潮，無暇向東進攻，於是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又得在這一時期中，繼續發展。在戰後的三年間，共有新創紡織業三十二處，麵粉業十九處，此外如絲廠烟草業等也有相當的發展，其事業的大部分乆多在上海與江蘇各地。產業的發展，遂使勞工階級跟着資產階級同樣地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發展。同時，日本在戰後第一時期中，因為受到危機比較的少，故仍得加緊向中國侵略，三年之中，他們在中國新創的工廠，單把紗廠而論，在上海的已有十二處之多，外資設立的工廠發展，自然也使中國在上海的勞工階級的數量和質量方面都增加起來。這種成千成萬的工人，都是從崩潰的農村裏逃亡出來，他們痛苦相同而且數千人甚至數萬人集合一處，當然易於團結，而其團結的力量，表現在鬥爭上比任何社會勢力更為堅決，更為勇敢。他們鬥爭的表現，主要的形式就是罷工，這是五四以後革命的主力所以落到上海的第一個條件。

其次，在戰後第二時期，國際帝國主義得到暫時的安定，又立卽恢復戰前侵略的形勢。因為各資本主義國家保護本國的產業起見，各自築着經濟的壁壘，於是競以剩餘商品，傾銷於殖民

地和半獨立國家世界獨一無二的遠東廣大的中國市場，遂成爲國際帝國主義剩餘商品的尾閭，中國農村的崩潰，遂至一瀉千里，無可挽救。而戰後新興的民族工業也以突遭重大威脅而不免破產，新興的資產階級爲保全自身產業計，不得不與外來的洋貨掙扎；但是幼稚的中國產業，那裏抵當得住猙獰的帝國主義資本，於是對於和帝國主義鬥爭的革命分子，從默許而漸至於同情，資產階級加入革命的陣線，反帝運動又得進一步的成熟。上海是中國新興產業的中心，又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總匯，中國資產階級反帝國的情緒，當然亦以上海爲焦點，這是五四以後革命主力所以落到上海的第二個條件。

復次，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領導五四運動的新青年派自從思想分野以後，陳仲甫已失去了權威，中國言論思想界又復中斷。久爲封建淫威壓迫的國民黨却在此時努力於中心思想的建設。孫中山自護法失敗後，正遇着新文化運動高潮的時期，同時，蘇俄革命的成功又與他以不少的刺激；因此他在這個時候，便決意離開他的革命工作，專從事於他的主義的建設與宣傳。在八年八月發行的建設月刊，便是他的機關雜誌。在這刊物中前後發表的有實業計劃（物質建設）與孫文學說（心理建設；）同時，黨中幹員如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都在這刊物上

發表很重要的著作，胡漢民更運用唯物史觀以研究倫理，爲當時不可多得的見地。同年，戴季陶又在上海發行星期評論，和邵力子主持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覺悟上登載着不少討論社會主義和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當時上海方面鼓吹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刊物，幾乎如光緒三十年時候鼓吹革命思想一樣熱鬧（註三）這便是中國國民黨新生命的胚胎，也是民十三重行改組而使國民黨進了新階段的先聲。

本來國民黨從興中會，同盟會到國民黨（未改組前）中華革命黨，在歷次的政綱中，不僅素來沒有反帝國主義的表示，而且反處處對於帝國主義表示「親善」表示「尊重國際信義，」而於無形中對於不平等條約總是擁護者，最少亦必是默契者。到了五四以後，他們把民族主義從新估定，從新解釋，隨着時代的轉變而轉變他們的主張。並且國民黨自興中會以來，他們一直在實際行動上奮鬬，不注意於主義的建設與宣傳，所以從事革命四十年的孫中山，他原是中國民族運動兩大柱石之一，康有爲失去了領導權威後，孫中山便爲中國民族運動的中流砥柱了；可是數十年來革命鬬爭的史實，儘管彪炳千古，而在言論思想界上從來沒有成爲一時代的權威。他在七年到八年因爲軍政府改組，被桂系軍閥和政學會所排擠，離粤居滬，當時北方各大

學的新文化運動正在風靡一時，南方反動氣焰也是勢不可當，而回顧黨內分子，除少數堅貞不拔患難相共的同志外，往往依違兩可，態度模糊的居多數。他才感到不去把主義重行建設和擴大宣傳，黨的分子不會健全，黨的組織不會嚴密；並且新文化運動因為領導者的思想分野後，中國的言論思想界百家爭鳴，異說並起，倘使國民心理不去改造，中心思想不去建設，即使國民黨的組織嚴密，黨員的分子健全，亦徒然使革命的時間愈加延長，人民的痛苦愈是加深，革命永無成功之日，中國亦永無強盛之時。於是他便在上海居留，一面著書，草成建國方略一書，以為中國今後心理建設和物質建設的準則。一面整理黨務，統一黨的名稱，（註四）在理論上經過這一次深入的並比較的研究以後，就立定了以後改組的基礎，和聯俄的政策，而國民黨的主義，也是在這個時期以後，才漸普及於全國羣衆。

國民黨既改變其革命的手段而從事於主義的建設和宣傳，同時，又在各種機關刊物上作介紹和研究社會主義的文字，他們不但把渙散的黨員意志集中起來，還把奔放的社會意識作識途老馬，這是五四以後革命主力所以落到上海的第三個條件。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繼五四而起的五卅運動，所以從北部中國的北京歸落到中部中國的

上海，是有其歷史的條件；而隨五卅之後的革命運動所以必然的歸落到南部中國，就須得把國民黨的改組經過大略一說，因為在五四以後，尤其是在五卅前後，國民黨已成了中國革命思想的權威，要明白當時的革命運動，必先明白領導這革命勢力的團體的轉變。

國民黨雖然始終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因為牠從來是集中力量於軍事暴動方面，對於主義的建設與宣傳，向不重視；就是在戊戌政變後民報與新民叢報的對立時代，亦以執筆者如章炳麟等的文字，不若梁啓超用輕快通俗，革命的主張，仍不能使大多數人所領會。這是在五四以前所以不能把革命意識普遍於民衆，形成一種廣大的革命鬥爭的所在。到了五四以後，由於為五四運動結成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是表現中國的社會思潮有要求一種新的國民的結合的傾向，更於戰後國際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與國內封建統治的荒淫無道，社會上各階級遂聞蘇俄的成功，而於革命情緒，越益緊張。這種傾向的精神，簡單的歸納起來，便祇希望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國民黨十三年的改組，便是應這種希望產生的。

國民黨改組的經過，可以分做三個階段；在民國八年確定黨的名稱，是第一個階段；十二年預備容共聯俄，始公開的向國民宣言，是第二個階段；到十三年實行容共聯俄而繼之以完成其

改組的使命，是第三個階段。

國民黨改組的第一階段，是國民黨的中興時代，也可說是改變革命策略的基礎時代。因爲國民黨自從民二被袁氏解散後，雖於次年仍在日本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祇是少數急進黨員的祕密活動，國內早爲社會人士所遺忘了。到國會恢復後，國會議員的黨員，不過借着黨團的作用，用別種名目在國會中活動，當時沒有健全的幹部，所以連黨的名稱都不能統一。（註五）在七八年間，孫中山才率幹部人員，留滬從事於革命理論的著述，而爲後來革命改變策略樹一基礎。不過在這第一階段中，中國國民黨的新生命雖然應時胚胎了；但與一般國民尚不曾發生若何關係，因爲祇有黨的理論的樹立，而沒有公開的進行黨務（註六）並且也不曾對國民發表甚麼宣言和具體的政綱。民九因得海外同志經濟上的援助，得在廣東稍稍活動，但也祇把黨章修改一下，仍不曾發表甚麼宣言和政綱。及民十一陳炯明叛變，孫氏蒙難，當時黨既未曾和民衆發生關係，故對於孫陳事件，每以私人爭奪政權目之。自孫中山蒙難到滬後，國民黨便要開始其第二階段的變化了。

經此事變以後，孫氏對於「在革命期需要一黨專政」的信念益堅，並且認定黨的組織，需

要嚴密，黨員宜絕對服從黨魁的指揮；所以他在革命方略中，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劃分；及見蘇俄的布爾塞維克黨用此方法以成功，孫氏的信念越加堅決了。當時中國的共產黨已經成立，且已加入第三國際，蘇俄因爲被白色帝國主義的壓迫，也很想向東方和中國結歡（註七）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孫氏蒙難抵滬時，蘇俄的代表越飛已於先一日抵北京，聞孫氏已在滬，卽派代表與之接洽，彼此意見甚允治，（註八）於是便有張繼介紹共黨黨員李大釗加入國民黨（註九）而改組國民黨一事，亦於孫氏與越飛接洽時確定。乃於九月四日召集在滬各省國民黨黨員，交換意見，一致贊同改組。十二年一月一日發表改組宣言，這便是國民黨十二年的改組。國民黨經過這次改組，便有下列二事可以注意：

第一，從中華革命黨改爲中國國民黨以後，此次才向全國國民公開的發表宣言，提出比較具體的政策。

第二，重新將三民主義爲明白廣義的解釋，尤於民族主義的解釋爲進步。民族主義在同盟會時代是極狹義的，以推翻滿清政府爲目的。清室顛覆後，以爲民族主義不適用了，並且恐在五族間惹起誤會，所以在同盟會改爲國民黨時，便把民族主義捨棄了。中華革命黨時代也不要民

族主義，因爲當時目的祇在推翻袁氏，所以專取民權民生的二民主義。由中華革命黨改爲中國國民黨時，正值歐戰告終，民族自决的聲浪，由西方播及東方，於是捨棄的民族主義，認爲尚有廣義的解釋，故仍恢復三民主義。但在十二年前尚未把主義明白解釋，至此，始在宣言中說：「吾黨之所持民族主義，消極的爲除去民族間之不平等，積極的爲團結國內各民族成一大中華民族，內以促全國民族之進化，外以謀世界民族之平等。」「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雖尚未喊出，而「力謀改正條約，恢復我國國際上自由平等地位」等意義，已成爲此次宣言中具體的政綱了。其他對於民權主義，已由「建設共和」擴充到「直接民權；」民生主義也由「平均地權」擴充到「節制資本了。」

這是國民黨的第二階段，國民黨到了這個階段，雖然當時還沒有得到多數國民的同情，可是國民黨自身已是生氣翊翊，便將轉入第三階段了。

從十二年的改組宣言發表後，又在一月二十六日孫氏與越飛發表一篇聯合宣言。不久，孫氏重回廣州組織大元帥政府，命廖仲愷和越飛同赴日本，居住熱海有一月之久，研究各種問題，聯俄工作，乃告成熟。更派蔣中正赴俄，考察赤衛軍的訓練組織，即爲日後設立黃埔軍官學校，創

造黨軍的基礎。及鮑羅廷到粵而十三年一月改組之方案始決定。（註十）改組宣言於十二年十一月發表至次年一月二十日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由孫氏以總理資格主席，其開會詞中有云：

「……我們十三年以來，在政治上得到種種經驗，發明了種種方法……此次召集各省同志來廣州開這個大會，就是把這些方法公諸大家來採納……至於這些方法的來源，是本黨把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在革命未成功之前，已成功之後，所得的種種革命方案，來參考比較，細心斟酌才定出來的。……此次國民黨改組，有兩件事；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要把國民黨再來組織成一個有力量有具體的政黨；第二件便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所以這次國民黨改組，第一件是改組國民黨的問題，第二件是改造國家的問題。……」

這一段報告不但是國民黨改組事件的重要文獻，就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中亦是不可忽視的。因爲這一篇報告詞，把中國數十年以來的民族革命運動的歷史截爲兩段，在這些報告的意思，是採用新的革命方法，從新造黨以建國，要把黨放在國上，從改造國民黨，再用黨的力量

去改造國。而且革命的策略，是從先進的革命國家和後進的革命國家，參考比較，重新估定，這是中國革命運動轉變的明顯表示。在大會期間蘇俄代表加拉罕來電致賀，大會表決覆電致謝；忽然接到李甯逝世的消息，即由大會表決去電致哀，並延會三日；至此，聯俄政策始公開表現了。在會議進行中，因為有「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的提案，以限止共黨黨員，即由李大釗聲辯謂：「第三國際共產黨員加入本黨，係服從本黨主義，遵守本黨黨章，參加國民革命，絕對非想將國民黨化為共產黨；其加入本黨，係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非以黨團作用加入本黨。」至此，容共政策已有明白解釋了。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以後，即中國國民黨改組工作的完竣而到了第三個階段的時候。

改組後的主義精神，可於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窺見。改組後的主要工作有二：一為向民眾作宣傳工作，以前雖然也有宣言發表，可是僅為領袖個人的文章，對於民眾從來不發生效力，黨與民眾也不發生關係；改組後始由各級黨部作大規模有系統的宣傳，以為喚起民眾，誘發民眾革命情緒，由廖仲愷計劃主持。另一即為創造黨軍，因為此次改組，要用黨的力量改造國家，則非先養成一班徹底了解主義而有革命精神的軍官不可；又以過去革命之所以失敗，在於

借重固有軍隊，以致革命成功，變成軍隊領袖成功，多一次革命，多產生幾個軍閥。改組以後，就命初從莫斯科回國的蔣中正籌備陸軍軍官學校（註十一）五月開學，即以蔣爲校長。

以上兩種工作，實爲改組後最主要的工作，這樣一來，不特國民黨立下了鞏固的基礎，就是民族革命運動亦得在短時間內深入民間，由民族思想而發生民族信仰，再由民族信仰而發生民族力量。（註十二）當時中國國民黨雖已成了中國革命思想的權威，而改組後在廣東奮鬥的第一年，眞是最艱難困苦的一年，因爲環境的險惡，在事實上不能表現如何大的成績。軍事上說，大元帥府不能出廣州一步，廣州以外四處都是敵人，軍權不統一，財政亦無辦法；又以黨中宣傳工作偏重農工，所以廣州城內的商民亦和革命政府不懷好意。就是黨內紛糾，爲了容共聯俄兩事，改組不到數月已有彈劾共產黨員的提案（註十三）因此種種關係，改組之初，國民黨在廣東的力量還很薄弱，其民族革命的情緒，反不若隨大戰後新興產業而來的新興工人階級，所以五卅革命高潮不發生於廣東而發生於上海。但是國民黨在廣東經過了一年多的奮鬥，終於把革命發源地的老家立下基礎了，軍事政治財政均得統一，黨內紛糾亦經調處，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之組織國民政府案，亦告成立。以黨建國的雛型既立，以黨員領導民衆的工作亦

可進行，於是十餘年來為軍閥官僚蹂躪宰割下的兩廣又一變而為領導全國革命運動的契機。

但是，國民黨雖已得到兩廣為根據地，還有一個大敵人，就是帝國主義的香港政府。該政府對廣東的革命政府向來不懷好感，加以英帝國與蘇俄成為赤白的勁敵，鮑羅廷赴粵以後，香港政府更寢食不安，他們便挑撥廣東商民援助陳炯明等一班軍閥，刻刻以推翻革命政府為務；對於國民黨的宣傳革命工作，百方抑止。當時香港幾成為各種反革命勢力的策源地，革命與反革命的主力既集中於廣東香港之間，勢必至於火併而激起革命高潮，這是五卅後全國各地革命運動漸處於沉寂，而廣東香港間革命運動作最後砥柱的原因；也是隨五卅後的革命運動，必須歸於南部中國的所在。

五四以後革命運動的所以自北而南，即以此故。至於領導革命的五四為學生，五卅後則為工人的理由，甚為簡單。我們已知道五四運動的領導者表面固為學生，而裏面實為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因為任何運動的發生，必須經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客觀上雖已具備了該問題存在的條件，而人類主觀上還沒有認識該問題的存在；要等到第二個時期到來，才由人類的主觀的意識認識了該問題的存在，而發生一種新的運動。五四運動的爆發，也自然不出這兩個範

國。日帝國的侵略與北洋軍閥官僚的壓制，使中國陷於半殖民的地位，這明明是具備了民族運動客觀的條件，但是實際上除少數民族觀念很深的急進分子以外，必不為一般人所認識。譬如五四運動以北京大學的學生最多，何以在做「老爺」時代的北大學生不去打西太后，不去打洪憲皇帝，亦不去打張大辮子，（註十四）而偏要等到蔡元培去整頓以後，在自動教育的主張中方可造就愛國的學生；又譬如五四動運前後，以北方的青年為最活躍，何以從戊戌政變而後，二十餘年中，帝國主義的不絕威脅，封建統治的庸弱無能，不知演出多少活劇，而必要遲至新青年出世以後，在打破傳統思想中才可造就覺悟的青年。這固然各有其客觀的歷史背景為依據，而五四時代的青年學生愛國高潮，必有少數智識分子為之牽線，為之推動無疑。

智識分子中的名流，青年界中的學生，他們都是中產階級中人，他們都沒有深切了解現時代社會的底流的人；他們祇有如拉德克所說的「改革的進行，為時非常短促，牠只能表現出這種改革是為當時所需要的罷了。因為眞正的民族革命運動，和他們自身利益相衝突的。」（註十五）所以，五四運動縱有偉大的歷史意義，而五四運動先鋒的青年學生們在自由主義的狂潮中，把全副精神多擺在為戀愛而犧牲，對於其他政治鬥爭反漠然不顧。五四運動領導的名士

們，把「好人政府」當做提倡德先生的目標，把「實驗主義」看成研究賽先生的極則，（註十六）對於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勢力運動，反以爲是「有失國際禮貌，」是「無理取鬧。」這樣，所以在五卅時代，民族運動的主力，自然地轉移到最富革命性的工人身上，中國的工人階級是隨着戰後產業勃興而一面又經國民黨新政策的宣傳和訓練，故在短時期內，便成爲中國革命運動的新勢力。他們是在五四時代始露頭角的，民八香港機器工人大罷工後，才成立了機器工會，不久便響影到廣州，影響到京奉鉄路的唐山，影響到京漢鐵路的長辛店；在上海的紗廠，海員，碼頭工人等，也實行反日大同盟罷工；到五卅以後，發展更爲迅速，勢力更爲偉大，援助五卅的粵港大罷工，二十萬人孤軍屹立，堅持至十五個月之久，尤爲全世界罷工事件中罕有之紀錄。他們在十一年舉行第一次勞動大會時，還不過是代表二十五萬工人，到十五年在廣州舉行第三次大會時，已代表有組織的工人一百二十六萬四千餘人。他們抬頭雖僅六七年，然而在中國民族革命歷史上，却已表現了不少的成績。

工人階級既然成了革命力量的中心，於是智識分子青年學生便退處於配角的地位，而中國民族運動又進了一個新的階級。倘若宣傳和訓練工人運動的人們，認清了中國的歷史和中

國的環境，把此出山之水，灌溉於大江南北，分流於華北各地，於是蒼幽的冷泉，一變而爲向陽的春水，則東方文藝復興之花，早已開遍於太平洋畔。不料此新興之革命主力，以其力量偉大，仍與中國歷史上農民階級一樣地被人利用去了。結果，不但民族革命的陣綫中已沒有他們的份兒；連本身的麵包問題，也沒有解決的希望。於是趕上歧途的民族運動，已至山窮水盡，而移轉不定的革命主力，重復羣龍無首了。

參考

(註一)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有云：「……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爲青年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

(註二)戰後世界資本主義的趨勢，可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資本主義危險的時期，在時間上是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第二個時期是安定時期，在一九二二——一九二八年；第三個時期是資本主義重復危險起來，即世界不景氣狂潮掀起的一九二九年以後。

(註三)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三章第二節。

(註四)民國二年國民黨被袁世凱解散後，次年孫氏在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因爲該黨是祕密的革命組織，各所留地立案的關係，有些支部仍用國民黨名義，二種名義在國內都沒有公開活動，到民八十月十日始由上海的本部，通告各分部，一律收用中國國民黨的名義。

(註五)民三國民黨在日本改組爲中華革命黨時，國民黨的名稱在海外各支部並用。民七改爲中國國民黨，一時各支部或用「中華」，或用「民國」，至八年十月，才告統一。

(註六)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謂：「此時北方爲徐世昌所盤據，南方亦爲陸榮廷所占有，故黨務不能在國內公開，進行者海外耳。以故八年十月十日所定之規約，幾全注意於海外，……」

(註七)據汪精衛的政治報告，孫氏在民七由粵來滬時，曾致電蘇俄慶祝他們的成功，鼓勵他們繼續奮鬥。其時各國皆讎視蘇俄，李寧得到孫氏的電報，因之大爲感動，視爲東方的光明來了，自此極力想與中國的民黨聯絡。蘇俄派到東方來的專使，有一個叫做馬林，汪氏說「馬林在民國十年曾到廣西，總理當時正在師次桂林，馬林去見他，總理當時曾打電到廣州給廖仲愷……說他從前聽得蘇俄實行共產很爲詫異，以爲俄國的經濟狀況共產的條件還未具備，從何實行，馬林來，才知道俄國之新經濟政策實與他的實業計劃差不多一樣，所以非常高興，這便是聯俄的起點了。……」

(註八)孫中山先生手札墨蹟中載有十一年八月三十日與蔣中正書云：「某事近已由其代表專人帶函，來問遠東大局問題及解決之法，予已一一答之。從此彼此已通問訊，凡事當易商量矣。彼有一軍事隨員同行，已請彼先派此員來滬，以備詳詢軍事情形，想不久可到也。望兄稍愈則當早來籌備一切。……」又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與蔣

氏靑云「……兄前有志於西圖，吾近日在滬已代兄行之矣，現已大得其要領。然其中情形之複雜，事件之麻煩，恐較之福州情形當過百十倍。（按時福州爲許崇智所下，蔣亦在福州）此無怪我國之志士乘興而往彼都者，悉皆敗興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從此可日爲接近。然根本之辦法，必在吾人稍有憑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無憑藉，則雖如吾國之靑年共產黨與彼主義完全相同矣，亦莫能爲。所以彼邦人士，祇有勸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職是故也。此可知先得憑藉不可。欲得憑藉，非恢復廣東不可……」一函中所謂情形複雜，事件麻煩，大約卽指容許共黨加入國民黨事，因當時蘇俄代表以此爲條件也。

（註　九）據汪精衛政治報告謂共黨黨員加入國民黨最早的爲李大釗。因李之加入，尙在孫氏蒙難留滬時也。

（註　十）關於十二年廖居熱海，蔣赴蘇俄情形，可參看十五年汪精衛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席上的政治報告。

（註十一）原稱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以黃埔舊海軍學校爲校址，因此後來通稱爲黃埔軍官學校。

（註十二）三民主義「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

（註十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中央監察委員張繼鄧澤如謝持等提過一次彈刻共產黨員的案，揭舉他們對於國民黨的陰謀。

（註十四）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有「……尤其是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從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嬗繼下來（初辦時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爲老爺，而監督及敎員都被稱爲中堂或大人）……」

（註十五）關於中產階級不能革命的理由，已有多人證明，陳公博在中國國民黨什麼一文中也舉出許多證據證明中產階級不能革命的理由。

（註十六）五四時提倡新文化的兩大怪物，一爲賽恩斯先生——科學，一爲德謨克拉西先生——民主。

第六編　轉形期中社會現象的逆轉

第十六章　瀕於絕境的社會經濟

在國人半意識中悶了下去　面對看一個最低的整個的破產　地日瘠而物亦不博　二十四國中以中國最貧　金銀幾於全部流出　國際收支不平衡　內地現金向都市奔流　沉淪在饑餓線下　加入世界經濟的範疇　煤鐵生產的落後　喧賓奪主的航業　世界鐵路最少的國家　貧乏的東方紐約城　獨行盈餘的銀行業　中外銀行業務的不同　上海銀行界獲利之由來　各地城市的落後　中國產業界的貧乏　農村所受的天災人禍　農村人口與農產物的減少

五四運動以及五四運動以後七八年繼續不斷的民族運動，臨了革命高潮開始激盪的時候，反在國人半意識中悶了下去。這證明了「要革命，單是下層不能照舊生活下去還不夠；必要下層不能生活下去，上層不能統治下去，才是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註一)因為中國封建殘

餘的統治勢力，做了帝國主義者十足的工具，他們還沒到不能統治下去的地步，所以民族革命運動是不會完成的。因為上層對於延長統治的條件越穩定，必然的下層不能生活下去的情況越惡劣；並且多數人又不會脫去「安分免災」的封建道德，於是遭遇到任何巨大的民族恥辱，也不能引起像五卅時代那樣盛大的民族鬥爭，而不能生活下去的情況更是惡劣。所以中國自從劃時期轉變以後，到現在已經陷入恐慌的深淵，大多數人在貧苦中生活與死亡。尤其是在資本主義的恐慌世界中，中國簡直是最受踐踏的泥淖，資本主義各國正賴軍事工業的發展，通貨膨脹的厲行，特別是對國內外大衆剝削率的加強，將創痛的恐慌作病態的好轉；而中國呢，牠正在完成列強「好轉」的意義底下，即列強資本的統治日益加強的意義底下，面對着一個最後的整個的破產。

這裏，本來想把中國的經濟結構和中國經濟恐慌的現狀，使讀者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和全面的認識，以找尋一條真正的出路；然而中國的貧乏和落後限制了我們，使我們得不到許多綜合的可信的材料，來滿足我們的慾望。但是不知道社會基礎的經濟現狀，一切都會落空；因此；我們雖然得不到相當的材料，可是對於中國社會經濟貧困的程度，還須得估計一下，可使大家

知道是窮，窮到如何程度？爲何這樣的窮，和還有生活下去的可能沒有？

中國是向稱爲地大物博的國家，可是這在閉關時代的一句封建傳統的話語，到了西力東漸，海禁大開以後，事實上地已日蹙物亦不博了。數十年來在帝國主義的重重壓迫與束縛之下，一方面用武力的侵略，掠奪我國的土地與賠款，一方面用經濟的侵略，輸入巨量的資本與商品，於是帝國主義者的勢力，遂如萬丈兇濤排山倒海而來，衝破了數千年專制古國，崩潰了因襲的封建社會，已無一塊主權完整的土地，亦無一種生產發達的產業，而在二十世紀世界上已是地小物少的國家了。

首先，誠恐還有當做中國是地大物博的國家，故把民國十四年代即民族運動最有力的一年，中國經濟和各國經濟比較一下：（註二）

國別	國富總數（元）	平均每人所得（元）
美國	七六二、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	六、六〇七
英國	二三六、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四七
俄國	一三四、二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六

法國	一〇三、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四九
日本	一〇二、三四二、九〇〇、〇〇〇	一、七三一
德國	七一、六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四一
英領印度	七〇、二一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三八
加拿大	五三、七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七二三
意大利	四四、七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一七
中國	三八、二八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一
波蘭	三四、一〇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五四
阿根庭	二六、四三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三九
巴西	二六、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八五三
比利士	二三、〇七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五三
瑞士	一八、七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〇五
荷蘭	一八、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六二〇

澳洲	一八、〇五六、〇〇〇、〇〇〇	三、一四〇
古巴	一六、〇四八、〇〇〇、〇〇〇	五、五五三
墨西哥	一五、八四七、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一三
祕魯	八、〇二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四六
芬蘭	七、二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二
智利	六、一四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六三七
新西蘭	四、〇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八七
拉都維亞	二、〇〇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五七

這個表指示出在上列二十四個國家中，國富的總數中國僅居第十位，而平均每人所得，則中國爲最少，這就是說，在上列二十四個國家中，以中國爲最窮乏，地大物博的觀念亦可不攻而自破。

中國國富既這樣貧困，國家經濟自無從建設。加之歷年國際收入，不敷支出，（註三）每年不敷之數，動輒數億，縱令此不敷之數，盡見於銀行之統計，則中國僅有之少許金銀，亦將於數年

以內，悉數流出國外。故國際收支，常此不變，再歷數年，中國是否尚可覓得少許不曾流出的金銀，已成一大疑問。按之過去已成的現象，竊恐無須再經十年，中國全國將並一枚銀輔幣亦無從覓得了。（註四）

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勢必引起內地資金之漸次集於大都市，資金一到大都市，即不啻爲輸出國外的準備；此可證之於年來國際收支的差額愈甚，內地現金奔流於大都市的愈多而可明白。然則內地僅有的資金，何以樂於羅掘而必須向大都市奔流呢？這和大都市的必須向國外輸出而無法稍阻者同其理由。因爲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由於歷年入超的有增無減，國際貿易出入不能相抵，大都市輸往內地的舶來品必多；反之，內地輸往大都市的國產品必少，於是內地不得不匯現金於大都市以抵償貨價的差額。內地現金向大都市奔流的現象，行之數年，則內地的現金涸竭立而可待，建築於內地的繁榮之大都市亦唯有終於枯槁而已。所以國際收支不平衡的現象，卽爲中國赤貧的徵兆。

中國國富的微小如彼，國民的赤貧又如此，故中國不但是世界上最貧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貧的人羣。孫中山說「中國人大家多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

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貧人都可說是大貧。」這是實話，中國除了一部分軍閥官僚和寄生於帝國主義之買辦階級可以得到生活上的享受外，其他大多數的人都是沉淪在飢餓線下。

在近百年中，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漸次形成了主要的支配勢力，卽附麗而生的買辦資本與民族資本，亦漸次由萌芽而略有發展了；反之，對於封建的自足自給的農村經濟，則日益破壞，解體，而趨於沒落，因此，中國經濟已由自足自給的農村經濟單純商品經濟，轉換爲帝國主義的附庸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而加入世界經濟的範疇。換言之，中國經濟因帝國主義的資本與商品的侵入，已成爲殖民地經濟。因爲已成了殖民地經濟的緣故，所以民族經濟是永遠不會發展的。現在從生產的本身，來把中國與各國作一個比較，藉以證明中國的貧困。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原料是煤和鋼鐵，資本主義國家莫不努力從事煤鐵生產的增加，所以煤鐵生產的指數，可以作爲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標準尺度。中國是「得天獨厚」的國家，煤與鐵的儲蓄都是很豐富的，中國煤的儲蓄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噸，佔世界產煤國第二位，鐵的儲蓄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佔世界第五位。可是礦源的中心是在黃土高地和在崇山峻嶺的高原，交通最不便利地方；其次是在沿海帝國主義勢力支配之下。（註五）故在生產方面，中國却異常落後，在五四以後第十三年（公元一九三〇年）的統計，世界各國產煤的數字，中國降在第十一位，不僅不及英，美，德，法各國，而且不及波蘭比利士，甚至不及印度。即在這極小的產量中，其最大部分還是外國在華煤礦的產業。（註六）

產煤的數量如此其少，然則鐵又如何呢？再以同年的世界重要各國鐵的產量調查表審視一下，與煤一樣的少得可憐，以世界第五位產鐵的國家，其每年的產量竟降至第十八位；鋼的產量，連許多小國也不如；而且與煤的情形一樣，在這小量的生產數目字中，大部分還是外國在華的鐵礦的產量。

如前所述，煤鐵的生產指數，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標準尺度，中國煤鉄生產如此落後，其資本主義生產的幼稚，也就不言可知了。現在還可以舉出別的統計數字，證明中國經濟的貧困。

誰都知道產業的發展，有賴於交通的發展，決沒有交通落後的國家，而有發達的產業。所以再把中國交通事業的統計數字，來證明中國經濟的貧困。先以航業說：也把五四以後第十三年

代的世界各國航業的統計，以人口佔世界第一的中國，而輪船的隻數竟降至第十八位，而且這二一一隻輪船中當然還有許多是航行於中國內河與沿海的外輪，所以純粹的中國船尚不到此數呢！（註七）

再以鉄道來說，在五四後第十二年世界各國鐵道的統計，中國是居於第十九位，若以面積及人口平均起來，那就少到駭人聽聞的百分比了；換句話講，世界上有鐵路的地方，已無一處再比中國少的國家了。就是汽車罷，照着那年的統計，中國是在世界上三十六個國家中，最少的一個國家，中國以外最少的是英領印度在每一萬人中有三輛汽車，較之一萬人中有一千九百三十八輛又四的美國，已經覺得懸殊得太可怕，可是中國在一萬人口中還不到半輛，眞個地大物博的國家交通事業這樣的落後，也已不能算是二十世紀的國家了。（註八）

其次再看中國的工業，中國自歐戰以後，確實已有一部分產業跟在帝國主義的尾巴而發展起來，然在實際上也是幼稚得可憐，現在我們姑且把全國產業中心的上海而論，上海是一向被人稱爲東方的紐約的，當然中國的新興產業也是一大部分集中在上海，只要認識上海，便可推想到全中國了。在實際上海僅僅是從鄉村裏跑來尋食的人們的居留地，是馬路上最熱鬧的

東方大都市牠還不是眞正資本集中與生產技術發達的場所。不過在中國已找不出第二個城市可與上海比擬，當然上海就稱爲東方的紐約城了。

人們總以爲上海是黃金砌成的，牠不知有多少的資產。但是按照五四後第十三年的工商部的調查，全上海的工業資本的總數，不過是二九三、二八三、四〇一元，這樣小的數目中還有一八九、八四六、七八一元的外國資本，那麼全上海的中國工業資本，僅有一〇三、四三五、六二〇元而已，這便是東方紐約的資產，也是中國工業中心的上海。如果再分開來考察，更可見中國產業的落後。上海最重要的工業是紡織業，烟草業，水電業，從這三種重要工業中，充分地表現出中國工業受外國工業壓迫的情形。在紡織業方面，中國資本僅僅三九、四七三、六五〇元，而外國資本竟至一〇二、三五〇、八〇〇元之鉅，比中國資本多至四倍！烟草業方面，中國資本是一七、三九〇、一一〇元，而外國資本却有二三、三五〇、〇〇〇元。水電業方面，中國資本是八、九三〇、〇〇〇元，而外國資本却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以上這三種上海最主要的工業中，中國資本總額只有六五、七九三、七六〇元，而外國資本總額則有一三五、七〇〇、八〇〇元。

在上述的許多別的工業中，還包含很多的小手工業，例如針織業的資本總額是一、三二五、六〇〇元，這是包括七十七個資本一、〇〇〇元以上的針織廠而言，平均每廠的資本僅有一八、三五〇元，除其中有三個廠的資本在十萬元以上，共計資本六〇〇、〇〇〇元，六個資本在三萬元以上，共計資本三一〇、〇〇〇元，以上這九個較大的廠資本總計九一〇、〇〇〇元外，其他六十八個針織工廠的資本僅有四一五、六〇〇元，平均每廠僅有資本六、一一一元，其微小如此。這些工廠大部——幾乎是百分之九五以上，是家庭手工工場。這些家庭手工工場愈是發廣，愈是表現資本主義機械工業之衰落而已。

再以所謂機器工業來說。機器工業是一切工業的基礎，其重要是不待解釋的。但上海機器工業資本的總額，僅有一、七六五、四五〇元。這一個數目，不及歐美各國一個大的機器工廠資本的十分之一，但在上海，這已經是一百一十六家機器工廠的資本的總額了。這個總數由一一六家平均，每家機器工廠的資本僅有一五、一七二元，這已經是可憐到了極點！何況其中資本在一萬元以上者僅三十一家，三萬元以上者僅十一家，而資本在一萬元以下者竟有七十四家。這些名爲機器工廠，實際是器具製造場而已。

這不過是舉其較爲重要的各種產業而言，其實各種產業都是陷於衰落的悲運。但是在這產業總衰落的中間，却有一種矛盾的現象，就是銀行業的崎形的發展。不但是外國銀行，就是中國資本的銀行，也是一年多是一年，而且是年年獲得很大的盈餘。

不過，中國銀行有異於普通資本主義國家的銀行，中國銀行的發展，不能作爲中國經濟發展或復興的說明。因爲中國的銀行界的最主要的業務，是投資於政治借款，而上海的銀行更以投資公債賣買爲唯一要務。外國銀行資本以投資工業，輔助工業資本的發展爲要務，中國的銀行資本却與工業資本隔離而以政治借款的投機賣買爲要務。這一個特質是決定於中國社會之特殊的經濟結構。

中國工業之落後是不待再說明的，可是商業高利貸資本在中國却已有長期的發展。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中國商品的侵入與原料的掠奪，發生了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在這樣經濟侵略的過程中，產生了買辦階級（洋貨進口與土貨出口的經紀人）買辦階級的本身不是新興的工業家，而是原來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領袖；他們利用原來在市場上的優越地位，做了帝國主義商品侵略的中間人。

交換關係的發展，引起金融機關擴大的需要，這是中國新式金融機關發生的第一個條件．也就是中國銀行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發生密切關聯的原因。

另一方面，由於財政的窮乏而引起借外債的需要；外債不足而輔之以內債，由於內外債的發行，在政府方面需要適應於借款便利的金融機關，而同時經手借款的官僚也企圖從中取利，於是官僚投資於銀行，就成了中國銀行資本發達的特殊條件。所以中國的銀行資本一方面帶有買辦階級的成份，而另一方面是官僚的成份。買辦階級與銀行資產階級，銀行資產階級與官僚，牠們相互之間的密切關聯是不待說了，官僚與買辦階級之間也有同樣的密切關聯，因爲官僚要借外債，固然在許多方面需要買辦階級爲經紀人，其在對內借款方面，買辦階級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他們藉銀行或公司的資力來投資於政治借款；所以買辦階級，銀行資產階級，官僚，他們是三位一體。

買辦階級的利益是與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相一致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愈發展，買辦階級的利益也愈大。國內工業的發展，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是不利的，所以買辦階級與國內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且是相反的。官僚的本身是封建地主豪紳政權的代表，他

們是在帝國主義的扶植之下，作封建軍閥的工具而爲其統治的助手，所以他們的利益也是與工業資產階級背道而馳的，以官僚買辦階級（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首領）爲構成分子的銀行資產階級，與工業資產階級利益之不一致，這就可以想見了。這是中國銀行資本之特殊性質的決定條件。

銀行資本既不用於工業投資，於是傾其全力爲政治借款的投機買賣。年來公債庫券等等的政治借款名目之多，凡數十種，額數之鉅，近十萬萬。銀行資產階級利用其經濟地位，操縱公債市場，其獲利之豐，可想而知。這是銀行資本——特別是上海的銀行資本之長足發展的第一個原因。因政府借款的投機買賣而所得的發達的結果，其無益於社會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是不待細說的；因爲政府借到了債款以後，並不是去興辦實業（縱使名目上有實業公債絲業公債等）並不是去發展交通，並不是去救濟農村，而是用於軍政各費——特別是軍費。所以公債之發行愈多，一方面固然可以使官僚買辦階級爲構成分子的銀行資產階級獲利愈豐，而另一方面却因此使社會經濟的破壞尤甚。

上海這些銀行之所以能獲鉅大利潤，大半是從事於政治借款的投資得來，姑以五四以後

第九年中（公元一九二八年）的中國交通兩家作例，中國銀行的資本總額僅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當時還有二八九、〇〇〇元的資本未收，可是在那一年除了買賣公債外，對政府借款却有一三五、三六九、八〇一元另五分之鉅。交通銀行資本總額是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其中亦有一、二八四、八五〇元的資本未收，而在那年直接投資於政府借款，却有六五，九七一，四八八元五角六分之鉅。除了直接的政治借款外，間接的投資於政治借款——公債買賣，爲數更鉅。（註九）

中國銀行界的無補於工商界，觀於他們的投資種類已可概見。即在小數的普通放款，又以利息之高大，往往反爲阻礙工業資本發展的桎梏。因爲中國銀行界放款利息之高，實爲世界各國所無，所以中國的銀行資本就是高利貸資本的變相。銀行資產階級以高利貸的搾取所獲得的高度的利潤，正是工商業界所流的血汗，所以這樣的利潤，無論增加到如何程度，不僅不能作爲測量經濟發展的尺度，而且正是工商業被高利貸搾取壓迫的說明，對於工業生產依然毫無意義。

東方的紐約這樣貧困，其他等而下之的都市，不問可知。在五四以後的十三年代全國二十

五個省城，九十五個通商口埠，共計這一百二十個都市中，僅有三處地方有自來水，並且有些地方連電燈都沒有，那裏談得到產業的發達。在五四後第十一年代（公元一九三〇年）根據南京工商部立法院的統計和其他各種材料的約計，全國工業生產品的總值，不足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註十）中國產業界的貧乏，倘以人口面積做比例，竟是任何人不敢相信的一種數目字。

但是祗看工商業方面，雖已足表現中國經濟情況的窮困，然尚未窺見牠惡化的深度。中國向來被稱爲以農立國的東方古國，停滯在農業經濟爲主的中國社會，農村經濟爲國民經濟的眞實基礎，如果農村經濟破產，將必使全國國民經濟陷於總破產的狀態中；同時建築於經濟基礎上面的政治文化等等，亦必趨於混亂、沒落、而致於不可避免的現象。同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也愈趨於貧困，飢饉，寒冷，流離，死亡的境地。「飢饉之年，天下必亂；豐收之年，四海承平。」這是農業國家的政治寫眞，所以中國目前的危機，是在農村經濟的基礎動搖，因爲農村經濟的基礎動搖，政治乃益腐敗，社會秩序乃益紊亂，文化教育乃益破產，種種壞的現象，層見疊出：經濟的情狀愈益貧困，危機的程度愈益深刻。

農村的破產，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日不在崩潰的進程中，不過到五四以後，尤其顯著罷了。致於破壞農村的主力，其唯一的原因，當然要推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不過按照人侮必由自侮的原則而論，那麽國內的封建殘餘，也是促成農村破產最大的幫兇。帝國主義之破壞中國農村經濟，已在上面幾章中提到好幾次，所以這裏單把國內幾種破壞農村的主要原因，略爲申述，藉以證明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眞相。

第一是人禍：所謂人禍，凡是軍閥，官僚，土豪，劣紳以及一切的封建殘餘的舊勢力都可包含在內，似乎不必這樣細說，現在祇把一種由內戰而所受到的兵災來說。自辛亥以來，內戰究有多少次？所受的損失總額共有多少，竟不能得到詳細的統計。不過這種損失，結果都轉嫁在農民身上，那是毫無疑義的。照王寅生等所著中國北部的兵差與農民一書中所記載的，可知農民因內戰而犧牲的程度，實在可驚了。僅把兵差一項而論，兼有力役實物貨幣三種，而力役和實物的兵差，更遠過於貨幣形式的兵差，這完全是一種落後的非近代性的賦稅。在民國十八十九兩年間，全國各省一千九百四十一縣中，徵派過兵差的有八百五十一縣之多，其數量亦屬可驚；如民國十六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間晉奉在雁門作戰，雁北各縣所負担的兵差，對地丁正稅的百分比

竟大上二百二十五倍以上，類此的記載在報紙與雜誌上見到的材料很多。但是此種記載和實際事實所表現的還不過千百萬分之一二而已，其他未見諸記載，或以內戰而連累的無形損失，還不知有多少。如以四川一省而論，自民國二年到二十一年的二十年中，發生的大小戰爭共有四百七十七次之多，單以軍費一項而論，每年平均耗去二萬三千五百萬元，此種巨大的消耗，和以戰爭而消耗的更不知有多少，此種直接間接當然都是從四川的農民身上搾取而來。五四以後，到民國十九年全國內戰發生的次數，竟是一年比一年的凶，區域一年比一年的大，尤其是民國十四年到十九年的六年間，平均每年有十四省區發生內戰，（註十一）在這廣大的內戰區域中，兵差所負數目，更不知要有多少，但是尚有甚於兵差者，例如：

「中國軍閥對於人民的剝削，一方面所謂合法地徵稅起捐，一方面任意地搶刼掠奪，兵差只是介乎此兩者之間而分量較輕的一種，牠所給與人民的負担已是如此。」（註十二）

農村經濟在這樣極度的摧殘，安得不日趨於沒落！

第二是天災：中國農村的災象，和人禍幾乎成了一種輪迴的狀態。近百年來，因爲政治腐敗，

毫無建設，北方苦旱，而溝渠不治，南方患水，而水利不興，以致天災流行，疫癘時作，在過去還是每隔數年或數十年遭遇一次的，到現在幾乎無地不成災，無時不成役。每次災患發生，其區域的廣大，受害人民的衆多，損失的巨大，開世界未有的紀錄。據賑務委員會所調查，陝西，甘肅，河南，山西，察哈爾，綏遠，湖南，安徽，山東，四川，熱河，貴州，江西，福建，江蘇，甯夏，河北，遼甯，浙江，黑龍江，廣東，廣西，雲南等二十五省，自十七年至二十年的四年中，各省所受水旱蝗疫雹霜風沙鼠猴虫火地震等災患，平均每年受災將及八百縣，占全國總縣百分之四一，二一，受災人口，總計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一萬三千一百十五人，占全國總人口四分之一；尙有多數縣，未接確報，即以此數而論，平均每年受災人口將達三千萬，而二十年的大水災尚不在其內。註十(三)並且人禍愈多，天災愈甚；反之，天災愈甚，人禍更愈多，天災人禍，相迫而至，農村經濟便淪於總崩潰的境地。

每一天災，必然引起二種不可避免的結果，即農村人口減少和農產物減少是也。農村人口的減少，雖以未有正確數字，不得減少的實在數目，然以災患之多，農村人口的死亡率必多於生產率，則可無疑。在五四那年農商部統計的農民戶數爲二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二十九戶，較之民三所發表的五千九百四十萬二千三百十五戶，相去遠甚；而況民八至民二十的十二年

中，各種災象，接踵而來。一個農業國家，農民逐年減少，眞是一件可怕的事。其次，爲農產物減少，農業收穫量減少，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天災人禍的相尋，實爲減少產量的主要原因。產量的減少，在此統計數目不甚可靠的時候，可從兩方面觀察，從農民收入的減少上看，而知佃農爲絕對入不敷出，自佃農平均亦多不足自給者，(註十四)再從歷年農產物的入超數目上看，則更可證明從出產的減少而至不能不仰給於國外。

所以現在中國的農村經濟，日趨沒落，其所殘餘者，僅僅一副空殼而已。從前中國雖沒有甚麼工業品供給世界各國的市場，但在農業的出產方面，還有巨量的輸出，國際市場上尙能勉強支持；可是近年以來，因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業原料品的輸出，一天減少一天，而外國輸入的食糧反一天多似一天，中國以農業爲經濟基礎，今則主要食糧，亦由外國輸入，而米的入超竟佔首位，此已足以證明中國農村經濟的根本破產。

以上所舉，不過是犖犖大者，然已可見中國工商業的不景氣，農村的總崩潰，國民經濟整個的衰落。

參考

（註 一）見李當左派幼稚病第一九一頁——一九二頁。

（註 二 表中數目字都是根據一九二五年的調查數字。

（註 三）此項統計以及歷年趨勢可參考近年來中交兩銀行營業報告國際收支項下的記載。

（註 四）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申報經濟專刊第一百二十期中柳塘四十六年來金銀進出口統計之結果中國金銀尚有幾何一文中有云「黃金在此四十六年中入超祇十二年，出超共有三十三年，出入超相抵之餘數出超乃有四億七千四百八十九萬三千二百二十七元之巨數，竊恐中國黃金即有所存，亦已無幾。……」又謂「白銀在此四十六年中出超占十七年，入超占二十八年，出入相抵，入超尚有十億四千一百八十二萬九千九百六十一元。如以四億四千萬人口分配之，則每人所得亦僅兩元。似此戔戔之數，雖中國舊有之存銀尚未計入在內，然爲數之無多，已灼然可見，柰無尙啓人覬覦之心，欲逼中國人竟無黃金白銀之可有……」

註 五）翁文灝於一九三二年估計的各區藏煤數量；

（註 六）石風濤帝國主義控制下的中國煤礦業中有「佔中國煤產量首位的東北四省的煤業，已經整個地成爲日本軍需工業的資源了。河北省是中國第二位的產煤區，可是一九三一年河北產煤七百萬噸，當中外資所產共達六百零八萬噸，單是開灤一家已達五百三十五萬噸；一九三二年在六百六十一萬噸中外資所產共達六百十萬噸，中國雖有正豐，柳江，臨城，怡立，中和等公司，然而在產量上僅是外資所產的一個尾巴。可是所謂華資公司

也不是純粹的華資。……」其他如河南山東各煤礦，均在日帝國資本之下，規模較大的晉煤以鐵路運費的昂貴，也不能與外資出產競爭，就成爲外資獨佔與傾銷的局面。

(註　七)據海關報告民國十九年外國商船進出中國口岸噸數百分比占百分之八十一又二十三。由中國各口岸往來外洋的航線差不多全在外輪掌握之中，據廿三年申報年鑑統計，廿一年份中國輪僅占百分之九又七。又中國沿海和內河航線，外商也佔絕對優勢，廿一年份中國也僅占百分之三十二又五。

(註　八)各種交通中只有公路一項，據全國道路協會的報告，現在公路已較十五年前多四五十倍，且尚有不少正在興築的。不但平均起來還要每一百八十五平方公里有公路一里，較之美國一又十分之六平方公里有公路一里者相去尚遠。並且中國近年的興築公路，多爲了軍事的需求，對農村，以運費太高，無甚利益。

(註　九)銀行投資於間接的政治借款，即公債買賣，至今仍然如此，往往大小銀行的資產大部分都在有價證券的投資，所謂有價證券本包含公債，庫券，股票，提單等等而言，但據熟悉上海金融界情形者云：上海各銀行所謂有價證券，什九爲公債庫券，至各銀行對於此方面之投資，可在各銀行每年報告之借貸對照表中可見一斑。

(註　十)新創造第一卷第六號朱其華再論中國經濟第一表。

(註十一)中國經濟第一卷第一期鄧飛黃中國經濟的衰落程度及其前途中歷年發生戰爭的省份數目統計表中。

(註十二)王寅生中國北部的兵差與農民第十九頁。

(註十三)民國二十三年的災區，尤爲空前，據政府調查災區地域已過全國三分之二以上，受旱災影響有十四省三百四十三縣，受水災影響有十三省，此外還有八省六十八縣受蝗患，十二省八十九縣受雹霜災；總計損失在十萬萬

元以上。關於災區調查的數字，除各慈善團體外，尚有金陵大學農學院的調查報告及中國銀行的受災田畝調查等，均爲比較正確的數字。此外主計處的統計月報及東亞同文的中國年鑑，亦有不少資料。

（註十四）上海社會局的調查如第二次勞動年鑑第一六八頁。

第十七章　瀕於絕境的社會經濟(續前)

國民經濟之無能　一幅近百年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縮影　兩種可憐蟲鬧翻了中國經濟上予了世紀末的效果　從財政收支中觀察貧困程度的深刻　附加稅超過正稅二三十倍　整個的社會經濟不健全的眞相　關於收支上的病態　借債還債的虧折　市價算結的厚利公債　充滿着更深刻的危險的種子　借債過活的各省財政　朝中多官在野多兵的社會　多官之害甚於多兵　實際歲收並不減少　世界最高之田賦　預徵四十年田賦與百種以上的雜稅　利用窮困極敲剝貪汚的能事　當兵做官爲兩大職業　窮的循環性

「命運用了無限長的鎖鏈，把全部人類聯繫着。一髮牽動了全局；一粒火星的觸發，燃燒了整個的世界。」(註一)

中國社會經濟情狀的惡劣，無疑的對內是牽動了各階級，對外是隨着世界經濟恐慌而蒙着不可避免的打擊。這種衰敗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現象，幾乎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出：不論是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壟斷，或是封建勢力的殘餘統治，擺在眼前的許多困難和障礙中，骨子裏都是

從國民經濟無力的一個條件構成的。下面一節文字，便是證明國民經濟的無力，所以惹出帝國主義和軍閥壓迫蹂躪的事情：

「例如戊戌到庚子的大反動，滿清權貴所利用的是若干萬的拳民，拳民就是生活無靠的失業者；爲什麼有這些生活無靠的失業者呢？就是中國資本窮乏，生產事業不發達的原故。又如，維新運動再起後列強向中國的投資熱日甚，中國的利權收回熱也與之俱甚，但是由美國的合興公司贖回的粵漢鉄道除了廣東一段，到底沒有力量自己修築起來；遷延到辛亥年，才有盛宣懷假鐵道國有的政策，向四國舉行鐵道借款，引起武昌革命軍的爆發；但是革命後，四國的鐵道借款停頓了，川漢路和粵漢路的一大段，至今還是沒有修築，這又不是中國資本窮乏之最顯明的證據嗎？然則我們對於滿清政府無能的一層，還要加上一個社會的無能；所謂社會無能，第一就是經濟的窮乏，沒有生產的資本，所以帝國主義乘虛而入。後半期的軍閥所以能夠肆虐，也是因爲社會的無能。袁世凱的摧毀國民黨，固然是得五國團大借款之力，但是那一次的借款，民黨並不是根本的反對，（僅反對其手續違法）並且民黨中的不肖分子，還有希望分肥的；當五國團要求種種的權利時，黃興倡導所謂國民

捐以謀抵制，但是國民捐三字，雖然喊得震天動地，終不曾捐得一個大錢；後來每遇對外的危急問題，輒有所謂愛國公債的提倡，但是成效也是「茫如捕風」：這又不是中國社會的無能，資本窮乏的證據嗎？還有一層：軍閥肆虐的工具，第一就是傭兵；傭兵就是生活無靠的失業者；唯有資本窮，生產事業不發達的社會，才有這些失業的可憐虫，肯替軍閥做工具，——不惟肯，並且求之不得，一經收到槍枝，非到死不放手；在生產事業發達的社會，服兵役是一種義務的負担；惟有生產事業不發達的社會，才有求生不得的可憐虫，以當兵爲一種權利，才產生「有槍階級」的軍閥。軍閥肆虐的工具，除了傭兵以外，還有一班穿長衫的大小官僚，大小政客；官僚政客，有時也利用軍閥作工具，但是大多數的官僚政客，還是自己作軍閥的工具。這一類的工具，比傭兵的生活要求，當然要高一點，但一樣的是生活上沒有去路的可憐虫。（註二）

這是一幅中國近百年來社會經濟生活絕好的縮影：爲了把當兵做職業的可憐虫愈多，不但是農村人口耕地面積和農產出品日益減少，就是帝國主義的暗算和軍閥的摧毀，也必因之而變本加厲；爲了穿長衫的不從智識技能上圖發展，不但是中國政治建設和經濟建設無從說

起，就是舊有的局面和苟且偏安的生存，也被這些「無風生浪」而且一樣的生活上沒有出路的可憐虫粉碎。

從上述一幅近百年來社會經濟生活的縮影中看來，就可知道中國的貧困，政府和人民是一樣的無能。自民國二十年擊起了中國經濟的喪鐘九一八的東北事變，除在政治上撥動了中國民族的反帝情感外，在經濟上却予了世紀末樣的效果。現在我們再從中國國家的財政收支中觀察牠的貧困程度的深刻。中國向來是有財無政的國家，即有若干年度發表着近似決算的財政報告，但在目前的軍閥割據局面未曾打破，直隸於中央而由中央支配的省區很少，又以稅制的紊亂與徵稅手續的繁重，往往人民的負擔愈重，而國家的收入反愈減少。地方徵收的附加稅常有反較正稅超過二三十倍的；（註三）而徵稅官的貪污剝削，更爲必然的事實。故僅由國家財政報告書中來觀察國家收支的眞實狀態與國民的負担，無疑的會得到錯誤的結論。例如軍費的支出在財政報告書中所列的，往往僅爲中央直接支付的數目，若將各省區的軍費支出合計起來，恐至少亦當在二三倍以上。又如財政當局，雖自詡自民國二十年起未發分文公債，而各省市公債之發行，却仍有增無減，此種債券的最終的負擔者仍爲吾儕民衆；諸如此種事實，都

可以說明財政報告書的不足以充分代表中國財政的好況或惡況。但是，即在這不完全的國家財政報告書中，已經很可足供中央財政健全與否的指南；更由中央財政的各種病態中，可以證明中國整個的社會經濟不健全的眞相。

現在姑把五四以後第十一十二兩年即財政部向三中全會提出的十九二十兩年度的財政報告書加以觀察，就有下列各點表現着十足的病態：

第一，關於收入上的病態，即間接稅遠過於直接稅，證明國家租稅負擔的不公平，亦即證明國民經濟的不曾有什麼進步。在十九年度的總收中，間接稅的關稅收入占百分之四十三以上，鹽稅收入占百分之二十一；二十年度的總收中，關稅占百分之五十四，鹽稅占百分之二十一以上，其餘稅收，亦多屬於間接稅方面，總計間接稅占去總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而普通國家視爲重要稅收的所得稅等，在中國財政上反而沒有，這固然可以說明中國民族工業的不發達，同時亦可說明帝國主義經濟和封建勢力雙重剝削的嚴重。

第二，關於支出上的病態，即支出的增加，卻非由於社會事業與國家機能的發達，而純因不生產的軍費和債費負担的增進，這在國民經濟上有百弊而無一利的。在北京政府時代不足論，

卽在國民政府最初的四年間（十六年到十九年）每年財政部的報告書，則知十六年的軍費支出達一萬三千餘萬元，十七年增至二萬萬元以上，十八年增至二萬四千五百萬元，十九年竟支出三萬一千餘萬元。本來國家財政的支出，要以直接或間接幫助人民的生產，繁榮國民經濟的發達爲原則，現在中國財政支出的增加，反適足以促中國經濟於破產的內戰軍費。軍費以外，尙有一項可驚的數目，乃爲償還債務。中國在北京政府時代的賠款與外債的數目，已可驚人，但自十六年起之五年間，國民政府又發行十萬萬六百萬元的內債，當然，內債發行的數量愈多，政府的負債亦愈重。故自十七年度起國家財政的支出中，每年由一萬二千萬元而增至二萬四千萬元以上。軍費債費既占支出總額百分之八十以上，於是關於國家建設的政務費，遂反成逆態的減少：此種財政上畸形的增加與減少，均足以反映中國財政病態的發展。

第三，借債還債的病態，國民政府於最初五年間發行至十萬萬六百萬元的內債，較之北京政府在十五年中發行六萬一千八百萬元者，驟視之一若國家財政必有起色。不知發行票面雖達十萬萬餘元，實際所收不過五六萬萬元而已，因爲自十六年五月至二十一年一月間所發行的公債及庫券二十五種，總計票面十萬萬六百萬元，而據自十六年至二十年的財政報告書中

所列，共計實收不過五萬三千八百七十萬元零。（註四）這是因爲發行債劵，類多中央財政窘迫之時，除少數帶有強迫性的勸募外，大都先以債劵向銀行抵押待至債劵在市場售出後，再以市價結算，所以發行價格雖有九八或十足的規定，而事實上政府所得不過發行額的五六成，還清時則又須按照票面値（Face Value）十足償付，這樣剜肉補瘡的辦法，財政安得不趨於破產；在政府祇求有債可借，不怕飲酖止渴，在銀行界以公債利息優厚，何樂不爲！結果將使銀行界以巨額的資金束縛於不生產的債劵上，同時政府的財政基礎建築於上海的金融資本上；中國的財政勢力既這樣地與金融資本相結合，而中國的金融資本又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附庸，（註五）這樣，政治安能上軌道，國家安得而不窮！

上述的三種病態，在民國二十年以後，依然是持續的狀態，祇要看後來國府主計處發表之二十一年度國家總概算來觀察，收支不敷仍巨，卽收入總數六萬二千萬元中若以各機關原列之數字，則軍費一項已超過收入的總數，雖經主計處核減，仍占總數百分之四十七以上。次之爲債務費爲百分之二十五，至於教育文化費則僅占百分之二，建設實業以及司法各費合之不到百分之一，所以在那概算書上也說「衡以國家經費分配的原則，財政的原則經濟的原則及社

會的原則，均多未能相合。」這眞難乎其爲巧婦了。

中國財政從上述三種病態中，不但可以證明其貧困，畸形，而且己充滿着更深刻的危險的種子。不但中央如此，就地方財政而言，各省財政幾乎全部在借債和要求中央或鄰省的津貼。富饒如浙江江蘇兩省，在二十二年度不敷已有三百多萬元。其他如湖北省竟達七百二十萬元，河北省亦達四百萬元。在此中央和地方財政的危機日趨尖銳的原因，自有其國內經濟和政治以及國際條件，在整個經濟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這千瘡百孔的財政，總難獲有完全合理的解決。於是中國社會經濟病態的發展，也便愈見深刻而瀕於絕境了。

並且，在這農村破產工商業不振的情況之下，社會失業的可憐虫與穿長衫的一樣是生活上沒有出路的可憐虫，一定有增無減，前者最後一條出路是當兵，後者最後一條出路是做官，於是朝中多官，在野多兵，兵愈多而軍閥的肆虐愈甚，國家統一愈難；官愈多而政潮的起伏無常，政治愈不能上正軌。中國多兵，究有若干，無人知其確數，一般估計，當在二三百萬人以上。中央設備較全，兵數尚不可知（註六）半獨立之省，長官多所疑忌，恃兵自固，其據一區者，就地籌餉，更廣招新兵，故事實上一師有數萬人者。中國官吏之多，至今而極，不但世界各國所鮮見，即在本國史中

任何時代所不及。中央無論矣，地方政府組織亦極復雜，省府無論矣，即縣府官署亦多冗員，在行政系統的官署中，倘不敷安插這大批冗員，於是巧立名目，任意設置駢枝機關，及至名目無可設立，位置無可安插，伴唱裁員節政，暗爲調濟新進，而有「輪流過癮」的話柄。（註七）美國當十九世紀時，凡人民上申請書於總統，得其簽字，即許墾種，一八一六年總統梅迪生（Madison）因公務繁冗，領地書積至二千，咨請國會添一書記，尚有議論其不可者。美國政治，已較他國浪費，然其在總統府中多雇書記一名，尙須據理而爭其不可，以視今日中國機關與官吏的任意設立，眞是相去天壤。

國人僅知多兵的害處，不知多官的害，不在多兵之下；以其不爲人所注意也，故其爲害之烈，往往有甚於多兵者。軍隊餉糈之巨，固爲政府最大的出支，然官吏俸給亦占行政費中的大半。夫於窮苦之榨取供養冗員，已屬不合，而現在國家俸給之外，倘有直接向民間榨取者，其爲害之烈，有甚於軍隊的當地籌餉。

政府患窮，固爲事實，按之上述的歷年財政報告，確有入不敷出的懸殊。然實際歲收，亦已增進不少，即以關稅而論，二十年度增至二萬七千萬元，以視清光緒季年，幾有十倍；鹽課自抵押外

債，稽核嚴密後，歲收亦旺。即各省地方收入，亦已增進不少，如廣東一年可收一萬萬元，則已超過光緒中葉全國的稅收。中央與地方的歲收，增加若是其速，而財政反處於絕境；論者謂由於裁釐加稅，其實裁釐而後，舉辦營業稅已補釐金而有餘，而田賦方面，其負擔之重，亦爲世界各國所罕見。（註八）又以地方軍閥應付內戰的關係，往往年徵數次，四川各縣的田賦，有預徵至四十年以上者。自民國十六年來，苛捐雜稅相繼頻仍，據民國十九年立法院統計處的調查，田賦種類最多的江蘇江浦縣有三十種，其中二十六種都是附加稅；（註九）雜稅種類最多的察哈爾有一百餘種，福建有八十餘種，（註十）在此惡政榨取之下，焉得不窮且死！人民的負擔，已吸至最後的一滴，而其用途，不過供軍隊的餉糈和官吏的俸給而已，故政府患窮，人民亦患窮，而割據軍閥的橫徵暴斂，貪官汚吏的層層剝削，正利用上下窮困的局面而極其敲剝貪汚的能事。

在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及十一月二十八日新聞報載有浙江省政府財政廳第二十二及第三十二號布告中，說明該省歷年各縣縣長侵吞公款的數目，有賬可查的達一百五十萬元以上。在二十一年三月間，河南民報上曾登有各縣縣長及財務局長欠款不清的消息，有在任半年侵吞十萬元的，其他侵吞四五萬的不知多少，亦有前任未曾算清，後任又已吞沒巨款潛逃者。

其他散見於各報者，如地丁征收銀額每年不到一萬四千元的河北阜城縣，竟爲唐某侵呑達十五萬元之多。又如安徽皖北鹽斤附捐征收局局長任職三月，收款十八萬有餘，始終未解分文，其他各縣縣長局長科長經人發覺侵呑數千元至數萬元者二十七人。更有趙良貴其人者，在民國十七年時，曾任綏省薩縣縣長，因呑款敗露，被民衆綑縛，身插「我是貪官趙良貴」的白旗，遊街數十小時，沿街按照旗上文字自叫，笑柄所傳，轟動晉綏兩省，不到幾時又在山西夏縣任內，以侵呑公款二萬餘元，被拘入獄。其他如湖北在整飭吏治的時候，發覺過去各縣縣長幾於什九未經辦理移交，可惜手頭沒有此種報紙，惟憶堤工經費保管委員會會計以侵呑堤款八十餘萬而槍決。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大公報上亦有在漢緝拿貪污，被拘者已有二十餘人的新聞。諸如此類，書不勝書，且可明說其貪污的亦不過是縣長局長之類，所呑亦不過數萬數十萬之數，其他家無擔石之徒，一登仕籍，頃刻擁貲鉅萬，僅拿官俸何以至此，其爲吮蝕農民的血汗，和彼潛逃，入獄，槍決，被稱爲貪污的蓋尤甚焉，這無怪身爲官吏的石瑛亦大罵其「貪官污吏遍中國」的了。

原來兵和官的來源，也是爲了中國經濟情狀的惡劣所產生出來，現在爲了多兵和多官而

使中國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組織陷於極端的紊亂與動搖，而益使農村和智識分子中一批批的爲生活驅使的可憐虫，一齊奔赴於當兵和做官的一途。於是兵益增而官益衆，紊亂動搖的局面亦日益嚴重；終於當兵做官成爲中國兩大職業，人民在這水深火熱之中，只要有一線求生的道路，無論名譽，廉恥，干法，犯罪等等，皆所不惜。所以中國革命的不成功，五四運動精神的喪失，以及帝國主義的壓迫，封建殘餘的剝削，都是爲了一個窮字；因爲資本窮乏，生產落後，才有兩種爲着生活沒有出路的可憐虫，因爲可憐虫對於當兵做官當爲職業，才使資本越益窮乏，生產越益落後；到後來成爲一種循環性，就是可憐虫越多，兵和官的敲詐貪污就越甚，資本生產力就越減退，失業的可憐虫越增加。

在這樣的循環性中，不但社會經濟就可到了最後一步的惡化，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現象，又是怎樣呢？

參考

（註一）胡愈之現代的危機中語。

（註二）節自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第二章。

（註三）如江蘇江都縣之忙銀，每兩帶徵，（一）省稅一元二角八分，（二）省教育稅四角七分，（三）地方稅三角，（四）平教費一角四分三厘五毫；（五）清鄉費三角，（六）新舊兩案畝捐九角六分八厘，（七）教育嬰費九分，（八）自治費三角，（九）普教畝捐一元九角三分六厘，（十）縣道畝捐二元四角二分，（十一）警察畝捐一元三角，（十二）改良農業捐四角八分四厘，「十三」抵補教育不敷費四角一分一厘四毫，「十四」積穀錢三分五厘，共計銀元十元九角六分五厘。此外復蓋紅戳三道，其一徵收一元三角，一應徵二元四角二分，一應徵九角六分八厘，是忙銀一兩，實徵銀元十五元二角九厘內二角九厘爲罰金， 爲原額每兩合一元五角之十倍。

（註四）東方雜誌第三十卷第一期千家駒國民政府與內國公債，又第四卷最近兩年的中國財政；又千家駒公債與金融一書中，可以參考。

（註五）中國的金融資本是典型的半殖民地的金融資本，牠並不由於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所誘致，是大部份爲買辦資本官僚資本所轉變的。

（註六）陳恭祿中國近代史下卷第八一一頁，又生活書店出版之一九三五年世界政治經濟地圖。

（註七）官場中所謂過癮的話頭，就是指候補已久，設法補缺，經過相當時候，再換另一候補者補缺，稱爲過癮，意指已經過做官之癮，可以讓位他人的用意，此乃親聞諸老於官場中人所說。

（註八）德人范格諾（W. wagner）在民國十四年統計山東各縣田稅每畝合洋一元零七分，已比一八六六年普魯士農民所納田稅多十五倍，美國一九二 年至一九二二年每英畝的田稅爲美金七角九分，合中國每畝洋二角四分。又二十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日報左津中國田賦問題中亦說日本土地稅平均每畝五角六分可見

日美兩國的田稅，都小於中國幾倍。

（註九）見統計月刊第三卷第一號至第三號。

（註十）見中國經濟第一卷第一號馬乘風最近中國農村經濟諸實相之暴露中有察哈爾最貧瘠之舊口北道屬十縣三縣之地人口不滿二百萬，而地方稅收至二百九十餘萬。又福建苛捐雜稅竟有八十餘種，在陳國輝蹂躪下之仙遊一縣一年征至雜稅逾三百五十餘萬之距，平時土著軍隊之勒索詐取，尚不在其內。

第十八章　國民經濟廢墟上的社會文化

社會變遷可以說明思想的蛻變　反映出雜燴式之社會文化　德先生誘發文學革命　賽先生唱着實驗主義　中體西用的理論粉碎了　實驗主義在學術上的貢獻　崇信科學方法的分家　東方文化復活的呼聲　轉形期的四種主潮　封建殘餘最後掙扎的直覺主義　代表資本主義展開的實驗主義　代表社會主義抬頭的辯證法唯物論　另求出路的東方文化論　新舊思想衝突的各種論戰　五四以來文化思想的變革　文體論戰　人生觀的論戰　文學的論戰　社會史的論戰　中國經濟發展的爭訟　東西文化的論戰和政治的討論　一切逃不了模倣的階段　最初運動的中心　優秀分子趨上兩條歧途　拉拉隊的阿世派　隔離社會象徵的清談者　思想行動無不與實際矛盾的頹廢者　新文化運動的種子沒有了　誰是眞明天子誰來收拾江山

中國社會文化的混沌貧弱和枯竭，已成了一種顯著的現象；尤其在思想界方面；正和今日中國經濟之不斷糜爛，和民族頹喪同其程度。現在有人甚至倒退到五四時代以前，倒退到戊戌維新以前，他們不顧歷史進化的邏輯，意欲恢復中國數千年來之「木乃伊，」意欲抬出固有的

傳統思想。

我們知道一種思想的抬頭，都有其社會的基礎，馬克思說：「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人類的存在，而是人類的存在決定人類的意識。」（註一）所以社會的變遷，可以說明思想的蛻變，同時，思想亦反映出社會組織的眞相。因爲社會的經濟構造，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之現實基礎，而文化思想，祇是上層的表現。基礎沒有變動，新的文化是不會發生的，若是新的文化發生，必是社會組織變動的反映。中國自鴉片戰爭後，社會基礎被外來的資本主義破壞，樹立在上面的政治學術生活等等的上層建築，都隨着社會基礎的變遷而轉移。所以近百年來中國文化思想的蛻變，完全是基於現代中國社會經濟大轉變的動向。

中國社會基礎的經濟結構，直到五四運動時代，還停滯在前期資本主義的一階段；並且爲了承繼滿淸封建統治的北京政府，與帝國主義者進一步的勾結，所以中國便陷於殖民地經濟的深淵。在這殖民地經濟的中國社會上，產生兩種矛盾現象：一方面不斷地稗販着資本主義文化，而另一方面又不斷地從事於封建思想的復活，其爲破碎，籠統，膚淺，錯誤則一，十餘年來，往復輪迴，不能自開生面，眞如任公所謂：「如羣猴得一果，跳躑以相攫；如羣嫗得一錢，詬詈以相奪，」

（註二）其形式上雖屢經變化，但在精神上從沒有根本的改變。卽有少數思想前進的智識分子，欲破壁以自拔於此黑闇的境地，又以不認識中國歷史與現實環境，妄試奮鬥，趕上歧途，終於意識拘不過事實，一齊溶化於大洪爐中。於是在這雜燴式的社會基礎之上，反映出雜燴式之社會文化。

在五四運動的初期，要算稗販西洋文化最熱烈的一個時期，並且也是攻擊舊文化最熱烈的一個時期。當時運動的中心，是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的兩大怪物，便是傳誦一時的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兩位貴客。德先生的精神，是注重個人的自由發展，要人人有發展的機會，當然先要有教育上的平等；但在教育上要使人人有機會求學，決非專尙深奧彫琢的古文古學之社會中所能實現的。因之，他們第一步就起來改革文學，使文學通俗化，使文學民衆化，而激成文學革命運動。至於賽先生的使命，也不是祇限於機器的一方面，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方法，比其他一切科學的結果更爲有價值；所以介紹科學的方法，是新文化運動者的責任。運用科學方法最周密的有實驗主義，因之實驗主義便在這個狂潮中引進中國。

賽先生和德先生成了五四運動中的主角，牠們倆引着中國新文化運動進一階段，牠們倆

把張之洞時代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粉碎了：這是劃時期轉變的中心運動，也是轉形期中的主要工作。

實驗主義初期引進的時候，因爲富有朝氣，所以對於中國文化界起了極大的變動，尤其是學術思想受影響最深。學者把牠的方法來研究學問，最有貢獻的是疑古派的一班人；疑古派在學術史上是上接於今文學派，再益以實驗主義的治學方法，在學術界上便有不少的收穫。

在這轉形期運動的全盛時候，便有國故整理的興起。這在文化運動方面是一種重要的事業，並且是不可越過的一種步驟。因爲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對舊文化有所認識；要打倒舊文化，更應明白舊文化爲甚麼要打倒。所以新文化運動者，就不惜用他們新的方法從故紙堆中去研究。不過這是少數人的責任，倘使叫普通人去讀古書，習古學，那是復古而非國故的整理了。

賽先生的科學方法，並不限於實驗主義，辯證法的唯物論，也是有關於科學方法的。所以新文化運動者在賽先生旗幟之下：便分裂爲二一派是忠於實驗主義者，另一派是傾向於辯證法的唯物論，牠們以主張的不同，開始其激烈的爭辯。

世界已是整個的世界，中國社會一切的轉移，也祇是受世界巨潮的動向所激盪而况這一

次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力是由西洋留學生發難的，（註三）因之，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推移，也不過是跟着世界學術思想的蛻變而振轉。自歐戰以後，西洋文化發覺破綻，科學的人生觀態度已漸漸被人懷疑，西洋思想界已漸從個人本位主義轉到社會本位主義，所以中國在五四以後，就有一部分人對科學表示懷疑，立刻引起新文化運動者的反響，於是又有所謂東方文化復活的呼聲。

這便是五四前後中國轉形期運動學術思想的主潮。把牠全部蛻變歷程概括起來，可以分爲四大階段：一爲直覺主義的階段，二爲實驗主義的階段，三爲唯物的辯證法的階段，四爲東方文化的階段。這四個主潮的彼與此替，就代表了這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也就可表現出五四運動在文化思想上衝突的現象：這四種主潮在這十餘年中始終是有力量的思潮。

當然，這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完全是社會變遷的推移，直覺主義代表了封建殘餘的最後掙扎，實驗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理論的展開，辯證法的唯物論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抬頭，東方文化論調代表了中國幼稚的資本主義在風雨飄搖中另求出路。（註四）現在把牠分開來講：

第一，直覺主義的階段：這階段的代表人物是張君勱等，直覺主義不過是一種玄學的思想，玄學的思想很顯明的是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中國封建制度，雖已漸次崩潰，而中國封建勢力，仍不能使之毀滅，這種反動的思潮，在中國仍有其社會的基礎。在五四前後，此種主義曾一度回光反照而作最後之掙扎，幾於給實驗主義起來消滅；到現在又有復活的模樣。

第二，實驗主義的階段：這階段的代表人物是胡適等，實驗主義和直覺主義適相反對，牠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基礎的一種哲學。牠的特點是注重實際的効果，完全是美國資產階級的精神表現；同時，牠亦是一種改良主義，牠不贊同革命的突變，而主張「一點一滴」的演進，這完全是暗示社會當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續漸改良，不應當「一反一正」的以階級鬥爭求達社會革命的目的。這種主張是五四時代最得中國智識分子信仰的一種主義。又因為美國實驗主義的領袖杜威，恰當五四運動時跑到中國來，（註五）實驗主義使趁着五四高潮，瀰漫於全中國。牠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已開的花，最明顯的果實，是整理古史和整理國故兩種運動。

第三，辯證法的唯物論階段：這階段的代表人物是陳仲甫等，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中心，牠是農工革命唯一的哲學根據。牠隨着社會主義而來中國，牠對實驗主義的

輕視，和實驗主義看到直覺主義一樣。因爲實驗主義是代表資本主義，所以說牠是拜金主義，或市儈主義。牠是認爲有階級便有階級鬥爭的，並且認爲只有「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變革」才可以使人類達到理想的共產社會，所以稱之爲代表勞動階級的哲學。牠是生物進化論成立後的科學方法，牠在中國文化上的貢獻是社會史的研究，尤其對於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引起史學者建設眞古史的動向。（註六）

第四東方文化的階段：這階段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等，這一階段的興起，因爲資本主義在大陸上的發展，受了無產階級的猛力攻擊，和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其弱點逐漸暴露出來。於是在歐戰以前，大陸上便有「反歸康德」的口號，尤其是歐戰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受了根本的動搖，資產階級更不能不另求出路，而有求助於東方精神文明的主張。中國在歐戰後新興產業家受列強資本主義的侵略，和隨新興產業而出現的勞動階級的威脅，幼稚的資本逐亦不得不另求出路，而趨向於本身固有的東方文化。此派思想經二梁的闡發，（註七）引起許多人把東西文化重新估價，重新比較東西文化的討論，因而盛極一時：最爲同情者爲直覺主義的學者，反對最力者爲唯物論派和實驗主義的學者。（駐八）

正如辯證法所指示給我們的歷史的進化——尤其是文化思想的蛻變——是由於互相矛盾，互相衝突互相反抗，而綜合進展的。新文化運動的過程，給予我們一個實例：即在每一個新的思潮的抬頭，必先與舊的思想衝突，形成各種學術上的論戰。其每一論戰雖未劃分顯著的時代，而於學術思想的變革，均有歷史的重要性。現在先把五四時代文化思想的變革列表分析，再述各種論戰的大概。

五四新文化運動
- (一)西洋文化運動
  - 第一段—思想表現工具德謨克拉西化—文學革命
  - 第二段—思想方法科學化(一)—實驗主義
  - 第三段—思想方法科學化(二)—辯證法的唯物論
- (二)東方文化之重新提倡

在這第一次西洋文化運動的第一階段中，有文體論戰；在第二階段中，引起了人生觀的論戰；第三階段中，有文學的論戰，同時辯證法唯物論者本身也引起了什麼社會史的論戰。

在第二次東方文化之重新提倡中，引起了東西文化的論戰和政治問題的討論。東方文化的重新抬頭，現在祗是一個開始，這到底是東方文化的迴光反照，還是可以代替西方文化的象

徵，姑置勿論。不過西方文化本身的缺陷，經過這次轉變而越益顯著了；同時，東方文化也有値得保留的地方，漸爲多數人所公認。不過，這種重大的工作，決不是幾位用玄學眼光的朋友們可以勝任的，假使重新提倡東方文化的祇知道東方的孔子人生哲學和印度釋迦牟尼的出世思想，那就和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還要幼稚。總之東方文化之重新提倡，是時代思潮轉變的必然趨勢，反對果然不是容易的事，贊成也非現在學術思想幼稚的中國智識分子所可亂道的。

五四時代文化思想的變革，既如上述，現在再以各種論戰的大概分述於次：

一，文體的論戰：這是五四運動最先爆發的一次論戰，開始於民國五年，到八年爲最熱烈的時期，在這次新文化運動中最關重要的一次新舊思想的衝突。雙方主角是新青年派和林紓章士釗及學衡派的駁辯，其爭論的焦點是語體和文言，其在歷史上的意義是文學革命的成功，德謨克拉西在中國思想界的抬頭。（註九）

二，人生觀的論戰；這就是唯心唯物的爭辯，開始於民國十二年的二月，在西洋二三千年來未有結論的兩大哲學思潮，近代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杜威的實驗主義，就是我國理學和漢學，

都是這兩大思潮中激起的漩渦。所謂人生觀論戰，就是站在柏氏立場的張君勱等和站在杜氏立場的丁文江等鬧出的玄學鬼和科學鬼的玩意兒。（註十）

三，文學的論戰；這雖然祇是個人本位主義文學家和社會本位主義文學家的互相攻辯，實是代表了辯證法唯物論的抬頭，和社會本位主義的勝利。開始於民國十五年，到十七年最爲興盛的時期。提倡革命文學的一方面，有創造社等，他們是以普羅列塔利亞（即無產階級）爲立脚點，他們以「一切藝術都是宣傳」而在揭破支配階級的罪惡爲目的。在反對方面，有語絲派的魯迅爲領袖，他們不是反對整個革命文學的本身，反對創造社人誇大狂的態度，把革命文學以外一切的文學抹殺了。（註十一）

四，社會史論戰：這是唯物辯證論者的論戰，牠的爭點是今日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還是封建社會？牠代表了主張國民革命者和主張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論戰，這是開始於十六年國民革命之後。當時國民黨初掌政權，對革命的理論，不能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對中國社會的現象，不能不求深一層的認識；而共產黨則因第三國際盲動政策之失敗，對中國經濟結構，更迫切地要求解答。同時，研究社會科學的，亦漸知注意於中國社會之探討，所以中國社會史和經濟史

的研究、便如風起雲湧了。因對這個問題的見解不同，形成了政黨中不同的派別；例如中國共產黨的幹部派和取消派的分裂，前者認爲封建勢力在中國社會甚佔優勢，以李立三爲領袖；後者謂中國已入於資本主義階級，否認封建勢力之重要，以陳仲甫爲領袖。中國國民黨的學者也有不同的見解，而社會科學者的見地更爲糾紛了，不但在西方資本主義侵入以前的中國社會還沒有統一的主張，就是現在中國究在那一階段，也是聚訟紛紜；因而思想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觀念，也便這樣的在矛盾與對立中爭辯着，對於過去的歷程和現在的結構，還這樣錯維紛繁，那裏談得到前途的展望？現在把這次論戰的主角和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若干種代表作，歸納一表、可見他們意見的紛歧了。（註十二）

中國社會史分期表

<table>
<tr><th>時代＼社會＼姓名</th><th>新思潮派</th><th>朱其華</th><th>陶希聖(舊)</th><th>陶希聖(新)</th><th>孫倬章</th><th>郭沫若</th><th>王宜昌</th><th>胡秋原 王禮錫</th></tr>
<tr><td>唐虞以前 (前2358?)</td><td rowspan="7"></td><td rowspan="7"></td><td rowspan="5"></td><td rowspan="3"></td><td rowspan="20"></td><td rowspan="5">原始共產社會</td><td rowspan="5">氏族社會</td><td rowspan="4">原始共產社會</td></tr>
<tr><td>唐虞時代 (前2357—前2206?)</td></tr>
<tr><td>夏代 (前2205—前1784?)</td></tr>
<tr><td>商代　盤庚以前 (前1783—前1402)</td><td rowspan="3">氏族社會</td></tr>
<tr><td>商代　殷代 (前1401—前1135)</td><td>氏族社會</td></tr>
<tr><td>西周時代 (前1134—前769)</td><td>封建社會</td><td>奴隸社會</td><td rowspan="6">奴隸社會</td><td>封建社會</td></tr>
<tr><td>春秋戰國時代 (前770—前247)</td><td rowspan="14">後封建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td><td rowspan="3">※奴隸社會</td><td rowspan="14">封建社會</td><td rowspan="14">※
※專制主義社會</td></tr>
<tr><td>秦代 (前246—前207)</td><td rowspan="13">封建或半封建社會</td><td rowspan="13">封建社會</td></tr>
<tr><td>漢代 (前206—後219)</td></tr>
<tr><td>三國時代 (220—264)</td><td rowspan="7">封建社會</td></tr>
<tr><td>西晉時代 (265—314)</td></tr>
<tr><td>東晉時代 (315—419)</td><td rowspan="9">封建社會</td></tr>
<tr><td>南北朝代 (420—588)</td></tr>
<tr><td>隋代 (589—617)</td></tr>
<tr><td>唐代 (618—906)</td></tr>
<tr><td>五代 (907—959)</td></tr>
<tr><td>宋代 (960—1276)</td><td rowspan="4">先資本主義社會</td></tr>
<tr><td>元代 (1277—1367)</td></tr>
<tr><td>明代 (1368—1643)</td></tr>
<tr><td>清至近世 (1644—)</td></tr>
<tr><td>現階段</td><td>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td><td>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td><td>資本主義萌芽仍存封建勢力的社會</td><td>半殖民地社會</td><td>政治上封建社會經濟上資本社會</td><td>資本社會</td><td>資本主義社會</td><td>—</td></tr>
</table>

姓名						
顧孟餘	初期資本主義社會					
梁園東	家族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	※半封建社會	—		
陳邦國	原始共產社會	氏族社會※	※封建社會※	※商業資本社會	殖民地化的資本社會	
李季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亞細亞社會	封建社會	前資本主義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戴行軺	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	過渡時代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梅思平	民族鬥爭時代	原始封建社會	原始帝國時代	新封建社會※※	商業資本社會	—
任曙	資本主義社會					
嚴靈峯	資本主義社會					

附註　凡有※※號的地位代表變形時期

五、東西文化的論戰和政治問題的討論：這是胡適與其他西方文化論者和梁漱溟等的論辯，其主要的爭點是中國究竟應否拋開自己根本的精神，而迷信西洋文化的德賽兩先生，其歷史上的意義是唯心論者的重新抬頭，東方文化論者得了一個新的立場。這是開始於民八梁啓超歐遊心影錄的出版，漸次沒落的直覺主義派借尸還魂，至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遂引起西方文化學者的反響，他們反對把東西文化分成三條路向如梁漱溟的主張，他們不承認西洋文明是物質的東方是精神的。因這東西文化的論戰又牽涉到政治問題的討論，就是

中國應走那一條路以自救？這次討論的骨格，是胡適羅隆基等西洋文化論者提出個人本位的民主政治，他們不能忘情於德先生，故引進許多歐洲十八世紀的文獻以提倡人權論，去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專政。繼人權論後的有社會主義運動和村治運動，前者便是唯物辯證論者的社會主義運動，後者是梁漱溟等認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徑，在本着我們東方文化的優點，以改造我們的文化，德先生不能解決中國的出路。此種論辯開始於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年爲最盛的時期。（註十三）

以上所舉的便是五四運動以來各種思想間相互的矛盾着，衝突着，反抗着，本來辯證法所指示我們的歷史的進化，也就在這矛盾，衝突，反抗中綜合而進展的。可是中國在這十餘年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中，所給予我們的各種思想和論戰，都逃不掉模倣的一個階段，他們都忘記了自家的立場，他們祇迷信着人家的方法，要想用同一的模型仿效成功。西方文化學者無論矣，就是提倡中國文化的東方文化學者，他們除了和羅素一樣地讚美東方文化外，始終還是沒有立下東方本位的文化，他們亦僅模倣而已。其他如主張文學革命的，革命的文學作品在那裏？討論中國社會史的，不論封建制度亦好，資本主義亦好，可是眞憑實據的史料又在那裏？十餘年來思想

運動所收穫在那裏?歷次論戰的結論又在那裏?五四新文化運動雖替中國思想界劃一時代的動向，還不曾爲中國思想界築起堅固的基礎，這裏可以證實了。

但是，五四運動雖然沒有替中國思想界築起堅固的基礎，祇有未樹堅固的基礎罷了，何以反而有逆轉的現象呢?這當然另有其原因。

在第十五章中已經說過了，最初運動的中心，是打破封建時代所殘留下來的桎梏，和否定束縛人類向上發展的文化，最努力於此種運動的便是陳仲甫，所以陳仲甫就把握着言論思想界的權威，他的衝鋒的目標，就是反對孔子，因爲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封建地主的思想，這種思想不但是一切舊禮教的發動機，並且是阻止產業發展的原動力。但是不久以後，在這新文化運動的幹部中，爲了賽德二先生而分化了；一派是以馬克思思想爲主標，一派是奉杜威主義當南針在這反孔狂潮之下，分出社會主義和實驗主義兩支相反的隊伍，他們固然各走各自的路向，各圖各自的發展，可是中國文化思想界却因此而失了重心。

文化思想界既失去了重心，雖然文化思想還是隨着社會經濟構造的變化，一幕一幕地反映出來，可是初受新文化洗禮已把心靈撥動了的青年們，稟着熱烈的情緒，飢不擇食地向前奔

放，便會走入一種不可迴復的歧途。其中最先入於歧途而且最爲普遍的，就是德先生思想的引進後，放棄政治上的鬥爭而致力於婚姻上的鬥爭，這種本末倒置的民主鬥爭，當然沒有好的結果。復次，也是一條很普遍的歧途，就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引進後，一般青年具有向上意識的、對現狀不僅是不滿，而且打算從根本改造，他們站在羣衆要求的尖端，作衝破舊軀殼的先鋒。似此白熱的情緒，有誰忍心說他們不是；不過中國總究是中國，他們聽着第三國際指揮要想在中國重演蘇俄的歷史，那是英勇的鮮血終於白流了。李甯也曾這樣的說着：「……並且應該研究在每一個國家裏因爲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種種不同，所以引起的特別地方……大家應該覺悟，全世界的制度，絕對不能用機械的方法，同一的戰略，跟着一個模型仿效成功。」（註十四）不錯，全世界的制度絕對不能用機械的方法，同一的戰略，跟着一個模型仿效成功的。

中國數十年來的模仿工作，終於旋起旋落，爲世所輕，正坐此病；在過去不知吃了多少的虧，到轉形期後，還是覆轍重循，而犧牲的代價更大了。因爲不論爲柔妙的愛神而鬥爭的新青年，不論爲最大多數人類而犧牲的戰士們，他們總是比較優秀的青年，比較優秀的分子趕上歧途，中國的社會文化使無前途了。

社會經濟在貧困的進程中長此畸形的發展，足使任何主義任何問題，都會和原來的完全相反，而其結果遂使中國的青年們甚致智識份子的全部，除了上述的二種趕上歧途外，都形成如下的三種範疇：

一，阿世派　祇有忿慨而沒有辦法，結果流于消極。

二，清譚派　祇有主張而不能實用，結果流於悲觀。

三，頹廢派　祇有誠心而缺乏能力，結果流於放任。

第一，先看阿世派的人們：那些迎合社會的阿世者，因為久在阿世的環境中過慣，已養成了一個牢不可拔的迎合心理和做人態度，他們的特長是了解社會種種惡劣象徵，以作迎合的資料。他們的專技是熟鍊運用卑汚手段，以求成功的捷徑；並且關於這些事象，他們知道得極多，假如一旦真的自覺起來，其忿慨的對象自較他人為多，而其憤慨的程度，也較他人為甚；但這種憤慨祇是一種悔恨的心理，一種鄙棄的觀念，而不是仇視的勇氣。悔恨的心理不過是自慚過去的錯誤，鄙棄的觀念不過是保持現在的摒絕，結果祇有趨於消極。所以常有許多軍閥官僚，不在殺人敲剝的時候，便吃齋唸佛起來。個人為善，是消極為善，僅達到不阻止與不妨害他人進展的程

度，還不足以負起人類應負的責任。

阿世的表象既是逢迎，即是一種無定見，無主張，無辦法的與世浮沉的行動。個人本身並沒有定見的人生意識，祇知道以自己的功名富貴爲原則，而希圖從中取巧，這般人下焉者是卑屈鑽營，陰險傾軋，以圖私人的慾望。上焉者是利用時運，巧妙漁利，以圖一己的成功。他們既無一定的主張，又少特殊的見解，結果祇是一個拉拉隊，在旁助威，專趕熱鬧，在他自己何嘗不是想把握時代，而終於不能趕上時代。這就是迎合社會象徵的下場。像這種東來朝東，西來朝西的驅逐逢迎，雖受新文化的薰陶若干年，覺悟過來還是送舊迎新的騎牆派而已。他們在新文化過程中最多是不會阻止，而在一種新思想未暴發或成功之前，他們常常會奉敬一個絕大的反動。

第二，那些隔離社會現實的清談者，對於一切問題的談論，並不是研究，又不是討論，而是隨口的妄談與任性的漫談，前者是不切實際的高調，後者是不近人情的廢話。喜唱高調者，他們即令一旦覺悟過來，信仰某種正確的理論，也不過是一時興之所至，隨便盲從而已。若是他們有所主張，不是盲從，但其主張却是成見，而非主見。成見太深的人，其主張決不能符合實際的需要，祇能夠滿足其個人的頑固心理。主張既不能實現，於是祇有悲觀起來，悲觀者又焉能擔負新文化

運動的重任呢?其次，喜說廢話者，即使一旦覺悟，也不會有一個如何合乎實際的主張，即有一些主張，也是一堆不相關切的零碎觀念。因爲他們的特色是無條理，無系統，無中心，無根據，日常的意見盡是冲口而出的胡說，離開事實的矯辯。無條理便流於駁雜，無系統便失之空泛，無中心便近乎玄祕，無根據便不符實際：這空零淺碎拚的可憐意見，自然無法應用，祇能永久逗留在浮漂的階段裏：他們和唱高調者一樣的無功於文化運動的任務。

第三，那些頹廢的人們，平日的生活都是違反了社會的象徵，以致思想行動無一不與實際矛盾。他們大都是意志薄弱者，受不了時代的驅乘，而流於放任。中國的智識分子自然就具有許多頹廢的歷史的遺傳，如果稍受環境的刺戟，頹廢的象徵更容易暴露出來，他們在太平時候，也愛無病呻吟，何況不幸生在亂世。他們對於任何事物，祇知道事後的痛苦，却不能防患於未然；有些甚至對於自然現象的運行，也會生出無窮的悲感。尤其是智識分子中的所謂騷人墨客，俗外無聊。那種「花開愁謝，春到傷歸」的懷抱，即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中心思想。他們不但是「長歌當哭，」有時還會「醇酒妝身。」那些乖偏不經的行爲，說是憤世疾俗的態度，這種人即令覺悟也不過移其悲感之心，轉爲希望之意，要他們去努力工作，刦是不可能的。他們覺悟後對某種思

想信仰的誠心，與希望這種思想成爲事實的觀念，並非不強或較常人猶且過之；但在行動方面，却祇能永遠的希望別人，沒有自己。這種祇有誠心毫無能力的狂誕分子，就是覺悟了又有什麼用處？

東方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爲了社會基礎的動搖不定，文化思想的路向紛紜，結果，從這社會的大洪爐中除了一小部分葆守天眞，堅貞不拔，或趕上歧途，進退維谷者外，陶鑄成上述的三種人羣。在這樣人羣構造的社會中，當然不會有健全的社會，當然不會有健全的文化，遂使十餘年來往復輪迴，仍歸舊套，而其逆轉的進程，則爲始而舊思想運動復辟，繼而舊制度捲土重來，終於舊人物借尸還魂，到現在歷史的惰性，民族保守的弱點，一齊暴露無遺。「以前張君勱先生說了幾句關於人生觀的話，便有丁文江先生等一大羣人去打玄學鬼，今年由考試院長戴季陶先生等所發起的時輪金剛法會，在北京舉行，在丁文江胡適之先生等脚下大演法寶，鬧到轟轟烈烈文化城中，倒沒有人去喇嘛廟裏打鬼，……因此，新文化運動的影子沒有了。又是一朝江山，又是一朝君臣，又是一個時代。」（註十五）

眞的，中國在這最近的數年中，文化逆轉的氣勢，有如「黃河之水天上來，」不久以前，在上

海金融恐慌極度緊張，極度尖銳的時候，我們有「救濟金融祈禱大會」在飢荒困頓呻吟的「妖邪」充塞着江南三月的時候，我們有「烏龍潭修禊盛會」在這獨佔與共管的鬥爭白熱化，全國民衆掙扎於死亡綫的緊要關頭，我們的名人甚至優秀的大學生，竟都只會乞靈於枯骨，求助於幽魂。(註十六)無怪一般想望天下太平的可憐虫，祇好查查什麼劉伯溫的燒餅歌，李淳風的推背圖：誰是眞明天子！誰來收拾江山！

賽先生和德先生在西歐支撐了二百年，翻了不少新鮮的花樣，結果造成了二十世紀文明，走在歷史行程盡頭的帝國主義文化固然是牠們倆的產物，行將開始於人類社會進程中的社會主義文化，也是牠們倆的結晶。他們倆在近古的西歐歷史中，好像中古時代的耶穌，把不少的人們送上天堂，同時也有不少的人們陷下地獄。基督教在中國沒有爲了牠而陷入地獄，却也未曾爲了牠而享受天堂之樂。賽德二先生的流澤，似乎遍及於全世界，在中國也曾轟動一時；但是終於給傳統的封建思想迷住了，只留下一大堆殘渣，酸化而成爲四不像的現代中國的社會文化。

二千年來中國因爲沒有吸收過外來較高的文化而停滯了，在五四運動的初期，稍稍吸收，

又是大吐大瀉，重復困頓於智識的飢餓線下，這當然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化問題，而另有更基本的社會基礎的經濟條件，所以文化的落後必從學術思想而影響到各方面。

參考

（註一）見馬克思經濟學批判。

（註二）見壬寅年新民叢報。

（註三）梁啓超以爲中國在清季文化運動的失敗，因爲西洋留學生全體未參加，而運動之中堅皆爲不識西文之人，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全之基礎。見清代學術概論第一六三頁。

（註四）見伍啓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第十四章關於四大階段的分析，可參看該書各章。

（註五）杜威在五四運動前三日到中國，他在中國住了兩年多，到過十一省地方，胡適便在這時把實驗主義努力宣傳，在新文化運動上影響很大。

（註六）辯證法的唯物論在整理中國古代史方面第一本成功的作品是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此書雖不免幼稚錯誤的地方，然從此以後，唯物辯證論者有系統的著作才一天多似一天，所以郭氏的著作在學術界上應佔相當的地位。

（註七）東方文化派最先是民國八年梁啓超從歐洲看完了世界大戰收場情形回來後，著一篇歐遊心影錄，正式宣布科學破產，應發揚光大中國文化，去調濟西方文化。至梁漱溟發表其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後，把解決生活中的問

題，分爲三條路向，以闡發東西文化的不同，他不但預言世界未來文化是中國文化，並且在中國化復興之後，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所以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將於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遍（見該書第二〇〇頁）。

（註　八）西方文化派對於東方文化派攻擊甚力，唯物論派之陳仲甫在他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中有「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孔敎，禮法，貞操，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更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敎；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又實驗派之胡適在他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有「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爲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爲精神的 SPiritial」。

（註　九）參考張若英中國新文學運動史資料。

（註　十）參考亞東書局出版之科學與人生觀和泰東書局出版之人生觀論戰二書。

（註十一）參考李何鱗中國文藝論戰和蘇汶文藝自由論辯集丁丁革命文學論三書。

（註十二）參考伍啓元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孫倬章怎樣幹朱其華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朱新繁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胡秋原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論嚴靈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任曙中國經濟研究緒論，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到三輯。

（註十三）參考梁啓超歐遊心影錄，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及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胡適等人檔集。

（註十四）見李甯左項的幼稚病一書中。

（註十五）見主張與批評第三期王遺時復興新文化運動。

（註十六）見新生第三卷第十三期非常乞靈於枯骨與宗漢烏龍潭修禊，前者更引四月六日的時事新報北平通訊，記述清明節民族掃墓及北平各界各大學學生發起宋信國公文天祥祠堂瞻拜禮二事。

第十九章　國民經濟廢墟上的社會文化（續前）

貧和愚的聯鎖關係　智識幼稚的可憐虫　求智慾熱狂的男女青年們　學校工場和社會市場　現代學校爲資本家陶育人材　中國學校代科舉以取士的機關　不能吸收失業的過剩人口　洋八股教育培植兩種人材　無階級無民族無國家的買辦官僚智識分子過剩的與年俱增　穿長衫和穿短褂的同爲社會混亂的酵母　智識販賣者擴展市場的掙扎與努力　從智識販賣所到學校衙門化　書既不讀國也不要了　留學生不能辭其咎　無所不通的學者和無所不能的專家　窺破祕密強作解人、智識落後還加上人格的惡化　留學界的新人物用舊本子　有誰來把中國西化　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翻譯書　現代中國公子嬪兒們的文房四寶　舊書瘋狂地翻印和販賣全盤文化也如經濟一樣地陷於總崩潰

經濟情狀的惡劣，可以影響到政治及其他社會現象：舉凡帝國主義的壓迫，封建殘餘的遏威，以及文化思想的逆流，既如以上各章所述。但是由於經濟情狀惡劣所反映出來的各種現象，又可以使智識水準的降低，而智識水準降低，可使生產技術與生產方法的落後，生產技術與生

產方法落後而經濟情狀必更趨於惡劣。故近來中國的大患除了一個經濟落後的「貧」字外，還有一個智識落後的「愚」字。經濟誠然是歷史上一切變遷的發動機，智識乃是推動發動機的原動力。尤其是在殖民地化的中國，更爲顯著因爲經濟的落後，智識越益落後了；同時，因爲智識的落後，經濟終於不能「好轉」了。

這樣聯鎖的狀態，在歷史上例子甚多。卽如中國從鴉片戰爭以後，智識的落後與經濟的落後一樣可憐；不論在興辦洋務時代，在講求維新時代，甚至在辛亥革命時代，倘使還用閉關時代的眼光去看，當然是興辦洋務時代的聲光化電之學，與洋槍大炮同樣的是了不得的東西；講求維新時代當然是勝過於洋務時代；辛亥革命又是勝於維新時代。但是再用世界的眼光回頭一看，不但不識字的老百姓和閉關時代沒有兩樣，就是智識分子，就是覺悟的智識分子，他們一樣是智識幼稚的可憐虫。譬如在興辦洋務時代，不但出使英國的郭嵩燾因爲喜談洋務，回國時不敢進京；就是中國最高學府翰林院出身的胡林翼，看見長江裏駛進兩隻蒸汽船，駭得「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註一）又如在維新時代，僅從間接的日本書中搬弄幾個西洋人名字和翻些片斷的西洋學說，主要的還是幾位經生文人舊店新開的熱鬧一下；維新首

領梁啓超也認「爲能力所限，」「爲社會所輕。」（註二）又如辛亥革命時代，果然已有不少鍍金的留學生回來；但是他們稍稍認識西洋文化的，必是不通國內情勢之人，稍稍認識國內情勢的，又必是出身於繳費不上學的速成班出身；日本祇要一個伊藤博文回國，明治維新大業，就告成功；中國碩士博士多於過江之鯽，到辛亥革命還是一糰糟。所以五四以前，中國經濟果然落後，而中國智識亦和經濟一樣的落後。

在五四運動的高潮中，確實驚醒了不少睡眠狀態的中國人，從窮鄉僻壤中跑出了不少求知的青年；不但男青年們，就是經過放足運動的女青年們，也從深閨中奔躍出來，要求學習「人」的智識。因爲求知慾這樣的狂熱，遂有人把西洋文化躉批介紹過來；中國在那時候眞有些像西洋文藝復興時代，方言文學的興起，和「人」的觀念的發現一樣地有生氣。

不幸得很，這種現象不能永久地持續下去。結果，那一批批從農村奔躍出來的男女青年們，現代化的智識沒有學得，反而因爲穿上一襲長衫而無路可走，無飯可吃。於是便有對於智識販賣所的學校教育訊咒着；他們不去反省眞正智識的是否學到，反而說有智識的人太多。以爲這樣現象的造成，是由於智識分子的「生產過剩；」正如近來世界經濟恐慌一樣，因爲生產與消

費的矛盾，於是由生產過剩，造成工人失業，股票跌價，信用下落等等現象，只有減少生產，才可避免此種危機。但是事實不是這樣單簡，因爲教育事業和企業的性質不同的。就是企業方面，若要解除經濟恐慌，亦須擴大市場，提高消費能力；如果消極的退却，只是使其生產裝置陷於停頓，結果非至破產不止。所以從減少學校而減少其受教育的智識分子，以爲便可解決學校工場和社會市場的矛盾，到底是不可的。而况我國學校，年來雖有增設，但是受教育的人數和全國人口的比例，和世界任何一國差得很遠；那麽減少學校，無異任全國最大多數的人民，永久沉淪於愚昧的狀態，這當然是錯誤的見解。

本來現代學校的設立，是所以培植發展資本主義的人材，因爲自產業革命以後，一切政治經濟等，既已盡歸資產階級的掌握，故學校不過爲他們陶育人材的機關。東西各國因爲產業的增設與擴大，故凡學業既成，均有所用；如習政治經濟法律者，可用之於政府辦事機關；習士木工程者，可用之於種種建築；學商業銀行者，可用之於商業機關等。——最近他們智識份子，亦發生過剩，則與工人的失業者同其意義，是出於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所生的現象。

中國設立學校，在光緒末年，正如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思欲由此走上資本主義之發展的

路：但是結果却大不相同，中國直到辛亥以後，滿清的統治雖已推翻，而政治則仍在封建官僚之手，經濟亦仍是封建時代的手工業，資本主義的建設事業，除了政治上換了幾個招牌，可說是絕無僅有。因此，學校不過是代科舉以取士的機關，父兄之培植子弟讀書，從前是爲的應舉，可以由此而致仕，現在也是這樣，這是一種投資事業，不過帶點投機性而已。這樣，我國的學校教育，實是爲官僚的預備；官僚不如資本主義政治下的職官，須有特殊的技能，在封建的消極政治之下，只須能夠知道向人民徵收種種苛捐雜稅，能夠於中飽以後在報銷上說得過去，便算極盡其能事。所以我國的學校教育，在外表上雖是近代的，而其實則仍是一貫的科舉的精神，爲一種洋八股教育的目的，在資格而不在技能，在形式而不在實質。

不過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組織，因爲帝國主義者勢力的侵入，起了極大的轉變。中國的農業與手工業，因了帝國主義者財政的剝削與商品的壓迫，都大批的破產失業；這現象正如歐洲產業革命起初時，農民與手工業者，以機械工業的壓迫，亦到處失業一樣。所不同者，他們是本國的資本主義開始發展，卒能吸收其破產失業的過剩人口於工商業中，以之轉變爲近代的無產階級。中國則不然，破產的是中國的農工，而以中國農工的犧牲，得更有發展的則爲帝國主義

的資本主義。在這其間，得享有我被犧牲的農工血汗的點滴餘瀝者，是中國少數的買辦。因爲這少數的買辦，於是在中國表面上也稍具一點資本主義的形式，學校教育爲適應此種需要起見，在代着四書五經而有外國語言文字的研習。社會上最負盛名的學校，便是不論歷史地理等科目，除視爲隨意科的國文，一切教科書都用原本，上課都講外國語，甚至體操也用外國口令；因爲語言是買辦之所必須，故會話尤爲重要。豈僅買辦，即在政治經濟的類屬，亦多陷帝國主義者之支配下面，所以新官僚也有熟習外國語言的必要。

由此可知，我國數十年所辦的僅僅是洋八股的教育，在洋八股教育下祇有培植兩種人才，不論買辦和官僚，各有相同之點，買辦的目的在能推銷外貨，代購原料，借放資本，用種種方式以搾取中國人民而取得回佣，這和官僚之惟求中飽同。買辦是處於中國人和外國人的中間，亦猶官僚之處於統治階級和人民的中間一樣。因此，他們沒有階級，沒有民族，沒有國家。可惜中國這在前期資本主義的階段，官僚衙門的組織，雖是年有增加，但是到底有限，不能盡量容納學校畢業的智識分子。同時，買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雖有萌芽，規模終究是很小，并且地域觀念又是很深，就有許多人不得其門而入。於是沒有專長的固然要失業；即使學有專長，也只好學非所用，用

非所學的犧牲一生。而況錄用標準往往又視背後的勢力爲標準，若其人具有奧援，則雖無資格，無技能，亦可獲用。因此從學校出身的智識分子，其過剩的人數，遂與年俱增。又以農工破產失業，社會生活日形不安，智識分子的生活標準尤爲低落。他們的地位和破產失業的農民及手工業者相同，爲了生活，只有從黑暗中去求出路，鑽營逢迎無所不用其極，穿長衫的智識分子，遂和穿短褂的農工失業羣一樣是成了社會混亂的酵母。

自然，這現象是有牠的社會根據的。中國人在普遍的貧困化的浪潮下，知識分子當然不能單獨逃過這個侵襲，並且他們的本身又包含了嚴重的矛盾與危機。知識分子是一羣寄生生活者，他們不會直接去參加生產；他們所有的，不是生產的技能，而是空洞的膚淺的一些知識，因而他們所能做的事，也是知識上的從業，不是物質上的生產。在發展正當的社會裏，知識在人民也是有用的，而且生產技能上的各種改進與指揮，也都包含在知識的範疇裏；但是生產上不需應用這些知識，或所學的並非是應用的知識，那麽知識便成毫無用處的長物了。中國現在正是用不着這知識而智識分子大都又是所學並非可以應用的知識，所以知識分子在不能當買辦，做官僚的時候，不得不把他們的知識，祇得單純地販賣知識給別的人，其從業的結果只是知識

份子的再生產。

但新生的知識份子是怎樣呢?在社會環境沒有什麼改變的條件下，他們所能夠做的事，也不過再步他們老師的後塵呀!於是知識販賣的競爭者增加了，所有可以安插知識者的從業的地方，因爲多數人的分割而更形狹窄，徒然擴充了知識份子的失業線，給知識份子的命運以更重大的打擊。所以知識份子在受了一般社會危機的侵襲外，他們本身從業上的矛盾，更加增速了沒落的趨向，今日所謂循環式的教育，眞是給予知識份子的刻毒的譏剌與威脅。

然而知識份子是不得不走向這個唯一的道路的他們既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却不能間斷了一天不生活;爲了目前，誰都顧不了將來，在那些可憐的狹小的市場中，把自己的勢力作爲過剩的商品一樣地，大家要拚命地兜售與傾銷。目前就以上海一埠論，補習學校、弄堂小學以及私立的大中學校，還有報章雜誌，一切可以容納知識分子的地方，沒有一處不在逐漸激增的形勢中。把所謂文化工作的外衣脫下了，裏面只是隱藏知識販賣者擴展市場的掙扎與努力而已。

農工失業羣求當兵而不得，每退而做土匪;智識分子求做官當買辦而不得，每退而辦教育!土匪和軍隊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成分，衙門和學校亦遂同樣成爲知識分子解決生活的地盤。

他們辦教育除了上述的販賣知識外，也有是做官的退步，或者是做官的準備。此種趨勢，進展得很速，中等以上學校已完全衙門化，教職員當然非私黨不可，一方面並用小恩小惠去收買學生以植勢，種種魑魅罔兩的鬼蜮行動，學校中幾乎應有盡有，從前還罵學校是智識販賣所，現在變成政客養成所了；從前還嫌學生祇知愛國而忘讀書，現在書既不讀國也不要了。

學校到了這樣地步教育當然已是破產。智識的落後也是必然的結果。興辦學校教育已經數十年，到現在，除了粗製濫造培植了一批批半生不熟的新官僚政客在社會發生供過於求的現象，變爲擾亂社會的酵母外，試問在文化界實際的進步上到底有若何表現？賽先生已經介紹過來了，莫說科學的新發明，就是應用科學上已成事物的能力，有些什麼？銀行業總算是有相當的發達了，關於幣制改革，還要請外國人設計；甚至軍閥混戰已有二十餘年，軍事顧問還要請教外國人。最可笑的，服膺科學社會主義的人因爲俄國共產黨幹部派的人士，說中國還是半封建式的狀態中就跟着喊打倒封建勢力的口號，俄國共產黨發生了反對派，說中國已不是封建社會，久已進入商業資本主義了！又喊着打倒資本主義，學社會科學的對於本國經濟歷史變化的歷程還跟着外國人，無怪反共的陣營中，當馬氏文通硬算是馬克思的大著，而赤色恐怖的黨員

們也說馬克思與李甯是同鄉的好友了。（註三）

社會原是整個的有機體，教育破產當然不是僅僅辦教育的責任，但是東西留學生實不能辭其咎。在五四以前，教育雖已有了破綻，學校還不致糟到如此；當時學校出身的智識分子，究屬不多，比較熟悉本國情形的東洋留學生，還可容納在政治舞台上，比較熟悉商務的西洋留學生，還可容納在商業舞台上，所以教育行政機關有時竟會門可羅雀，公私學校倘被視爲神聖清苦的場所。到了五四以後，留學生在新文化運動中大顯神靈，鍍金的智識分子，販賣西洋文化，不但成爲青年們偶像的崇拜，而且得到待遇標準的最後一級。（駐四）本來最高學府的大學校中，還有幾個三四等人才的西洋人，還有對於國學確有幾分研究的翰林舉人，五四狂潮到來，翰林舉人的國學，先後隨線裝書而打倒了，高鼻捲髮的洋教員在收回教育權聲中趕走了，鍍金的學士碩士博士們，拿住賽德兩先生做幌子，一齊成爲教授講師，於是在外國同等出身的不過做個小學教員，而在中國已是大學校長和教授了。（駐五）他們自身在外國不知學到些什麽學問，可是回來便成爲學者，爲專家，並且是無所不通的學者，無所不能的專家。一經鍍金，身價百倍，實際上往往不若國內專科學校畢業生的程度。他們只會把一大串的洋文切口東拉西湊地搬演

出來；自己沒有力量與外國文化接觸的青年們，一陣眼花撩亂，祇覺得偉大，祇覺得玄妙，一味盲目地崇拜，而彼鍍金們便得永遠投機下去，永遠胡亂下去。

這種秘密終於給幾個天資較高的青年們窺破了，他們學會了人生處世之道。於是胸中可無點墨，嘴上不妨大吹，從未學醫的，忽然談起中西醫學的比較與溝通，從未研究教育的也會批評教育的原理與實際，從未到過西北的，居然擬具開發西北的具體計劃，從未進過工廠的，也敢大談勞資問題的研究，不知產業革命是什麼而說歷史是唯物的，不知國際關係的眞相，也會决定一九三六年的大戰必至爆發。這樣已經和埋頭於幾本教科書的同在好學生之列，比之跳舞，打牌，看電影，寫情書的，比之鑽營奔競，拿津貼，做打手的都好上幾倍。即此好學生也不過混些學分畢了業，拿着證書去當中學教師，他們當然像在大學裏的老師如法泡製，於是中學也糟了；中學的畢業生拿了證書去做小學教師，他們又像在中學裏的老師如法泡製，於是小學也糟了。在過去還有人說中國只有「好青年」而沒有「好成年」，所以學生幹愛國運動，做了官便去幹賣國勾當；現在學校變成衙門，學生成爲皂隸，從前只有無師自通的少數賣國賊，現在大批走狗漢奸的養成所，正在大量的生產不但「好青年」又如鳳毛麟角，就是天眞爛漫的小學生，經不

起旦旦而伐之，無從希冀其成爲棟樑之材了。

教師教出學生，學生又當教師，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當他都是好學生出身，中國的學校教育已經要破產，中國的知識水準，已經要降低；而況因爲五四運動之後，智識分子已有過剩的現象，學校漸漸變爲衙門，教師也不許讓給當時所謂好學生的去當了，於是除了智識落後以外，還加上人格的惡化。

最高學府的大學校中，站在學術界地位最高的教授講師們，智識如此其幼稚淺薄，遂使五四運動後中國的文化界，仍和辛亥革命和維新時代甚至倒退到洋務時代一樣地落後。吾們姑把出版界一方面來證明文化落後的眞相。中國從辦理洋務到現在，還是在模仿的一階段，學校教育在初中以上所學的除了國文和某一時代的讀經外，都是在學習西洋文明，都是在讀西洋書本。但是在全國的高級中學和大學生中所用的是什麼本子，按照理想，因爲教授和講師們大都是鍍金的，那麼所用的書本，也必是目前西洋流行的最新教本無疑。可是事實上竟是大謬不然；他們還是用他們自己讀過的古董，所以有一本同樣的教科書，有連續用至二十多年的，有外國早已絕版而中國爲了教授講師們的方便專開翻印古董的印書店；亦有西洋帝國主義者專

供殖民地奴化教育應用的本子，而在中國的銷路也是始終不衰的。有時新回來的鍍金先生，似乎要想看幾本外國新近出版的名著，可是在中國任何一家書鋪子——當然是開在中國的西書鋪子，非等三四個月直接向外國訂購，總是買不到的，（註六）數十年來用全副精力興辦的洋化教育，到現在連幾本教科書還這樣的古怪而可笑，無怪西書鋪中不易買到新出版的名著了。有人反對中國文化的西化，其實介紹西洋文化的人材還沒有培植成功，有誰來把中國西化呢？

西書鋪中買不到學術名著，本國的書鋪情形又是怎樣呢？留學生既然這樣庸俗而低能，即有少數佼佼者，亦以生活問題而把學問犧牲了；於是翻譯界又是非常貧乏。不要說馬克思的全集至今找不到一部完整的譯本，就是從五四以來在文化舞台上熱鬧地介紹過的西洋學者，以及什麼主義什麼思想，到如今從來沒有對於某一個學者的全部作品或是某一種主義和思想的全部參考書譯過一套，出版過一次。再退一步說，在中學在大學中幾乎當做唐宋八大家文章一樣看待的英國沙士比亞作品，到現在亦還找不到一部完整的沙氏譯本。回頭看看日本，他們對於各國著名學者的全集，常有幾種不同的譯本，坪內博士到了高年，還辭去早稻田大學教授

而以一生獻給翻譯沙翁全集的偉業。(註七)所以日本人不但大學生，就是店員職業婦人等等，只要自己努力，可以在一個圖書館中，得到自古至今世界學術的輪廓。中國識外國文的看不到外國名著，不識外國文的，只聽見說一個個外國的人名，懂得一些故事，記得幾個切口，一點也不深刻去了解牠，本來也就無法的了解牠。但是識了字總想發洩的，既然沒有好書讀，於是三角四角式的文藝書，大綱提要式的科學書，以及充滿着頹廢的幽默小品，曲線藝術，便成爲現代中國公子孃兒們的「文房四寶。」

又因爲圖書也是企業的一部門，簡單而淺薄的小册子，那裏滿足書業者的慾望，因之幾度革命以後，早經丟在毛廁裏的線裝書，乘此機會，瘋狂地翻印和販賣。書業界既沒有大批的新貨可做，便專以古老陳腐的線裝書來競爭，有念五史而又有念六史，有洋裝本而又有圈點本，橫豎死人身上用不到送稿費；於是除了供給資產階級當做一種裝飾風雅的趨向外，更減輕成本，大量生產，而有一折七扣，一元三斤的競爭。在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前後，中國出版界祇有什麼「雜誌年」「舊書年」，即使學校不成衙門，教育也要破產，智識也要落後。

學校是研究學術的文化機關，出版界是宣揚學術的文化機關，現在學校已成衙門，書鋪變

爲古董店，豈僅教育本身的破產，中國全盤文化也如經濟一樣地陷於總崩潰的境地。在這種情狀之下，僅僅從東方西方的文化上講些陳腐的廢話，僅僅由軍閥官僚的立場上，做些尊孔讀經的文章，那也等於抽捐徵稅而欲整頓產業一樣地加速其經濟破產而已。

參考

(註一) 事在聯軍入北京之後一年，語見薛福成記述胡林翼的一篇故事中。

(註二) 梁氏認爲清季文化運動爲能力所限，不免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見清代學術概論一書。

(註三) 武漢政府時代有人公開演講馬爲俄國人，見主張與批評第三期劉大杰文化運動的人生；又在江西搜查學生行旅中有馬氏文通一書，卽作爲反動證據，見報紙通訊。

(註四) 留學生待遇在任何機關團體中，總是最高的一級，甚至研究學術的中央研究院中，亦有如此規定，往往同爲大學畢業，國外必高出一等。

(註五) 獨立評論第九期孟眞教育崩潰之原因中，關於哥侖比亞大學之畢業生，據說在美國不過是做小學教員，在中學教書已是鮮見的事，而在中國最少是大學教授，或者竟可做大學校長，竟可做教育部長。

(註六) 外國新出名著，在中國是沒有現貨的，這是常買外國書的「日本書除外」或者都有同樣的苦痛。據西書舖中人說，他們的生意全靠幾種老牌教科書和幾種小說遊記娛樂小品文書，專門學術名著中國從來不銷的。言雖有些過份，但是亦爲事實。

（註七）坪內博士共費數年心血，專譯沙翁全集，共計四十巨册，全書告成時適英國亨利皇子遊日，大爲驚嘆。

第七編　結論—最後的淸算

兩因兩果成此轉形期的全局　各有一貫之權威　相互關係前後不同　一切事變均與帝主封建有關　轉變後之更畸形更棼亂的社會　逆轉和落後的現象　歷史上兩種不可避免的弱點　不是由於過去思想發展的邏輯結果　接受外來反動沒落的思想　不可解答的啞謎　文化建設無希望　經濟建設從何做起　打倒帝國主義是夢想　剷除封建勢力是幻想　中國往那兒去　開始壯烈的革命鬥爭　人類社會的歷史前程　思想運動　澈底破壞與澈底創造　不堪回首的往事當作成功之路的明燈

以上各章所述，雖然很是簡略，也可以說是近代中國劃時期轉變的一個小小淸算。讀此可以明白中國從來的社會生活內在的矛盾，和本質的危機；一切矛盾與危機從何處發生向何處消滅，也可窺見牠的大概。我們知道數十年來的中國，封建殘餘的肆虐而已，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已，此爲事態之因；經濟的貧乏而已，文化的落後而已，此爲事態之果：兩因兩果，成此轉形期的全

局。

但是同爲封建殘餘，在辛亥以前爲滿清統治階級，在辛亥以後爲北洋軍閥集團，中有一貫之權威焉，禮教是也。同爲帝國主義，在辛亥以前爲國際帝國主義共同侵略時期，在辛亥以後爲日本帝國主義希圖獨佔時期，中有一貫之權威焉，資本是也。封建殘餘視帝國主義如靠山，帝國主義視封建殘餘如工具。因爲當做靠山看待，於是由南北對立，而成爲大小軍閥割據的局面，而終於各成其爲帝國主義在華的代理人；因爲當做工具看待，於是一方面雖然啓發了中國資本主義要素的增長，但在他方面却桎梏着中國社會形態的飛躍過程，以形成殖民地社會。

這樣，兩者的關係當然是很密切的了，不過牠們相互的關係，亦有前後的不同；在辛亥以前，帝國主義之與滿清統治階級乃出之以愚弄；在辛亥以後，帝國主義之與北洋軍閥集團，乃予之以勾結。因爲出之以愚弄，故僅見滿清政府的無能，而不見帝國主義的壓迫；革命的對象，亦祇有推翻滿清政府的要求，沒有打倒帝國主的呼聲，因爲予以勾結，故越益感覺軍閥的強頑，越益感覺帝主的猙獰，革命的對象，乃從打倒軍閥的呼聲中，又有打倒帝國主義要求。

中國最近數十年中，任何一次內部的政爭，無一不與東西列強的壓迫有密切關係，任何一

次外來的侵略；亦無一不與內部封建殘餘的肆虐，有連帶關係。例如甲午戰爭的失敗，列強乘勢劃分勢力範圍，於是一面促起維新派的變法運動，一面激成守舊派的大反動，而此反動所得的結果，就是辛丑和約；辛丑和約的大創痛，除了巨額的賠款外，便是東交民巷的外交團：前者把中國新舊關稅鹽稅，一齊列爲賠款的財源，使中國財政上長期間失去了自由，後者是任何國家所罕有的使館區的劃定，成爲列強在華共同宰制中國的太上政府。因爲辛丑和約的大創痛，於是有維新運動的再起；因爲有日俄對滿蒙的角逐，與列強的投資競爭，於是有立憲和革命兩派的積極進展；因爲有四國聯合對川漢，粵漢鐵道大借款，於是有辛亥革命的爆發。而革命的結果，最顯著的除了外蒙變爲俄國屬地，西藏和中國的關係更爲疏遠外，就是造成一個五國銀團，攫去了中國的鹽稅收入，實行監督中國的鹽政。又使海關總稅務司的地位，事實上變爲列強監督中國財政的代表，而海關亦變爲替外人的收稅機關，稅務司惟外交團的命令是從，而中國財政，完全陷於絕境。氏爲有五國銀團的大借款，於是袁世凱破壞國民黨的計劃成功，圖謀帝制的基礎成立；因爲歐戰發生，日本獨霸東方，謀倒袁氏，宰制中國，於是反帝制各派反得一種積極的援助，洪憲帝制遂告失敗，因爲列強引誘中國參戰，段祺瑞落入日本的圈套，於是護法的長期戰爭，

演成南北對立，成爲大小軍閥割據的局面。而此長期的護法戰爭中，所得於歐洲和會的，遠不如喪失於日本的重大；就是在華盛頓會議所得的，除了收回山東的空軀殼，和取消客郵外，中國所希望最切的關稅自主權和取消領事裁判權，未曾獲得一些效果。又因爲蘇俄向東方活動，中國在國際關係上成爲赤白對抗形勢，於是一方有國民黨利用共黨的援助，內以摧毀軍閥，外以打破帝國主義的企圖；其與國民黨敵對的軍閥，則倚仗國際列強爲奧援，而用全力以對付國民黨。雙方既各有所憑藉，徒然使革命的時間愈加延長，人民的痛苦愈是加深，整個的中國社會，幾乎爲之紛碎了。

被世界巨流紛碎了的整個中國社會，在臨了沒落的前夜，突然爆發那劃時期轉變的五四運動，這或許是中國民族運動發展之史的過程中，最後一剎那的掙扎，也是歷史演進中必然的現象。但是這偉大的反帝的民族運動和反封建的民主運動，因爲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限制，結果便失敗了；付了極大代價，反而獲得更畸形更棼亂的社會：這裏有禮教的復活，這裏有佛教的追求，這裏有德謨克拉西思想的憧憬，這裏有法西斯蒂理論的醞釀，更有社會主義各派學說的流行。這樣形形色色，光怪陸離的現象，無疑的正是中國變質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反映，有了

這種變質的畸形的社會發展，當然在牠上面存在着封建思想的殘餘，資本主義文化的影子，以及社會主義思想的根苗，各有活躍的領域，各有滋長的土壤了。

五四運動既然揭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幟，爲了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限制而失敗，其反動所得的結果，勢必帝主的壓迫越益嚴重，封建的肆虐越益惡毒。這兩重勢力的交相爲惡，遂使中國的經濟成爲殖民地經濟，中國的文化，成爲殖民地文化，前者可以一個貧字來代表，後者可以一個愚字來代表。這兩個字的交相爲用，遂使中國的國民必須倚賴於封建殘餘，中國的封建餘殘，必須倚賴於帝國主義，前者猶之奴隸之於主人，後者猶之顧客之於店主。這是五四運動以後，不論在經濟上在文化上，較之在五四運動以前必然地有逆轉和落後的現象的所在。

並且反帝和反封建的潮流中又必借助於其他前進的文化思想當做武器而文化思想有如海潮一般，既挾着偉麗的波濤，又含着污濁的物質，牠不問高山低谷，一經奔放，盡爲浸沒。牠的偉麗的分子，固能爲牠所浸而加添了許多美觀；但牠的污濁的分子，也儘足使牠所着的地方，霉爛腐敗，使牠們更加醜惡。不論是封建制度也好，資本主義文化也好，社會主義思想也好，牠們在某一空間和時間中，都會表現着非常的美觀，可是一到中國往往爲歷史條件所限制，爲經濟關

保所決定；封建殘餘無論矣，就是資本主義文化的影子，社會主義思想的根苗，雖然牠們各有活躍的領域，各有滋長的土壤，而一經牠們所着，便覺霉爛腐敗，充分醜惡的了。這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求解放運動，反而使中國的社會，愈益加強漆黑一團的色調。

但是五四運動的失敗，除了帝國主義封建餘殘兩種勢力作祟外，還有中國歷史上留給我們兩種不可避免的弱點：就是五四運動所以沒有樹立堅固基礎，而致於失敗，還含有別種意義。

第一，因爲中國思想發展，不是由於過去思想發展的邏輯結果所致；本來任何一種思想的發生，各有所本，亦各有所歸。譬如說，有了「人的發現」而後可以發生宗教改革運動，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必然地有科學上的發見。西歐從中古進展到近代，其間亦自成其歷史傳統。十二十三世紀中，法國北部的文化已不亞於十四世紀的意大利，但是爲了時機尙未成熟，文藝復興的中心點，仍由法國移入意大利，而牠的時期也退後了一二百年。直至十四世紀開始時，日耳曼的民族已能作自由的思想，已能謀獨立的生活，已能建立強固的政府，已能各有自己的方言，已能自由表現個性。已能繼續希臘人的遺緒而作科學的研究；（註一）於是文藝復興便在這瓜熟蒂落的時期爆發了。因爲牠在歷史上的條件早已備具，所以在十六世紀禍兆畢集，大難將臨的時候，

愛神酒神終於被日耳曼人所厭棄，讓位那救苦救難天國中的聖父聖子。（註二）倘使當時沒有歷史上的條件，那麼人民對於宗教觀念的復活，其結果不過以朝拜聖地，及乞食行善爲限，至多亦不過背上十字架去打打土耳其人，演成第二次的十字軍戰爭罷了，牠何以走入宗教改革的途徑呢？又如西歐對於封建社會之舊傳統思想，在很早以前便已經過了長期的鬥爭，所有近代資本社會的一切條件，在封建社會中就已成熟了基本模型，十七八世紀以後的變革，祇是打破封建外殼的工作，其他早已安排好了。中國在這二千餘年中，儒家的傳統思想，不僅在思想的領域內排擠了其他的新思想，而且麻木了思想發展的車輪。在西歐有重重的遺產可以承繼；在中國則僅有儒家同一根源的古董，即有所求，亦是空無所有。直至鴉片戰爭後，西力東漸，始有相當排除歷史上種種條件限制之可能；在此情形之下，許多萌芽的新思想，得以迅速長成，而數千年來的一統和沉死局面，亦得從此打破，不幸國際上人家已先於我們而發達，他們已趕在我們面前，爲我們有力的競爭者和壓迫者了。甫經萌芽的新思想，因爲不是由於過去思想發展的邏輯結果而枯萎了。中國歷史的發展，又受此新的限制，祇得仍舊停留於原來的狀態中，這是五四運動所以不能樹立堅固基礎而致於失敗的一原因。

第二因爲接受外來反動沒落的思想所形成的結果：接受外來先進思想，對於本國思想發生重大作用，可以俄羅斯來證明。俄國當十九世紀時代，還是東方式的落後國家，牠在彼得大帝統治之下，從西歐大胆地搬運必要的先進文化來補充自己遺產的空虛，俄國在十九世紀以後，產生了許多權威作家，彼得大帝實有不可磨滅之功。就是後來成爲二十世紀思想上的一個先進國家，也是因爲烏里亞諾夫布列哈諾夫等人自覺的突起，自覺的搬入先進國的文化，然後社會主義革命得到極大的收穫。中國向來是感覺到接受外來先進思想的缺乏，在歷史上祇有搬運過一次印度思想，反而把中國倒退囘去了。直到五四年代，中國正在開始接受眞正外來先進思想的時候，恰値西歐思想趨向於反動和復古的年代。結果飢不擇食的中國人，竟把神秘的柏格森和悲觀頹廢的羅素等思想，一齊搬運過來；甚至拜金熱狂中生產出來的杜威實驗主義，成爲中國無上法寶；無抵抗著稱的亡國哲人泰戈兒，也算中國起廢囘生的續命湯。他們原是大戰以後開始沒落的產物，他們是代表那已經腐敗而且準備着自己毀滅的歐美布爾喬亞，已無力繼續人類偉大的遺產的一種最後呼聲。所以這次外來思想的接受，和中古接受印度思想，同樣地把中國倒退囘去了。

在這接受外來反動沒落的思想運動中，同時把社會主義思潮也曾搬運過來，牠的幼稚和膚淺，也一樣地和介紹資本主義思潮時請了德先生和賽先生便算盡責。又因爲開始搬運便有突進和跳躍的進展，不但牠本身的內容上很是枯竭和空虛，並且使那反動沒落的許多思想，反而利用國人性情，得到復活的機運。到了一九二一年代，社會主義思潮在國際上也開始墮落和發生變動的反動到來，於是歷史又走上失敗的途徑，而中國也便始終被那外來反動沒落的思想泛濫着；這是五四運動所以不能樹立堅固基礎而致於失敗的又一原因。

現在我們可以知道，中國所以不能走上復興之途，所以不能成爲二十世紀的現代國家，因爲是經濟的貧乏，因爲文化的落後；經濟貧乏和文化落後的原因，是封建殘餘的肆虐，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從這兩因兩果的中間，又有如上所舉的兩種意義的遭遇，那麼怎樣可以走上復興的途呢？怎樣可以成爲現代式的國家呢？這已成了中國的一個啞謎，因爲儘管大家渴望着，至今沒有一個正確的答案。

有人以爲應當從文化建設入手，因爲牠是社會經濟制度全部構造中不可缺的一枝柱石。但是在中國歷史上舊的祇有毒素，新的沒有傳統；現在國人智識的落後，更是各種事業的最大

障礙。不過文化是產生於物質生活，又作用於物質生活之精神的體系，牠有一貫的原理，在形式上為種種的觀念形態。假使中國從文化建設入手，請問從何做起？復古嗎？中國實在無古可復，即使先秦思想至今還有部分的價值，亦僅用來作為創造的基礎。並且文化總是向前的，復古那裏有生路可走，祇要看西歐文藝復興時代，人文學者也和方言文學者同是對於中古拉丁文表示不滿。（註三）西化嗎？現在成功的模型太多了，資本主義文化雖已臨了末路，而資本主義國家還多咧，社會主義文化也在蘇聯傳出凱旋的呼聲了，中國又將何去何從？那麼照着「本位」特造模型嗎？這祇有不懂歷史進化的使命的人說說罷了，人類文化的進展，牠是一時期一時期天然的演進，不是學者們的自由意識，或政府的一紙法令所能創造出來或改變過來的；祇有各地方社會經濟結構所發展的基礎不同，便或先或後的產生出不同的文化。所謂本位文化、痛快的說是中國固有的封建文化，最多總跳不出張之洞發明中體西用的文化而事實上還是繼續着過去數十年的殖民地文化，這是無從掩飾的，更也不必巧辯。那麼怎樣呢？復古無古可復，西化無路可走，本位的老路也夠受了，中國糟到這樣地步，空談文化固然無補於事，文化救國，也要有人來幹，要有路來走。現在不識字的要識字還沒機會，識字的吃飯還成問題，只靠幾個有閒階級沉

浸在反動沒落的文化潮中，不配談文化，更不配說自救的方法，所以文化建設入手，是無希望的了。

也有人以爲應當從經濟建設入手，因爲經濟的關係，可以理解任何社會形態的一貫線索。中國數十年來的掙扎，不能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下而解放出來，確是爲了資本窮乏生產落後的原故。因爲資本窮乏，生產落後，不但不能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且不能撲滅封建殘餘的肆虐。但是中國急切的經濟上的建設，究從何處做起？中國從來的經濟過程，以農業經濟爲本，所以經濟建設應從農業建設着手；可是耕田已在種鴉片了，農民說是打仗去了，請是怎麼辦？說是鴉片眞的禁絕盡了，內戰可以沒有了。耕田有無下種資本不必問，即使下種了，黃河之堤何人修？長江之水何人治？農民是否不做土匪而回來不必問，即使回來了，苛捐雜稅是否免？豪紳汚吏是否除？故以農立國決非高調可以唱得成也。那麼還是振興民族工業，可以成功快而效率大。在這機器工業雄霸世界的現時代，又是國際帝國主義當做傾銷的大市場的中國，振興民族工業，確是當今自救的一道。但是振興工業，資本從那裏來？人材又從那裏來？即使專替政府做些投機事業的中國金融界，眞的發願輔助生產事業了，即使年年帶着巨款在各國學些交際會話的公子孃兒

們，眞的發奮求些眞實學問囘來了，試問權在外人的海關，是否替我們保護而實行他們的自殺政策呢？試問外人在華的工廠，是否放棄廉價人工和當地製銷的特權呢？所以振興工業，亦不是「硬幹」所幹得成也。單單把農業工業兩件事情來說，已是難乎其難，而况所謂經濟建設，是各方面的，各方面先要有了經濟建設的條件，方才可以談經濟建設。現在中國任何方面看去，都是破壞經濟建設的魔鬼，甚至口裏狂呼經濟救國的志士們，也要想等機會拿囘佣，而在另一方面又正在製造破壞經濟建設的工具和勢力；所以經濟建設入手，也是無希望的。

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在現在中國既然是沒有希望的，還有人說政治不良，還有人說教育不好等等，看來都有相當理由，實際都是枝節問題。近來亦有許多人以爲病在人心大變，還是請敎孔老夫子，試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這和大刀退敵，鏈子救國一樣可笑。然則中國究竟怎樣去自救呢？

於是就有人主張從根本設想，中國這幾十年既然給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所糟榻了，那麽中國最大的敵人便是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中國要自救，中國要走上復興之途而完成現代式的國家，只有打好基礎，看淸目標，縮短陣線，以全力向那主要敵人進攻，才有生路可走。但是時至

今日，打倒也非容易的事情，還不是標語和口號所可了事，也不是發宣言打電報所可奏效的。

先說進攻帝國主義用武力進攻嗎？這是萬萬談不到，因為「日本人十日便可亡中國」（註四）兵端不可輕啓的，以十七年日本在山東演成的慘案而論，當時革命軍的打倒帝國主義口號，何等響亮；可是眞正碰到帝國主義來挑戰的時候，也只好趕緊迴避，繞道北行。強駐山東的日兵竟過一年，有誰向他們說出一個「打」字？不但不敢進攻，就是抵抗亦談不到；東三省和熱河的淪亡，逃難的人竟然聽不到砲聲，致形成打倒帝國主義和無抵抗並存不悖之奇觀。武力既力有所不及，於是又有從經濟上不合作來反抗。從打倒而退至反抗，形勢上已大有懸殊；豈知反抗猶有所不可能。開當十六年革命軍在武漢時代，帝國主義者對革命軍曾為消極反抗的總退却，其結果直至革命軍無法可以救濟。當時陳公博因而很痛切地說了些老實話，他說：「在目前我個人最感痛苦的，如要國民革命成功，非打倒帝國主義不可；但同時果要國民革命成功，先妥帝國主義不可。」（註五）原來中國被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既深且久，一面吃虧越大，一面依賴亦越深，好比吸食鴉片，癮越深者身體越壞，身體越壞者越離不了牠。所以若把經濟侵略手段一旦驟然撤回，我們便大起恐慌，支撐不住，反要哀懇於牠「請你還是侵略我罷。」（註六）

經濟上不合作既然和武力進攻一樣做不到，於是而有運用外交方式的所謂「革命外交」的主張。半殖民地國家不配有外交的，直至外交上的官司一路敗訴，終於閃避開民族間的衝突鬥爭，而以剷除封建勢力，便算是對外，便算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了。（註七）然則打倒帝國主義，當非幻想！

復次，封建殘餘的剷除。打倒封建統治，其歷史還早於打倒帝國主義。因爲數十年來無數次革命運動的對象，什九皆爲封建統治，而其結果，僅僅推翻滿清朝廷。——滿清倒而有十百滿清的承繼者——軍閥起，事態之奇特，已在第十一章中略爲敍述。——中國目前之大敵，原不止封建勢力一種，而封建勢力要居首位。牠本身肆虐於國人猶以爲未足，更甘爲帝國主義之工具，以作雙重之壓迫，故封建勢力，實爲中國目前首要之大敵。封建勢力原不止軍閥一種，而軍閥實爲封建勢力的集大成；故剷除封建勢力，應從打倒軍閥始。打倒軍閥既爲全國上下共同的認識，且又無打倒帝國主義者的多所顧忌。但是二十年來，越打越多，越打越強頑，此中必別有其奧妙存焉。軍閥之有帝國主義作靠山，固爲不易剷除的一原因；軍閥之有廣大失業羣衆，亦爲不易剷除的另一原因：然而其奧妙尙不在此，蓋時至今日，軍閥二字，不過對於有槍階級的一種通常稱謂而已。在

最初祇有北洋系統的軍事最高領袖曰軍閥；自洪憲帝制失敗，軍閥分裂而成割據局面後，初而軍人之獨霸一方者曰軍閥，繼則雖不能據地稱霸，祇要有若干隊伍指揮，藉此可以籌餉者亦稱之爲軍閥；後來經過長期混戰，兼併分化，成敗無常，於是軍閥與土匪已不可分（土匪擴大即成爲軍閥，軍閥零化即降爲土匪）而軍閥之範圍更見擴大。然而革命隊伍或革命勢力所能管轄的隊伍，猶不以此稱之。直至國民革命軍統一以後，初僅國共互以軍閥指謫，繼則同爲黨治下的隊伍亦互以軍閥相指謫，（某一時期西南對中央即有如此說法）其間中央直屬的隊伍，中央任命的長官，我人固不要人云亦云，然而軍閥數量的激增，確是不可掩飾的事實。此僅在軍閥之數量上言之，至其身分，更爲奇特。在過去祇有軍閥可以做匪首，匪首可以爲軍閥，任何變化，總是社會之盜賊。現在只要成爲軍閥，任憑你失敗到若何地步，總有一個好聽的名義，總有一個下台的地位，最不出息的也可住在租界，做一個當地名士。因爲這樣，於是有財有勢以後，人人想做軍閥；另一方面因爲當代聞人，出國使節，洋行董事，公司買辦，甚至文化機關的首領，無往而非有軍閥出身的人物。見得平常仇恨之心自減，到現在幾於人人心目中已不復有軍閥，社會的環境如此，若再喊出打倒軍閥的口號，不啻在妓院中講些貞操問題。總之，軍閥雖無法律的根據，已得社

會的默許：故剷除封建勢力，亦如打倒帝國主義一樣是屬於幻想。

這樣，除歷史上留給我們兩種的弱點已成爲不可挽囘的刼運外，經濟和文化的建設都無希望，打倒帝國主義和剷除封建殘餘又是一種幻想那麽中國還是一個啞謎，還是得不到答案。

我以爲要解決這個啞謎，先要解決兩個前題：第一，這次劃時期轉變的五四運動，是否已是終止了？第二，照着上面所述，中國已是沒有希望了，中國眞的沒有希望了嗎？如果沒有希望，那麽我們落得樂天安命，沉淪在落後的封建社會之中，忍受着帝國主義的刀刀分割，和在亡國的憧憬之下，通過了一個摸索時代。如果還有希望的話，應當往那兒走？這兩個前題把牠解決了後，其他的一切，也都解決了。

第一，原來一個時代臨了轉變，總有很長的歷史；一般人祇注意着爆發時的一階級，那就估計不出牠的眞價值了。譬如五四運動，罷爆發以前姑且不計，卽以運動的爆發起牠便一幕幕地展開下去，從愛國運動反對日本的侵略，進而恢復國權，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軍閥及賣國賊，反對基督教的文化侵略；更從而一方面反宗教運動，一方面革新教育的運動；因爲反帝而轉到反封建方面去，於是有打倒舊禮教；一面以反孔爲出發點，而有反對傳統思想，反對平庸的哲學，反

對僅存形式的文字；一面以民主運動爲出發點，而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婚姻自由等運動；由文學革命運動而引起思想運動，一面以賽先生德先生爲導師，一面以唯物辯證法爲規範，於是各立門戶，互爲駁辯。以運動的場所言，已由北京而普遍於全國；以運動的分子言，已由少數教授學生而普及於知識分子勞動階級和一部分的產業界。更以運動的高度言，民國八年到十六年爲一階段，尤其是最後的三年間達於最高度；過後，一落千丈，幾乎聲息全無，因此便有人以爲五四的精神消失了，劃時期的轉變沒落了。

五四運動沉寂了後，各方面的現象，比之運動爆發以前，確有倒退回去的模樣，中國似乎又像洪憲帝制前後的那樣僵凍狀態了。

但是，我們應當用歷史的眼光去估計牠，那就十六年的時間眞是短之又短，在歷史上任何一回大轉變，決沒有十年二十年就會結束的。也許中國人把辛亥革命看得太容易了，對於五四爲然覺得沉悶。其實辛亥革命也有數十年的歷史，如果沒有北洋系奪天下的野心，沒有袁世凱去幹逼宮的好戲，民國元年的誕生，那就須得延遲幾年；所以辛亥革命的成功便是牠的失敗。再看西歐的一次文藝運動，歷史上看來，牠奔放出來一幕幕轉形期的事態，好像緊湊非常，熱鬧非

常，可是把年代計算一下，那就有滿清入主中國的一個朝代光景，事後的我們，祇見緊湊，祇見熱鬧，當時在西歐的劇中人，不知揮過多少熱淚，流過多少熱血，各國憂時之士，也不知有多少人煩悶，有多少人失望。其實轉形期的時代車輪一經推動，便無法制止；思想上的種子，一經傳播，遲早總要出七。例如法蘭西大革命不知走了多少曲折，不知遷延多少年月，結果民主之花，最先怒放者還是法國又如新教之於英吉利，不知費去幾許週折，仍被壓於梅麗女王，停頓於依利沙伯，但到十七世紀中葉，便和政治問題聯合而成英國空前的大革命。至於在轉形期中社會的混亂，也是必然的現象，因爲轉形期的全程，便是若干社會現象突變的累積，也是若干社會秩序破壞的累積，突變和破壞都是社會混亂的因子，並且在這突變破壞的過程中，新舊勢力又必自然地發生狹義的改良，和愚昧的盡忠，而有玉石不分之弊。凡此種種的結果，不但可使道德的標準降低，外患內亂天災人禍，亦必以整個社會不安定而俱發。此種現象，可以中世紀以後的日耳曼做代表，牠對於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都不是主角，而始終是西歐轉形期的犧牲者，直至三十年戰爭結束，牠已完全沉淪，政治上的分裂，經濟上的崩潰，歷史上任何國家中找不到和牠相像的一個時代，當時日耳曼人的人格，也和牠的政治地位一樣墮落到深淵裏去。但是牠終於跳躍起來，終

於成爲一個近代非常的民族國家。

中國這回轉變，僅有十六年，表面上似乎沉寂了，平原下的火山，却仍是不息的燃燒着；只爲了前途遭逢着崎嶇，車輪似乎暫時的遲緩下去，其實牠還是向前衝去，去衝出已往失敗的路線；誰說這轉形期的巨輪早已歇了下去？

第二亡國滅族之危言，始於中日戰後，至清末而言之者衆；及九一八而言者益衆。究竟不亡不滅乎？必亡必滅乎？殆已普遍於國人心頭之疑念。在滿淸季世，每逢外交上之失敗，必有志士仁人，奔走呼號，國人亦必皇皇然，惟恐豆剖瓜分之不可免，而子孫將無噍類矣。今者外患內憂，已是司空見慣，獨佔共管，徒爲飯後談資；是則爲必亡之徵乎？抑爲不亡之徵乎？數年前有人著以中國必亡論一書，歷舉我族弱點十八端，間附圖表以證實之，出版未久，風行全國，成爲中國出版界驚人之紀錄，（註八）國有以必亡論行世者，復以甚速之速度，甚廣之數量，致其聲而窮其究竟者，是爲必亡之徵乎？抑爲不亡之徵乎？惟是人人不圖救亡而嘆息必亡，雖不得必亡之結論，已有必亡之條件，而况自有其事實之存在乎！

中國雖有必亡之條件，但是中國還有前途。還有不亡的希望。

中國既有前途，既有不亡的希望；那麼中國究竟往何處去？就是今後的去路在那裏？

「中國往何處去？」除了少數別有肺腸及大多數莫名其妙的糊塗虫外，凡稍有思想的人們——尤其是被壓迫的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總是鬱結苦悶，無法解決。因爲這樣，便有無聊的知識分子，他們替假革命者和野心家，也常扳起面孔，說些今後去路的鬼話；他們自身在行動上、在理論上，都表現他們的矛盾和動搖，對於這個問題，當然沒有澈底理解的可能。因爲這樣，國際帝國主義者忙着授意於買辦階級，要依照他們的意思來指導中國；共產國際也忙着吩咐代言人，要依照他們的圖案來建設中國。而在這兩大國際領導下之中國智識分子和青年戰士們，固執各爲其主的成見：資本主義的代言人以爲中國現在政局的不安定，是沒有建築以資產階級爲背景的政治，所以要走資本主義的路，以求獲得資產階級的同情和援助。機械的唯物論的代言人，以爲中國必經過資本主義的階段，而後方能走入社會主義之路，故唱爲二段革命論或純民主論。共產黨史太林派的代言人，以爲中國革命只有第三國際所指示他們的國際路線，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們便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性民主革命。但是託爾斯基派的代言人又說現階段的中國，又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有發動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於是資本主義和機械的唯物

論反對共產黨，資本主義又反對機械的唯物論，而共產黨的史太林派又反對托爾斯基派。他們自己混戰還不算，就是外界素不相干的人，因爲對於各種問題看取的方法不同，也被他們盲目地攻擊；共產黨人說：「你是市民階級的代言人。」市民階級的代言人說：「你是共產黨。」他們果然各有用心，外界却被他們鬧得黑漆一團。近來中國思想界的樊然淆亂，和青年們的煩悶徬徨，悉基於此。

那麼中國究竟往何處去？文化建設既有所不能，經濟建設又有所不可，剷除封建勢力儀是一種幻想，打倒帝國主義又是絕無希望，那麼祇有讓唯心論者說些玄之又玄的高調了，於是「民族復興」的聲浪，便甚囂塵上。但是中國過去的民族是怎樣？現在又是怎樣？復興些什麼？用什麼方法去復興？到現在不但沒有做出成績，並且沒有說出辦法，勉強找些復興的事業也祇有革命老家的廣東，已在提倡讀經，商業中心的上海，已經發起保孔存文，和文化城的北平亦已急起直追，嚴厲禁止男女同學的了。除此以外，祇有修建孔廟和民族掃墓兩事而已。本來要中國復興，要成爲現代化的國家，不是說些無聊話，做些無聊事便可實現，况且中國民族，尤其是漢族，早已衰老落後到極點，眞的復興成功，祇有把中國民族越發庸俗與無能而已，所以民族復興，不過是

那些東方文化學者的一種烏託邦，封建統治者的一個烟幕彈，是中國的歧途，不是中國的出路。

要找中國的出路，首先應把一切抹煞了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抽象觀念，根據客觀的現實，予以個別廓清的必要。現在中國正在劃時期的轉形期中，我們所需要的是具有革命的鬥爭與創造的要素，而不是單純的模仿與抄襲，同時也不是妥協與奴化，更不是安命與樂天。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法蘭西民族革命的勝利，因爲牠和歐洲其他各國有不同的地方，牠一開始就堅決和舊的傳統完全斷絕一切關係，一開始就脫去神衣而登上赤裸的舞台，牠的民族興起了無限光榮也僅在壯烈的革命的鬥爭基礎上面。現在中國的出路，亦祇有從壯烈的革命的鬥爭下手，枝枝節節做去，或者遊離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史的意義而盲目地碰壁，付何任何極大的代價，徒然造成形形色色逆流的現象而已。

或者以爲在國際帝國主義者共同進攻中國的今日，尤其是沿海沿江存帝國主義者的控制形勢之下，那種壯烈的革命鬥爭，無論如何不會成功的，並且國內還滿布着帝國主義者的工具——封建殘餘，這種有利於中國而不利於他們的舉動，他們比帝國主義者還要防上得嚴密，那裏可以發動？這便表示着沒有革命的勇氣了，革命而無強頑的敵人無艱難的境地，便失去了

革命的偉大意義。現在國際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雖在加緊對中國的壓迫和剝削，但是國際資本主義，已是到了最後的一個階段，牠和中國民族一樣地衰老了，牠的歷史的命運業已走在盡頭了。現在中國雖是正在受難的年代，但是同時也是最有希望的年代，祗要內以「喚起民衆」，外以「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一齊開始壯烈的革命的鬥爭，奮往邁進，共赴此的！中國轉形期的開始，便是世界轉形期的開始，中國進了歷史的新的階段，便是世界進了歷史的新的階段！

要中國踏上歷史的新的階段，依着客觀的發展，是必然的到來。這裏，便應當學習法蘭西大革命前期的教訓（註九）創造一種盛大的進步的思想運動，便可加速這個新階段的到來，使還革命前進的歷程中，依着歷史的運行，作有利的前導，和有力的推動。並且中國社會發展過於落後，民族意識久已澌泯，格外需要一個更高度的更豐富的思想運動。思想運動往往在民族受難年代中最易沒落下去，亦最易鍛鍊出來，民族的盛衰就在這一點上分別。中國在過去祗有片段的主張，沒有體系的理論，中心思想還不易產生，那裏夠得上稱爲思想運動。孫中山也認爲過去革命的失敗，在於沒有樹立中心思想所致，可惜孫氏沒有把革命大業完成便長逝了。中國的

革命運動，沒有把中心思想建設成功，所以在理論上表現他們的矛盾，在組織上表現他們的散漫，在主張上表現機會主義的抬頭，在行動上表現官僚政治的復活，甚至許多人不知他所處的是中國，更不知自己是中國人，這樣無思想的人羣，那裏可以建設成功一個現代的國家！

現在中國是需要創造一種思想的歷史運動，造成中國近代思想發展中一個更高的，新的歷史階段，把革命情緒發揮到最高度，不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教育上，不論是社會的，個人的，都有澈底破壞澈底創造之必要，祇求在民族解放與國民大衆利益的大前題下，一切不可以成見對付。這樣，我們相信在民衆眞正喚起以後，封建勢力便失去其基礎而不能苟延殘喘的了，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眞正聯絡，帝國主義已失其根據而結束其歷史的行程了。外無帝主的侵略，內絕封建的肆威，再以革命的情緒，激發民族意識，創造民族性格，生產事業由此而進展，文化水準由此而上昇：這便是中國今後的出路，也是中 民族今後唯一的生路。

在內憂外患交迫下的中國，眼見牠漸漸走近滅亡的路子，似此空前未有的嚴重局勢，是中國人最險惡的遭際，也是中國人最壯烈的成功之良機。過去的一切，演成了現在，還在變作將來，在因果牽連禍福相倚的歷史運行中，任何成功都可以看作失敗，一切失敗也可以促其成功，以

往的錯誤同過失，只有懺悔，只有責備自己，只有慷慨的承認錯誤，勇敢地改過自新，去衝出已往失敗的路線，重新幹起，把不堪回首的往事，當做成功之路的明燈！中國有希望，中國還有前途，—中國必將跳舞起來！—

參考

(註一)日耳曼民族作自由思想的如威克立夫等，能謀獨立生活的如城市的興起等，能建立强固的政府如英法等國，能自己自由表現個性的如詩人但丁等，藝術家喬託等，能繼續希臘人遺緒而作科學研究的如路加培根等。

(註二)歐洲自十二三世紀發生一度宗教狂熱後，對於宗教信仰日漸冷落，於是希臘的酒神和愛神漸有代基督的上帝而興的趨勢。但是不久又因爲歐洲出了三件可怕的事，一是土耳其人的侵入，和東羅馬帝國的滅亡；二是一五三一年夏在日耳曼和瑞士地方彗星的長期出現；三是魔鬼來臨的恐慌。於是一般人在這樣心理狀態之下，又熱情於宗教的信仰了。

(註三)歐洲在中古時代對於拉丁文猶之我國的官牘文字，古學復興猶之我國唐代文人的提倡古文學，方言文學猶之我國近時的白話文運動，古學復興者和方言文學雖水火不相容，可是對於已死的拉丁文，一致的進攻，所以古學復興在復古中仍有創造意義。

(註四)孫中山曾在三民主義中雖有這樣的說法，他不過是證明中國的無能，並不是說帝國主義的不可去打。可是現

在竟把他引爲長期抵抗的煙幕彈了

(註 五)「陳公博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中,歷舉十六年革命軍對於帝國主義總退却後的苦痛,他說:「工人和外交部所打筆墨官司外交部和外國領事所打筆墨官司,都是要求外人復業歸根一句話,我對帝國主義亦爲總退却的妥恰」革命軍已經跪在帝國主義者的面前了,那裏敢說打倒?

(註 六)梁漱溟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

(註 七)前進第一卷第六期汪精衛覆林柏生書中有「軍閥是帝國主義的工具非先剷除國內軍閥,何能對外?且剷除軍閥已[illegible]是對外了。」

(註 八)見二十二年六月四日時事新報評論。

(註 九)法蘭西大革命之前導爲盧騷福祿持爾等大思想家,所以史家稱法國民族興起之光榮,盧氏等啟發思想的功績,應和犧牲沙場的革命戰士同一偉大。

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終